中共歷史的見證

——司馬璐回憶錄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第二版

《真相》系列（三十）

中共历史的见证

——司马璐回忆录

司马璐 著

明镜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Witness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emoirs of Ex-Communist Smarlo Ma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Mirror Books

©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2138-15-3

by Smarlo Ma
Chief Coordinator Ho Pin
Cover by Yi Hua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 11514-0366, U.S.A.
TEL:(516)338-6976 FAX: (516)338-6982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info@mirrorbooks.com

明镜出版社出版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禁止翻印，转载，复印，违者必究

本出版品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本出版品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内容简介

本书著者司马璐，原名马义。在那个封建社会，马家祠堂不认我，因为我是一个私生子，我自幼是个孤儿，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幼年依亲读了几年小学，其后在流浪中自修苦学，渐对时事发生兴趣，先后参加过左翼读书会与中国共产党。去了当时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使我的一生不断发生奇遇。

我在延安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中共第一代互相对立的人物。

我在延安读过抗日军政大学和担任抗大图书馆主任，当时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开始由于情感纠缠，从情敌被打成政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派我到敌区做地下工作，接受考验。因为我的表现积极被恢复党籍，担任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其后又被派往浙西，当时我的处境危机四伏，惊心动魄，分分秒秒在和死神共舞，目睹多少为理想奋斗不息的年年人，死于党内外的斗争中。我终于逃了，我于 1937 年入党，1943 年退党。

我退出中共后，继续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参加过中国民主同盟，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织「中国人民党」等，由于当时中共对于一个自动脱党，又对中共内轻了解太多者，一直穷追猛打，欲置我于死地，1949 年中共政时，我逃到香港。

我在香港组织过「中国自由作家联谊会」，成立自恋通讯社，出版《展望》杂志，创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等，先后出席过「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多次，应邀访问西德，苏联等国。

我在从事中国民主运动中，先后接触过沈钧儒、章伯钧、蒋介石、蒋经国、李友邦、郭雨新等。

1983 年我移民美国，先后主持过《探索》杂志，组织过「中华学人联谊会」等。

我少年时代与戈扬结伴从事革命运动，相识逾 70 年，期间经过几度离散，终于在 2002 年 9 月在纽约结婚，共度晚年。

夏志清教授说：「你们二人的故事，将是兄的自传，也希望能搬上银幕，让世上更多人都能看到。」

李又宁教授说：「你们的爱情故事与现代史密切关联，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柏杨、张香华伉俪说：「有情的人一定有缘，有缘的人一定有果。」

余英时、陈淑平伉俪说：「你们真是理想的最后结合。」

刘再复教授说：「你们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事幸福的。」

感谢朋友们的祝福，请读者看我们的故事吧。

司马璐晚年在纽约的活动



中华学人联谊会举行文化大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演讲人前排左起：张敏、遇罗绵、司马璐、王友琴、龚小夏，后棑左起：丁抒、宋永毅、遇罗文、张郎郎、胡平、陈奎德。



中华学人联谊会举行王若水先生追思会，左起：王丹、冯媛（王若水夫人）、司马璐、萧强。

（曾慧燕摄）



司马璐、戈扬结婚宣言

我们相识了 70 年，从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战，不断的接受挑战。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新观察》，一个在香港办《展望》，连结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姓名。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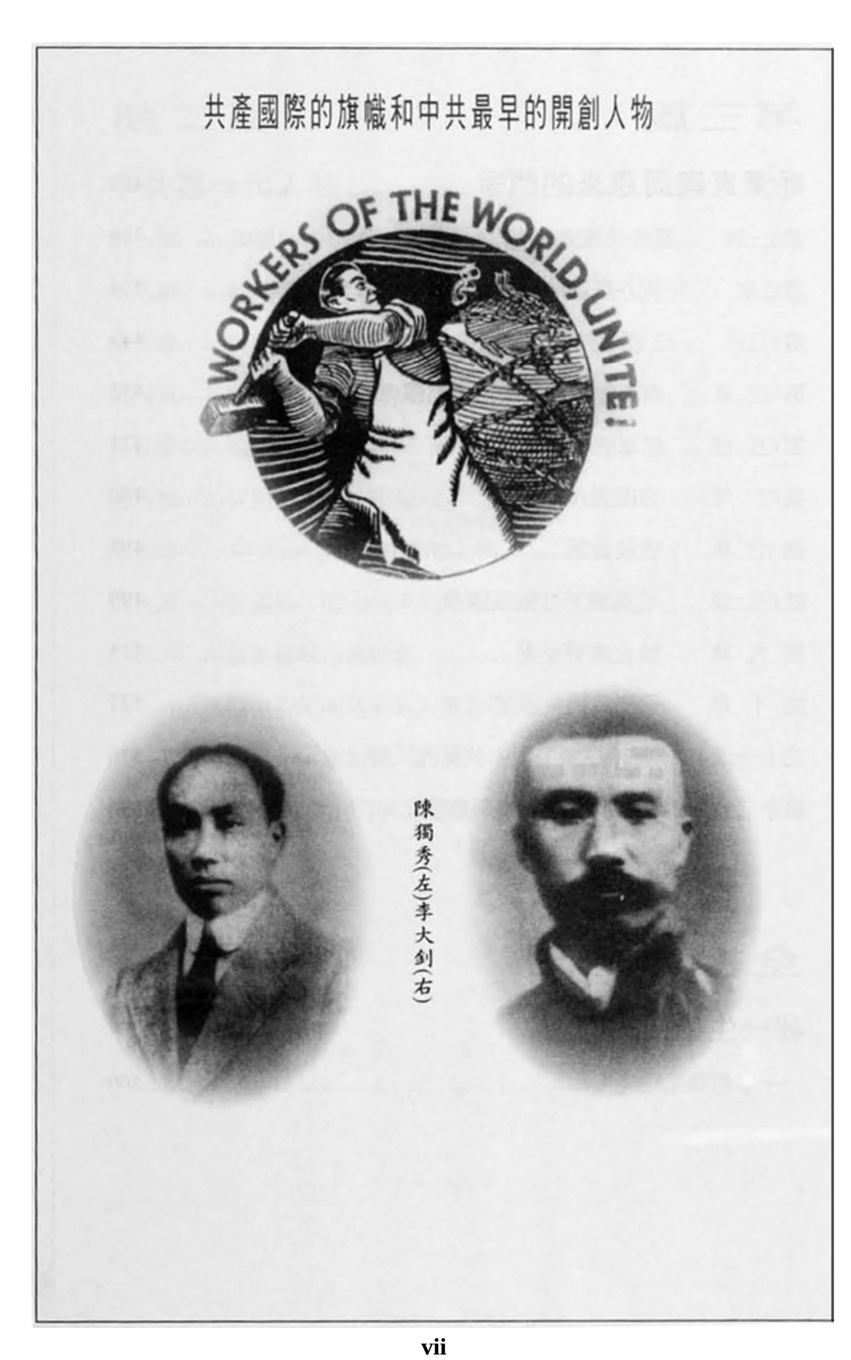
感谢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感谢高贵的法官和潘绮玲律师，以及亲戚好友的见证。见证我们的——结婚宣言。

司马璐（原名马义）时年 83 岁
戈扬（原名树佩华）时年 86 岁

2002 年 9 月 13 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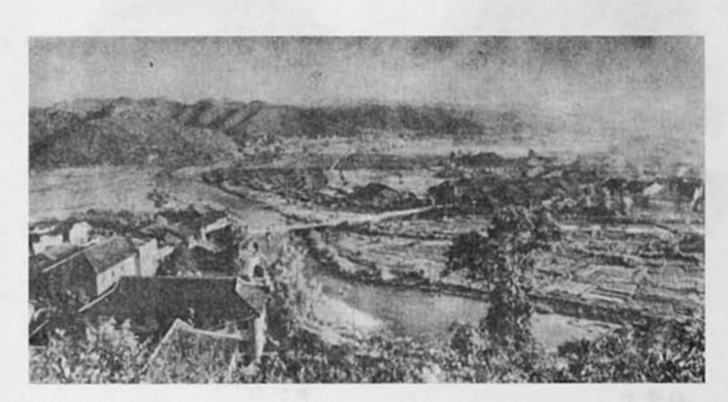
陳獨秀(左)李大釗(右)

井岡山「火併王倫」

1927年國共分家，中共秋收起義失敗，毛澤東率部投奔井岡山，與山大王袁文才(下左)王佐(下右)結拜兄弟，找到立腳點，不久就把袁、王殺了。情節很像《水滸傳》中的「火併王倫」。







井岡山一景

中共早期的風雲人物



張太雷
廣州暴動的領導者



陳延年
陳獨秀的長子，在莫斯科受訓後回國主持廣東黨務，領導過周恩來，清算過他的父親。



向警予
中共最早的女活動家



瞿秋白
清算過陳獨秀。中共第二任總書記。

中共早期的風雲人物



瞿秋白與夫人楊之華女兒獨尹合影



李立三
中共著名「立三路線」
的代表人物。



周恩來
黨、政、軍、特一把抓。

毛澤東的一部分親人們



楊開慧



毛澤東與賀子珍



毛澤東與江青
這是1939年著者在延安親自見到的一個鏡頭。



張文秋
毛澤東的雙親家，也是周恩來上海地下工作的「主婦」，國際著名間諜佐爾格的助手。

周恩來與他的一部分親人



前排左一爲張若名，第四排右二爲周恩來。(1920年7月17日攝於天津)



周恩來與鄧穎超唯一的親熱照片。



周恩來(中)、鄧穎超(右)、孫維世(左)。



艾蓓

她算不算周恩來的親人還有待考證。

周恩來的劇照



周恩來劇照之一
(周恩來在「仇大娘」
劇中演惠娘，左起第
二人)。



周恩來劇照之二
(周恩來在「一元錢」
劇中飾演孫慧娟)。

中共六屆四中的反對派（之一）



羅章龍
當時爲全國工團書記



何孟雄
當時爲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林育南
全國蘇維埃會議籌備會秘書長



柔石
中國左翼作聯盟負責人之一

中共六屆四中的反對派(之二)



般夫　魯迅的朋友



胡也頻　丁玲的丈夫



李求實　中共的文委領導人

江 西 蘇 區 (之一)



1931年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蘇區的群眾大會

江 西 蘇 區 (之二)



古柏
毛澤東的秘書，
江西反AB團的主角之一。



陳伯鈞
江西反AB團的主角之一。



羅明
「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

把毛澤東抬上遵義會議的兩名轎夫



中共革命博物館中的遵義會議。牆上掛像爲(自左至右)：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王稼祥、陳雲、劉少奇、朱德。



張聞天
毛澤東自己說，在遵義會議中，毛從周恩來手上奪權成功，張聞天投了他關鍵的一票。



王稼祥 王稼祥出身國際派，遵義會議前夕倒戈擁毛。



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麗，朱仲麗自稱愛毛澤東更深。

張國燾的第二中央



毛澤東與張國燾合影



張國燾、張國燾的第二中央，黨軍政的第一把手。



徐向前、張派中央軍事的第二號人物。



陳昌浩、張派中央的政治第二號人物。





張國燾派的第二中央在川陝的石刻標語。

陝北紅軍最早的領導人



唐澍



謝子長



劉志丹



高崗



陝北肅反時，毛派幹部到達陝甘邊區。前左起：
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後左起：
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戰抗初期的武漢第二中央



周恩來



王明



秦邦憲



李克農



王明(左二)、周恩來、吳玉章、羅炳輝在武漢合影。



王明(左二)、周恩來(左三)代表第二中央向國民黨獻旗。

一張具有諷刺性的中共歷史圖片



1938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六屆六中全會，開始清算王明，會前攝有這張照片。毛澤東特讓王明坐在前面正中的主位，毛澤東與康生則站在後排兩邊。

一張被中共逐步毀滅的歷史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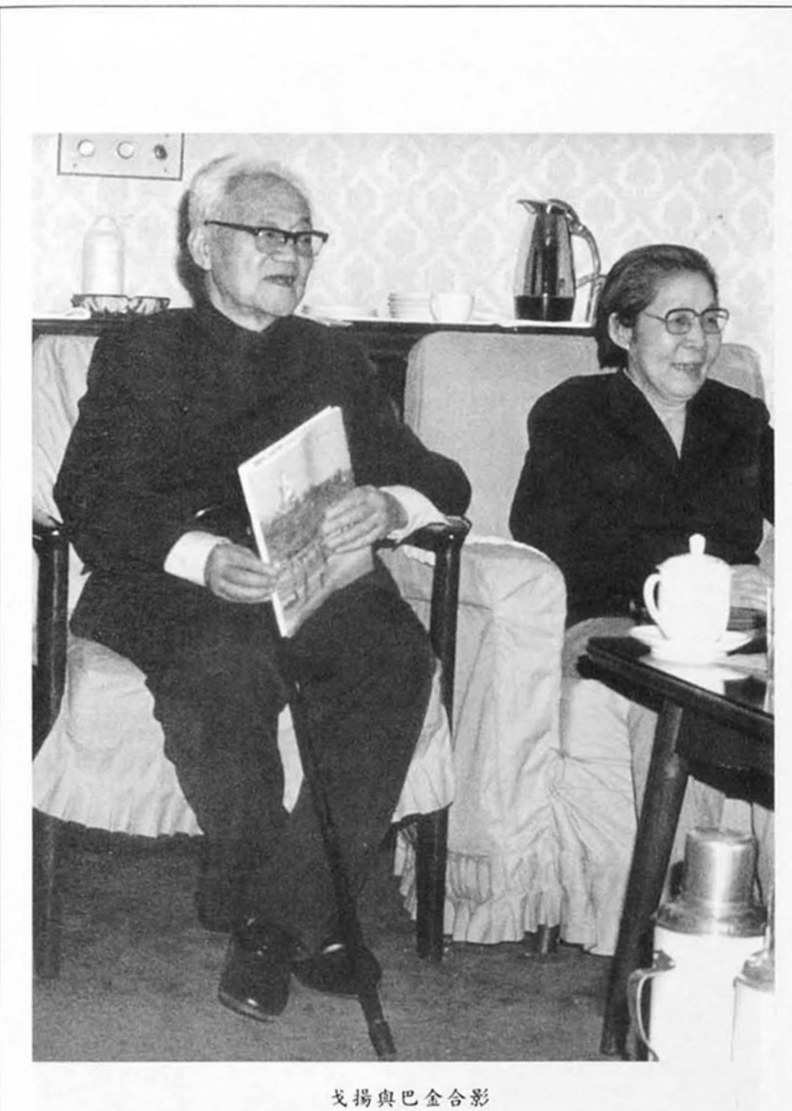
1959年7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又稱廬山會議)，作出了「彭德懷、黄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決議爲「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鬥爭的同志平反，摘掉「右派帽子」。這次會議爲表示黨的領導已經糾正錯誤，團結一致，集體領導，有這樣一幅歷史性的照片，左起：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林彪。1966年，毛澤東領導「文化大革命」起，先把劉、鄧在圖片中抹了，林彪事件後，又把林從圖片抹了，四人幫倒台後，這張照片重新被中共引用，但是沒有林彪。

司馬璐延安時同一代的老朋友


王實味


鄧　拓


田家英



戈揚與巴金合影



1989年4月20日，戈揚悼念胡耀邦，獻上花圈後離開天安門。

历史的切片（戈扬散文代序）

一段日记

1937 年 7 月初，我回到海安。

回家没几天，7 月 8 日早晨，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原来是司马璐，当时他的名字叫「马义」——司马璐，瘦长个儿的青年，一身深色衣服，脚上套一双裂了纹的皮鞋，「裤呲裤呲」地来到堂屋。在东边桌边，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他神色兴奋的告诉我：「抗日战争开始了！」

「哪天？」我问。

「昨天，7 月 7 号。」他答。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文化馆有一个无线电，由我管，我从无线电知道的。」他说。

司马璐是我同乡中唯一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只知道在镇江时，我们开秘密读书会总有他。他被国民党抓过，放出来时，中共因他没有出卖过人，叫他回海安，先在文化馆呆着。他就是这样去海安文化馆的。

文化馆在海安中街衙门口的西巷子，门前很宽阔，尽是雪白的大石头。但很少有人住，有时只有他一人，所以让他管无线电。当时，文化馆的这架无线电，也是全镇唯一的一架。司马璐说，他听见日本军阀在卢沟桥放的枪声了。

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跟着忙起来，司马璐回文化馆，我和他一齐去。到文化馆里面，在黑板上写呀改的，弄了好半天，才把黑板报挂出去。先是衙门西巷子里很少几个人看，一下子一堆人看，马上人

都涌来了，人山人海，好像是全镇的人都出动似的。于是，人群里发出了声音，于是，粗话脏话也跟着来了。

「小鬼子敢打中国？还不把他打的头破血流，没处叫娘。」

「人家有坚甲利兵，你有个啥？」

「我？有的是人！一个顶一个，一条顶一条，看看谁斗得过谁？」

我被打成右派

1958 年 3 月 8 日，一个晴朗的午后。北京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北头的北长街 78 号，中国最大的杂志社之一——《新观察》杂志社，以党支部扩大会的名义举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全体会议。作为《新观察》杂志的主编，也是杂志社负责人的我，就在这次会上被正式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即反动派，或称反革命。

这个晴天霹雳，震撼了杂志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人人面色苍白。他们或正视，或侧视，或低头偷视着我。人人的脸上，彷佛都写着「惋惜」二字。

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十足年龄 42 岁，参加中国共产党 17 年。在座的党员中，我是党龄最长的一个。经过抗日战争，在战火中受过伤，右足留有伤痕，有「三等残废证书」。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新观察》杂志主编。这本杂志于 1950 年 7 月 1 日，由历史学家黎澍创办。《新观察》原是一本时事政治性半月刊，是年 11 月，我接手以后，改为时事政治、通讯报导、文学、艺术、生活的综合性半月刊。七年来准时出版，发行数由原来的 40,000 份，逐月逐年增长，如今将近 600,000 份，仅次于全国发行数最高的刊物《中国青年》。

六四的枪声

「四人帮」倒台后，我从被流放的农村回到北京，把《新观察》恢复了。

1988 年 12 月 7 日，北京大学成立「未来学会」，我去讲了一次话。下来后就有人告诉我，中宣部派来特务把你的讲话录音录去了。果然第二年春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把我这次讲话稿印发给大家，批判我否定社会主义。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人们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我也去广场送了花圈。可是我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只是在参加胡耀邦的遗体告别仪式后，以无限的愤慨写了一首诗《这边和那边》，便来美国参加一个座谈会离开了北京。

4 月下旬，我来美国加州参加一项会议，正是回国的那天，北京戒严，我便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我到哪里去呢？

祖国的历史文化给了我一个启发，暂时皈依佛门，我便去洛杉矶的西来寺住下。

「八九民运」期间，我的心总是悬着。看报纸、看电视，那些惊人的消息，动心的镜头，越看，我的心越是悬着。

北京啊北京，千千万万的我的亲人啊！兵临城下，虎视眈眈，他们想干什么呢？6 月 4 日，枪声终于响了。

我呆了，我木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尸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我用笔在纸上划，不知不觉地画出了一只手、两只手……血淋淋的手。就是这样一些手，把北京城弄得横尸遍街衖，鲜血流入护城河，一座生气勃勃的都市变为惨不忍睹的死城。

我在北京大学的那次讲话，「六四」后北京市长陈希同「平乱报告」中，把我作为动乱分子的头条大罪状，证明他们杀人是正确的了。

《WM 我们》的轰动

前几年北京来人说，王培公走出监狱的当天，就有几十位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到他的家里去看他。我不认识王培公，但是我想，如果我在北京而又没有蹲监狱的话，我也会去看他的。王培公是一位穿军装的剧作家，写过不少戏。我只看过他的一出戏——《WM 我们》，那是 1985 年秋天，在北京西单民族文化宫。那时正是话剧的低潮，而他的这个话剧却突然掀起了高潮，轰动全北京，每天预售出几天的票，售票口还在排着长龙。单就这点，也就足够人们深思的了。

那天下午我走过剧场，碰巧的是胡乔木也进了剧场，就坐在我的右前方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他，他没有看见我，因为我是观众，他是审查官，凌驾于观众之上，人们总要拿眼睛点他，因而我也看见了他。只见他正襟危坐，那苍老而瘦削的脸上只有皱纹，没有笑纹，好像谁都欠下他的债，他是收账来的。这首先就给了我一个不祥之兆，这出刚刚开场的戏，说不定就要收场。

《WM 我们》为什么如此蹦动？毫无疑问，我和胡乔木都是带着同一个问题走进剧场的，只是各自的目的不同，各自的感受不同罢了。

作为观众，我很快地进入角色。台上的七位知识青年，一个个都像是我的儿子或是我的女儿。一刹间，我彷佛不是看戏，而在重温自己的生活。

要寻找这出戏轰动的原因，这就是原因。

尽管王培公只是一位艺术家，一位不问政治的艺术家，在他的剧本里，没有写一句政治性的台词，只是艺术地描写生活。要知道在中国大陆，现实生活是描写不得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如实地一写，就必然会得出与中共意愿完全相反的政治结论。

理想主义不见了

到纽约以后，一天中午，美国女作家苏珊·维蒂在曼哈顿的一家

日本餐馆，请我和马元希小姐吃饭。饭还没有上桌，她先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纸，我们一看，是《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已经译成英文。

我先是一愣，然后问她：「这个中国的古董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她笑道：「是我的朋友从中国大陆寄来的。」接着她问我：「你不是当过新四军么？会不会唱？」

「会唱。」我说着，便轻声地哼了起来。

苏珊坐在我的对面，勾着头，侧耳细听。一边还用手指头在桌面点着打拍子。等我哼完，她问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我品味着，感慨万千地回答：「50 年过去了，有隔世之感。」

「你还记得当时唱这支歌的情形吗？是在行军的时候唱？」

我笑了。心想，你真是一位美国的作家小姐。那是夜里行军，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怕被碉堡里的日本鬼子听见，哪里还能大摇大摆地唱进行曲呢？

我告诉苏珊，这首歌词的作者是新四军军长陈毅。我最初见陈毅时，他才 41 岁，穿一件粗布衬衫，灰军裤卷在膝盖上面，瘦骨嶙峋，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那时候当官的还没有小灶，大家吃的都是发了霉的玉米粒。正如歌词里写的：「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苏珊表情严肃，态度认真，指着歌词的最后一句「为了人类解放，为了社会生存……」问我：「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说道：「我们这些人当时确实是这样的。不过，那是理想主义。」

后来，这些理想主义就渐渐的不见了。

司马璐的傻子事业

什么是我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呢？

我常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傻子，一是骗子。有的人当傻子，有的人当骗子。

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司马璐过去都做了傻子，过去向我们宣传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大部分竟是骗子。

我从历史家身上看到了一颗颗赤子之心。可是弄得不好，得罪人不说，还有可能惹下大祸。司马璐过去吃了很多很大的苦头，还在死着心眼儿往傻子的事业上钻，一生犯了傻病，傻到家了，所以才写出《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这部书。这是记述傻子的年代与傻子的回忆。这本傻书的唯一价值是让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汲取历史教训。

引言（著者自序）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是记述我一生平凡而又传奇的故事。

我首先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首诗句，勾画出我这个人和我成长的时代背景：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
在我们面前万物俱全，在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全部直上天堂，我们全部直下地狱。

我的一生确实如此。我来到这个世界，地球上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我是一个私生子，我是一个孤儿。孩子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仰天大哭，天下之大，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家？我这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年少时曾经参加过革命，我曾经把共产党看作是我的家，我热爱过这个党，我曾经把我的青春奉献给这个党，在中共发展日渐壮大的过程中，我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党，为什么？这个故事是很复杂的、曲折的、传奇的。

当年我为什么向往和参加共产党？理由很简单。我自幼是个孤儿，又穷又失学，做学徒、干粗活，自视又高，想出人头地，靠自己自修苦学，能读点简单报刊，最初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后来被兄长辈的一些左派朋友引导和指点读了一些马列理论的书。又读了一些中共的文件。当时我真的逐渐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个代表穷人利益的

党，人人平等，救国救民，改造世界……。那时传达文件的同志就站在身边，我要当场读完（靠强记，不能笔记）。我每读一个文件，都有飘飘然的感受（大概就同吸毒差不多吧）。

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

共产党人中我见过的有毛泽东、张国焘、王明、秦邦宪、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林彪、康生、李维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王稼祥、董必武、林伯渠、潘汉年、高岗、柯庆施、邓小平、江青等。

民主同盟中我见过的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罗隆基、张申府、梁漱溟以及当时被称为民盟右翼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励。青年党领袖李璜、左舜生等。民盟有位无名英雄是鲜特生。

我到香港后，当时张君励等正酝酿组织一个新的民主运动，又被称为第三势力。不久，雷震代表蒋介石访问香港民主人士。1954 年我应邀访台，这是我首次见到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其后又去过几次。我对蒋介石的印象是威仪严肃，对陈诚的印象是十分拘谨，对蒋经国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当时国民党很重视教育，培养青年。

正由于我的上述经历这么复杂，具有这个条件写出许多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历史真实故事。

我在执笔写这本回忆录，时年 85 岁。回顾过去，我的大半生是在颠沛流离自生自灭中度过的，多次面临绝境，死里逃生，不断和死神搏斗，我亲历过这大时代大转变的过程，绝大多数和我同一代的人都已逝去，我认为自己更有责任忠实的写出我的记录，作为历史的见证。

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须有梦，我走进这个世界就开始有梦，一个梦接一个梦，我走过来了。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政治如戏，多少风流

人物和我擦身而过，论英雄各领风骚，朋友们常笑我是「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

第一篇 我是一个私生子

一个梦接着一个梦

钢丝上与死神共舞

我是怎样活过来的

一生的故事是传奇

第一章 五四运动那年出生的孤儿

1919 年，我出生在中国江苏省海安县。海安原是属于泰州县的一个大镇，为苏北水陆交通的要枢。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门前的一条河流和一座小丘。小丘名凤山。40 年代初，新四军到达海安，把小丘平了，所以凤山也就没有了。

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盐河，两岸是苏北鱼米之乡，出产丰富。但是农民却终年过着悲惨的生活，灾难频仍。每当收获的季节过后，农民们首先要把他们的谷物偿付高利贷，壮年男女就丢下家，到上海去帮工打杂。我们眼看着粮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从这条河流运出我们的家乡，而换来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从富有变成无产阶级

相传运盐河的两岸，从前都是盐场，海安距离海边只有六十华里。据说海安的原名就是「海岸」。有些农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们用手车把海鱼和「私盐」运出来，换点布匹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税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们的家乡，驻扎的税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这些税警，他们平日任性纵欲，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形同匪盗，孩子们都远远的避开他们。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张士诚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来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私盐贩子」，愤于虐政，率众起义，他起义的地点就是我们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义堂，为当年张士诚所建。多数的史家都把张士诚写成流寇或「盐匪」，然而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他的英雄事迹极受我们景仰。

海安有一位著名的绅士韩国钧，又名紫石，前清举人出身，曾任

东北外交特派员，山东和江苏省长，又曾多次主持江苏水利建设，后退休还乡。他属于国民党早期的反对党进步党，支持过袁世凯。袁死后他和国民党的高层人脉关系也很广泛。1940 年，中共的陈毅和刘少奇都先后到过海安，称韩国钧为德高望重的政界前辈，执礼甚恭，并将海安改为「紫石县」，以表崇敬，中共在海安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时，恭请韩国钧莅临指导。1942 年韩国钧逝世，「紫石县」改为「海安县」了。

我自幼姓马，初名马元福。后来改名马义，再后来又用了「司马璐」这个笔名从事写作，所以也有人以为我是姓司马的。我六岁时父母双亡，留下我和一位 13 岁的姐姐。当时我家的住宅很大，母先逝，3 个月后，父亲还未断气的时候，所有镇上和附近姓马的，都搬进我家来了。他们把我家的产业和所有贵重值钱的东西，差不多都抢光了。姓马的互相打架、无日无之。我的奶妈为了保护我，也被人打伤了。

姓马的人中也有「温和派」，在他们协商之下，留下一小部份家财给我和我的姐姐生活，并由另一家贫穷的叔叔照顾我们。所以我的家庭成份从富有变为贫农。

我的这位叔叔待我们不错，不过，由于他的经济能力有限，我只受到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教育，姐姐在父母去世前也读过一些书。我在 12 岁时就做杂货店学徒独自谋生，也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涯。我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

生母未婚生子为我自杀

说起当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 1 吊钱，约合当时的银洋 3 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比一个杂役还要苦，扫地、抹桌子、烧饭、洗碗之外，甚至还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里夜间打牌，我要侍候在侧，倒茶拿烟，等到他们倦了，天已黎明，他们一个个睡觉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继续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点倦态，鸡毛帚立刻迎头打将过来。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只饭碗，老板娘把我鞭打

得皮开肉裂，最后还罚我在烈炎下跪了两个钟点。最难忍受的是老板和老板娘不准我偷闲看书。有一次，老板娘骂我：「小杂种，你也配读书，给我滚出去！」

我回家把经过告诉姐姐，她哭了。我已经开始懂一点事，追问姐姐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她才开始透露了我的身世。

姐姐说：「我们家本来是很富有的，父母过世以后，家产差不多都被姓马的分光了。」

我说：「那一年伯伯叔叔们在我们家抢啦，搬啦，打架啦……到底为了什么呢？」

姐姐说：「他们那些宗亲说，我们这一家姓马的『无后』，所以凡是姓马的都可以到我们家分家，占有一份我们家的家产。」

我说：「我们不是有你和我吗？怎么可以说『无后』呢？」姐姐说：「我是女的，按祠堂（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祠堂的权力很大，他等于一姓的族长，有权裁决同族之间的一切纠纷）的规矩，有女没有男，就算是『无后』了。」我接着紧张地问：「我不是男的吗？」姐姐看着我，迟疑了好一会，才慢吞吞地吐出 5 个字：「你是抱来的。」说完，姐姐转过头又哭了。

姐姐又给我看过父亲逝世时的「讣文」，在我的名字上面有「螟蛉子」3 个字。在中国旧社会的伦理关系中，「螟蛉子」就是「养子」的意思。

这是姐姐第一次向我道出我的身世之谜。在这以前，我和别家孩子吵架时，他们都骂我「野杂种」，这时我开始悟到，他们可能早就从他们的家人中听说过我的身世的秘密了。

我既不是马家的亲生儿子，我是从哪儿来的呢？姐姐只能告诉我：「你是从育婴堂（孤儿院）抱来的。」我问她「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就不能回答了。

我童年时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贪玩，顽皮。有一晚在当地的徐春来茶叶店中，和别的小朋友捉迷藏，在追缠中扭伤臂腕，茶叶店立即请来医生治疗，也为此我和该店小老板徐展堂成了童年好友，每当他听到有人对我有侮辱性的语言，非常气愤不平。他后来用了多年时间为我「寻根」。1941 年冬，我一度回到海安，我们畅谈通宵，他就我的身世作了认真的查访和考证，对我作出以下的报告。

我的生父叫陆省斋，海安一位著名医生，生母崔氏，是海安一个大户崔家之女。陆省斋当时等于是崔家的家庭医生，常在崔家出入，把崔家小姐诱奸成孕，以后就生下了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未婚生子的少女被认为有辱家门，自己也觉得见不得人，我的生母当时还是个 17 岁的少女，在忧惧中生了我以后，旋即吞金自杀，崔家把我送进了「育婴堂」，也全家搬出海安，不久马家就从「育婴堂」领养了我。

马家也是海安大户，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没有儿子，所以急于领养一个男孩子。我一入马家，拥有封建权威的「马氏祠堂」就紧急会商宣布，因为我不是马家人，永远不能进「马氏祠堂」。

我的马家父母实际上等于我的养父养母，整日夜都双双躺在床上抽鸦片烟，由于外间传说这马家太有钱了，周围姓马的都等着这一家主人快死，后来就是我六岁时亲眼所见的，姓马的爆发一场「内战」，混战一团。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认识过的我的「家」。

父子相见，心照不宣

如果说，我的诞生，我的生母崔氏为我自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一场马氏宗亲夺产便是一场闹剧和丑剧。我的身世中悲剧是第一幕，闹剧和丑剧是第二幕。其后我和生父见过一次面，陆省斋先生（他虽然是我的生父，我只能这样称呼他），我终于和他见面了，当时我笑不出，哭不出，心里很乱，外表上又要装得少年老成，若无其事，这

亲父子见面的一幕，是喜是悲？是悲喜交集？是激动还是冷静？那种复杂的心情真难以形容。

我童年时代的好友徐展堂对我详细谈了我的身世。我脑子里仍有旧的伦理观念，我准备去拜祭我生母的坟墓。就在这时，不知是否有人故意作的安排，我的一位马家堂兄请我到他家吃饭。这一天我去了，主人说：「没有外人，都是自己家里的人。」经介绍，我的天，一位年约 50 岁的中年人，竟是陆省斋先生。我们四目相对时，我有些不自在。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两对眼睛开始对话。我仔细看，我的身材和五官同他完全一样，肯定我是他这个模型中打造出来的。我心里想：「他就是我的生父，绝对没有错，我已见到生父了。」他对我谈话的态度温和、体贴、关心，不断向我碗里夹菜，嘱咐我留心身体等等，我感到他是一位仁慈的父亲。我们谈话时，彼此都没有勇气揭开这个秘密——我们的父子关系。他称我「马先生」，我称他「陆先生」。更有趣的是，他要他的孩子叫我「舅舅」。他续娶的填房也姓马，所以我们彼此的称呼都很滑稽。别人也在窃窃而笑。这一天（也可以说这一世），我们亲父子相聚 3 个小时，然后在「陆先生」、「马先生」的相唤中说了声「再见」。所以我说这一幕勉强可说是一幕喜剧。

这次海安之行，一想到生母，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没有我，我的生母就不会死了。我又想到我马家的奶妈，没有她的奶水哺育我，我是活不了的。我想要哭，想要叫，我要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需要亲情，需要父母的爱。

我一生从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来到这个世界，她走出这个世界。她付出自己青春的生命，生下我这个儿子，便和我天人永别了。陆省斋先生，你虽是我的生父，可是我一想到生母的死，我就恨你。我曾经想去生母的坟墓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后来知道她的坟墓已无影无踪了。感怀身世，我曾写了以下几句：

吾母为吾生，吾母为吾死；父子相逢时，心中乱如丝！

1941 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我的出生地——海安。我从此漂泊天涯，在全世界流浪超过了一个甲子（60 年）。每当朋友向我诉说他们的乡愁时，我总觉得，他们的故事对我是很陌生的。这是我的错吗？

第二章 从学徒到参加共产党

我的阶级成份怎么说呢，我的生父和生母都是富有的，我的养父母也是富有的，由于我是一个私生子，在那个封建社会，我被遗弃，我一出生就没有人权，没有人的地位，我被送进孤儿院。后来，同样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马氏宗亲借口我不是马家的血统，争夺领养我的马家财产，我和姐姐遭此浩劫，最后由一个贫穷的叔叔照顾我们。这叔叔家有妻室，没有儿女，我和姐姐就叫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一家 4 口，靠租来的 12 亩地过活，很艰难的。开始他们还供给我读书，我读了 2 年私塾，3 年小学，因为家里无力负担，就停止入学了。我就做了几天帮工，不久就溜回家。

那个年代，几乎年年有内战，我的环境迫得我还是必须独自谋生。当年时局的混乱，又迫使我成为一个早熟的政治动物。我小小年纪就有政治兴趣。在我 10 岁多一点的时候，家乡（苏北）军阀混战，我也学大人写了一张，打倒 XXX 的标语，正站在凳子上张贴，被人拉了下来，后来查明我要「打倒」的是一个同学，才算没有麻烦了。

12 岁的小学徒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很多青年学生组织宣传队下乡。我当年 12 岁，还很矮小，跟着他们，自己带着小板凳，站在上面演讲和写标语。不久，宣传队解散了，我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布店学徒。

学徒工作等于杂役。我爱偷偷地读中国旧小说，爱得入迷，屡次受到呵责甚至挨打。于是我又逃了。第三次学徒名义上比较好听一点，是当地一家报馆的排字练习生，当时我以为练习生比学徒好，干了一年，依然是打杂，没有学到一点技术，我对老板说：「不干了。」他说：「学徒必须做满三年，否则你要赔我的饭钱。」于是我「贩了桃子」（「桃」与「逃」谐音，当时学徒逃离，都称为「贩桃子」）不想回家，

就当了流浪儿。

路边，屋檐下都暂时成了我的住所，被这里赶出，就到别处去，夜间冷了，就紧紧的缩成一团。有时霍地惊醒，原来是一只野狗从我的身上跃过，我拾起一块石子打过去，骂声：「他妈的，你奉谁家主子的指使，也来欺负我。」霜露撩过我的脸上，我抹一抹就算洗过脸了。太阳从地面上升起，我就捧起书本子，路人都望着我傻笑而过。当我饿得实在有点发昏，才懒洋洋挺起身子去讨些钱买点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这个小叫化子不仅向人家讨钱，而且要讨旧书旧报纸。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门前，屋内传出声音：「哈哈，这个小疯子又来了。」

我想，这样在街边被人当做「小疯子」总不是办法，还是回到海安家中，并不时到我童年好友徐展堂处借书看，后来他的书全被我读完了，徐对我说：「我有一位朋友贾静哉，他藏书很多，我介绍你去看他。」

参加左翼读书会

我见了贾静哉，他比我大 10 多岁，身体健硕，谈吐豪爽，我们一见如故。他是美孚洋行江苏总代理，很有钱，也热心公益，他有意办一个私人的图书馆。1935 年，他资助我读了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教育。这家学校的名称是「私立上海图书馆专科学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门薛家弄，缴费读一年课程，考试合格就可以获得一张文凭。我用了 2 个月的时间，把一年的课程读完，算是提前毕业。

不久，我到了镇江，担任贾静哉和当地一个国民党负责人共同办的「私立镇江流通图书馆」管理员。该馆位于镇江水陆寺巷 26 号，免费出借书籍和举办图书流动展览。

镇江是我一生中最早接触新文化的地方，我对于镇江的金山、寺庙、宝塔、甘露寺印象还很深。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传奇的故事，都发生在镇江，例如，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白蛇精水漫金山，《三国演义》

中「陪了夫人又折兵」的甘露寺等等，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灵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这一生永远忘不了我的恩人贾静哉，他后来又多少出于我的影响，非常左。抗战前后，他资助过很多左翼文化人和中共地下刊物的出版。后来去了苏北解放区，中共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代表中出现过他的名字。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在中共土改期间，我担心过他，因为他原籍镇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在「三反」「五反」期间，我又担心过他，因为他曾经是个洋行买办。我通过各种渠道想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中共没有给我答复。令我终生感到遗憾。

我在图书馆工作不久，把所学的一点皮毛知识，再结合管理图书馆的实际经验，写成一篇文章，寄给全国最富声誉的天津《大公报》的副刊，大概当时写这类文章的人不多，我的文章居然侥幸的被发表了。我当时在图书馆的月薪是大洋 8 元，《大公报》寄给我的稿费是大洋 12 元，令我喜出望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发表文章。

我在图书馆工作中结识知识青年很多。由于中共的政治宣传偏重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压制民主等等，所以很多青年都同情和倾向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表面上并不存在。这些左倾青年就以读书会的名义秘密的活动。我的图书馆往来读者很多，因此也便于掩护读书会。每个读书会的成员不多，按身份和兴趣分别结合，例如教员、学生、文艺爱好者，医院护士等都各有自己的独立活动。戈扬是这一时间的活跃分子。

江上青是叛徒？

我在这期间又给镇江的《苏报》和《妇女周刊》写过文章，笔名「王菲」，是个很女性的名字。编辑托人找「王菲小姐」，见到我才知道不是小姐，而是小子。编辑的名字叫徐若萍，她又介绍我认识了江上青。后来我才知道，徐若萍是个假名，她是中共著名人物任弼时的妹妹。多数中共地下工作者都用过许多不同的假名，江上青是个例外。

他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关进苏州反省院。他应付国民党很有一套，出狱后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名字一直用的都是江上青。他长得英俊，言谈幽默，读书也多。他常对我纵论天下大事。然后又补上一句：「现在是瞎说的，回到老婆怀里，什么都忘了。」

江上青引导我读了一些马列理论的书。我记得他曾经要我读一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不久又要我「不要读了」。当时我不了解什么原因，我想他也不一定完全了解，反正我们那一时期就是这么跟的。不过江上青确有几分戏弄国民党的天才，最后也为此而死。抗战初期，他组织了一支游系队，打的是国民党旗帜，领的是国民党的钱，用的是国民党的武器，暗中又和共产党军队密切配合，结果骑在马上被乱枪打死。江泽民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中共报刊介绍他的身世和他的父亲，我才知道江泽民是我青年时代师友之间的同志江上青的儿子（养子）。

江上青到底是烈士还是叛徒，中共安徽党委（因为江上青死在安徽）有过争论，文革期间，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曾经挨斗，说她是叛徒的女儿。

进了国民党监狱

1936 年 12 月，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当时一般中共党员，都主张把蒋介石杀掉，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事庆祝，提出「公审蒋介石」。过了两天，中共的态度突然改变，主张「和平解决」，一般中共党员和同路人都大惑不解，党的文件解释说，共产党一向是反对这种劫持和军事政变的。12 月 25 日，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又说，因为「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了。」也有人当时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和根据英文报纸的消息，理解中共态度的改变，是出于苏联的影响。斯大林担心日本军队可能发动反苏战争，唯有中国抗战能阻止日本进攻苏联，当时能够领导中国抗战的，唯有蒋介石，所以苏联一开始就坚持释蒋，甚至说「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策动的。

「西安事变」以后，左翼青年更趋活跃，一部分共产党的组织开始恢复，仍然极端秘密。党的外围是青年团，团的活动也不公开，后来改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就较为公开了。一般的说，在中共领导下，「救国会」是当时最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包罗广泛，成份复杂，很多中共党员都以「救国会」身分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时，只承认自己是「救国会」分子，坚拒说出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比较易于获得社会人士同情和保释。

我们这些青年人，当时作过一些十分幼稚的事，影响和作用都不大，却很易招惹麻烦。例如 1937 年 4 月，我们油印了一份传单，在电影院散发，不久杨瑞年等被捕，国民党的镇江政治警察队查出，有些被捕者都是常在我的图书馆和我接触的，于是 5 月初就把我逮捕了。

我们的图书馆，当时也受到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支持，所以当政治警察队逮捕我的时候，他们是不愿声张的。这一天，一个便衣警探持来一张我的朋友汤小南的字条，约我到他家里谈谈，我当时还不知道汤已被捕，随来人走出门后，另一个守在门外的警探就恶狠狠的紧贴在我身边，他们一左一右，就把我挟持到队部去。

政治警察队是一座中国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占面积不大，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小办公室，我在这里受到初步的审讯，然后被安置在一个临时拘留所中，我们这一间里面大约有 27 个未决犯人，新犯人进门以后，照例被划出一块勉强可睡下的地方，但是夜间依然纠纷迭起，有时甲的腿侵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虫白天都大摇大摆的在我们面前走过，午夜的时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总要有几十条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觉满意。没有带行李来的犯人，就钻在稻草堆里，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紧紧裹住，不多几日，我们的衣服也全都变成灰黑色了。每天有两餐饭，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两小片猪肉，送饭进来的时候，一并提来一桶开水，有些人在

自己饮过后，就把碗浸在里面洗一洗，后来的就只好喝他们的洗碗水了。

我们平时早受过「应付被捕」的指导，也看过这样的小册子。比如关于供词一项，就告诉我们，作供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绝对矢口否认，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则不妨装作坦白。凡是必须要牵涉到的人，根本说不认识他，在无法否认的时候，就尽量对这个人加以诽谤和攻击，说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复对这个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别人牵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认了。

我前后一共被审讯过 7 次，他们拿出各种刑具恐吓我，那个审讯者是个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满脸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内团团转，急得筋骨都快爆出来。

「妈的——」连珠炮似的巴掌打在我的面颊上，我用两手保护我的头部，继而他又让我挨了两下巴掌，踢了我两脚，肉体上虽然有几分痛，心里却感到很甜，认为这是革命者的光荣，我已受过党的教育，「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日间以捉臭虫为乐，脑子里在考虑怎样应付下一次审问。经过 7 次审问，他们认为我是个幼稚的被人利用的左倾青年，要我写一份「自传」，并提出 16 个问题要我书面回答，然后把我的答复改了又改，要我抄上，最后对我说：「政府为了表示宽大，你可以取保释放。」我过了一个多月见不到阳光的日子，一走出监狱，两脚像登云驾雾似的，飘飘然走上大街。

共产党把我「突击入党」

我从国民党监狱被释放之后，回到图书馆，馆长对我不满，我觉得呆不下去了。当时我有些不解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上海一个中共外围机构「蚁社」派人来接我到上海正式办入党手续，所以中共「资料」中说我在 1937 年 6 月入党是不错的。根据我后来的理解，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在国民党白区的地下组织百分之九十七都已瓦解，所以西安事变结束，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以后，首要工作，就是恢复党

的地下组织。当时，凡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而没有向国民党出卖过同志、公开发表过反共声明的，都被认为经过监狱锻炼表现不错的，列为「突击入党」的对象。

我到上海以后，就被带到一个「朋友」家里，由一位姓陈的 26、7 岁的青年和我谈话，他一见到我，很热情的和我握手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小亭子间里，这好像是他的卧室又兼书房。

他逐点问起我的家世、出身、经历，然后对我说：「你写篇自传」，我把「自传」写好如期送去，陈先生又和我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以后，我们每隔 4、5 天见一次面，前后总有 5、6 次。他在谈话中，渐渐称起我「X 同志」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同时，他的身份我也逐渐明白。

我在陈先生那里第一次读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党的文件——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其它几种极端秘密小册子，我读过后，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时他向我说：「我们党的长征，完全是为了『北上抗日』。」这句话倒是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经过这些反复的谈话和阅读这些小册子后，他终于给我看了一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要我正式入团，他并为我说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是党的学校和后备军。你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

我的神情极度紧张，我起初说：「我对于革命理论还懂得太少呢。」他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你服从革命的领导和纪律。」

党指向哪里，我奔向哪里

我又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对着一张纸画的镰刀斧头旗举手宣誓，完成了简单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当时我的确很兴奋，我从小是个孤儿没有家，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家」了，我现在是属于革命，属

于党的儿女，党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啊！中共「资料」中说我 1937 年 6 月入党，起初是团员，不久又被称为候补党员。

入党以后，我奉命回海安。当时贾静哉、徐展堂对我说，已准备好一个「海安文化馆」要我负责。我考虑到离上海时，组织上对我的指示是：「暂时掩蔽，等待进一步指示，注意联系群众，面目不可太左。」因此我就接受了文化馆的工作。当时我在镇江读书会的老同志戈扬也回到海安，她很热心帮我的忙。七七事变发生，我急奔戈扬家，告诉她：「卢沟桥打起来了。」我们一起上街贴大字报，又邀当地绅士韩国钧的女儿韩柳娴领导组织一个抗日剧团，柳娴又亲自点名戈扬为剧中女主角。正在排演期间，我又奉命急去上海，所以就从海安突然消失了。

我开始进入一个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的时代！

我又到了上海。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和日军正在华北激战。不久，8 月 13 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全面抗战展开。当时中共公开的政治号召是，发动群众保卫大上海，而内部的传达报告是，「国民党政府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是放弃革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动摇时，共产党必须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抗战开始时，国共之间就已经同时出现裂痕，至少我们心理上已被武装为国共合作抗日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过渡时期的手段。

10 月底，大场失守，大上海保卫战接近尾声。在撤退期间，我当时准备留在上海郊外打游击的。但是，党给我的指示是：「你到延安学习。」

我从此开始了我的政治上的「长征」生涯。

第三章 我的一个延安梦

在一般的共产党员和左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当时的「革命圣地」，能够去延安打一个转，就好像出洋镀过金一样，即使是一个白痴，我们也得对他敬畏三分。遇到争论，听说某人是刚从延安来的，大家也就寂然无声了。「组织」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许多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经过两次组织生活以后，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驯服了。

我们三男一女谨慎的整理好行装，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过南京，正是一片混乱。兵荒马乱，人心惶惶，难民漫山遍野，上有飞机掠顶而过，下有扶老携幼者的叫声、哭声，一片乱哄哄，令人惊骇而又心酸。

挤呀挤，跨上津浦车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侥幸的。我们四个人在车上也互相做了个鬼脸，「庆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渐渐消失了。

我们在每一个小站在都要停一停，让过军车，另一列客车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员我们也要让。有时在半途上，车行渐缓，三声警笛，于是全车乘客一哄而散，伏在田地里惊魂未定，已听到飞机声由远而近，又掠顶而过，也分不清是日机还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再回到车厢，有人惊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号孩子不见了，然后，汽笛声夹着闹声、骂声、哭声……火车又把我们载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来，这一带的农村是荒凉贫瘠得多了，时近严冬，树木凋落，风沙蔽空，寒气袭人，那些衣服滥褛的农妇，迎着霜风，提着一篓篓的食物走来出卖，她们生得很健康，结实，淳厚可爱，但是我们想和她们接近时，她们却害怕，面无表情，立刻避开我们。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老牛车拖了九天，才把我们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陇海车又破烂、又肮脏、又混乱，大兵们一批批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沿途以军人上落为最多，我们没有买票就上了车，遇到一次查票，不知为什么他也没有要我们补购；直到西安，我们跳下车，天刚黎明。西安车站古色古香的、宫殿式的建筑，我对它颇为留恋，我们正凝神赞赏，后面的乘客却把我们推到车站口，收票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们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们立刻叫了人力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又称十八集团军）而去。

西安为我国古都之一，城市建筑一方面已相当近代化，马路宽畅，街道整洁；一方面具有北方气质，庄严而朴实，绝大部份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国式的房子。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一幢中国式的住房，大概这幢房子的主人过去还是一个「封建的」书香之家，一进门就是一座屏风，里面十分宽大，大约总有四十多个工作同志，都穿着挂有「八路」符号的军服，往来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紧张。开始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同志，听说她过去是四方面军的老干部，我们作过自我介绍之后，她转身去到另一个房内，然后再折回来。特别向我亲切的招呼了一声：「X 同志，你有很久的斗争历史了。」这时我相信我的「鉴定表」（每个党员都有一份「鉴定表」）已经早转到「西安办事处」了。她对另一个小鬼又嘱咐了一声：「把这位 X 同志的行李搬进来，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

我住到「招待所」以后，满以为那三个同伴就要搬来，岂知等了两天，还不见他们的踪迹，我很担心他们，心里焦急如焚，却又不敢到「办事处」去问刘同志。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时集合，立刻离开西安，坐一辆大卡车，全

车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当日即转云阳。

三原距西安九十华里，云阳是三原的一个小镇，距三原约十里左右，有八路军的留守处，内战时期是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在当地的干部中，当时还传说着过去彭德怀与丁玲之间的艳事，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已经准备借题热闹一番，老彭辟谣。不久他又说，革命不胜利，他是不结婚的。

云阳青训班「艳遇」

西安事变后，国共停战，中共在云阳设立了一个青年训练班。受训的人不一定是青年，也有过去在地下工作中与党失去联络的老干部。训练班实际上是从白区到红区的中途「过滤站」，受训的学员时间不一，有人第二天就直奔延安，有人三五天不等，有人则受到较长时间的审查，也有不受欢迎的，就在云阳「送客」了。

青年训练班由当时的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兼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乐少华为政委。冯文彬原是浙江农村的牧童，他的文化全是参加红军后学的，我觉得很难得。胡乔木是知识分子出身，江苏盐城人，和我的乡音较为接近，我对他有亲切感，但我们从来没单独说过一句话。乐少华原是上海的产业工人，曾在苏联学习。这一类工人出身又留学苏联的干部，在当时是佼佼者。在我的记忆中，他是第一个向我宣传王明的。后来我在有关邓小平家世的资料中才知道，乐少华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夫，1952 年自杀。

我当时对冯文彬、胡乔木、乐少华三位青训班负责人印象都很不错，感到他们热情诚恳而有朝气。

青训班的学员每天黎明六时，听到军号就匆匆起身，大约在二十分钟内完成整理、洗漱、集合、点名、早操，然后早餐、学习、劳动等等，每一个人经过这种锻炼都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对我的一生也很有用。

我们到云阳时，因为青年训练班招待所已经住满，无法容纳。因此我们很多男女同志就被安排在一间大房同住。其中一位活泼、清秀、热情，比我成熟的叫小卢的女同志，一手拉着被单，一手拉着我说：「同志，你睡在我这儿。」当时我脸上泛起红晕，有点拘谨，随后我们和被同卧，才开始互通姓名。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单独的交谈、拉手、亲嘴、拥抱。如此而已。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快，确有些冲动，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应该如何，小卢也没有引导我，我们就如此虚度良宵，第二天各自分开。后来，我和小卢打招呼，她淡淡地应了我一句：「同志，有什么事吗？」她似乎忘记了我，或者恨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

我的另一位镇江时代的女友，姓淡，她到延安的某一晚，一位领导干部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起初不从。那领导说：「你是否真有革命的决心？这就是第一关呀！」

毛说：「穿草鞋，爬大山就是革命」？

从云阳到延安，有八百里路程，日行百里，八日可达，普通约行十日左右。我遵从同伴的劝告，买了两双草鞋，一双穿上，另一双带在身边。我背负的行李，在途中走了一段放弃一部份，从五十斤减到二十斤，最后只提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陕北山地北行愈登愈高，爬过一层山，又是一层山，山峦起伏，重重叠叠，奇伟壮观。站在一个高山顶上，极目望去，长空万里。一个人站在这里实在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们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难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难得见到一两处有树木的地方。第二天我的脚上就起了七八个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别的同伴也是一样，可是，谁也不认输，大家硬着头皮继续走。

我迷迷糊糊地紧跟前面同志的脚步，当时我只有一点是清醒的：我不能掉队，掉队就会死在山中。那时正开始进入严冬季节，西北风迎面吹来，我们把头紧紧缩在颈内，唯有拼命走路才能御寒。路上常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到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我们就自己做饭或休息。

有一天全日没见到一处人家，水也没有饮的，饿的时候，我们就拿起身边的大饼吞下去。我们在山丛中一面赶路一面寻觅水源，见水就喝，哪顾得什么卫生不卫生。

快到延安时，我们在甘泉县休息了一夜。「甘泉」听来很美。名为县城，实不及我们江苏省一个小村庄大，而且非常荒凉。我们因为买不到吃的，找到县委书记，他替我们找到一些杂粮和两个鸡蛋。这两个鸡蛋我们怎么分配呢？于是做了蛋花汤，十六个人每人一碗。在我的回忆中，这是一碗非常美味的蛋花汤。

那个时代，物质条件困苦的情况，非身历其境者是很难理解的。

1937 年 11 月下旬，我到达延安。延安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许多青年视延安为革命的圣地，我当然向往已久。毛泽东当时说：「穿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延安又名肤施，陕北军事重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造反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屯兵于此。

残破古老的延安山城

延安是一座残破古老、群山环抱的小城。南北直径约一里。弓形门的窑洞排列在山腰间，洞前有宽阔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往通行，很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延安城东是清凉山、宝塔山；城西是凤凰山，隔着延河遥遥相对；城南是小校场（运动场）；城北是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等。许多中央机关和中共要人的家都住在这一地区。

我们初到共区的青年，当时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的穿著整齐，有的破破烂烂，着西装、中山装、短衫的，形形色色都有。我的记忆中，在陕北男女青年当中，穿着比较时髦的，女的要数江青、朱仲丽；男的要数朱光（后来的广州市市长）、周而复（作家）。我自己是一袭从灰色不知变成了什么色的长袍，皮鞋也已经断了后跟。

延安每一个青年都会唱《延安颂》，把延安唱得像天堂一样美好。

实际上这个天堂只存在我们梦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延安梦」，这个梦有点像著名的童话故事《艾丽斯梦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

我有一个「延安梦」，这时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梦，人在梦中不觉是梦。我们黎明起身后就开始迎着寒风劈开冰块，用人的体温把冰化成水。我们吃的是小米饭，菜是红萝卜或是南瓜，营养当然是说不上的，每餐如此，甘之如饴。我们把自己的苦行视为革命者应有的情操，因为我们身在梦中。

当延河还没有解冻时，凄厉的西北风嗖嗖地吹着，傍晚群山反射着落日的余晖。入夜后，偶尔从山间传出狼的嚎叫，一片苍茫景象，直到农历 2 月间了，银色的山头上，雪还没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还浮着厚厚一层冰。我们迎着风扛着柴，抬着石头，锄着荒地，日以继夜地劳动和学习，晚上再围着豆油灯开小组会。春天快来了，我们忘记了春天。

延安的一般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以上厅级旅级，有小灶，两菜一汤。再高级的四菜一汤。毛主席的享受更好。等级是被严格的划分着。当时我们认为，他们对革命有功，应该如此。

陕北是个美人窝

我虽然怀着理想去延安，但到了陕北，最初触动我的神经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漂亮的女孩子。

我见到的陕北第一位美人，一直不知她的芳名。是在西北青年救国会，副主任高朗山介绍下认识的，那女孩子不施脂粉，白皙皮肤，有迷人的浅笑，优美的身段，温柔的举止，我对她虽属惊鸿一瞥，毕生难忘。高朗山说，她姓白，是陕北米脂人。后来我才知道「三国演

义」中的貂婵正是米脂人，米脂是陕北出美人的地方，是个美人窝。

延安的天气，一过冬天，很快就接上夏天，这时的气候闷热而干燥，有时早晚和白天的温度相差距离很大，冷的时候，我们就穿上棉军服，热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个跳进延河洗个痛快的澡，延河洗澡，这是我们最爱的玩意儿，也是最高的乐趣。男男女女，河上作「鸳鸯戏水」之乐，往来水中追逐，有的女同志公开向我们挑战，她们首先用水泼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追过去，一定要她吃口水，或者搂住她，直到她求饶为止。这种场合，每个人都脱得清光，等级高下的阶级身份一点都无从分别，男女间算是享受了一点「共产主义」！革命的清教徒，难得有此迷人风光。

当年的延安，参加晚会也是属于消遣性的。

参加晚会要入场券，找入场券要靠「关系」，我的「关系网」似乎不错，所以常常有参加晚会的机会。我每次在晚会上都见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当中的前一排是空着的，说是虚席以待毛主席的，毛泽东多数不来，这些座位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感到（应该说没有人敢于）说这个情况是不合理的。

延安边区医院见闻

我到延安，不久就病倒，被送到边区医院。边区医院除「组织上」送来的病人外，是不收其它病人的，有人因为没有正式经过组织介绍，医院当局拒绝收留，在门外就死掉了。进院以后，应该先经政治指导员审查过，然后才由医生分配你的炕位。每个窑洞有一个大炕，三五个病人住在一起。全院只有一个外科兼内科的医生，这个医生，原是过去国军中一个被俘的军医，脸上有些浮肿，一见到我们，总是对我们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么意思。医院的行政干部和病人骂他，他也是报以一笑。

院中有十来个女看护，全部都是四川人，过去都是四方面军裹胁而来的，加上院长、主任、政治指导员、管理员、医生、勤务员、马

夫、伙夫、警卫班等等，职员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这中间只有那个医生算是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医药设备根本说不上，比较严重一点的病或者急症，医生只好束手。

医院的伙食比其它机关要好一点，但也要按照在党的地位分成等级，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还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们觉得这里的待遇比起他们原来的部份要舒服得多了。

医院中，同住的病人闲聊多喜欢说鬼故事，有的同志坚持有鬼，甚至说延安某处某处有鬼，有的同志说长征途中在某时某地见到过真鬼，有的同志说人都是假的，鬼才是真的。

在另一个窑洞中，有个老病人，因为他年纪比我们都大，加上听他自我介绍过他的一段革命历史，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说：他是最初与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同去苏联的，回国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几年的牢，直到抗战开始，才在「释放政治犯」声中被释来延，但是他这时已经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些在苏联的故事，在政府狱中受刑和狱中斗争的故事，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医院里突然紧张起来，窑洞内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装同志，我们一个个走下炕来探头张望，又被赶回自己的炕位上去。

「不得了，那个痨病鬼张抱平，原来是个托派。」在宁静以后，一个女看护慌张的走过来对我们说。本来这个女看护也一向敬重的称「张抱平」为「张同志」的，这时已改口称他为「痨病鬼」了。

张抱平已经被抓去了，这时全院的同志都在骂他，都在从张抱平的平日谈话中，竭力寻找可疑的地方，好像个个都愿意挺身作证似的，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把张抱平痛骂一阵以后，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杯弓蛇影」谈「托派」

延安到处为「托派」的影子自相惊扰，究竟托派是怎样的？主张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干部根本摸不清楚。我们所见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骂街式的口吻。据说「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这么恐怖，一方面他跟我们之间的具体的形像、观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据说，「左倾」的机会主义是「托派」，「右倾」的机会主义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名都好像与「托派」有关似的，以后，「托派」的字样也不准用，只能称为「托匪汉奸」了。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种高贵之感。

「听说你常去看边区剧团的林萍，是吗？」招待所的总支部书记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坦白地说。

「她是有政治问题的，你知道吗？她有托派嫌疑。她对你说过些什么？她对你谈过政治问题吗？」

「书记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们从没有谈过政治问题，她也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

「你还知道她别的情形吗？」

「不多，我只听说她的未婚夫快来了。」

「这个女人好狡滑，好吧，你跟她多接近也好，不过她说些什么，你要随时告诉我。不要中了『美人计』，为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扬一扬手就去了。

林萍小姐，你去了哪里？

不久，我在林萍的介绍下认识了她的未婚夫杨明。其后我又和杨明单独见面交谈过。有一天，我们在陕北公学碰到，他拉我在山边坐下，突然问我：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吗？」

「我当然没有你了解得多。」我说。

「你们不是很接近吗？」

「不要开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他把脸一沉，摇摇头，像似很愤怒，又像似很伤感似的，然后又低下头：「不，她已经有政治问题了，我和她从小同乡又是同学，我们在十年前就订婚了，我也很爱她，我们过去又在一起做过革命工作，这次我很快乐的要求党把我调来延安，以为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岂知一到延安，组织上就告诉我她是一个托派，后来又说是国民党特务，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动证据。你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那么，你找到没有呢？」我迫切地问。

「活见鬼，什么证据，她懂得什么，还是那么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么呢？你能否帮帮我的忙，她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

「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不过，你的心神也应该定定，如果她真的没有什么，真金不怕火，组织上也不会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说。

「难道真的不可能冤枉她吗？」

我没有答话，我们相对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欠妥」，又自己回答了：

「即使冤枉一两个同志，这也免不了的，党不能让一个反动份子混进组织，破坏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需要严密，所谓『以防万一』，为了在一万个同志中防备一个反革命分子，自然冤枉一些好同志，但，这是为了革命也没有什么。否则放松一个，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了。」

这以后，我没有再见过杨明，林萍也听说被调了工作。

柯仲平的故事

初到延安，就见到延安鼓楼的「墙报」。墙报常常见到柯仲平的长诗，都是歌颂共产党的。我对诗并不熟悉，但是柯的诗通俗易懂，也就吸引我了。我听说他是早年创造社和狂飙社的成员，又是延安战歌社社长、民众剧团团长。后来我常常见到他，他是一位美髯公，到处写街头诗，到处唱自己的诗，有时唱得声音沙哑，旁若无人。也有人把他看作疯子。但在我的心目中，柯仲平是很可爱的。

柯仲平到陕北不久，就抱有一个心愿，要把陕北苏区的主要创造者刘志丹的一生写成长诗。这位诗人对于中共党内的矛盾，几乎完全无知。延安整风时，不但未被整，而且受到毛泽东的宴请。毛劝柯写点新东西，柯未理解。1947 年柯在河北又见到毛，毛问柯的写作计划，柯说要继续写刘志丹。毛说，井冈山，你写不写？柯未答。毛说，你不如写《红楼梦》吧。柯仍未理解。1953 年，中共内部出现高饶问题，柯仲平受到株连，他的长诗《刘志丹》被毁。后来他继续重写。1963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康生指责李建彤的《刘志丹》以小说反党，柯仲平又一次被牵连，再受审查。这以后，他一度晕倒在路边。1964 年 10 月 22 日，他在党支部作交代时，因为过于激动，当场倒下身死。

柯仲平的故事，是我们那一个时代最典型的「延安梦」。

每一个到延安追求理想的青年都有一个「延安梦」，多少人幻梦成空，多少人消失在梦中……

第四章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我出了边区医院，回到招待所。中央组织部通知我。要我等待分配工作。

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

在中央组织部，接见我的高文华问我：「你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我希望，党能送我到苏联学习去。」我说。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过许多书刊和听过许多故事，是关于苏联如何进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满等。所以我早就立定两个心愿，第一个要来延安，第二个要去苏联。现在延安总算到过了。下一个是去苏联了。于是，当党问我的工作意见时，我的「到苏联去」就脱口而出了。

「这是绝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会对我说：「现在正是国内的革命高潮，在苏联的同志还要赶着回来。」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相对沉默片刻。「那么，你还有别的意见吗？」苏联梦既已落空，我的虚荣心在追求别的方面的满足。我说：「我希望做点上层工作。」

他大笑起来，似乎在故意作弄我。「哈哈，上层工作，你要做防空哨，还是要拿锄头到山顶上垦荒去？这些都是上层工作呀！」

我惭愧得把头低沉下来，他愈笑，我愈是觉得无地自容。

「我告诉你。」他突然严肃的对我说：「我问你的工作意见，这不过是对你的党性的一个考验，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当党问他的工作意见的时候，他只应该回答，服从党的决定，听从组织的分配。党要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半句还价的……。」

他滔滔不绝的说下去，愈来愈像训话的口吻了。「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好了，没有什么话了，你先回去，党决定了你工作的时候，再通知你。」

抗大的大队长何长工

这次谈话，看来中央组织部对我的印象大致不错，不久他们通知我，我已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组织上了解我曾学习和管理过图书馆，因此，要我去整理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图书馆。

我在这一期间和冯文彬接触较多。我和他是在云阳青训班认识的，他是青训班主任，同时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他面目清瘦，短小精干。张国焘出走的第三天，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冯文彬告诉我的。中共建政后，冯文彬突然降职为天津市的区级干部。

我初到延安时，中共的干部政策正处于转型期。对干部的使用，兼顾政治条件与业务知识，在这两方面的考察中，干部的流动性很大，有时三、五天就被调动。1938 年 3 月，我入抗大学习。抗大是个很不正规的学校，学员的学习时间和分期弹性都很大。不过，训练的严格至今对我仍有正面的作用。例如抗大提倡的作风是「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抗大强调的传统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抗大校歌中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大的校内外，凡是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写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的奋斗作风」等等，这一切至今我记忆犹新。

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我初进抗大时在五大队，队部在延安城东约二十里的柳树井。我对柳树井的印象很深。当时窑洞不多，不够

用，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一定时间用来敲石头，挖窑洞。我的工作是把石头从山上搬到窑洞口。当时大家一面劳动，一面还有同志领着唱歌。

抗大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等。

第五大队大队长何长工，他的腿在内战中受过伤，走路一拐一拐的。他为人正直，常和我们随便谈天。学员们提出什么困难，何长工非常关心地倾听，满口应承，「一定负责解决」，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所以我对他的评语是：轻诺寡信，热情有余。他从未谈过他在红军中的光荣历史。但是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上井冈山，何长工是联络人。「文革」期间何长工被斗，有一条滑稽的罪名，即他对毛泽东「不叫主席叫老毛」。当年这些人一道「打江山」，彼此称兄道弟，拍拍肩膀是常事。而在毛泽东一登龙门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兄弟和同志的关系，而是主奴之间的关系了。

我对林彪的印象

我在五大队学习，大约两个月，调到校本部，因此就与林彪和罗瑞卿有了接触。

抗大的校长林彪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儒将。半生的戎马生涯把他锻炼成一种非常坚强的性格。他双目紧锁，含而不露，严肃中有几分神秘，细心而又实际，脸上笑容不多，但对人亲切。我们都对他印象很好。林彪同时是八路军 115 师师长，常来往于前线后方，抗大的日常校务由罗瑞卿处理。早在那个时候，我们见到毛泽东和林彪站在一起时，毛的一脸喜悦之色。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亲如父子。在那个时代，我们崇拜毛泽东也崇拜林彪，觉得毛林亲如父子是很正常的。

早年的林彪不但骁勇善战，而且以敢向上进言著称。林彪向上进言和用兵一样大胆。「文革」前后吹捧林彪和咒骂林彪的，似乎很少谈到林彪进言的胆量。1930 年林彪给毛的信，怀疑「红旗能打多久」；1935 年林彪给军委的信，提出撤换「三人小组」，都反映了他与当时

中共军事路线的争论。林彪当时年经；他所揭发的问题，实际上对毛夺取军事权力有利。毛泽东觉得这个「娃娃」可爱。1948 年东北战役中，林彪对于毛泽东先打锦州的指示尽力拖延。但在最后结束战役之后，毛对林彪的「抗命」并不责怪，而且传令嘉奖。

1969 年我在香港出版过《林彪语录》，我在序言中说：「林彪常用最简捷的语言表达他的意见，他平常说话有时简单到就像对士兵下命令一样。话不在多，反复地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林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林彪并不唯上，前例东北战役即是说明。另一例是韩战，中共决定成立志愿军出兵北韩，毛点名林彪统军，林称病拒绝。还有一件事，是一般的中共党员难以想象的。1950 年 10 月，周恩来和林彪等秘密访苏谈援朝事，在宴会上斯大林向林彪敬酒，而林彪竟然不肯用嘴唇碰一下酒杯。斯大林生气地说：「难道我的酒里有毒药？」

林彪的个性是，他不愿意的事绝不敷衍。王炳南的前妻安娜说：「林彪跳舞像拖黄包车。」林彪的跳舞也和打仗一样，你跳你的，我跳我的。林彪后期忽然成为对毛泽东的阿谀之徒，说什么「天才」，「巅峰」，「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使人难以理解。也许是政治野心起作用吧。但是在毛泽东对他起了疑心，并把矛头对准他之后，他依然表现出最后不屈。在 1971 年 5 月 1 日晚，林彪上天安门，那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他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至于他的死，至今仍是一片历史的疑云。林彪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是他有时是静如处子，弱不禁风；有时是猛虎下山，山呼海啸，林彪的一对眼睛充满智慧与信心。「文革」中他为什么做出那样糟糕的事，也是一个谜。我对中共党史中对林彪的绝对的赞扬与绝对的咒骂非常反感。

罗瑞卿看毛的脸色行事

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身材修长高大，脸上有疤痕，是内战时受的伤。他总是咬紧双唇，有几分肃杀之气。他说话有一定的公式，可能

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原故。罗瑞卿和林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罗总是喜欢当面吹捧地位比他高的人，而林对任何人都只是轻轻地点头。罗的身子总是站得毕直的，林较为灵活，这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像骆驼，一个像猴子。

有关中央苏区的资料中说，林彪罗瑞卿曾经同台演过话剧，这一对儿，一长一短，确是演戏的好搭挡。

罗瑞卿是职业特务。早期担任红军的肃反工作，中共建政后担任公安部长。在 50 年代初的「镇反」期间，罗是超额完成任务的部门首脑。当时有一个笑话说：「毛泽东有一天失了手表，要罗瑞卿追查。第二天罗向毛报告：『我抓了一千个犯人，他们都认罪了。』」

罗瑞卿的公安部门当然也负责中共领袖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每到一处，罗瑞卿都要事前亲自安排，十分细心。毛泽东下水游泳，特别是喜欢在江河里游泳，这就给罗的保卫工作出了难题。罗瑞卿自己本来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特别学会了游泳。罗瑞卿这个公安部长，他的很多精力和时间是充当毛泽东的私人保镖。

中共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冤案是罗瑞卿搞的。60 年代他担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他早于林彪开始在军队中吹捧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学雷锋」，学毛著。在党内，他亲自逮捕潘汉年，对彭德怀落井下石，这些都是罗的表演。黄克诚生前说，罗瑞卿看毛泽东脸色行事，找到一个对象，咬住对方不放，不死不休。

彭德怀也到过我们抗大演讲，他虽是个军人，很有政治头脑，为人朴实坦率，虽然对毛泽东的愚忠未免可笑，但比起罗瑞卿，的确可爱多了。

「文革」中间，罗瑞卿与彭德怀同在一狱。罗瑞卿不平地说：「我怎可以和他关在一起呀？他反对毛主席，我没有呀！」罗瑞卿的意思是说，自己才是毛泽东的真奴才，彭德怀是不配的。

罗瑞卿的前妻叫刘敏湛。罗和郝治平结婚前，我和郝治平在抗大校本部也是很好的朋友。当时罗瑞卿死追郝治平，郝不怎样喜欢罗。郝的性格活泼，罗很死板。后来他们是在五台山结婚的。

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主要是在毛泽东面前争宠。毛在林、罗之间取林而弃罗，完全基于一笔政治交易。毛助林打倒罗，林助毛打倒刘少奇。

我常在抗大校部和大队部见到滕代远。滕代远是与彭德怀共同发动「平江暴动」的，他后来长期住在苏联，讲一口很好的俄文。他也是抗大的副校长，负责教学协调。滕代远的另一个职务是八路军参谋长。当时八路军一共有三位参谋长，滕代远对苏俄，叶剑英对国民党，真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是左权。左权于 1942 年战死，滕代远调到前方。我对滕代远的印象是谦虚，谨慎，细心。

教员中很受学员欢迎的是郭化若，他讲「孙子兵法」，十分风趣。当时有人说，毛泽东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郭化若的「孙子兵法」，都是最能引人入胜的。毛泽东曾笑对郭化若说：「有关军事理论，你是我的老师」。文革时郭化若被称用「孙子兵法」反毛。

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抗大教员中有几位我较为熟悉的有：

哲学家艾思奇，他早年写的「大众哲学」，通俗易懂，影向很大，那个时代的左倾青年，几乎都读过。他到延安的时间较我为晚，我记得毛泽东初次介绍他与大家见面时，他还有一点害羞，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谈哲学，观点及内容，大部份是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偷」来的。

任白戈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和他的堂兄任卓宣（叶青）都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后来任卓宣成了国民党理论家。任白戈亲口对我说，1925

年罗瑞卿进入武汉黄埔军校是他介绍的。任白戈也是早年「左联」的秘书长，他入党很早，后来党龄中断，所以屈就抗大教员。他为人随和，是个忠厚长者，喜欢「摆龙门阵」（任是四川人），他还会做点泡菜给我们尝尝。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亲自见到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小校场（等于体育场）练戏，他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另一位教员徐懋庸，我也相当熟。当年他在上海代表「左联」与鲁迅联系。「左联」实际上由周扬当家，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双方展开论战。徐懋庸站在周扬一边，给鲁迅写了一封公开信。鲁迅骂他是「敌人的奸细」。后来很多左翼文化人都不和他来往，把他当作「奸细」。他觉得自己很受委屈，到了延安向毛泽东申诉。他对毛说他与鲁迅之争的时候，毛把「鲁迅」二字听成「路线」，问「什么路线之争」？他说这是自己的发音不准的原故。后来他被安排到抗大。因为我和徐懋庸、任白戈来往较多，好事者称之为「任徐派」。后来徐懋庸随抗大去华北太行区，整风时，徐懋庸批赵树理，而杨献珍又批徐懋庸，艾思奇又批杨献珍。这样你批我，我批你，都咬定对方是「托派」。「文革」前后，大家一起被打倒了。

延安除抗大外，还有陕公（陕北公学）。抗大主要培养军政干部，陕公培养一般干部，也带有政治考查性质，很多陕公学生或转抗大，或转鲁艺（鲁迅艺术学院），或转党校和马列学院。抗大由中央军委领导，陕公由中央社会部（又称情报部）领导，鲁艺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党校和马列学院由中央书记处领导。马列学院又一度用过马列研究院或中央研究院的称谓，对外通信一律称为「中山图书馆」。

担任抗大图书馆主任

1938 年 5 月，我调任抗大图书馆主任。因为我学过一点点图书馆管理兼有少许经验，当时在延安，学这一门的不多，因此我就滥竽充数了。说实在的话，我这个「主任」，外行人也一样可做。因为那个时期，抗大规定的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的著作，以及其它理论参考书，全部大约在五百种左右，其中主要课本每种在千册以上。图书馆一般业务是将图书分类，便于读者选择。但是抗大图书馆所做的工作不是便于读者选择，而是配合每个单位或每个大队学习的需要配给，用完又将这批书转到另一个单位。所以，我这个「抗大图书馆主任」实在应该正名为「图书运输主任」。我本来在上海学的图书馆管理是「杜定友图书分类法」，在抗大图书馆完全没有用上。

我出任抗大图书馆主任时，和胡耀邦有过短时的同事关系。当年我十九岁，胡耀邦二十四岁，都很年轻，耀邦已经是参加过长征的小鬼，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我到任不久，耀邦调任第一大队政委。我们直接相处的时日不多，但我对耀邦仍留有一些印象，他热情，活泼，常在年轻学员中奔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胡耀邦实际上和图书馆也有点关系。中共早期没有图书馆这个单位，江西苏区，放一些书的地方叫「列宁室」。后来到了陕北，为了配合第二次国共合作，苏区改为「边区」，红军改编为国军，「列宁室」就改为「中山室」，再后来就改为「救亡室」。这些室的部分工作也是图书馆工作，其中有些图书室是由胡耀邦领导的。

抗大图书馆在各分校都设有分馆，有时校本部要我到分馆检查工作。我问「怎样检查」？他们说，一是点书，二是查调书记录。有一次我到蟠龙分校，点书的工作完了，分馆的同志却交不出记录来。他们说：「我们的记录是鸭蛋。」我说：「鸭蛋也是记录，交出来。」不久，分馆的同志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捉来一只鸭子，对我说：「你可以带回去交代了。」我胡里胡涂把鸭子背回，本来有点感到尴尬，结果校本部的同志皆大欢喜，说我带回来的鸭子是「检查工作」的最好成绩。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就把这只鸭子的命给「革」了。这件事偏巧给当时抗大的女生大队长张琴秋碰到了，我们都知道她过去是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师长，很尊敬她。张琴秋把那些烹鸭子的女同志批评了一顿，说这种作风不正派。我走上前去自己作了检讨，并留张琴秋喝一口汤。她掉头而去，我对她更有敬意。文革时张琴秋是在斗争会后跳楼自杀

的，后来她的女儿也跳楼自杀了。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著名勇敢的女兵，没有死在战场，而死于残酷的党内斗争。

抗大图书馆的怪现像，一个是图书运输，另一个是人力的浪费。

抗大图书馆总馆的书籍大约有三万册，每一分校大约不足一万册，这些书绝大部分是供学习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图书馆的任务就是在大队与大队之间搬来运去。例如，这一天某大队学习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我们就得赶快把这本书集中送去；这个大队用过这本书改为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与左派幼稚病」，我们又赶快运去新书而把原书运到另一个大队去。其实，这些运书工作不是每天都有的，工作也并不繁重，可是，我们的人力实在浪费太多了。

抗大图书馆总馆及分校图书馆工作的同志一共有十余人，除我以外全是女同志，有的女同志或是高干的眷属，或是「大腹便便」，她们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而被派到图书馆工作的，某些领导视图书馆为眷属的休闲或保胎的地方。

抗大图书馆有几位女同志长得很美。她们往往成为高级干部追逐的对象。我印象中有一位沈同志，名字不记得了，身材消瘦，戴着深度眼镜，很能干。有一位叫纪潜，也不错，邓拓常来图书馆看她。有一位叫苏蕙，她和她后来的爱人方方都是华侨。有一位叫夏森，当时的副校长罗瑞卿，训练部长陈伯钧对她都有兴趣。陈伯钧是江西苏区肃反 AB 团的小英雄，自恃毛泽东喜欢他，常常叫图书馆的女同志「个别谈话」，往往一去数小时。我曾以妨碍工作为理由加以阻止，陈伯钧对我的态度十分粗暴。他明白地对我说，「你要端正对领导同志的态度」，「我找谁谈话，你无权管」。我要解释，他用手指着我要我出去。

我成为高干的假想情敌

我和陈伯钧的正面冲突是为了夏森。夏森是女同志中最漂亮的一个，生得一对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脸蛋儿，她不多

笑，不多说话，一举一动都引人入迷，笑的时候，甜而美，两个酒涡微微露出，举止很文雅，从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转中就使人感到，她不仅美丽，而且是位极聪明的女孩子。

我与陈伯钧的冲突传出，有的同志说：「这是三角恋爱呀？」有的同志说：「马义（我当时的名字）怎么能和陈部长争呢？」有人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算了，死了这条心吧？」苏蕙可能出于好意，劝我以革命事业为重，以学习为重。我当时反应强烈，怀疑她是代表那些高干来压我的，因此，我们两人起了冲突。我记得她当时狠狠地骂了我一句：「你这辈子没有女同志会爱你，你这辈子别想有老婆!」

有一次，贺龙到我们抗大对罗瑞卿说:「介绍个女同志来玩玩嘛!」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听到了。我对一个女同志说：「这里不是窑子。」「窑子」就是妓院的意思，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这两个字用在不适当的时间与对象上。有人把话传给罗瑞卿，据说罗咬牙「哼」了一声。这位传话的女同志偏偏又叫「汪瑶芝」，同志们常故意取笑她，叫成「逛窑子」。她恨极了，当时误会我是故意骂她的。

抗大图书馆是个「女儿国」，我置身这个女儿国中，又喜欢和女同志说笑。有些高级干部认为，我对下属的女同志或者说了些重话，或者加以干涉。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成了「假想情敌」。我天真地想，假如真是情敌，一个办法是女方自由选择，另一个办法是，我和我的情敌来一场决斗吧。

我这个高干心目中的「假想情敌」，不久就被逐步升级了，他们把我从「假想情敌」升级为「假想政敌」。他们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打击我。

我接受中央组织部的审查，他们要我写自传，从祖宗三代写起，这对我的确是个大难题。我怎样到这个世界来的？我的上一代也说不清楚，何况写三代？于是他们就要我交代我在镇江从国民党监狱中放

出，是否写过悔过书。我说没有。是否自首过？我说没有。到延安后是否参加过一个叫「新哲学研究会」的小组织？我说没有。

当时中共审查党员有一条标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悔过书争取出狱，只要坦白交代，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认为这是骗国民党的技巧和斗争手段。而我坚持说自己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觉得难以置信。至于「新哲学研究会」（又名「卡尔学会」），据说是托派组织，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当时偶尔有些同志在一起谈唯物辩证法，这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我怎么可能怀疑是一个什么反动组织呢？

罗瑞卿制造我的冤狱

以后我被送到边区保安处，一谈三小时，从我的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经过，同某些人的接触经过，等等。审问的人，有的粗野，有的斯文，轮流替换，绕绕圈子又重复叫我老实交代。

「你说，你照直说吧，这里没有别人，没有关系，我总帮你忙的，『新哲学研究会』会员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你赖是赖不掉的。我相信你也只是被骗参加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

「我委实一点不知道，要我说什么？」

他狠狠的望了我两眼，又接上去说：「你好好说出来，立刻放你回去，否则的话，哼哼……。」

一会儿，一位面目姣好穿着整齐制服的中年人走进来，立刻，审讯我的那位干部就回避在一边，进来的人，我认识他就是周兴，当时是边区保安处长，他正对我怒目而视，最初审讯我的那位干部又走近来，轻轻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他阴险的对我说：「你就在我们这儿住几天吧。」

接着，我被换了一身红条子的衣服，后来我知道这叫囚衣。我现在一见纽约地下铁路的工人所着的工装，就会想到我在延安的囚服，

太像了。

现在，我算是失去自由了，我被带进一个漆黑的窑洞，我一进去，就摔了一交，刚一站起，又踢到另一个犯人。

「唉呀，好小子，瞎了眼睛吗？」他随手也回敬我一拳。

我定一定神，才朦胧的看出，这窑洞里，数数连我一共是十一个人。

接着，我的铺盖送来了，里面被翻得不成样子，再看看，我的读书笔记和几件较好的衣服都不见了。

犯人是被规定要劳动的，我们这一组是派在挖新窑洞，由武装士兵押着，我们一早就在警笛声中，匆匆集合出发工作，其中有几个犯人罪嫌较重，身上被套上红色的外衣。除了偶尔相骂以外，犯人间不准交谈，所听到的只是一片「砰砰」「沙沙」的声音，我挖了不上十锄，手上就起了水泡，后来被派改充用箩箕搬运沙石的工作。

第五天，周兴把我叫去，他的态度还算温和，对我说：「你的问题我们需要迅速解决，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他说了一通，走了。另一个干部接着说：「照直说了吧，在我们这里，铁打的，钢铸的，都要软化的。」我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用一根小棍子把我没头没脑地打了几下。然后，他吆喝一声，几个人把我拖到凳子上，把我双手吊起，大腿用绳子绑在凳子上，下面放砖头，上面坐着大汉，然后将我的小腿往上撑，骨头吱吱地发出响声。他们继续问我说不说，我委实说不出什么，不知怎的，眼泪夺眶而出。我除了感到痛苦，并无怨言。因为我当时自信对共产党的忠诚，应该接受这种严厉的审查和考验。不过我那时毕竟还是个孩子，稚气未脱，也缺少从容就义的勇气，终于哭出声来。他们也就给我松了绑，还对我说：「哭什么，还没有对你来真的哩！」

他们又继缤对我进行疲劳审问，我对他们说：「同志们，我为了

革命，参加党，受过千辛万苦，冒着无数艰险，为党工作，今天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对党依然没有怨言，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我是党的好儿女，我以为党为了保卫革命利益，对敌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们郑重的处理我的案子，如果证明我确有叛党行为，我愿以生命抵偿。」

我的腿部渐渐松动，又恢复了劳动。两个月以后，我由边区保安处递解到中央组织部，离开边区保安处的时候，我奉命具了一个结，不得将内部的情形泄漏，否则要受革命纪律最严厉的制裁。一到组织部，我就等于被释放了。

边区保安处对我审不出结论，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情况下，把我退回中央组织部。这次接见我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他对我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暂住在招待所，等我进一步和你联系。」最后，他亲切地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我叫潘汉年。」他又问我这次在边区保安处的感受如何？我指着我的屁股说：「我这里还痛呀！」他说：「打了几下屁股，不要紧的。」我又说：「我被打以后，开饭时给我的碗上加了两小片肉。」他说：「这就不错了。」

我的冤狱是罗瑞卿一手制造的。在这场女儿国之灾中，我差一点儿送命。同是这个罗瑞卿，1955 年亲自逮捕了潘汉年。同是这个罗瑞卿，在文革中由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上海将他逮捕。罗瑞卿与潘汉年的政治命运颇多相似之处，冤冤相继，「请君入瓮」，历史果真有因果报乎？

第五章 枣园训练班

我在延安坐了共产党的牢狱。潘汉年把我保了。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他凭什么保我呢？据我事后了解，潘汉年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1937 年初，我在镇江被国民党逮捕时，潘汉年正是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当时，东南地区主要城市的政治犯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都由潘汉年掌握全程资料。他在上海住在爱文义路爱文坊，我去过，没有见到潘本人。由于上述背景，所以中央组织部把我交给潘汉年处理。潘汉年说话很有份量，他就把我保了。

潘汉年保我以后，问我学习还是工作，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学习」，因此进了枣园训练班。

我初进枣园训练班，以为不过和抗大，陕公一样，是一个学校。关于这个训练班的特殊背景，是后来一点一点的了解的。枣园训练班属于敌区工作委员会（敌工会），敌工会又名白区工作委员会或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等等，名称时时不同，当时中共对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地区都称「敌区」或「白区」，所以敌工会权力很大。

枣园训练班，康生以敌工会主委兼主任，潘汉年以副主委兼副主任，日常工作由敌工会主任秘书曾希圣负责。枣园训练班机密性最强，人数不多，每一个人都用假名字互相介绍认识，除了小组会以外，我们不准私相谈话，路上见面也不准打招呼。

虽然如此规定，我们见面有时还是点点头，甚至聊几句。我们谈的大概不外是中共地下工作中的传奇冒险故事，当然少不了对一些领导人的赞佩之辞。在当时来说，这些故事也提高了我们对冒险的兴趣。

关于康生这个人

枣园训练班的负责人是康生，文革以后的中共数据都说康生是个坏人，把他全部否定。在我的直接印象中，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他不

太像一个革命家，而像一个洋行买办。戴着金丝眼镜，着马靴，爱骑马，有时一副打猎的打扮，有时双手抱着洋狗（延安我见到唯一玩洋狗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带上四个警卫员，每人一匹马，康生好像坐在四人大轿上，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把中国话「洋化」？例如说「托洛斯基匪徒」这四个字，他把音调加强加慢，说成是「托——洛——斯——基——匪——徒」。

康生原姓张，山东人，一生化名很多。少年读私塾。由于当时山东的一部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康生进了德人所办的青岛礼贤中学读德文。后在诸城教书。1924 年到上海，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1925 年加入中共，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学支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干事，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并参加过上海三次暴动。

凡是知道康生的人，无不赞其天分极高，他善书法，绘画，工金石，能诗词。康生与毛泽东相同，读过不少中国古书。他尤胜于毛者，康生除了中文外，英文，德文，俄文俱佳。康生还有一套武功。当年周恩来处决「叛徒」，很多是由康生执行的。

1927 年国共分裂以后，康生担任了上海租界工部局唯一华董虞洽卿的秘书，虞是上海喧赫一时的人物。康生以虞的秘书的身份，中共中央机关借「虞公馆」加以掩护。康生夫人曹轶欧、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王明夫人孟庆树，经常和虞的姨太太打麻将。总书记向忠发不管事，中共中央实际上由王明，康生，周恩来负责。向忠发被捕时，供出王明和周恩来的住处，向竟不知道康生的背景与具体情况。在紧急情况之下，是康生亲自驾车把王明、周恩来救出，这段历史是康生亲自对我们说的。当时，王明周恩来都在延安，康生应该不会说谎。后来中共国际派没落，上述的事也就无人再提了。到了文革，连康生自己也不愿提了，其实这段历史，康生对党贡献很大。

康生的讲话较为大胆，也言之有物。他对我们讲过许多地下工作的具体史实。例如他说，南昌暴动时，朱德在窑子里请客，把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全灌醉了。他又讲到，六大以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是个不错的工人领袖，他作为党的领袖是不适当的。他当了总书记又让他无事可做，以古董商人的面目出现，拥有洋房、汽车、小老婆等等，这些安排也是错的。他当时没有对于向忠发是否叛变的问题作结论。另外他又说到，有一拥护过袁世凯的大人物早年为我党工作并作出贡献。当时他没有点明这个人是谁。周恩来临终前对罗青长说：「当年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党不要忘记写他。」周恩来所说的杨度就是当年康生对我们说的「拥护过袁世凯的大人物」，康生甚至对我们说，「李维汉曾是个半托派」。当时李维汉也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康生公开攻击他，在党内生活中是很不寻常的。后来我才理解，李维汉是个积极的「立三路线」者，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因此康生敢于公开指李维汉是半个托派。奇怪的是，当时李维汉也在枣园训练班讲过话。

张闻天讲阶级斗争

枣园训练班的待遇，在延安各机构中算是顶好的，和马列学院一样，每天有一毛五分钱的菜钱，菜里都瓢上几片肉，份量也多，可以够吃，每日一顿小米饭，一顿馍馍，或者面条，另外每月有两块零月钱。军服也是上好的。

枣园的学生，一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我们的学习主要分为政治和业务两大部份。

先说政治学习部分，有许多内容基本上和抗大党校差不多，但也有些突出和特殊的。例如：

张闻天讲阶级斗争说：「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了吗？没有，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民族斗争的领导权，第一个阶段打败外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本国的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打败本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小资产阶级，建立工农社会主义的政权。」在那个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张闻天的这段话，当然对党外是秘密的，也

是当时中共企图的真心话。

毛泽东给我们作政治报告，他的湖南土音很重，声调很低，缺乏抑扬顿挫，但极富幽默感，常常说得哄座大笑。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手不释烟，每说一两句话总要咳嗽一声，当时的健康不大好。我记得他当时的一段讲话是：「同志们，我们要准备干一辈子的革命，我们倒下去，把武器交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倒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我们的革命要一代一代的接下去。」

王明（陈绍禹）给我们讲苏联共党史，他只来过一次，其余的课一直是吴黎平代的，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过：「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吴黎平挟着书本一段一段的读，看起来是个书生，有点可怜巴巴的样子。

高岗讲「群众运动」

李富春给我们讲「中国问题」。

刘少奇给我们讲中共党史，其人貌不惊人，不苟言笑，说话的声音像个女人。他常告诫我们不要存有「领袖欲」，他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给他当不了领袖；一声不响的人，却可能一步步爬上。」后来我才明白刘的这几句话，是冲着王明的。

邓发给我们讲工人运动，他说：「我们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已经忘本了。」

王稼祥给我们讲「中国革命与武装问题」。

李维汉给我们讲「中国社会团体与政治党派的调查与分析」，据他说：「民社党党员一共二十四个人，青年党党员不出一百人。」他称张君励为「张排长」。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杨松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

军政治委员，他给我们讲「统一战线」。他引用到一些手抄资料供我们小组讨论，其中特别要我们从许多生动的革命史料中去学习，了解党如何从两条路线中展开斗争（即党内的斗争）。

陈云，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讲党的秘密组织与地下工作。

我最不喜欢的是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与边区参议会议长，我们背地都叫他高大麻子，他给我们讲「群众运动」，只看他嘴唇上下移动，简直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的官僚架子还很大，我们一发问，他总是很不耐烦。当时我就感到一点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当那么大的官，对我们讲「群众运动」呢？

传奇性的故事

枣园最特别的一门课是业务，所谓业务者，即地下工作的技术，例如：

怎样利用社会关系（亲属、朋友、同乡、同学等），找到自己的安身处，作为立足点。

怎样找一份公开合法的职业，掩护自己的工作。

怎样与非共人士打交道，怎样利用中间份子、黄色工会、国民党和其它反动份子。

怎样在通信中用隐语。

怎样去联系「自己人」时所用的暗号。

怎样利用打麻将之类的形式开小组会。

怎样利用舞厅之类的热闹场所交换情报。

怎样利用敌人的公开机关，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怎样随时随地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容貌和化装。

怎样摆脱敌探的跟踪。怎样打击叛徒。

怎样在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审讯……等等。

枣园训练班同志中，流行一些传奇性的故事说，中共地下工作中，具有化装天才和「十八般武艺」的人相当不少，有人谈周恩来，说他男变女，女变男，易如反掌。有人说陈赓，说他在上海走进一座大厦，一进一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有人说李克农，他扮起国民党的高官，进出国民党的机关，卫士都举枪向他敬礼。有人谈到康生，说他能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说到潘汉年，说他能在两座大厦顶上跳来跳去，身轻如燕等等。

抗战期间的中共地下工作

抗战期间，中共的对日情报工作与国民党之间有较多的联系，都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的对日情报系统，大致可分为五个地区：一是以潘汉年为中心的上海；二是以廖承志为中心的香港；三是许建国，刘仁，王世英为中心的华北；四是以朱明，金仲华，邵宗汉为代表的苏联情报中国部；五是东北情报部门，一部分由华北领导，一部分由东北抗日联军陈龙领导。据我所知，1927 年国共分裂后，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的「红队」，抗战开始后已不存在。「红队」这个恐怖组织受过苏联「契卡」训练，队员身体健壮，精通武艺，专门搞暗杀活动。「红队」当年被称为「伍豪之剑」（伍豪为周恩来化名）。

周恩来领导中共的地下工作，其总的战略布署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以，一般的左翼活动，真正的共产党员多数在幕后策划指挥，被捕被杀多是外围的人物。牺牲个人保护组织和领导，当年有许多为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认为这种赤胆忠心奉献革命是应该的。

当时中共的地下工作，大致有几个要点：

第一，西瓜政策，外面一定要有保护色，里面是红色的，不要露

锋芒：不要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有「三化」，一是职业化（要有一点专业知识），二是社会化（要广交朋友，而绝不能暴露自己，甚至要交反动派的朋友，遇到危险时，住到国民党要员的家里），三是合法化（比如男女同志以夫妻身份作掩护，不使外人怀疑）。

第二，敌人的机构要打进去，把敌人的干部拉出来。秘密派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据早年青年军招募委员会的周祥对笔者说，1942 年江泽民参加过青年军 208 师，驻江西黎川）。三教九流，青帮红帮，哥老袍哥，黄色工会（即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乡会，同学会，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要打进去，愈是敌人心脏的部分，愈要打进去。

第三，把敌人的据点变为中共的据点，利用敌人的公开交通线，掩护中共的秘密交通线，利用敌人合法的电台掩护中共非法的电台。在敌人后方开展经济斗争，如抢购银元，黄金，屯积生活必需品，利用共军控制区走私，包括向白区推销南泥湾特产（鸦片），由贾拓夫主持，扩大财源。

第四，储备力量。同志与同志间避免直接往来；单线联系；必要时牺牲个人或外围保护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甲合作打击乙，同时又与乙合作打击甲。用反共的面目和组织消灭反共的力量。因此，为了培养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机构的关键职位，牺牲一些小共产党员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特务熊向晖在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身边，利用反共面目，杀过不少共产党人，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第六章 我与新华通讯社

我在延安的遭遇，有时倒霉，有时风光，真实的情况确是如此。做了共产党员，身不由己，全听从党的安排和指挥。我在那个时期好似一块木料，领导当然是工程师，有的领导说，我属于栋梁之材，有的领导说我只适合搭草棚，有的领导说我只配劈作废材火化。他们分别主宰了我的不同命运。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当年在延安有一口号是：「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凡属于重点培养加工施肥的干部，有时可能平步登天，有时也可能无辜被打入地狱。我也许属于其中之一吧。

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

我在枣园训练班大约两个多月，潘汉年安排我担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我这个主任没有一个兵，一个人住一个窑洞，采访、写稿、用复写纸抄稿件都是我，先后将稿件提供给武汉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的《新中华报》和《每日新闻》。

办事处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写通讯稿，而是替潘汉年转信件和包裹。这些邮件的封面上写的是通讯处的地址和一个假名字，里面是什么，我当然不知道。这些邮件我送给潘或潘来自取，有的是汪漪来取。汪也是枣园训练班的同学，她是燕京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后来派在史沫特莱身边工作。史沫特莱在苏联被当作托派，被驱逐，与中共的关系却搞得很好，出版过英文版的《朱德传》，中文版是由汪漪译的。

办事处正式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有些流动干部到这里暂住，几天又走了，多数是派往担任地下工作的干部，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人寿、黄景荷夫妇。刘人寿在 1955 年潘汉年事件中受牵连，长期系狱。人寿和我相识时，我们都是青年，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从未失手过，却在壮年可以大有可为时入了中共自己的监狱，一住近 30 年。以后他和潘汉年的平反一波三折。汉年已逝，人寿出狱时身心备受摧

残。虽然我脱离中共后，彼此在政治上各走各的路，但是我这个人的一生，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对于往日的朋友和同志，无论已逝的，活着的，我总是怀念着。

我和人寿夫妇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记不得为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三个人凑钱到一家小馆子一聚。吃得差不多时，突然来了空袭警报，我们来不及付账，一起奔了出去。于是三个人笑着说：「我们还可以再吃一餐了！」

潘汉年要我去访问一位以塔斯社记者的名义驻延安的代表。此事一直令我不解。我当时的政治水平低，俄文英文一字不懂。我按潘汉年提示的问题，通过一位张小姐翻译，我用铅笔记下他的答话。这位苏联人的姓名和他说的问题，我记不得了。我把访问的记录交给潘汉年，他看了没有表示什么就收下去了。事后我想，那位张小姐也是用英文和苏联人谈的，汪漪英文好，潘汉年为什么不派汪漪去呢？

我对于这件事给终不理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不理解的事，也是要执行的，而且不可多问。

关于潘汉年这个人

潘汉年长我十三岁，我们一起谈话的时候，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他仪表潇洒，谈吐轻松，反应敏捷，是才子加「小开」型的人物，同周恩来相比，除了没有带兵打过仗，其余没有一样不及周的。他曾问我和镇江时期的旧友是不是保持联系，我误会又是「审查」，回答没有联系。汉年说，社会关系多，为党工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觉得随便放弃社会关系是很可惜的。当他知道我将来有意做一个作家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作家需要成名，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成名，首先要依靠组织。」

还有一次汉年这样对我说：「文化工作是组织工作的一部分，组织工作需要依靠群众，文化工作更需要深入群众生活。」

汉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当时我常咳，痰也多。他见面总是问我「是不是好些」。

汉年上过中学，未毕业，以后主要靠自修，他十五岁时（1921年），做上海中华书局校对，并于同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创造社。他的少年时代，多和我有相似之处。汉年二十二岁（1928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书记，二十四岁任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党团书记。他被称为「神童」，又被称为「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据说毛泽东也叫他「小开」）

1931 年 5 月，潘汉年调中共特科，成为负责人之一。1933 年又调中央苏区，同年 10 月，代表苏区与红军，和福建十九路军签订协议。次年，他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1936年正式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从事长期谈判。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记述，在国共谈判期间，潘汉年能随时与莫斯科联系。在中共的记述中说，潘汉年对于有关密码，能凭强记译电。蒋介石在书中还说，他曾要陈立夫当面考过潘汉年，证明了潘的强记工夫。

潘汉年从二十七岁起就被称为中共的外交部长。他是中共的一位传奇人物。

1939 年初，我记得有几次见到潘汉年，他都是用纱布包住一只眼睛。最后一次他对我说，他的眼疾很严重，延安缺少治疗条件，他将在短期内到大城市治疗。因此他把我的工作关系，分别交由三个人和我联系，即杨松、徐冰、曾希圣。潘汉年向我交代说，我以后向杨松汇报办事处日常工作，因为他接凯丰为代理中宣部长；与徐冰联系办事处与其它党报的关系，因为他是中央党报委员会的主任秘书；曾希圣是我主要的领导，他接替了以往我和潘汉年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凡是我过去转给潘汉年的信件和包裹，都由曾希圣处理，因为曾是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

曾希圣带我游桃园

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曾主持过军委二局，军委二局是主管军事情报的，破解国军密码工作。曾希圣曾被毛泽东称为「红军的灯笼」，被周恩来称为「红军的眼睛」。毛周都说过曾希圣是中共军事情报的开创者。毛还说，如果没有曾希圣，长征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曾希圣领导军委二局时，不到三十岁，是一个天才，有些和曾希圣共过事的同志说，曾希圣这个人脾气大，不易相处。不过，杨尚奎夫人水静女士说，曾希圣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我有同感。

我和曾希圣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感觉是很有人情味，没有半点架子，没有官腔党腔。如果说潘汉年还对我作过若干政治谈话，曾希圣几乎没有，当然，他需要了解的，潘汉年已经和他谈了。有一次我转交潘汉年一包东西，迟了几天，他批了我一顿。他说：「任何一件事，如果条件相等，时间就会决定一切。如果我们的条件处于劣势，我们能争取时间，我们也会转劣势为优势。」

曾希圣有时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带在身边玩。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回忆是，曾希圣带我到延安王家沟的桃园，桃园又称桃林，风景优美，休憩胜地，常有宴会、舞会。参加者都是高级干部。王实味所写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正是这个地方。

桃园当年是延安唯一的风雅去处，据说是陕北唯一种植桃树成功的地方（枣园类似日后的中南海，桃园类似日后的北戴河）。桃园在延安清凉山下万佛洞、仙人洞之间，原称桃花洞，传说是吕洞宾惊为世外桃园而名，洞外有丛树及院屋。「桃园」有茶室，满座皆中央级领导人。

我踏进桃园感到既惊又喜，在陕北那块枯荒的土地上，我突然见到几十株桃树，一片片绿叶，红花点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树下有石桌石凳，有人在喝茶谈天，有人在下棋玩朴克牌，和整个延安表面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相比，桃园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同台喝茶时，除曾希圣外，记得还有柯庆施、李初黎等。曾和柯后日都是中共风云人物，李初黎早年是创造社的，曾被称为李立三路线者，当时在延安主管对日宣传工作。似乎不怎样得意。

我离开延安后不久，曾希圣调任新四军七师政委，中共建政后，他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来又兼任山东省委书记。他对毛泽东崇拜到盲从的程度，他到安徽以后，注意到淮河易于泛滥成灾，提出「淠石灌溉工程规划」。不料 1956 年受到批邓子恢的影响，他的计划被中央否定。从 1957 年的「反右」到「大跃进」「三面红旗」庐山会议等等，曾希圣都是百分之百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的。

庐山会议后，1960 年春天，曾希圣回到湖南资兴县曾家村，了解农村「饥、病、逃、荒、死」的严重，再对照安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自己过去推行的是错误的政策。他对夫人余淑说：「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戴罪立功。」于是他冒着犯天条的风险，在安徽局部推行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彻底承认反右反错了，一手承担责任的，曾希圣为第一人。在这同时，曾希圣完成了淮河和淠史杭水利工程。

1962 年七千人大会时，毛刘两派都对安徽的责任田、包产到户加以攻击。毛派把曾希圣视为叛徒，刘派也指责曾希圣推行修正主义，是富农的代言人。结果曾希圣成了毛刘斗争夹缝中的牺牲品，被撤掉省委书记职务。由于他在安徽最后一个时期民间声誉颇佳，所以撤职后被勒令不准再回安徽。先到上海，后来迁到四川，「文革」时多次被打得皮肉溃烂。后来转为血癌，送到医院。医院拒绝为「走资派」治疗，1968 年 7 月就死了。曾希圣的为人直率大胆，不搞权谋，他的错误也是太相信「通天」了，对毛泽东个人太迷信了，对党太痴情了。

柯庆施、杨松

柯庆施和我初次见面时，他说「我们好像是同乡」。后来彼此才

知道，他是安徽人，我是江苏人，不过口音似乎相当接近。这件小事可以说明，这位后来被称为极左派「祖师爷」的柯庆施，在当时还是相当乡愿的。

50 年代，著名的「乌鸦作家」曹聚仁在「北行记」一书中写到，他在北京和柯庆施谈到我。曹说：「此人在海外专写反共文章，反动极了。」柯说：「这个青年以前还是好的，怎么搞的啊！」一个被称为极左派的共产党人，用这种口吻来看待我这个反共者，可能也出于他的乡愿。

目前中共许多资料都说柯庆施是个坏人，因为他是「四人帮」的祖师爷。我对柯庆施的看法，只能凭我个人的体会，我认为柯庆施对青年一般都爱护，他当年培养上海一批青年，不等于他对这批青年后来成为「四人帮」的干将应该直接承担责任。

杨松相貌俊秀，文质彬彬，平易近人。有一次我去向他汇报工作，正碰上他开饭，桌上放的是四菜一汤，三荤一素。我眼睛为之一亮。当时一般干部的生活是很苦的。杨松问我吃过饭没有，我撒了个谎说没有吃。于是他招呼勤务员给我开来一份菜式相同的客饭。在当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后来我每次见他，多选在他开饭的时间。

杨松，现在五十岁以下的共产党人，恐怕知道他的人不多了。我去见他的时候，他是中宣部的代部长。原来的部长是凯丰，因为到武汉中央代表团去了，所以由杨松代理。杨松与凯丰都被认为是王明派的理论家。延安后来的《解放日报》，凯丰是社长，杨松是主笔。

杨松是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学生，1927 年去苏联。他和柯庆施都曾经在海参崴主持过「共产国际远东交通站」。有的中共干部的回忆中提到，当时要去苏联，有的是要经过杨松谈话的。

杨松从 1933 年起，主持中共吉东局，领导东北的地下工作。次年，吉东局改为满洲省委。当时东北的地下工作受莫斯科的中共代表

团直接领导。杨松经常化装成商人、医生在东北活动。杨松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杨靖宇的政治委员，他的身份就公开了。1935年杨松在莫斯科，是中共「八一宣言」的起草人。

我和杨松见面不久，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会，杨松要我去采访。我到会场上找到高岗，他是议长。「高大麻子」的官僚架子很大，我以前见过高岗，而且和他谈过话。但是这一次，他似乎根本不认识我。可能是他的官大了。在陕北，很少人不讨厌「高大麻子」的，只是不说而已。

我说明来意。高岗不耐烦地说：「新闻记者的事，我们这里不管。」

「高议长，」我说。「这是一件大事，应该向全国报导。」

「这关你啥事？」说着，他把头转向别处，耸耸肩走开了。

那个时候正是毛泽东与高岗互相吹捧的时候。毛泽东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个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个模范。毛甚至还说，他自己要向高岗学习。对我来说，毛泽东赞扬高岗，我却有些不解。后来高岗的官愈大，我愈觉得他是个草包。

杨松又指示我多报导边区的建设。我记得我为《新华日报》写的第一篇通讯是「边区工厂」，这是当时陕北唯一的工厂，位于距延安四十里的茶坊。我去那里采访的时候，在工厂里睡了一晚。夜里，同睡的人酣声如雷，我无法入睡，走出窑洞，这时立刻来了一位警卫向我查问。这个工厂的厂长沈鸿，是中共工业的开创者。

「延安整风」时，杨松除了写社论和教书以外，还忙于写检讨，不久，杨松就死了。

在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杨松，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似的。我后来在香港时，先后知道杨松、潘汉年、曾希圣被整，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延安时认为最好的领导，也是我一生中最早进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一个个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运中的不幸，影响了他们吗？

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吗？

我和潘汉年相识最早，1939 年初，汉年离延安，我和他从此一别十年。1949 年共军占领上海时，我早已脱离共产党。潘汉年把我大骂一顿，要我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这一骂让我下了逃离大陆的决心。1955 年 4 月，汉年以种种离奇罪名被捕，折磨至死，我在有关上海的部分，将再写到。

新华通讯社的成立

1939 年 2 月，延安的三个新闻单位奉命合并，成为新华通讯社。合并以后，由原《新中华报》负责人向仲华任社长，原《每日电讯》负责人丁拓主持电讯科，我是（新华日报》驻延安办事处负责人，主持通讯科。从此杨松不大管事了，徐冰则以党报委员会主任秘书身份领导新华社。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常说我是新华社的老祖宗，就是根据这个史实。

中共出版过许多种有关新华社历史的书籍，他们多数把新华社的历史分割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 1931 年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红色中华》当年是一份报纸，也出版时事特刊，简称《红中社》。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通讯社。不过，中共以《红中社》作为新华社的前身也并无不可。后一时期是从 1941 年秦邦宪（博古）领导新华社算起。因此，新华社的历史就留下一段空白。

中共有关新华社的资料，很少提到第一任社长向仲华。向仲华早在江西苏区时代就在《红色中华》工作。《红色中华》于 1936 年 1 月在陕北复刊，后改名为《新中华报》。从复刊到新华社成立这一段时间，全由向仲华负责。他是文武双全的领导干部，后来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和副总参谋长。向仲华为人的特点是，在中共内部如履薄冰、险象环生的权力斗争中，能够做到大智若愚，明哲保身。在我们相处期间，我对他的印象不坏。但是他在我的政治问题上一言不发。他逃过党内历次运动很不容易，死于 1981 年。

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党报委员会给我们发了一份有关党的新闻学观点的材料。其中说新闻工作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新闻工作绝对没有独立的客观的说法。新闻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首先要讲政治的立场和党性。

党也重视利用非党的报章宣传党的政策，产生统战作用。

后来当我接触到一些传统的新闻学书籍后，才知道共产党的新闻学观点是很荒谬的，传统的新闻记者道德标准，有的是主张有闻必录的，有的是主张忠于事实真相的，有的是主张揭发社会黑暗的，有的是主张为社会伸张正义的，总之，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都要求一个新闻记者，讲求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道德的修养，为人民大众的喉舌。

共产党把传统的新闻工作的美德，全给推翻了。

从开创到被踢出新华社

新华社在清凉山，靠近党报委员会。我在这里工作的一段时间，徐冰对我一直不很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在未见到我前，他对我已有了一定的看法，或者认为我的工作能力不够，或者根本不喜欢我这个人，反正他和我每次谈话不超过三句。

后来，我和徐冰又在重庆的「周公馆」相见，他对我的态度转为友好，这是后话。虽然他在延安对我是非常粗暴，我还是对他晚年的遭遇十分同情。

徐冰原名邢西萍，早年留学德国和苏联，1924 年入党。先在北方局工作，后来又在南方局工作。中共建政后，曾为中央统战部长。「文革」期间，「61 个叛徒」事件被弄得沸沸扬扬，当年徐冰在北方局时，曾协助刘少奇处理此事，他是首当其冲。他在当统战部长期间，经常与在华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往来，这其实是他的本职工作，而

在「文革」中被称为「美国特务」。他于 1972 年 3 月被迫害致死。

我在新华社工作时间不久，徐冰派来了一个人，叫缪海棱，起初说是做我的副手，不久他就指手画脚，不客气地把我的权夺了。再进一步，他又指摘我的党籍有问题，说我没有把组织关系和党员鉴定表通过合法程序转到党报委员会来。于是我找向仲华社长说明经过。我说我确有组织关系，但过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只有我一个人，怎么过组织生活？可是向仲华这个人是个菩萨，对政治问题一贯不表态。

我的申诉没有结果，就去问徐冰。徐冰说，他和海棱同志的意见相同。而且他补充了一些加强语气的话：「你没有组织关系，工作要另外考虑。」这样，新华社的党支委会我就不能参加了。

我又去问杨松。杨松说：「汉年同志对我说过，你是同志，但是你没有参加组织生活很久了。」我又向他解释过去我一个人无法过组织生活。杨松说，这些情况他都了解。他又问我：「能不能由汉年同志说明情况？」我说，潘汉年离开延安后，目前人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我又去找曾希圣。曾希圣说：「你的职位不可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汉年同志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当然可以证明你是同志。」他郑重地提笔为我写了几个字，大意是说，马义是个好同志，证明我的组织关系。我以为问题得到了解决，把曾希圣的信交给徐冰。徐冰看了看，说：「哪有这样处理组织关系的！」随手就把曾希圣的信撕了，说：「这封信有什么用！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无权写这样的信。」

从此，我以「组织关系不清楚」，不宜担任领导工作。先坐了几天冷板凳，随后被停职，我和新华社的关系就此结束。

顺便一说，当时徐冰宠爱的缪海棱，也就是从我手上夺权的那个人，在「文革」期间是一位红人。他是新华社副社长，实际负责人。曾写诗歌颂江青，又是揭发徐冰的积极份子。人事沧桑，政治的道路

阴险，敌友无常，怎么说呢？

我从新华社的开创者之一被踢出以后，又到了中央组织部。

第七章 陈云要我接受党的考验

陈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干部的工作分配，高级干部由毛泽东（有时也包括刘少奇）决定，中级干部由组织部（有时由陈云亲自谈话）决定，下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决定。

我最后一次到中央组织部，高文华在低头看有关我的材料。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窑洞的后边。一会儿，陈云随高文华走出来，陈云也在这个窑洞里办公，然后，我又被陈云指了指他办公台旁一个座位让我坐下。

我在仔细端详陈云，他身材不高，穿着整洁的一套斜纹布军服，面容清瘦，双目有神，很精明干练的样子。实际上我早已见过他，只是没有单独谈过话。

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我也坐在下面听。我的个子矮小，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比我年纪略长的同志从我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

当时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比较轻松，可以有人敢于这样提问。接着陈云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当时我听陈云的这段话，我也是这么想的：毛泽东的健康关系到

中国革命，毛泽东吃鸡吃得合理。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同志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我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当年陈云的风度也使我印象很深，迄今难忘。我也深信我的追述除了简略以外，绝没有曲解陈云的原意。我有时想，陈云这段「语录」如果不写出来，在中共党史上也许就会失传了。

接受考验，开辟工作

陈云翻阅关于我的文件，他提出两个问题问我：「你在镇江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既然是有陈果夫支持的，他们难道没有要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从来没有，我年龄也太轻，他们似乎也没有怎样注意过我。」以下我就大大的骂了一顿国民党的人都是胡涂蛋，我又继续说：「在国民党人中间，谁注意过这些事？花钱办了事业让我们活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在我被捕以前，还没有跟我谈过思想问题呢。」

他满意地笑了。

「那么，你在被捕和出狱的时候，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关于这点我在自传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他们写了几个问题要我书面答复，我抄了几段『唯生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他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倾青年，一定已经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对他们从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件活动，他们也没有再要我悔什么过，就叫我交保释放了。」

陈云深思片刻，然后对我说：「你要接受一段时间艰苦工作的考验，然后你的组织关系再作决定。」他的意思是要我到敌后去工作。我说我接受组织的决定。陈云又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要接受党的考验的。要自己开辟工作。」

接着陈云和高文华谈了些什么，高文华又向我交待以后同组织的联系方法，大意是，我到白区（国共合作后已取消「苏区」的说法，但是习惯上仍把国民党统治区称为「白区」）以后，与党的联系是「单面联系」，即我必需随时随地把我的一切活动向某地某人报告，而那个某地某人是一个符号，我不能找到它。而它却可以随时掌握我。这也就是说，我要为党工作却不被信任。

陈云把我送出延安，用的是「开辟工作」和「考验」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学问很大，具体的解释是，要我在党的领导下另外「开辟」一个天地，如果我侥幸有些成就，党认为有利用价值的话，就承认我的组织关系，否则任我自生自灭。如果我被认为有反叛行为，会发生什么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呢？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了。我在入党的誓词中说过，我准备为革命的需要，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一切服从组织」，虽然受到一些打击，我的党性依然很强。有时觉得委屈，再一想，这只是个别领导的偏差，中央是不会错的，应该依靠党，相信组织。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是神圣的，我绝不可以怀疑和渎犯他，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了党，我毫无选择，跟着党的正确路线，纠正自己的错误。正确永远是属于党的，错误永远是属于我自己的。无论党怎么指责我，批评我，处分我，我都接受。「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原罪」，党是至高无上的神。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的确可笑，而在当年，我的一颗纯洁的心早已奉献给那个「崇高的理想」了。

延安，延安，我资在舍不得离开你啊！我把你当作母亲，我把你看作「圣地」，我离开时虽然自己带着一身委屈，依然把延安看作「圣地」。我问自己，为什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不幸呢？我又想，党怎么样把我怎样处理，我是不该怀疑的。

我沿着延河默默地走着，河面虽阔，水不过膝。我又走上浮桥，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石子。我呆呆地看着，随后唱起了《延安颂》、《抗大校歌》、《黄河谣》，掩饰我的破碎的心。然后我对延河说声「再

见」。

路途遥遥，人海茫茫，我这个原是没有家的孩子，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以为有了一个家，现在我又要去寻找了。

我百感交集。我在延安也风光过一个短短的时期，虽是黄梁一梦，也算是不虚此行。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做成的」，他自己取名「钢」，一般的干部应是木料，有的可做栋梁，有的只可烧火。不同的领导主宰一个党员不同的命运。党员除服从之外，绝不可以还价，也无权问为什么。

我从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的遭遇却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我在延安被审期间，一度保护我过关的是潘汉年，潘汉年的下场是悲惨的。把我送出延安的是陈云。我很感激陈云，假如不是陈云把我送出延安，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期间，我很可能遭遇到和王实味同样的命运。祸兮福兮？

国民党追捕，共产党赶我

我一到白区，就在陕西洛川被国民党逮捕了。他们要把我送到咸阳受训。押解途中同行的还有一些其它被捕的青年。我和宋一平（曾经是参加共产国际最年轻的中共代表，1953 年 3 月与胡耀邦同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古元（画家，后来担任过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我们三个人对共产党一片忠诚，一身是胆，从三原逃到西安。我们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又被接待在招待所。不久，宋一平和古元不辞而别了。

我在招待所住了四天，又被叫到办事处去。可能他们向延安请示过，对我的态度马上变了。

办事处的这位同志严厉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搬出招待所。」

「但是，我在西安熟人很少。」

「不行！你立刻搬出去！」

说着就立起身，作送客的样子，我这时意乱如麻，心痛欲碎，无力地抬头看一看他那冷酷的面孔，走出了办事处。

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旧的社会关系在我去延安以后，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我能到哪里去呢？我是从三原逃出来的，国民党在追捕我，而共产党又把我赶了出来。

这段日子我是在东躲西藏，露宿街头中度过的。我想到宋一平，我们在三原出逃时，他曾经对我说，他有一个哥哥叫宋野平，是西安《秦风日报》的负责人，这张报纸是一张独立性报纸。宋一平对我说，我如有困难可以找宋野平。

我找到《秦风日报》，和宋野平谈了一下。《秦风日报》是个历史很久的保守报纸，待遇很低，也正缺人手。宋野平要我写了一点什么，然后就给我当了编辑。

我以为生活安定了，就住进了西安青年会宿舍。谁知不久，中共又派人通知我，要我立刻离开西安。他还用警告的口吻对我说：「否则大家都不方便。」我回到报社，报社的人又对我说，警察局有人来过，问到我。当时我想不出共产党要我离开西安，国民党的警察找我，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不过，我还是乖乖地听了党的话，搬到西安郊外一个叫吴复如的朋友家暂住。吴复如是我在《秦风日报》工作时认识的，他见到我的狼狈，毫不犹豫地留下我。他在国军政工队教唱歌，他的太太是学美术的，绘宣传漫画。他们住的是一间破旧矮小的民房，小夫妻的生活带有浓厚的艺术趣味。这个小房间除一张木板床外，打地铺的空间也没有。吴说：「我们就睡在一起吧。」他的太太也表示欢迎。这是我第二次和朋友的一对儿三人同床，前一次是在延安和刘人寿夫妇。我自嘲自己这个角色叫做「床上宾相」。

吴复如是东北人，他使我接触了东北军。

骑兵第二军

当时，国军骑兵第二军何柱国的部队从绥远奉调赴河南东部。这个部队经过陕北，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给他们很深的影响。何柱国在西安，决定要物色一批青年政工人员随部队到河南去。我由吴复如介绍，参加进去。我们这一批十多个青年，发给我们骑二军的军服、臂章和路费，我们就上路了。途经潼关，山峰连绵，谷深崖绝，南傍秦岭，北依黄河。远远望去可见敌哨。潼关是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十分壮观。

我们这个临时组织的小团体，一路上也开小组会、检讨会等等，搬出的全是延安学来的一套，我们在讲话中用的词汇，也属于「延安文法」。当时青年普遍的倾向，如果说你显得左一点，就被视为「进步份子」。如果你能胡扯一点什么马克思、牛克思，就有人会簇拥着你，把你看作思想上的引路人。当时很多青年就是这么迷信共产党，我们这个小组织就自称为临时支部，目标是找共产党。

骑二军的总部在河南沈邱县。沈邱是一个三等小县，在河南安徽的交界的地方，我们从西安走了八日才到。第二天，骑二军政治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茶会，何柱国将军出席讲话，我则代表几个年轻人致答辞。以后，我被派到政治部主办的油印报纸《抗战日报》担任主笔。

骑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不少东北军系统的干部，也有中央派去的胡宗南系统的干部。何柱国本人是广西人，骑二军却是东北军，所以内部矛盾重重，磨擦很多。我发现很多中下级的干部，拿国军的军饷，着国军的制服，他们的心却是向着共产党的，听共产党的话，按共产党说的去办。

我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但还是一个积极为共产党工作的人。我虽然受了共产党的许多折磨，还是相信共产党是好的。工作中的偏差是革命过程中避免不了的现象，我应该毫不动摇地忠实我的理想。不

是党员，一样可以革命，我要做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心向着党，寻找党。

1940 年 3 月，我随骑二军抗战剧团（这是我们临时支部领导的）到安徽阜阳一带做流动宣传。在骑二军，练习骑马的机会很多，有的同志也的确学得很好，活跃在大平原上，跳上跳下，疾驰如飞。我真是羡慕。但是我自己学得太糟了，第一次就从马上摔下来，第二次在过河的时候，在河中央顺水而下，马在指挥我，我要听它的，它和我大开玩笑。第三次马缰控制不住，那马一口气狂奔了十余里，可把我吓坏了。所以这次行军，我主动放弃了骑马，把行囊放在人力车上，随军步行。我们到达安徽边境，正遇到日军的扫荡。在敌人严密封锁之下，我们抢渡颍河，个个屏着呼吸，船在河心轻轻地划着，快到对岸的时候，岸上有一个老百姓急急地向我们摆手。我们的船头刚调过身，敌人的巡罗队已到岸边，开始射击。我们狂奔上岸，四散而逃。晚上敌人退了，我们又从各自隐蔽处钻出。我们决定打游击，我被推为「司令」。

我过去曾在抗大学过游击战术，有几条理论，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完全背得出来。现在真的做了「司令」，才知道书本上的东西遇到具体情况怎么用，就难了。当时散兵和逃亡的老百姓到处都是，部队扩充很容易，粮食和武器的缺乏都很严重。我们找乡镇长、保甲长想办法，他们埋怨说：「我们这里平时三不管，一遇征粮要草全来了。过去有中央军、和平军（指汉奸部队）、新四军。像你们这样的游击队也时来时去。」老百姓中还流行着一首顺口溜：「鬼子来扫荡，游击队跑光。两边打不着，百姓遭了殃。」

游击队在实力上无法同日军硬拼，同时又要不断向新地区征粮，因此只有「避战开源」四个字才能生存。有人骂这种游击队「游而不击」，或者「扰民」，甚至说与土匪差不多。老百姓说的其中也有些是事实，我们也是不得已的。而游击队之间的矛盾，主要也在于生存空间的争夺。实在是大鱼吃小鱼，而大鱼小鱼打的都是抗日旗帜。有的

小鱼没有还手的余地，就被攻击为「土匪」、「汉奸」，被大鱼吃了。

新四军说我们是土匪

不幸，这顶「土匪」的帽子就落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这支可怜的游击队，游来游去，终于遇上了大鱼——我们胡里胡涂地闯进了新四军的地盘，被包围了。

我当时听说对方是新四军，高兴极了。我们不是要找共产党吗？这不正是大好的时机吗？对方要我们缴械，我对我的伙伴说：「这是应该的，新四军是自己人。」

这样我们被缴了械。我的伙伴们被集中看守，我一个人被带往孙家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据说司令要见我。到了目的地，说是司令部搬走了。我们又继续走，在曹市终于见到了司令——新四军苏豫皖边区纵队司令彭雪枫。他像一个大学生，有点书卷气；同时他也有军人的威武，眉宇深锁，目光逼人，像一只敏锐的猫正注视一个目标。

「共产党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彭雪枫说。「凡是抗日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但是必须接受革命的领导。」

我说：「我们当然愿意接受革命的领导，但是一路上陪同我的同志却说我是土匪头子，这的确使我太难过了。」

「什么？难道你不是土匪头子？」彭雪枫说。「你不但是土匪，你现在的态度就是反革命。」

我听到这两句话，尤如晴天霹馒，眼前一阵昏黑。等到我略为清醒时，彭司令员已经不见了。一个干部把我带进一间独立的小房子，对我说：「你就暂时在这里住下吧，等彭司令还要召见你。」房内有一个士兵，会意地把我收下，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勤务员送来，看管我的士兵和我寸步不离，从不和我说话，态度严肃得可怕，他大概真是把我看作土匪或反革命了。

那个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四五天后就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兵油子，满脸髭须，结实的大块头，当接替那个士兵的时候，他世故地看了看我。随后，当我们俩之间沉寂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和我搭起腔来：「你在这里关了几日了？」

「不，怎么好说是我关在这里？我等着四五天了，彭司令员要召见我呢！」

「彭司令员要召见你？」他惊讶的问了我一句，又怀疑地瞥了我一眼：「真是怪事。」

「难道有别的事吗？」几天来蕴藏在我心中的一片疑云，经过他这一提，倒立刻需要找到一个回答。

「啊，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起来：「老子当了二十多年兵，所见到的怪事可真多。哈哈，我们这种当兵的，在那里干都是一样的。」

一说到他的当兵，他话锋更健，讲个不停。

「老子起初跟吴佩孚，后来又跟了老冯，老冯垮了，就跟了老蒋，后来又当过皇协军，我们奉令清乡，新四军来，我们一举手又变成新四军了……。」

这个兵油子当着别人的面骂我是「反动派」，私底下却和我做了朋友。

我们相约逃出新四军，三更动身，一口气走了一百四十里，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倒头便睡，又睡了一天一夜。后来我的这个同伴找到他的老长官，我也回到骑二军。

又一次做了政治皮球

我在第二天返回沈邱，立刻就去见了政治部主任李春华，关于我从新四军逃回来的事，只字未提，只说是我们的游击队给日本人打散

了。

李春华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他认为我们这次打游击虽然失败了，但是已给骑二军的政工人员带来莫大的光荣，他又立刻把我引见何柱国将军，何柱国也慰勉有加，立刻就决定提升我当抗战日报社的社长。

这时我很想安静的做些实际的抗战工作，对于共产党的作风，有了更深一步的反感，也极端痛心。但是，我还是极力的想宽恕他们，还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严格的战斗的革命的党所免不了的。有时，我还是这么痴想，这不过是某些个别干部的个人错误，与党的领导和革命路线是无关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些冤屈，我总应该忍耐些。我们的领导者过去不是常说，一个好的革命者，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应该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吗？

骑二军中几个过去临时支部的同志，不时的问我：「与党的组织关系恢复了吗？」我只是苦笑。

正当这个时候，骑二军却对我很礼貌的下了逐客令：

我一听说何柱国将军找我立刻去谈话，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见面时，我照例向他行个军礼，他很客气，一定招呼我坐下，我想事情一定是更加不妙了。

「一个青年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是很好的，我从来不但不加阻止，而且极愿意帮助他的。但是，你也应该了解我今天的处境，我的苦衷⋯⋯。」这是何柱国将军的开场白。

「军长，你的意思是？」我问。

「没有别的，我只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不是！」我非常爽朗的回答他。

他在台上翻了翻，检出两项文件，随手递给我，一面对我说：「你自己看看吧。」

两项文件是用不同的字体写的，一项是讲我过去的入党和在党内担任过的工作，另一项是说我这次是新四军派来骑二军工作的。后一项全是胡说，而前一项几乎全是事实。我看过以后，呆了半晌，何柱国两只眼睛紧紧的钉着我，注意我的反应。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抬头看看何将军，他的眉宇间透着温儒、智慧和英武，给我印象很深。当时国民党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但我对这位国民党将军充满敬意。骑二军把我礼送出境。许多青年朋友十里相送，女孩子们流着眼泪。我的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沉重的。

第八章 担任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

1940 年 8 月，我到了四川重庆。重庆是一座山城，房屋依山取势，层层叠叠，又是嘉陵江与长江的会合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临时首都。我在延安时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以下简称青记），所以到重庆后住进张家花园的青记宿舍。

青年记者学会

青记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负责人是范长江。他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后来参加中共，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文革」时跳井自杀。在重庆时，范长江是个忙人，青记的事，他仅仅挂个名，日常工作由徐迈进、杨西光、傅于琛领导。徐迈进是「新华日报」编辑主任，他负资青记的财务。杨西光负责青记的组织，他后来是「光明日报」社长。在「四人帮」倒台后，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很起了作用。傅于琛负责青记的总务，他原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主编。当时青记开会时，我曾经「炮轰」过他，什么事想不起了。事后我觉得傅于琛是个老实人，我为此深感内疚。以后我查中共的数据，当官的找不到他，被整的也找不到他。不过傅于琛这个人常在我心中出现，我怀念他。

我也很怀念徐迈进。他与潘梓年（「新华日报」社长，潘汉年的哥哥）、章汉夫（「新华日报」主笔）被称为创办「新华日报」的三杰。徐迈进对我说过：「在国民党统治下，要办一个共产党的报刊真是困难重重。」当时我对迈进的话深有同感。但是后来，我有另一种感受。国民党时代，共产党的报刊出版固然不易，而中共当政以后，人民根本说不上有出版自由。

我在青记还有一位难忘的朋友叫徐师梁，笔名「老百姓」，他在苏皖边区办过一份油印报纸「拂晓报」，字体端正，版面精美，当时被称为油印报中的第一报。他奉命调皖南新四军总部办一份同样的油

印报，经过重庆时我们住在一起。我对他谈起我被国民党军队「礼送」出境，却没有透露我在新四军几乎被枪毙的事，所以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告诉我一件事，就在我离开沈邱后不久，骑二军和新四军打了一仗。我心中一惊，假使我还在骑二军，就不知什么事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算又逃过一劫。想不到后来师梁辗转到了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正赶上「皖南事变」，死在乱枪之中。在那个年代人的生死常常不是自己可以预料到的。

青记宿舍的隔邻是影剧界人士的宿舍，两座房子的后院相通，所以常在一起聚谈。记得起的是著名导演史东山，和话剧名旦，正值青春年华明艳照人的舒绣文。「文革」史料中有舒绣文被斗惨况，令人不忍卒读。

我在重庆开始接触的朋友多是「新华日报」的，其中有陆诒，他是一位能干的爱国记者，但是不大懂政治。李普为人厚道，他虽在中共的党报工作，仍不失为一位职业记者。鲁明是一位情报记者，中共建政后他出任驻外使馆的参赞。石西民是「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他的身份更为特殊。有一次我和他走到重庆的两路口，忽见前面有人打架。石西民对我说：「我们一起喊『特务打人了』。」这一喊，打架的人都以为对方是特务，过路的人也跟着喊「特务打人」，到底谁是特务，无人知道。石西民拉我走开。他认为，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让群众痛恨国民党的特务。

我在重庆也接触过一些不属于中共党报的记者，例如「大公报」的高集，「新民报」的张西洛，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不过我有一个印象，他们比「新华日报」的朋友左得多了。左派朋友中我也认识一些很有温情的，其中有一位叫方土人，是苏联塔斯社的翻译，收入可观。他也住在张家花园，他和夫人每次见到我都要我到他们家「补一补」营养。他曾经私下对我说：「我的薪水是中国人的几倍。我属于使馆雇员，苏联人的薪水又比我们雇员高几倍。」他又补充说：「这在使馆也是常情，不过，塔斯社常常加班加点，不加我们的钱，

太小气了。」

在重庆我遇见少年时代的朋友戈扬，她当时还叫树佩华，在蒋夫人领导下的全国慰劳总会工作，我每次去看她，她就把我带进附近的小馆子给我「补一补」。我们很少谈政治。很多年以后我们在纽约见面时话及往事，才知道当年她在邓颖超领导下工作，而我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但当时我们都守口如瓶。

和周恩来的一次单独谈话

在重庆期间，范长江介绍我担任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若山（即金元凤）的秘书兼该队中文部主任。后来又成为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

朝鲜义勇队的队员，当年都是由国民党的干训团训练的，全队约有三百余人。人数虽不多，但素质极好，政治文化水平都高。他们在二十五岁上下，大多是在革命家庭中长大。朝鲜亡国以后，他们随亲人颠沛流离，不断受着革命的熏陶，体健力壮，生活刻苦，意志坚定，思想纯洁，社会关系单纯，而且每个人至少懂韩、中、日三种语言。具有上述各种优秀素质的朝鲜革命青年，是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

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若山，三十七八岁，圆圆的脸，宽宽的肩膀，有一副迷人的笑容，永远是乐观的表情。当时我和金若山相处得很好，他是一位可敬的朋友，我直至今天始终怀念这位异国友人。他热情，诚恳，重道义，气度大，常常做一些吃亏得连自己都不能解释的事。他是一位革命的苦行者，我很佩服他。当时在重庆，有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朝鲜青年，他们对金若山并不满意，常常暗中伤害他。金若山并不介意。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他们也不重视那些患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的朝鲜青年，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中共重视两个实力派，一个是以金九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反日反共，有个「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另一个是以金若山为代表的进步派，他们标榜朝鲜民族统一战线，有一支颇具战斗力的义勇队。两者都受国民党的支持。由于朝鲜反日反共的保守派与国民党的理念相同，更受到国

民党的垂青。一般来说，国民党的 CC 系倾向支持朝鲜保守派，黄埔系倾向支持进步派。

我当时写过一些有关朝鲜问题的文章，在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和「国际新闻社」发表，还出版了两本书（两书都用的我的本名「马义」）。1992 年 9 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在这本书中分别注出一部份资料引自马义的「朝鲜义勇队胜利的四年」（1942 年）和「朝鲜革命史话」（1944 年）。当年这两本书用的都是非常粗劣的纸张，能保存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

朝鲜义勇队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加上我的著述和介绍，中共认为我的职业岗位对党有用，曾经整过我的徐冰，这时正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政治顾问，把我请到「周公馆」去。「周公馆」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名义上是周恩来的私人「公馆」，事实上是当时中共领导国民党区域活动的大本营。

我在周公馆一个小房间内坐定后，徐冰走进来了，他和我热烈的握手，笑声不停，倒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一想起在延安时他对我的态度，心中忐忑不安。怎么，同一个徐冰前后怎么变成两个人了。

这天我和周恩来单独见了面，他问的多，自己则说了一些扼要的话。他说：「中朝关系将来的确太重要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在朝鲜的失败，是满清帝制崩溃的信号。」后来问了我一些有关骑二军的事，他似乎对何柱国很有兴趣。

我和徐冰又继续晤面数次，他渐渐要求了解我们朝鲜义勇队的一切，如朝鲜人在中国的党派活动，他们与中国当局的关系，朝鲜义勇队的内部组织情况，朝鲜革命者个别人的分析等等，后来我们的谈话有时他也谈到我个人的问题上面。徐冰说：「你经过党的考验，真金不怕火烧；党现在对你完全信任了，我也对你很了解。」

他停了停，似乎期待我的反应，我没有答话，他又继续说下去：「你离开党以后，表现很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我打算考虑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不过我还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你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像初入党时那么兴奋，但听了徐冰这一番话，心里也很高兴，我随口说出：「假如组织上信任我，相信我还能为革命工作，我自然是愿意的。」

不久，我被通知，正式恢复党籍，并由周恩来和董必武当面交待，我担任中共驻朝鲜义勇队的代表。我的组织关系由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联系，而工作又对周恩来的另一政治秘书陈家康负责，够复杂的。

骗了国民党，也骗了朝鲜朋友

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我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朝鲜义勇队。周恩来说：「朝鲜革命与中国革命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我的安排下，周恩来和金若山在上清寺半山一座朝鲜医生的住宅见过面。周交代他的秘书陈家康和我作日常联系，遇有重大问题由周恩来或董必武亲自处理。陈家康中英文都很好，生得又瘦又小，显得短小精干。他的记忆力也十分好，往往我说过的话，或数目字，过了若干时日他还清楚的记得。家康每次见金若山，都在南岸大佛寺的金宅。金夫人做得一手上好的朝鲜菜，家康非常爱吃。若山夫妇对家康非常尊敬，大家边吃边谈，就像一家人一样。谈话中每提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若山夫妇就流露出一种崇敬的天真的笑容。

朝鲜义勇队的经费和配备全由国民党支持。陈家康要我帮金若山出主意，以提高素质为理由，向国民党要钱和装备。我直接见到周恩来和董必武，谈到这些问题时，周的意见是编制图表和预算骗国民党，董的意见是据理力争。当时的朝鲜义勇队实际上已由中共暗中掌握，这件事主要是我和陈家康两个人干的。陈家康对我说：「恩来同志指示，你的任务是说服金若山，把朝鲜义勇队调到华北去。」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给金若山，告诉他，日本人正把朝鲜人向华北大量移民，朝

鲜义勇队只有在敌后，在华北发展才有前途。他本人对我是信任的，他周围的亲信也支持我的意见。直到把百分之八十的朝鲜义勇队队员调去华北，国民党才知道。

中共的出版物中，关于朝鲜义勇队有如下的记载：「周恩来直接参与了朝鲜义勇队的活动计划的制定，经费预算等。」朝鲜义勇队许多队员后来纷纷北上，进入华北解放区。金若山被迫并入韩国光复军后，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员切断了与金若山的一切联系。国民党支持了金若山的政敌金九（韩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后军），中共也对金若山落井下石，公开支持金九。（见人民出版社的「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等书）。实际上这些对朝鲜义勇队的工作都是我做的。中共把这些账全记在周恩来的功劳簿上，我后来感到，这件事我是一个罪人。

朝鲜义勇队被中共拉走以后，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怒，我首当其冲。国民党对于这事追究得很认真；传我问话，我说：「我怎么能指挥朝鲜人呢？」于是国民党又找金若山，金若山根据过去周恩来的指示回答说：「这是朴孝三（朝鲜义勇队副总队长）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调动。我要把朴孝三撤职查办。」实际上这时朴孝三已经在华北由中共直接指挥，另立门户，改称朝鲜义勇军，金若山如何能把他查办呢？于是，国民党就把金若山的朝鲜义勇队撤了，合并到另一反日反共的韩国光复军。

我对不起金若山

朝鲜义勇队完了，我的利用价值也完了，金若山的利用价值也完了。

当金若山的干部全部被中共抽空以后，金若山又通过我向中共提出，他也要到华北去。这时周恩来拒绝了，理由说的也很堂皇。「周恩来同志的意思，要金先生继续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比过去重要得多了。革命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是陈家康对我说的。

然而这中间真实的原因，我心里很明白。金若山是当时朝鲜革命运动最有威望的领导者，他在朝鲜人民中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性的人物。共产党最初必须利用他，才能把一批朝鲜青年骗到华北去。如果金若山也到了华北，领导权自然又落到金的手里，中共就不易直接掌握了。

金若山要我约周恩来见面，没有想到周恩来连我也不见了。据金若山从国民党得到的消息，国民党的康泽曾为此事和周恩来吵了一架。康泽对周说：「你们口口声声联合抗日，为什么要拆我们的台？」周说：「你说的这件事我全不知道，你说的中共干部马义我不认识，你们要抓要办我不管。」

据说本来国民党要办我的，周恩来说根本不认识马义（司马璐）其人，国民党反而有些犹豫了。

这时，周恩来又要他的左右不准与我接触。周的话后来又被他的左右夸大了，变成「恩来同志说马义有问题」了。周恩来原以为国民党要逮捕我的，马义已经做了炮灰，后来知道国民党既没有抓我，我也没有出卖共产党的行为。此事以后是董必武出面处理的，这是后话。

至于金若山呢？二次大战后他回到韩国。先到汉城，南韩政府认为他是左派，甚至说他是共产党，不接受他。于是他转去平壤，北韩鉴于他在朝鲜民族革命中的声望，任他为劳动相。当时北韩亲中和亲苏的两派斗争激烈，金若山当然属于亲中一派的，不久就以中国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金日成处决。金若山的遭遇令我终生不安。往事萦回，故人依稀，我常为此泪下。

金若山，金若山，我真对不起你啊！

浙西地下工作的逃兵

1941 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在重庆的干部或调动或转入地下。

当时，董必武仍留在重庆，他派来一位姓郭的青年人来找我。郭

暗示我随他走出，然后我们就在附近小丛林边走边谈，他传达董必武的话说：「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就要到来，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组织上作了全面应变的准备。」

郭又交给我当时的法币五百元、车票和中共伪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证件等等，要我立刻动身，到苏浙边区工作。先到浙江屯溪，听候组织上进一步的指示。

我当时内心七上八下，很复杂。接受党的任务吗？想到周恩来那一幕，觉得很可怕，自己实在委屈。不接党的任务吗？国民党要逮捕我，同时共产党也会更加怀疑我。我权衡之下，留在金若山家不是长久之计，但此外的确走投无路，最后还是接受了党的任务。

我在共产党内屡受打击，又被党玩了一次。我被共产党颠三倒四反复了许多次，这简直是常人不易理解的。

秘密工作的暗号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组织上告诉我到皖南的一个暗号，到屯溪后，先发一封信给某某，当你的信件发出后，组织上和你连络的时候，不管他指一样什么颜色的东西问你，你一律说是白色的，然后，你们就可以畅谈一切了。

以后，一个成衣店是我们碰头的地方，成衣店的橱窗中放着几件衣料，是用着做各种符号的，蓝花的放在上面，是要你等一等再来；红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如果你不是特别约好的，请勿进来；无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你可以自由进去；如果这几件衣料一起收去，就表示，这里发生危险或已经发生什么事故了。

我们在地下工作中，纪律很严，组织上常常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同志之间需要互相了解，又需要互相保密，这的确很难。因此必然产生许多人为制造的矛盾。我在地下工作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易学到的东西。

组织上对我们说：「潜伏在党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数据。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领导又说：「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

他们又一再强调，「革命的策略没有直线的，总是迂回曲折的，没有规律的，全靠随机应变。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游击区——天目山

我到了浙江金华。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市，气候温和，街道整洁，市面繁盛，百货充斥，摊贩的叫卖声，婉转动听。这个小城市常常被人披上了「小杭州」的外号。我按照党的指示，和浙西地委一位同志联系上了，他要我到浙西天目山临安县，临安为南宋、元初名城。东为东天目山，西为西天目山，两山脉之间各有一天池，宛如一对双目，故名天目山。临安于潜镇，有一私人小医院，掩护着浙西地委的活动，临安以北的天目山，是当时国民党在敌后最大的根据地之一，由于国共合作抗日，这个根据地也成为中共浙西地委活动的保护伞。

我从天目山出入沦陷区许多次，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能在日本人的枪口下走进走出，如入无人之境，主要是依靠群众掩护。

在天目山周区做地下工作，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老百姓从没有问过我们是哪一党的，只要听说是抗日的，都会自动帮忙。而他们万一被揭发，也是危险的。在抗战期间，敌后死难的无名英雄很多。

我在沦陷区用过许多假名字。有一回一位老乡对我说：「你用什么名字我都不在乎，反正我一眼就认得出你。」我在嘉兴住了一晚，碰到日本人带着翻译查房间。我和侍者从不相识，他却尽力证明我是「好人」。杭州有一个汪伪的「西湖管理处」，那里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我是抗日份子。他们陪着我游湖，青山依依，碧波荡漾，垂柳轻拂，使我完全忘记自己正置身虎穴之中。

有一次我去于潜，和一位女同志同行。这位女同志十分热情。一位游击司令叫我进了他的房间，把手枪从腰上解下，在我面前一挥，说：「你立刻和她断绝往来，否则，你们两个没一个好活！」我在他威胁下，向地委请假，要回苏北老家看看。地委同意了。

我回到海安，心情极坏。但是这次回家，却在我一生的历史上有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是知道了我幼小生命成长的曲折故事，另一个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我的生父陆省斋先生。关于这段故事，我在第一章中有关我的身世中已经写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我回到海安，新四军来了一位干部，和我谈话，问我在重庆的工作是谁领导的，我说有周恩来等等。他一听，以为我一定是个大干部，坚持要把我请到李堡的一个师的师部。我记得那是一座像祠堂的房子，先来的一个同志和我简单地招呼了几句，就走了。后来的一个自我介绍是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钟期光对我似乎有些了解，对我说：「现在游击区很需要干部，尤其是本地的干部。你既然来了，就在这里等候分配工作吧。」

我被安置在一个老百姓家中等待消息。过了大约五、六天，钟期光又对我说：「你的工作还没有安排好，现在战局紧张，有时师部一日数迁，你就还是回到你原来的单位吧。」这一回我又被「礼送」出

境，又一次作了政治皮球被踢了出去。在我后日所接触的数据中，当时在那种环境，能够全身而退，已算是万幸了。

中共的「资料」中说：「1941 年皖南事变后，司马璐被派往皖南、浙西一带做党的秘密工作。后来因犯错误被开除党籍。」事实的真像是我自己从革命队伍中逃跑的。我为什么逃跑呢？

我到浙西以后，当时浙江有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以刘英为书记的浙江省委，另一套是以谭启龙为书记的浙东区委。在组织系统上，区委应受省委领导，但是浙东区委有几块根据地，有一些枪杆子，而省委却是「挂单和尚」。省委和区委同属于华中局领导，因此干部之间磨擦得很厉害。我也不知道领导我的人属于哪一派，这个人要我提防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却对我说：「有的人表面上积极可靠，实际上是敌人的奸细。」当时可能由于延安整风已在酝酿，气氛紧张极了。有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务必要认真留心我们周围同志，到处都有奸细，每一个人都要经受严格的考验，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审查，这是绝对必要的。」

不久，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国民党逮捕，在永康被杀。党内有人认为，这是区委打击省委，借刀杀人。

这时我处在一个什么环境呢？我奉命独自守着一个共产党的联络站。这里是富阳三溪附近一个「三不管」的小村。富阳驻有日本人的重兵，东北方面是东天目山的国民党游击队。西南方面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三方面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这个无名的小村就叫「三不管」。

「三不管」是一个畸形繁荣的走私的天堂，白天到处是地摊，很多外地人都到这里批购日用品转销各地。晚间灯火通明，饭店生意兴隆，暗处隐隐可以见到抹脂涂粉的姑娘「迎宾」。

「三不管」也是情报贩子的天堂。情报人员有单方的，有双重的，也有三重的。夜深以后，表面上这个「三不管」已经死了，实际上，

在黑暗中鬼魅横行。第二天早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死尸，其中有被凌虐致死的，有被枪杀的，有毒瘾发作而死的。有些尸体残缺不全。至于他们是被谁杀的，无人特别关心。人们见到一个死人，就像见到一个死老鼠一样，用点烂布一裹，拖到僻处挖一个坑埋掉。这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也是一个人间地狱。

我就这样逃了

试想当时的情况，一个人随时都可能被杀，生前「三不管」，死后三不认，到底是谁杀的，没有人知道。我只有一个本能的求生欲望，逃！

想逃也不很容易，第一没有钱。我在「三不管」认识一些走私客，有的走私客要我帮忙，比如替他们暂时看管一下「行李」，这是顺手人情，为什么不做？他们也给我一点好处。后来他们觉得我这个年轻人靠得住，要我替他们把一头牛在两天内送到另一个村子。在这个鬼地方做事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付钱，大约合大洋十元，对我是个不小的诱惑。我确实需要钱，就甘于冒险。到了目的地，接我的还是同一个人，原来他暗中随着我，防我把牛偷偷带走。反正我不管这些，拿了钱飞奔赶路。同行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这么慌慌张张，肯定是『贩桃子』的。」我懂得江湖上说「贩桃子」就是逃跑的意思，急忙说：「我不是『贩桃子』，我是替人家带牛的。」谁知他一听我替人带牛，大声喝道：「好小子，你走私！你知道牛肚子里装的是黄的还是黑的？」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黄的就是黄金，黑的就是鸦片烟土，牛肚子里塞进这些东西，三五天不会死的。到了目的地，走私者把牛宰了，取出肚子里的东西，牛肉还可以卖钱。我这才明白，我被人家利用做了一趟走私的工具，我也达到了出逃的目的。

我必须赶快走出「三不管」。当时有一种车辆，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你只要付几个钱给司机，就可以搭车赶路，司机把乘客称为「黄鱼」，我不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反正我做了「黄鱼」逃离了浙西。

第九章 反对国共两党的「一党专政」

回到重庆后的第三天，金若山设宴为我洗尘，并在席中介绍了东方文化协会的秘书长郭春涛（曾任国民党实业部长）。随后，郭春涛邀我担任了东方文化协会秘书。

我在郭处陆续认识了许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人士，如谭平山、王昆仑、章伯钧、邓初民等，郭春涛往来的朋友，多数是反蒋的老国民党员，非共的亲共份子。郭春涛曾提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应该提高自己的自尊心，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黄河有了河套，长江有了支流和湖泊，所有的水就不至尽流入海了。」

当时我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我和中共之间，开始渐行渐远了。

后来周恩来身边的王炳南渐渐成了郭春涛的常客，我和郭的关系也渐渐疏远，我从那个迷魂洞里刚刚逃出，郭春涛钻进去了。后来朋友对我说，中共建政初期，郭春涛想要一个部长，中共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只给他一个参事，郭一气心脏病死了。

创办「自由东方」杂志

我到重庆后，决定自己办一份刊物。有些朋友背后议论说：「这穷小子发疯啦！」

当时正是重庆的雨季，我全身只有一套烂西装和一双破皮鞋。我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天明到黑夜，满街奔跑，回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每一个朋友的地方，这样三元五元的募化。有的朋友为我的热情感动，又为我介绍新朋友。一个月以后，我居然凑集了法币一万多块钱，我的创刊号出版了，这个刊物定名为《自由东方》。

我们不谈中国的内政问题，专谈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刊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金若山和司徒德（孙科的秘书）都帮助过我。另一位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杜君慧女士，她是一位朝鲜革命者的夫人，非常左倾，却对我的这一份报导与讨论东方民族问题的刊物《自由东方》感到兴趣。她说这正是她自己想做的事，她找了一些著名的官太太，如倪斐君、曹孟君、谭惕吾、胡绣枫、王枫、胡子婴等帮我的忙。她们都是相当左倾的，我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也还是中间偏左的。

我在办「自由东方」时，认识国民党的一位文化检查官易礼容，当时国民党对文化控制很严，政论文章都要他签字通过，在那个时候，易礼容被视为右派人士，国民党的文化高级特务。全国解放后，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有易礼容，当时国民党向中共靠拢的很多，我以为易礼容也属于这一类，其后见到中共介绍易礼容的历史，才知道他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1928 年脱离中共，做了国民党的官。解放后，他一度担任中共全总的劳动部长。我又在中共发表的照片中见到他，确实是我熟悉的重庆时代国民党的文化检查官同一个易礼容。我为之咋舌。

《自由东方》是一份专门研究东方民族问题的刊物，当时在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很重视，我记得有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评论，主张越南独立，受到英国保守党报纸的猛烈抨击。中国外交部还特为此给我们来了一封公函，要我们以后的评论谨慎一点，免得给外交上增加麻烦。我接到这封信后，奔到外交部找杨云竹司长理论，他很客气的说：「你们写你们的文章，我们外交部办我们的外交。」自由法国驻重庆的总领事，请我吃了一次法国餐，对我说：「你们对越南问题的看法，甚至我们法国人也有同感。自由法国也绝不让旧法国的殖民政策重演。」

《自由东方》曾经收到一位署名「胡志明」的读者来信，发自广西柳州，附着中国旧诗和讨论越南革命的文章，在香港时，我对张发奎谈起这件事，张说：「正是这位胡志明，当年在柳州处境很困难，

是我照顾他的，后来回国打游击，成了越南革命的领袖。」

《自由东方》出版后，我又出版了自己编写的《朝鲜革命史》。刊物不仅能够按期出版，而且办了两个书店——牛角沱的「东方书店」和民生路的「自由东方社门市部」。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中，我被称为「实力派」。

1976 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见到北京图书馆编印的《全国期刊目录》，其中有我早年主编的《自由东方》，令我感慨万千。

参加民主同盟

1943 年我脱离中共，只是消极与恐惧，并没有任何大志。不久我自己发现，这种消极并没有解决我个人思想上的苦闷，当时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中，有不少和我的遭遇与想法相同的，都想在国共以外寻求中国的出路。

我和中共的关系从革命浪漫主义到怀疑，到感受压力，到产生恐怖感，再到脱逃。当初也无意与共产党作对，因为我毕竟还有些理想主义，当时对国民党的作为也是看不惯的。既然对国共都不满，因此在章伯钧、邓初民的介绍下我参加了民主同盟。

据我当时的了解，中共与第三方面政治团体（即后日所谓民主党派）是貌合神离的。中共对民盟的政策是表面捧场，背后拆台；一面打击，一面拉拢；上层敷衍，下层分化。在基本上，他们很讨厌民主同盟，不愿意民主同盟在组织上有所发展。当民盟接近瓦解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旁托一下。因为民盟这块招牌的存在，对中共是有利的，可以为中共壮声势，与中共的政策相呼应。但是当民盟一旦在组织上展开的时候，他们又从中阻挠，以免对中共产生威胁。中共在民盟内部的活动，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外围之外有外围，核心之内有核心。

我参加民盟以后，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当时的民盟绝非如国民

党所宣传的是共产党的尾巴。民盟的主流，当时的确有些理想的，民盟后日向左倾斜，一部份原因是国民党逼出来的。当然最后民盟也的确做了共产党的尾巴党了。

民盟领导人在私人谈话中对中共意见很大。有一天，张申府对我说：「抽象的共产党人不错，具体的共产党人不是东西。五十号的人尤其混蛋。周恩来更是坏极了。」

我听了为之一惊。他所说的五十号，即是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章伯钧对中共，对国民党都不满。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一批人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个是都市的流氓，一个是农村的流氓。」

我和中共正面冲突

当时我在民盟负责青年工作委员会（又称青年部）。重庆有许多个青年活动的小组织，民盟决定把这些小组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组织。中共负责青年运动的是刘光，他指责我执行「联合」政策，等于向国民党暴露秘密。结果，那些坚持搞小组织的中共领导，终于和我正面冲突。我们不顾中共的反对，在上清寺的特园举行了「青年联谊会」的成立大会。这时章伯钧不愿我和中共的纷争扩大，就劝我把民盟的青年工作「收了」。

中共「资料」说我「参加民主同盟，因搞小组织活动被除名」。事实刚刚相反，我是因为要发展民主同盟的青年运动大组织而与中共发生正面冲突的。这时我对共产党的朋友，基本上还是友善的。但我逐渐发现，我能「容共」，而共产党已经绝对容不得一个异己。他们的方法，一是孤立，二是打击，三是造谣。

我有一天和几个民盟朋友吃饭，我们彼此道别以后，那几个民盟朋友就和别人打了一架，我无法证明是谁的错，但是第二天《新华日

报》报导说，几个民主人士和我在一起以后，就被国民党特务打了。有些我尊敬的民主人士都私下告诉我，中共警告他们：「马义（司马璐）是托派，是国特，不能和他往来。」而同时也有接近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要我小心，因为有人说：「马义是共产党。」

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在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几乎全被孤立了。有少数同情我的朋友私下告诉我，中共对他们的传达内容是：第一、因为我是托派份子，所以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在延安参加过公审托派份子的大会，托派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是不清楚的）。第二、因为我在民盟内部搞小组织。所以被民盟清除了（事实上是，我当时是搞联合，搞大组织，而中共是坚持搞小组织的）。第三、因为我和国民党特务有来往（事实上，我当时仍旧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受监视中）。我在这个时期中，生活又一度陷于困境，情绪非常低落，我的确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呢？

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共产党下一步会对我怎么样。我的社会关系被隔绝，我的生活又陷入困境。我实在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

共产党人思想的混乱

那个时期，许多共产党员的思想也是十分混乱的。二战的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开始转变。在欧洲，他们过去需要发挥民族主义，以对抗希特勒的德国；在美国，他们过去散播两个世界长期和平共存的思想，以骗取更多的美援。代表这一时期政策的最高峰是「德黑兰会议」。在这以后，斯大林在行动上大转弯，从与盟国合作的政策转变到准备世界革命的政策。

斯大林在国内清算了瓦尔加思想（瓦尔加是苏联的权威经济学者，他说二战后美国可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在欧洲，他们开始打击民族主义倾向的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铁托主义；在美国，他们把矛头对准受到民主主义影响的美国共产党领

袖白劳德。白劳德坚持「德黑兰路线」。在斯大林的大转弯期间。我看到一群共产党人不知何去何从。当白劳德最初宣布美国共产党改称「美国共产主义政治教育协会」的时候，中国的许多共产党员和左倾份子很不理解，为此，中共大力进行说服工作，他们印了许多小册子，同时在《新华日报》上解释说，这件事是美共的英明措施，白劳德是如何伟大的天才的领导者。后来，乔木（即乔冠华）翻译了一篇白劳德的「德黑兰道路」的长文，刊在《新华日报》上，刊了两天就不见下文。不久以后，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开始清算白劳德和美共，并宣布白劳德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因为斯大林发怒了。

由于斯大林与铁托的矛盾正在扩大，在中共党内一度很流行的「我们跟着铁托走」，一会儿说可以唱，一会儿又说不可以唱了。为什么中共当时动摇不定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闹情绪，很想学铁托，但又担心，学了铁托，民主国家又不接受他。所以，当时中共作出民主姿态，表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企图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40 年代中共有许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文章，都有一定的针对性。简而言之，都是冲着国民党的。在当时来说，也的确发生了相当的统战作用。中共的企图是团结中间势力（如中国民主同盟等），争取美国对中共的支持，孤立国民党和蒋介石等。

中共的亲美言论

1944 年 6 月，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1944 年 7 月，当时担任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政治顾问的谢伟思访问延安，毛泽东对谢伟思说：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广告，他们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也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思想。」

「我们欢迎美国的民主思想。」「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我

们欢迎它。」

谢伟思还透露，当时毛泽东向他表示，希望与美国的资本家合作。谢伟思对毛说：美国资本家一听到「共产党」就害怕。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可以改个名称。」

毛泽东曾经异想天开地打过一个电报，要到美国求见罗斯福总统和向美国资本家要美援，这个电报是美国外交档案中见得到的。

1944 年 7 月 4 日的重庆《新华日报》隆重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中说：「7 月 4 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配合上述毛泽东赞扬美国民主的谈话，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不断介绍西方国家的民主。同年 10 月 3 日《新华日报》报导，美国军队在占领区（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协助当地人民选举行政官。该报评论说：「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同年 10 月 25 日《新华日报》报导，英国人民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支持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该报评论说：「东西文化的不同之点，恐怕这倒是一例。」

同年 11 月 15 日，《新华日报》又以「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为题发表评论说：

「1864 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正在战争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美国的民主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

不难理解，当时中共心目中似乎是以林肯寄望于蒋介石的，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大陆，有没有一位这样林肯式的人物呢？

1945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又对谢伟思说：「国民大会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宪法和建立一个固定制的立宪政府，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由人民的自由选举产生，而不能由各政党讨价还价或指定产生。」

1946 年 4 月 10 日《解放日报》社论说：「中国共产党要求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

1946 年 2 月 22 日《新华日报》社论说：「为了防止个人独裁，为了巩固党派合作，为了稳定政局，采用责任内阁制，使总统不负实际责任，更为有益。」

1946 年 3 月 14 日《新华日报》社论说：「省得制定省宪」，「实现地方均权主义，防中央集权的流弊」。「有了各省人民的制定省宪，则中央政府固不能任意支配地方，地方政府也不能压迫人民。」「多党内阁制」「只有各党各派长期合作，才能避免政局的不安定。」

「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说：「如何统一呢？独裁者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统一呢？」「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统一」。「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

1944 年 10 月 10 日，周恩来在延安庆祝双十节大会中说：「我们所主张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如果统一于一党专政，统一于军事独裁那便是假统一。」

中国必须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否则就是假统一，这些话早在五十多年以前，中共领导人就说过了，好话就是好话，真理就是真理，总不能说，当年对国民党可以这么说，现在对中共说就不适用吗？

唯狗哲学

中共当时确实接受到一些「美援」，甚至因为中共提供过美国重要情报，毛泽东还获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奖金。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后来由于毛蒋争宠，毛泽东不愿居于「二奶」的地位，坚持美国必须抛弃蒋介石，这一点美国认为办不到，双方开始冷淡下来。

在这同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私通」西方国家，也表示非常震怒，中共面临抉择，与苏联重续情缘，还是与西方国家这个「新欢」没有名份的鬼混？结果在解放战争中，苏联控制中国东北，所处地位实在重要，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弃美就苏，转过头来大骂美国特使赫尔利，说他与蒋介石唱双簧。后来国共和谈决裂，中共认为美国调解不公，提出「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对苏联的「一边倒」等等，当时我是目睹这一过程的。我们重翻 1944、45、46 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会发现中共立场的反复，时而右，时而左惊人的转变。

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时我深具同感，但我是一个经过延安政治生活过的人，在我的政治体验中，国民党有一党专政，共产党也有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时讲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政治策略，而我的观点是反对一党专政，必须针对所有政党而言。

我当时对共产党人内心的矛盾细心分析，对他们深感同情，比较粗糙地写了一篇「唯狗哲学」。我在文章中写道：

「共产党员分为三等：第一等共产党员善于揣摸领袖的心思，他们的一举一动正像狗的嗅觉一样灵敏，成为主子最心爱的哈巴狗；第二等共产党员从来不用思想。他只须跟着党的政策变，成为一个机械的忠实的执行者，这种狗只会咬人和听候使唤，它们不一定获得主子的宠爱，但是主子却觉得它颇有用处，这种狗如看家狗和猎狗都是；第三等的共产党员，只会呆头呆脑地背诵教条，它们一遇到机会，就要成为党的清算下的样牲者，通常吃的狗肉，都是宰的这种狗。最后

还有一种自命为前进的左倾份子，它们不分昼夜地狂吠，这些都是属于满街撒粪的野狗。」

我的这篇「唯狗哲学」激怒一些中共党人，我对此表示遗憾，因为我反对共产党，而对于共产党员是没有敌意的。

中国人民党的成立

在抗战胜利前夕，人民期待此后会进入和平民主的建设时代，政治社团的活动出现了一股新的高潮。我和我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决定重新披上战袍上阵，因此组织了「中国人民社」。其后改称「中国人民党」。

「中国人民党」的群众基础是什么？我现在应该作出历史交代：我在被中共孤立后，一部份和我同时退出民盟的同志，就讨论组织一个真正独立性的民主政党，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些四川帮会袍哥的领袖，他们没有政治主张，只有江湖义气，要钱出钱，要人出人，很尊重知识分子。后来我在上海又与红帮领袖建立了关系。据我了解，红帮领导人物中有些是有政治兴趣的，他们早年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也发动过上海抵制日货运动。当我对红帮领导人物谈到「人民党」，他们立刻拍了胸膛表示全力支持。

「中国人民社」于 1945 年扩大改组为「中国人民党」，并发行自己的机关报《人民周报》。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加以公正无私的批评。国民党在这方面似乎还表现不在乎，对于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共产党开始造谣，说中国人民党是由国民党支持的。

中国人民党最初的一批人，除了我以外，还有王新吾（曾为章伯钧秘书、赵公愚（《时事新报》记者，后来担任上海《申报》的东北特派员）、丘斌存（后来任台湾财政厅的副厅长）、蔡力行（《联合周报》发行人，以后主办「联合编译社」）、包直（重庆《新闻快报》的经理）、谭宇人（四川「袍哥」的活动份子，他变资了全部家产，贡

献给团体)、黄树德(当时作我的秘书,是一位精干的年轻人)等七十余人,骨干份子都是年轻人,以后又有大批「袍哥」弟兄参加。令我最感动难忘的是,有些「袍哥」弟兄写了血书,请求参加我们的团体。

不久,我作了一次西南旅行。我对昆明的印象特深,无处无花,鸟语花香,四季皆春。这里的女人美,男人也美,人与花争艳。滇池浩渺,水天一色。街边小食,风味独特,令人回味。我往来重庆、昆明,坐的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军用飞机,而为我购票的却是共产党员高天。高天是昆明《扫荡报》总编辑,他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种身份。当时,中共对于我的打压还没有完全透明,高天还是把我看成同共产党合作的民盟份子。高天钻了国民党的空子,我又钻了高天的空子。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谢他的帮忙。

我的西南之行一方面是为了发展人民党,一方面做了一点生意,想为我们的活动筹积一点经费。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订了一批拖鞋,交货时发现有许多破损。于是向制造商交涉,对方说:「用一点浆糊就行了。」我说:「不可以。」对方说:「老弟,看来你入行不久,做生意就是糊嘛!」我对这个「糊」字,感触良多。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把我在重庆剩下的仅有的一点财产,全部留给继续在重庆的一批人民党青年朋友们,两手空空只身的跑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人民党同志,也一样都是些穷鬼,他们还等待我到上海后有些苗头呢!我一到上海,房子立刻发生问题,开始几天住在朋友家里,后来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帮助一个朋友扩充了他的公司,这公司就提出一笔款子在四川北路三义里替我租了房子,我又利用这个据点,在上海办了「大江通讯社」和「武训图书馆」,奠定了我在上海活动的基础,以后我又在虬江路积善里顶下另一幢房子。

有一段时间我在上海三天两天就要大宴客一次,来客中不少是富有阶级的绅士。要好的朋友诧异我钱从何来?实际上这是我广交朋

友，为我们的活动筹款。当时法币一天天贬值，他们调一笔款子给我，「翻个身」就给我们不少方便。我常在席终人散之后，常连一张车票也买不起，要靠自己的两条腿跑回家！

另外，政府的配给物品和美国的剩余物资，凡是文化机关能得到的东西，我都能设法钻到门路。坦白地说，当时这些就是我们的财源。但是我个人的生活一直是很困难的。

中共对我的围剿

在这同时，香港编印，上海发行的中共地下刊物《文萃》，每期都有攻击我的文章，主要原因是我天天都呼吁国共停战。当时东北的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华北和中原也是遍地烽火。我们这时痛恨国共内战，觉得应该为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为人民减少一份灾难，迭次沉痛呼吁，坚决反对这个残酷的内战。

我常常邀约一些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谈到组织一个联合阵线，屡次失败，主要原因是：第一，我们的力量太单薄，还不可能领导一个发生重大影响的运动；第二，我们在作风上还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第三，我们彼此想吃掉对方，缺乏一种民主精神，也缺乏互助、互让、互尊、互信的基础。

中国的保守势力也成为民主的障碍。他们对于新生力量和青年人的运动，并不加以鼓励。他们躲在一边讪笑、讥讽，甚至遇到机会投来几块石子，打击我们。「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还艰苦得很，因为守旧势力和共产党人都在夹攻我们。」我们常这样感触地说。

1947 年 10 月，中国人民党在上海举行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当时上海《申报》刊载的新闻如下：

「中国人民党于 10 月 1 日（该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发表宣言，内容为要求政府及中共恢复理性和良知，实现和平，立刻停止摧残人权、屠杀人民的行为，放弃统治思想的措施和作风，立刻安定人民生

活，废除苛杂，抵制外货倾销，扶助民族工业，救济全国清寒学生。新兴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建立强有力的第三方面。」

上述宣言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党代表吴仁勋在香港招待记者。次日，中共香港《华商报》在报导和社论中骂我，通栏大标题是「马义救主」。「马义救主」原是旧京剧里的一戏名。「马义」又是我的名字。在中共的文章中说，今天的马义要救的「主」，就是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

那时主持香港《华商报》的都是我过去的熟人，如范长江、金仲华等。他们后日在中共统治下所遭遇的命运，十分悲惨，我默然地为他们的灵魂祈祷。

我必须指出，当中共围剿我的前后，并非所有共产党人或左派人士视我为敌，其中有些人一直对我是很友好的，例如新华日报的李普，和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对我说：「那些反对你的人，他们的意见不能代表党，绝对不能代表党。你不要胡涂，愈走愈远。」

我自信是一个坚强的人，说实在话，在当时也不免一步一惊魂。我曾经偷偷哭过，也曾经想到自杀，从此了结自己。

我去看沈钧儒先生。沈老对我的政治问题沉默不言，对我的生活慈祥地关怀。一天晚上，老人亲自给我送了一笔钱来，救我燃眉之急。我一直尊重沈老的嘱咐，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直到 1963 年沈老逝世，我在悼文中写道：「世事沧桑，恍如一梦。五斗之义，恩重如山。」

「中国人民社」成立以后，我再去拜访沈钧儒先生。我没有考虑别的，只觉得他是我尊敬的长者，也是我患难中的恩人。他老人家对我组织的团体没有正面表示意见。他说，政治社团的发展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群众运动的路线，可能搞得轰轰烈烈，却在群众中没有根，热闹一阵就过去了。另一种是组织一群青年朋友，分别对当前中国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具体的研究报告，反复讨论。走这条路不能急躁，

但却可能影响深远。

还有一位前辈孙伏园先生，他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也是鲁迅的好友。他知道我个人的生活困难，四处联系为我找工作，虽未成功，情谊可贵。

我对当年的经历，后来有一个感想，在中共谣言的攻势中，很容易使无知的人盲从，毁灭一个青年，但这些谣言对于久经阅历的老人，是不大发生作用的。

我在上海遭受国共两党夹攻时，《大公报》主笔李纯青、谈家芳夫妇不同意我这样穷干，傻干，劝我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纯青当时有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不清楚，对我却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他们劝我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也是出于至爱和善意。我永远感激，终生感激。

上海「四一四宣言」

在中共渡江的前一年，我向我的旧同事和朋友们呼号，大家都应该放弃小圈子，牺牲小我的利益，来促成和推动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民主大团结。

1948 年 4 月 14 日，上海文化界包括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发表了《四一四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当时上海有些报纸报导，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四百一十四人，实际上是跨大的误传，其实指的是发表的日期。这次行动是上海三友实业社支持的，三友实业社生产的「四一四毛巾」十分有名，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四一四宣言》发表后，社会反映很好。我们当时常在上海银行俱乐部聚会，我们组织了「和平民主同盟」，我是负责人之一。我们的活动受到国共两党的一致抨击。共产党说我们的「宣言」是属于国民党的「缓兵之计」，而国民党说这份「宣言」「动摇人心，影响勘乱。」

「和平民主同盟」的朋友大部份是心地善良的读书人，在赤白双

重压力下，后来都避开了。我因为继续著文主和，当时中共的佳木斯电台点名张申府、施复亮、马义（司马璐）三人主和是「历史罪人」。我们三个人又都是共产党的退党者，中共又骂我们三个是「叛徒」。

不久，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又对我警告说：「再不停止活动，就要抓人了。」

在那个赤白高压的时代，我们这一群可怜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相互间的照应与安慰，曾经通过封建的形式，以红帮领袖张子廉为大哥，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结拜兄弟中包括毛健吾（抗战时衡阳《大刚报》社长）、方秋苇（上海《申报》主笔）、陆一远（即陆渊，中共留苏学生中最早的托洛茨基派领导人之一）等，这种封建的结合不久，大难临头，大家各奔东西，我们的大哥也不见了。

人民党最后一次宣言

这样，中国人民党被迫要停止活动了，可是我们基于政治的责任感，于 1948 内 12 月，也就是共军进入上海前的四个月，发表了对时局的紧急公告。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党临时全党代表大会紧急公告（中华民国 37 年 12 月）

鉴于目前极度紧张的局势，中国人民党 37 年 11 月在沪举行了临时全党代表大会。大会首先就目前整个情势详加研讨，一致决议，重申本党一贯主张的人民路线，争取民主进步，实现和平建国。为此，本党号召全党同志，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抢救当前的民族危机，要求国共双方立刻停止内战，召开包括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当前国事。本党认为，倘内战不予停止，和平不获实现，则一切无从谈起。今日人民遭受战乱长期蹂躏，身家倾荡，饥饿之惨，流离之苦，怨愤之深，双方倘稍具良知，安能忍心再拒绝人民和平之要求！

中国人民党特向国共双方提出忠告，为政府为中国打算，无论任

何方面，立刻首先主动提出和平，以争取广大和平人民的支持，实为最明智之举。

中国人民党号召，一切自由份子，民主斗士，彼此应该破除门户之见，加紧团结，形成有力的第三方面的力量，以促成和保障中国和平民主的实现。

中国人民党成立迄今，现已三年于兹。抗战期间，本党同志均曾出生入死于敌前敌后，伟大的民族战争呼唤我们，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但今日战乱所为何事？同胞互杀，骨肉相煎，有心人能不同声一哭！

中国人民党在此临时全代会中，对于过去工作，曾经严格检讨。为充实党的领导机构，统一行动起见，特决定所有过去总部委员会及临时行动委员会，自即日起一律撤销，改造中央。今后本党对内对外，概由中央委员会负责。

中国人民党同志献身人民民主事业，虽在今天环境极端复杂之下，不敢稍懈。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的胜利，将一定属于广大人民的！

上述宣言是中国人民党最后的一份正式文件，也是我个人在离开中国大陆前最后所说的话。

中国人民党的活动最后一次见于中共报纸的，是 1967 年 1 月 25 日上海《解放日报》，据称中国人民党成员伪装进步份子，鼓吹民主自由，推动和平演变，钻进革命组织，企图掌握领导实权云云。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相信当时是中国人民党的新一代年轻同志在继续奋斗中。

中国人民党的活动，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存有档案资料。国民党的资料最早出现于徐复观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联合秘书处出版的《全国政治团体概况》。40 年代后期，全国共有政治团体一百五十多个，中国

人民党名列第十六位。1983 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党派史》，其中第十二章及附录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国人民党的文件。

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中国人民党的资料似较丰富，1992 年该馆编印出版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一书，列出当时较具影响力的三十六个小党派，中国人民党名列第五位。书中原始文件甚多。包括纲领宣言等等。

中国人民党最初通过的党章有六十九条，政纲有五十三条，纸上谈兵，在当时各个小党派中，条文被视为最完整的。其中有「刷新政治，安定社会，解救民生」，「政治民主须与经济民主共行不悖，政治改革须以增进全国人民幸福为目的，以适当手段进行经济改革」等，我们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大问题，但在 1945 年我们就提出来了。

第十章 中共的统战与知识分子的沉沦

我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中国抗战过程中成长的。我们年青时介入政治，动机都很纯洁，后来才渐理解，政治上有阴阳两面，阴的是背后的黑手，阳的是台上台前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当然很多人胡里胡涂地成了烈士了。

抗战之初，我们纯洁的青年都高喊「团结」「胜利」，八路军在平型关成功伏击日军，华北百团大战力挫敌人，中共对外宣传共产党的战功时，你能想到，在中共内部，林彪和彭德怀都受过毛泽东的斥责，斥责什么呢？毛说：

「你们现在打日本人，太早了，这是帮蒋介石的忙。」这是政治阴阳两面的例子。

我们纯洁的青年都宣传对日本人「敌忾同仇」「有我无敌」的精神时，你能想到，当时的国、共、日汪三方，他们都秘密派有代表，表面上抗战没有停，他们秘密来往，互相交换情报，甚至互相配合，蒋汪合作对付共产党，共汪合作对付蒋介石，国共合作当然打着抗日旗帜公开进行。蒋汪的勾结，中共公布的反蒋文件很多。共产党与汪精卫的合作，过去属于高度机密，近年来也透露了一点儿，有的中共干部的回忆录中写出，他们当年做汉奸，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党所安排的任务，越至潘汉年代表中共见汪精卫、中共已透露的一部份档案证明，是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指示的。当年毛泽东把抗战比之为「三国志」，蒋介石的军政中心退到四川，为蜀；汪精卫以南京为中心，为吴；毛以延安为中心，为魏。陕北虽小，毛泽东以曹操自况。

这里还有一段内幕，当汪精卫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时，汪本人倾向投共，陈公博倾向投蒋，结果抗战胜利后，倾向投蒋的陈公博为蒋介石枪毙，而当年与汪精卫谈判过的潘汉年也被中共以「叛徒」的罪名折磨而死。因为蒋毛二公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要做「民

族英雄」就不能把自己的英名与汉奸挂钩，所以一定要以「汉奸」或「叛徒」的罪名，把这些工具消灭。

令人难以想象的，当年极力鼓吹抗战的《救亡日报》，除头面人物以外，其中有些负责者，竟和著名的汉奸报纸《新中国日报》是一批人。过去中共办统战报纸简直有通天的本领。许多统战干部往往同时是特务工作的干部，有的白皮红心，赤胆琴心，有的朝秦暮楚，具有多种身份，有的直到死亡，你还无法知道他到底是谁。

共产党不择手段的夺取政权，中共统战政策的多变与机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对变局，没有原则，甘心向权势低头。我所亲自经历的，就是这样一段混账历史。

现在试就我所接触和知道的几份中共统战报纸和几个代表人物加以介绍，我选用的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共合作中的郭沫若，一个是共汪合作中的袁殊，一个是在政治上瞎了眼睛乱闯一通的曹聚仁，我所以写他们，是因为这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沦，他们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抗战期间中共的统战报纸

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半吊子的新闻工作者，自幼失学，除自修以外，没有什么学历。十五岁有幸考入一家报馆当练习生，又转入一家图书馆，十七岁（1936 年）我大胆给天津老《大公报》寄去一篇文章，又侥幸刊出。从此，我每天认真读报，间中也读了一些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当时我的印象中，传统的新闻记者要求新闻记者一定要有道德标维，虽然有的有闻必录，但忠于事实真相更为重要，有的是主张揭发社会黑暗的，有的是主张为社会伸张正义的，总之，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都要求一个新闻记者，要求一个新闻工作者有良知，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道德修养，报纸为人民大众的喉舌。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但是共产党的观点：新闻工作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为无产阶级服

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新闻工作绝对没有独立的客观的说法。总之，共产党的观点认为，新闻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首先要讲政治的立场和党性。

共产党「新闻工作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并不限于自己办的党报。共产党人的新闻工作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共产党的正式党报，这种报纸是正式的党的工具，宣传党的政策。

第二种，党的统战报纸，这种报纸表面上是中立的，用曲线的方法宣传党的政策。

第三种，利用敌人的报纸发表对党有利的文章，从事发挥一点一滴的渗透作用。

共产党一向重视报纸的宣传，也重视利用统战和敌人的报纸。许多著名的共产主义者都利用过所谓资产阶级的报纸，例如：马克思早期曾在所谓资产阶级的「莱因河报」发表过他的思想，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与天津《大公报》无关）写过一篇主张「湖南独立」的文章，周恩来担任过天津益世报（天主教报纸）的欧洲特约记者，邓小平为巴黎《赤光报》油印高手，后来在江西中央苏区主持过《红色中华》。可以说，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与新闻工作这一行有过关系。

共产党人办党报比较容易，根据党的决议，宣传党的政策，老老实实做党的工具，只要没有路线错误，大体就过得去。但是「党报」往往属于指示、教条、八股性质，摆着铁青的脸，不易为读者欢迎，发行量有限，影响也就不大。统战报纸就不同了，他不仅要懂得宣传，而且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周密的策划，台上有拉的、有唱的、有表演动作的、有五光十色的灯光布景，令人眼花撩乱，台下的观众在轻歌妙舞的陶醉中受到感染。这叫做「潜移默化」的政治宣传。

周恩来是统战报纸的高手，我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包括新闻工作，他总是对我说，写文章表面上不要过左，才能有读者。他长期领导地下工作，他的原则是，利用报纸可以联系读者群众。地下工作必须与党的公开宣传活动绝对分开，而在办统战报纸方面，周恩来另有一套策略，即宣传、统战、特务工作的「三结合」。以宣传扩大党的影响，以统战、以略带灰色的言论和处理新闻为党「交朋友」，以统战报纸的「中立」形象，掩护中共的特务活动。

救亡日报——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抗战开始，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的谈话中，谈到国共合作从事抗日宣传的问题。不久，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决定用郭沫若这块知名度很高的左翼文化人作招牌与国民党的上海市负责人潘公展合作办报，当时商定这张报纸由双方共同出钱。人事方面，起初双方各提出一组名单，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决定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由潘公展提名的人任经理，其余的人由社长全权决定。当时代表中共直接领导的是潘汉年。

报纸出版了，这就是抗战期间有名的《救亡日报》。这份报纸名为国共合办，关键的职位全由中共控制。后来上海沦陷，他们逃亡到了广州，「由于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夏衍语），因此就在余汉谋的大力支持下恢复出版。关于余汉谋捐款的数字，夏衍说是开办费二千元，郭沫若说是每月一千元。

廖承志曾经向《救亡日报》转达周恩来的两点指示：一、争取公开合法，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避免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发生摩擦），二、外地经过广州的党员和共党同路人则由《救亡日报》的负责人联系，中共广东省委派饶彰风以记者身份，借《救亡日报》掩护党的统战和特务情报工作。

《救亡日报》因为销路不佳，余汉谋的捐款不够花，因此又利用了国民党省长吴铁城的关系，当时白报纸要靠进口，关税很重，因此

市面上白报纸官价与黑市相距很大，《救亡日报》由吴铁城批示免税进口白报纸，数量很大，不仅《救亡日报》自己够用，而且通过黑市出售获利，《救亡日报》的经费就解决了。

《救亡日报》也一度出过桂林版，是由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

《救亡日报》贯彻了共产党的一条办统战报纸的方针：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用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华商报——拿资本家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1941 年「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恶化，左翼文化人纷纷集中香港，在廖承志的具体领导下，创办了另一份中共统战报《华商报》。

这份报纸为什么叫《华商报》呢？因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份报纸的面目必须是灰色的，不然要吓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支持。

根据香港法律，当时在香港办报或者要缴巨额保证金，或者要由香港著名的绅士担保。由于这份报纸的招牌是「华商」，于是就找出香港华比银行华人买办邓文田出面注册，一切都很顺利，邹韬奋的「大众生活」也是由另一港绅之子曹克安登记的，当时的廖承志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粤华公司的老板，出头露面的全是「商人」，所以报纸称为《华商报》似很自然。

《华商报》出版的第一天，统战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排在最显著版面地位的，竟是以何东爵士为首和港澳及东南亚着名资本家的「贺词」。何东是什么人呢？当时被认为与英国关系最深的香港首富，他的家族成员中也有国民党的高官，何东的公开捧场，谁能想到《华商报》竟是共产党办的呢？现在何东家属的成员何国柱是香港「星岛日报」的老板和中共政协的常委。

据张友渔回忆，周恩来一再指示，「《华商报》不要太红了，要灰一点」，夏衍回忆说，「《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刘思慕的回忆中说，《华商报》的任务是，「支持左派，争取

中间，批评和孤立右派」。上述三人当时都是《华商报》的负责人。

《华商报》贯彻了共产党的另一条办统战报纸的方针：利用资本家，挂出商人的招牌，捧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香臭不拘）题字剪彩，又突出小市民关心的社会新闻，这样，《华商报》自然热闹起来了，开始「灰」，然后一点一点的「红」，这是政治艺术和商业广告混合的作品。

新中国日报——拿日汪的钱，办共产党的报

经过抗日战争，特别是身在沦陷区的中国人，大概还记得，当时上海有一份著名的汉奸报纸《新中国日报》，这份报纸的负责人是袁殊，袁殊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新中国日报》社长，日本兴亚建国运动总干事，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当时写过许多主张中日亲善和平、联日、拥汪反蒋的文章，而实际上，这个袁殊是中共的统战专家和中共特务。

人们会问，当时中共是主张「坚决抗战」的，为什么共产党又公开做汉奸呢？这的确是当年中共政略部署的「最高机密」，一方面联蒋反日，一方面联日反蒋，让国府与日汪在抗战中互相消耗，而中共则在「抗战」的旗帜下扩大自己的力量。据中共出版的「袁殊传略」，引述几段如下：「抗战期间，凡在上海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的人，对袁殊的名字恐怕是不会陌生的。30 年代初，袁殊就活跃在上海文化界，是一位进步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940 年汪伪政权成立不久，袁殊突然出任伪《新中国日报》社长，以后又加上了一连串的伪职，列名于大汉奸之间，遂使许多人切齿不已……谁能想到，袁殊竟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共产党地下工作、情报工作者。」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然投敌，串演反派角色」，「袁殊还掌握另一刊物叫《杂志》」，「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党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视为一个

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认为，只要为党的事业所需要，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1955 年，袁殊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捕，过去地下工作中对党的「历史功绩，却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状」。「从坐狱到恢复自由，整整过了 27 年零 5 个月。」他死于 1987 年，死后上了八宝山。八宝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过汉奸。

大公报——从国民党的统战变成中共的统战

国民党早年也有统战报纸，例如，30 年代和 40 年代，蒋介石与老《大公报》的密切合作。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等所办的老《大公报》，抗战开始前后，以批评时政敢言见称，执笔者胡适、丁文江等都属于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由于老《大公报》在知识分子中影向很大，主持笔政的张季鸾又是蒋介石私人的常客，与蒋直接交换时局意见，时人都认为老《大公报》是蒋介石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桥梁。中共过去对老《大公报》的评语是:「大公报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

中共解放战争期间，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小骂大帮忙」逐渐转变为对共产党的「小骂大辩忙」，成为中共的统战报纸。现在，大公报一类的统战报纸，有时比中共人民日报还左。

国民党的雷震、黄少谷等也都是统战报纸的能手，甚至早年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杨度，他的制造舆论、组织与统战报纸也很出色。过去的新闻变成了今天的历史。雷震、杨度后来都变换了历史的位置。而我个人，一生中干过新闻记者、革命工作、民主活动，一直是新闻工作与政治的边缘人。

郭沫若现象

每逢历史变革的时代，总有一些动摇失节，朝秦暮楚，投机取巧，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像当年的郭沫若一样，出卖灵魂，我称之为郭

沫若现象。

郭沫若是早期左翼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也是早期中共党员，参加过南昌暴动。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郭沫若逃到日本，写过一篇极为尖锐的骂蒋文章，题目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其中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往事与哀思》）

抗战前一年，林林代表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日本向郭沫若传达中共政策正转变中，国共可能第二次合作。文学也要变。从「无产阶级文学」转变为「国防文学」，郭沫若听后，起初不能接受，后来终于说：「党决定了，我就坚决拥护。我愿意当党的喇叭。」此事记于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一书，以及林林的回忆文章中。

其后郭沫若终于接受共产党的任务，愿意再做「党的喇叭」。抗战开始不久，郭氏回到武汉，蒋介石接见了他。郭氏早年的记述中说，当他与眼前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热烈握手时，温暖，激动，全身像通了电似的。

不久，郭沫若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来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头儿，这是一个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我在公开场合常看到他，单独见面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朝鲜义勇队队长金若山要我送一批朝鲜革命的材料去的。说也奇怪，他完全没有注意就丢在一边，却向我打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克宁奶粉，当时这种奶粉在重庆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我当然回答不知道，和他说话很吃力，因为他的耳朵不好。不久，日本作家鹿地亘进来，他们完全用日本话对谈，我就乘机告辞了。

第二次是我办「自由东方」杂志想请他帮忙的。郭沫若很重视人事关系，而我当时强调「自由东方」这份杂志的独立性，郭沫若既怕

丢掉国民党的官，又怕违背中共的意旨，他要我找一两个国民党大官给他写封信，然后他才好帮我的忙，我觉得这种趋炎附势的事很为难，彼此沟通的语言不多，就告辞了。

抗战后期，郭氏《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明末的农民领袖李自成，真正歌颂的是毛泽东。「解放」以后，郭氏意气风发地写出更多的歌颂毛泽东、斯大林，甚至歌颂江青的诗文。郭氏写每一个「大人物」，都令人感到他是跪在地上写的。

1959 年春，郭沫若写出一个话剧《蔡文姬》，故事是写曹操思慕贤才，以重金迎回远嫁匈奴的蔡琰（文姬）。蔡琰以曹操忧国忧民以统一中华为己任的英雄业绩所感动，终于抛夫别子，投入曹操的怀抱。剧中的曹操爱江山，爱美人，也爱贤才，正是影射毛泽东的，而郭氏自己则以蔡琰自况。当时正值反右，郭氏得以逍遥「右」外，深感「皇恩浩荡」。所以郭氏说，他在写此剧时泪流满面。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郭氏说，蔡文姬最后一场出场一定要穿「红袍」。毛泽东看此剧也点头称好。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向是有争议性的，郭氏「为曹操翻案」，把他肯定为一个正面人物。不仅是曹操，郭氏还要「为秦始皇翻案」。郭氏写道：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商纣王开其端。」

秦始皇和商纣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暴政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先为秦始皇翻案的。毛泽东在论及「肃反运动」时说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而我们共产党杀了几十万！郭氏向毛泽东学舌，又搭上一个「酒池肉林」的商纣王。

「文革」期间，郭氏在大会上说，他过去所写的所有东西一文不值，应该一把火烧掉。他时时去拜访康生，探听政治行情。「四人帮」垮台，郭氏立即作诗捧华国锋而声讨江青。据刘白羽悼郭氏的文章说，

郭氏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要跟着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啊！」郭死于 1978 年 6 月，已经来不及歌颂邓小平了。

从袁殊看蒋、毛、汪关系

我在前文已经介绍过《新中国日报》，这里再详细一点记述袁殊一生的传奇故事。

我在上海有一次在朋友的宴会中，主人介绍我认识一位马姓的女士，我笑迎说：「原来是我的妹妹！」她说：「我是你的姐姐！」以后我们又见过几面，她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后来，她有一次把我带到一座白色的豪宅，算是「白宫」吧，她说：「这是我的家。」女主人很瘦弱，而这座巨宅简直像宫殿。又是空空荡荡的，非常不相称。我问她：「你的先生呢？」她笑一笑，并未作答。我感到身在这座大厅里多少有点恐怖。这时候我听到了狗叫，一只，两只，三只……好多好多只狗啊！这座宫殿就是女主人和一大群狗公子狗小姐住着。我在这里没呆多久就跑出来了。

事后我把这个奇遇告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给了我一拳说：「你居然和一个大汉奸的老婆勾搭上了！」我吓了一跳，问他究竟。他告诉我，这个女人名叫马苏，又名马景星，是大汉奸袁殊的老婆。抗战胜利后袁殊跑了，他的老婆还守着这座房子。袁殊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有文才，是个作家，是个革命家，也是个政客。他简直是个千面人，有演戏天才，演什么像什么。他的间谍生涯，包括共产党特务，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特务，而他真实的身份是一个共产党人。

袁殊于 1928 年参加左倾的文艺团体「狂飙社」当话剧演员，崭露头角。

1929 年秋，袁殊去日本读书，认识了一些日本的青年朋友。一年后，他回到上海，表示立志于新闻事业。他办了一份《文艺新闻》，标榜中立公正，兼收并蓄。和袁殊交往的多是左翼文艺人士，袁殊自

己也参加了「左联」。一些著名的左翼作家，如夏衍、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为《文艺新闻》写过文章。

1931 年 10 月，袁殊加入共产党，他的工作岗位是「前卫组」，组长是中共著名的特务头子李克农。共产党要求袁殊不得再同左翼人士往来，要多交右派朋友，写没有政治性的文章，甚至写反共文章。中共并指使袁殊打入国民党的组织展开情报活动。因此，袁殊的左翼刊物《文艺新闻》就停刊了。

1933 年，袁殊利用国民党 CC 系的关系，又参加了最机密的「干社」，并及时将情报传递到共产党的「特科」。有些共产党员叛变，特科从袁殊处得到情报，就对其制裁，必要时将其处死。

袁殊在日本读过书，同过去的日本朋友，在上海相见了。因此他与日本特务机关建立了交换情报的关系。后来这些日本特工，在抗战期间位高权重，成了袁殊有力的后台。在这期间，袁殊还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建立了关系。

1936 年春夏之间，袁殊第二次留学日本，获得日本外务省的支助。西安事变以后，他回到上海，代表中共与他联络的冯雪峰，要他立刻离开。因此袁殊第三次去日本，1937 年 4 月回上海。

袁殊这一次到上海，正是日本侵华前夕。袁殊过去早已拜过青帮头子杜月笙，当时国民党正在征召留日学生，于是杜月笙向戴笠提到袁殊。戴笠派人找到袁殊，对他说：「你过去干情报很出色，人才难得，欢迎你参加军统！」袁殊很兴奋，他又有机会回到情报战线了。在这同时，他秘密向中共汇报，中共中央电潘汉年，要他转告，这是袁殊为党奉献千载一时的机会。

1937 年 9 月，袁殊正式成为军统特务。以《华美晚报》记者和上海编译社负责人的身份出面，他向戴笠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情报。

1939 年汪精卫叛国，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为主任，丁默村、李士群为副主任，设立「特工总部」。戴笠把袁殊召到香港安排任务。

袁殊回到上海即与李士群联系上了，又同两个日本特务接上了关系。袁殊在中统的时候，曾与这两个日本人交换过情报，这两个日本人已经成为在上海的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一个人叫岩井，他的公开身份是副领事，他的「岩井公馆」是外务省的情报机关。另一个是影佐，他是日本军方的「梅机关」的特务机关长。这两个人同时是汪伪政府的政治顾问。

当时上海有一份著名的汉奸报纸《新中国报》，这份报纸的负责人就是袁殊，袁殊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日本兴亚建国运动总干事，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当时写过许多主张中日亲善和平、联日、拥汪反蒋的文章，而实际上，这个袁殊是中共的统战专家和中共特务。袁殊这个汉奸是执行当年中共政略部署，一方面联蒋反日，一方面联日反蒋，让国府与日汪在抗战中互相消耗，而中共则在「抗战」的旗帜下扩大自己的力量。

中共出版的「袁殊传略」叙述：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然投敌，串演反派角色」，「袁殊还掌握另一刊物叫《杂志》」，「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党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认为，只要为党的事业所需要，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日本投降前夕，袁殊到了苏北解放区，被安排在淮阴的一个村庄，改名曾达斋。

1955 年，袁殊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捕，过去地下工作中对党的「历史功绩，却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状。」从坐狱到恢复自由，整整过

了 27 年零 5 个月。死于 1987 年。

曹聚仁的中共密使之说

有一段时期，海外盛传「曹聚仁是两岸密使」；因为曹和我相识很久，想解解这个谜。

我们一群知识分子，曾于 40 年代在上海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发表「四一四」宣言，呼吁国共和平。这份宣言，曹聚仁是起草人之一。

曹聚仁长我 19 岁，是 30 年代即已成名的作家。抗战时他为中央社记者，江西赣州《正气日报》总编辑。他读书很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下笔也快，是一位很不错的作家和记者。他对于政治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讨厌政治，屡次从政治的边缘退缩，却又从一个政治旋涡，卷入另一个政治旋涡。他一生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动派，他的位子常常在两者之间。他的文章有点怪，常被人称为「不吉祥的乌鸦」，他也自称为「乌鸦作家」。

我和曹聚仁相识于抗战期间，往来不多，胜利后再见于上海。1948 年 4 月 14 日，上海文化界发表宣言，简称「四一四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聚仁是这份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宣言发表后社会反映很好，而国共两党却一致抨击。共产党说这份宣言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国民党说这份宣言「动摇人心」。当时我们这些签名者组织「和平民主同盟」，方秋苇（《申报》主笔）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聚仁也被推为负责人之一。但是他害怕了，拒绝这个角色，于是我和秋苇上门，他又拒见。以后他更进一步，说他与「四一四宣言」毫无关系。

1950 年曹聚仁到香港，开始在《星岛日报》写专栏。他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是蚂蚁嗅到同伴的死味，赶快改道，何况人呢！许多朋友读了都对聚仁同情。次年，徐訏约了一些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聚会，聚仁当众表示了对共产党的不满。

50 年代初期，大陆到香港的难民中，有人做投机生意，买空卖空，顿成巨富。我的这位朋友曹聚仁，本来是玩笔杆儿的，见到有人发财，头脑也发了热，忽然想做生意。有人对曹说：「开办银行最好，根本不需要资金，以你曹先生的大名，存款一定滚滚而来，岂不立刻可以成为银行家吗？」

当时香港开办银行，政府只要查核你有 300 万存款，就可以申请执照。其时 300 万是个不小的数字，曹兄拆息挪借，领到了执照。开业那天，我接到请帖前往祝贺。曹兄银行的招牌是「中国农工银行」，他满面春风地一一与来宾握手。第二天我去该行开户，已经「关门大吉」。后来我遇到曹聚仁问及此事，他说，这间银行的事与他绝对无关。

曹聚仁的发财梦失败以后，他又专心写文章了，但是他转为对中共小骂大辩忙。他的投机心作怪，认为中共的大方向是对的，跟不上这个大潮是自己的错误。有一位笔名「退职记者」的人，在《星岛晚报》著文，回顾曹聚仁起草「四一四宣言」的往事，聚仁又公开加以否定。我忍不住了，和聚仁在陆海安主持的《真报》上笔战，指曹聚仁反复无常。以后大家都说曹是「中共统战作家」。不久，「战盟」秘书长李微尘对我说：「曹聚仁也是我们的同志。」这时候我才知道，曹聚仁参加了第三势力运动。李微尘请我和聚仁吃了一餐饭，表示和解。

90 年代以后，有些海外华文报刊收到中国大陆寄出的「50 年代国共和谈资料」，这些资料似乎编织得十分细密，其中说到曹聚仁从 50 年代起就穿梭于海峡两岸，从事国共和谈。这故事像间谍小说一样，十分有趣。是真有其事吗？我对此作过一些考证。

1956 年，曹聚仁确曾去过北京。夏衍的回忆中有以下的记述：40 年代初，曹聚仁被蒋经国看中，「当了蒋的高参」。「1943 年春，他到重庆来看我，要见周恩来，说他可以对蒋做一点工作。恩来同志对他进行了鼓励。」「1955 年我到北京后，他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金门炮战那一年（指 1958 年——司马注），他又到北京找我。他对我说：

『香港报纸说我是大陆派驻香港的统战分子，而国内文化界依然说我是反动文人。』」「有一次恩来同志对我说，曹聚仁还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他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夏衍《懒寻旧梦录》）

中共人物类似的回亿录中还说到这样一件事：1956 年，在一次周恩来招待文化人的茶会中，当周恩来谈到对台政策时，曹聚仁突然站起来说：对台湾我有办法，蒋经国会听我的话！举座为之一惊。

曹聚仁的女儿曹雷所写《爸爸原来是密使》，很像中共的官方资料，缺乏可信度。对照这一期间的有关资料，包括中共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曹聚仁在北京向夏衍汇报在香港的工作」，曹聚仁在《南洋商报》所写的「北行记述」，曹聚仁第二位夫人邓珂云的笔记，所有各种资料，除了说曹聚仁向蒋经国一再写信，周恩来请曹吃饭以外，没有一处提到蒋经国的复信，也没有说曹聚仁在 1956 年到过台湾。甚至还有更离奇的传说，说蒋经国和曹聚仁在香港海上秘密晤谈云云。如果真有这些事，过去需要保密，现在有关蒋家的档案两岸都已解冻，还有什么可保密的呢？

从《周恩来年谱》的记述看，周恩来多次请曹聚仁吃饭属实。请曹吃饭时有党外人士作陪，说明不是什么「密谈」。中共发表消息时说曹聚仁曾为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此时是《南洋商报》的特派员，更证明曹不过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中共利用曹在《南洋商报》的影响力，对台湾释放出政治气球。

1956 年 7 月 16 日，周恩来请曹聚仁吃饭后，曹在《南洋商报》上写道，周对他谈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是可以坐下来商量的。」

10 月 7 日，曹聚仁记述，他问周恩来，如果说台湾和大陆统一，中共将给蒋介石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

（陈诚）愿意做台湾的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然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像周恩来那样聪明的人，怎么可能通过一位「密使」这样传话？实际上，曹聚仁仅仅是被周恩来利用，作为统战宣传的工具，根本谈不上「密使」。

1956 年以后，香港正式的中共统战报纸《晶报》出版，凡能为中共敲边鼓的文化人，每月送基本稿费港币一千元，写稿另计稿费。当时港币一千元的价值，超过今天的一千美元。聚仁除了这份收入外还有他的《南洋商报》的收入，他的生活相当宽裕——他有没有其它的收入，我就不得而知了。他住在九龙金巴利道的一个公寓，每晚必去舞厅。聚仁的外形朴实，有书卷气，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很得女人欢心。很多女人称他为「大学问家」。聚仁自称女学生对他的追求，他一生中遇到无数次。聚仁正式结婚两次，第一个妻子名王春翠，第二个妻子名邓珂云。可是他的两个妻子都在上海，而他自己是鱼与熊掌兼得。邓珂云到过香港，发现聚仁正和一个舞女同居，一气又回了上海，并去看了王春翠。

从五零年代后期开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曹聚仁的消息。「文革」期间，有一位老太太来看我，自我介绍说，她是曹聚仁的姐姐。我看外貌也很相似。她说，聚仁住在湾仔一处残破而又漏雨的阁楼里，贫病交迫。

后来听说聚仁在上海的两位夫人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香港也有人闹，聚仁就搬去了澳门，晚境凄凉。他的女儿曹雷是歌唱演员，和他则清界限，并在歌颂江青的电影《春苗》中演唱主题曲，这曲子的歌词是「四人帮」的干将徐景贤写的。

聚仁逝世以后，他的好友徐訏为文悼念。但是徐訏的文章中亦有微词，他说：「每个人性格上都有矛盾的地方，曹聚仁似乎特别显著。」「他的号召人家返大陆，有点不顾人家死活。」徐訏认为曹聚仁的性格中有「老鸨」心态。

曹聚仁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类典型。他是文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他既不安分，又害怕政治；他介入政治，又不负责任；他充当别人的政治气球，又自以为得意。他给蒋经国写信，却又骗人说：「这个女人（蒋经国）在追求我。」香港文化界的曹聚仁，和工商界的董浩云，都是可悲的人物。

曹聚仁是两岸密使之说，整个故事是编造的，荒唐的。

不过，最后我要补充一点。五十年代我有一次访台时，国民党的第六组主任（等于中共的统战部长）唐纵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曹聚仁确是替共产党做统战的。」他没有举出任何事实。可能所指的就是曹聚仁不断给蒋经国写信的事。

第十一章 大上海的「解放」百态

上海「解放」前夕，人心惶惶，谣言纷纷，黑市猖獗，物价一日翻几番，老百姓拿到法币，或是抢购米粮，或是换取银元，担心贬值。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战线都在崩溃中。

人鬼难分的局面

上海「解放」前夕，我周围的一些左倾朋友，他们是很高兴的。

「我已经是内定的上海市副市长，」其中一位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对我说。「你怎么样？赶快表示政治态度呀！」

「你要贵为副市长了，失敬，失敬！」我觉得有些滑稽，几乎笑得合不拢口来。

「当然，当然，你的一切包在我身上！」他的谈话有些语无伦次，继续对我说：「你呢，给你一个报社社长当当好不好？《新闻报》或者《申报》，你喜欢哪一家？」

「沪西的洋房我已经看过几座了，我还在考虑，不知道哪一处对我更适合些。」另一个这样说，他又对我表现得十分关心：「反正解放军进来以后，我们接收的洋房汽车一定是用不完的，自然有你的份。」

还有一两个人，他本来的目的是要找我借钱，但是在说话中，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终于伸出手来：

「赶快立功赎罪呀！……不过，现在你手头方便不方便，先借点现款给我吧。」

1949 年 5 月 27 日，共军进入上海市。我看到青年男女们在街边载歌载舞，他们扭着秧歌唱：「人家一齐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我看到那些疲憋的共军战士们背着小行囊，我觉得这些孩子们是可爱的。

我看到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以一个什么什么团体的名义，举行欢迎解放军的集会。

我看到上海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为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接收了许多大的建筑物。

我看到我的朋友卢绪章突然以中共官员的身份出现了，他是上海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平时总说自己是生意人，「不谈政治」。

我看到我的另一个朋友鲁觉吾，过去一向在国民党报纸上写反共文章的，突然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小广告说，自己过去如何受蒋政权迫害。中共认为他的表功行为迹近可疑，把他抓了起来，要他交代，把他一条腿打断了。

我看到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押着「反革命分子」的囚车疾驰而过。

我看到不少人以「伪装革命」的罪名被捕。

我看到，华东局的情报委员会号召国民党和反共人士「弃暗投明」，「立功者奖」，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胡均鹤，他在不久前还是日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助手。另一个负责人王大超，原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局的处长。过去杀共产党的人，「解放」之初负责处理反共案件，驾轻就熟，令人难以想象。其中胡均鹤是早年同康生、陈赓同在苏联受过特务训练，1934 年担任过中共少共书记和红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先后担任过共产国际、中共特科、国民党中统、国民党军统、日伪情报机构的头子，最后又回到中共，也是传奇一生。1954 年胡均鹤因「高饶事件」被捕，供出他在日伪时代曾陪同潘汉年见过汪精卫，为潘案最早的揭发者之一。后来潘汉年被捕，潘的一条罪名又是他重用了汉奸胡均鹤。胡均鹤以后又得到平反，被中共的公安部门所赞扬。他死于 1993 年。也上了八宝山。

我看到，有的人不惜出卖朋友和亲人，过去有过私仇的，认为报

仇的机会来了。甚至街边两个人打架，本来与政治无关，彼此却互指对方「你是国民党特务」!

当时的上海，我想到一个人与鬼难分的局面。

上海「解放」前不久，我有个朋友叫吴藻溪的，他是上海南华大学教授，1946 年与许德衍等组织「九三学社」，当时他也寻求中间路线。有一天他带我到一位前辈家中吃饭，主人曾经做过中山先生的卫士，名字我不记得。藻溪和其它的宾客玩牌，主人把我带进他的卧室，我进门吓了一跳，墙上画的都是各式各样的鬼，主人对我说：「这是阴朝地府的世界」。然后他又指着那些画中的鬼对我说：「小老弟，你听着，你周围所见到的，你街边所遇见的，你以为是人，其实都是鬼啊！鬼像人，人像鬼，人和鬼实在难分」。我推测这位老主人一生中一定受过很多政治刺激，他是我们那个时代中另一类政治人物的故事。

正是这个吴藻溪，共军进上海后不久，他就诬告我是国民党的「特务」。本来我认为他是我不错的朋友，突然对我有这么一手，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这时，我想起那位曾经担任过中山先生侍卫的长者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是阴朝地府的世界……小老弟，你听着，你以为是人，其实都是鬼啊!」当时的上海正是这样一个世界。

潘汉年把我骂醒了

这时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十多天没有出过大门一步。我的朋友在夜深开收音机收听短波，遭到中共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了一队人来，翻箱倒柜地搜查。我的朋友受到警告，以后不准再收听短波。这次搜查虽然没有带去人，但是我们已经饱受惊吓了。

因为不愿连累朋友，第二天我离开那个地方，找到另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是来找个事的，因为现在一则生活困难，二则没有一个事也不大方便。」这个朋友倒很义气，他起先告诉我，现在生意几乎停顿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还有

点货存在那儿，就卖一段吃一段吧。这个年头儿，你老兄谈什么找事，有碗饭大家吃吃，你就搬到我这儿住吧。假如你一定要个名义，那么我就请你当个副经理。」他很诚恳地对我这样说。

从这时起，我就正式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在上海出现了。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在延安时候认识的人，姓刘。他的出现，令我一惊。他说：「我们找你好久了，你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我们哪一处没找过？四川北路、虬江路、威海卫路、卡德路，不是吗？」

我听到他背出这一连串的地址，内心感到极度紧张。但是在表面上，我还极力保持镇静。他问我现在的地址，我为了安全，不再引起他的怀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以后他每隔三两天就来看我一次。

「汉年同志很关心你，希望你去看看他。」

像提解一个犯人似的，他就把我带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去了。

「上海市人民政府」仍是过去市政府的老地方，里面乱糟糟，茶几和写字台堆在一边，另外用些破旧的木板临时隔成许多小房间。我等候在会客室，老刘先进去通报。

潘汉年在延安曾经保护过我，我对他有敬意又有感恩之意。但是这一次见面，他的态度十分严肃，和我没多说几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要我写一份检查报告。

我当时回答他说：「我现在只想做生意，对政治已经完全没兴趣。」

他说：「你考虑考虑，三天后再来答湲我。」

第四天，我再去见潘汉年。「你已经考虑了？」潘汉年说。

「是的，我考虑过了。我对政治实在没兴趣，我觉得做生意好……」

「做生意，做生意！」潘汉年立刻翻了脸。「你全是欺骗我们！根

据我对你这个人的了解，从你的性格和历史上了解，你不会有一天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你也不会就消极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我是一片好心拯救你。你要重新做人，如果你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将来一定为反动派所利用。」

潘汉年这一骂，把我骂醒了。潘汉年的话无异是提醒我，要想在中共的统治下再挨些日子是不可能了。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

1955 年 4 月，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被捕，中共宣称，潘汉年于 1943 昨 4 月在南京晤汪精卫，为「通敌」行为。后日的中共资料又证实，潘汉年的行动是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示。

潘汉年当时的罪名还有一条，即故意放走一些反革命分子。假如这罪名成立，也就包括我在内，那么，潘汉年是我第二次的恩人了。

1977 年 4 月 14 日，潘汉年逝于湖南长沙附近的劳改农场。夫人董慧逝于一年以后。因为潘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而周恩来也没有替潘汉年说过一句话，所以潘案的平反问题屡经反复。1982 年 9 月才宣布平反，前后折腾了 28 年。潘逝于 1977 年。朋友在香港对我说，汉年逝时长叹一声，眼睛没有闭。

路培华小姐助我出逃

我离开上海前，当时我有一位女友，名字叫路培华。她进一位抗日的无名女英雄，也是一位奇女子。我在前面提到过，蒋介石有一位顾问叫王芃生，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也是当时重庆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负责人。路培华从少年时代就被王芃生一手培养，秘密安排在日本，是王芃生的得力助手。路培华从未被捕过，抗战胜利后受到表扬。我因朝鲜义勇队的工作关系认识王芃生，又经王芃生介绍认识了路培华小姐。

她是河南人，1933 年她还在读中学，适逢中国军队在喜峰口抗

击日军，她参加一个中学生的慰问团，到前线向守军司令王敬久献旗。

王敬久问她：「你将来长大了，能为打日本做什么事？」

路培华答：「我愿为打日本做一切我能做的事，乃至奉献我的生命！」

自此，路小姐勤学英文、日文，后来派到日本，被一个日本贵族家庭收为养女，渐渐进入日本主流社会。抗战时，她是日本人在上海的中、日、英文翻译。战后我同她相识，她又向我介绍许多上海滩上的名人。

共军逼近上海，朋友劝她走，她认为自己过去一直做日本人的工作，从未伤害过共产党，加之要照顾重病的母亲，决定不走。她认为我非走不可。她变卖了自己的一些首饰，安排我继续以经商为名，渐渐远离上海，到香港去。我们在上海火车站道别，她轻声对我说：

「等我吧，我把妈妈安排好，会跟着来的。」

她站在火车站远远的一角，目送我离去。

我到香港后，我们通过几封信，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舅舅常来看我。」，「舅舅」指的就是共产党，是我们在上海时订的暗语。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信。路培华曾经介绍我认识过一位在香港的英国记者史密斯，后来担任过英国东南亚专员，我托这位记者打听，不久他通知我，「LULU 已经不幸死了。」

我后来在香港使用「司马璐」为笔名，司马代表我对中国古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崇敬，「璐」字作为我对这位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华终生的纪念。

当我听说我的女友在上海被害以后，痛苦、愤怒、绝望是难以名状的。我当时住在香港一个小公寓中，同一公寓的另一房中住着居白易女士。她注意到我的神色有异，细心看顾我。后来我就对她谈了路

培华如何掩护我逃出大陆的故事，她很感动。居白易同时也讲了一个令我十分感动的故事，她说她的妹妹还未结婚，有一个私生女，现在对外说是居白易的女儿。白易结过婚又已经离婚。现在她妹妹的这个私生女不知如何处置是好。我一听到「私生女」，刚好触动我这个「私生子」的神经，虽然当时我的生活也很拮据，我不加思索，立刻向居白易表示，承担这个「私生女」的一切责任。因此我和居白易为了好好的扶养这个「私生女」，把她作为我们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我们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决定结婚。但是香港婚姻注册署却认为居白易没有离婚证件和孩子的出生纸，拒绝承认。因此我们只请了张国焘、丁文渊（丁文江的弟弟，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等几位前辈吃了一餐饭，作为象征性的结婚纪念。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居白易的父亲居革非，也曾经认为，他们居家有一个「私生」的孙女是有辱家门的，反对我们组织这个家庭。

我们的养女马兰，在香港读中学时，因为她愈来愈成熟为一个少女了，母女之间不时有矛盾，居白易向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女儿」，我坚决反对，接受一个儿女，怎么好随便换的。因为我自己身受过「私生子」的痛苦，我不愿马兰再遭遇到我的相同命运。因此就把马兰送到美国读书，马兰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国画西洋画都有基础，她目前是美国艺术家学会的会员。她的丈夫 Tony Spengler 也是艺术兼电脑的工作者。

由于我和居白易的感情缺少长期培养，所以生活在一起很不快乐。白易可能觉得我心里时时还想念着路培华，她就对我说：「如果路小姐来，我一定让她。」

她又常对我的朋友说：「我知道马义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不怪他，因为一切是我造成的。」

我非常感激她的大量。她对我在香港的一切活动都积极参与，对我个人的饮食起居病痛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的确也努力想爱她。可是，爱情这件事创造不易。我到美国之后，对她也尽过一点责任，马兰也

两次替她办好移民。她表示如果和女儿继续生活在一起，她不愿来美国。我离开香港时，我们在香港还有一点物业，她就守着物业独自生活，我的朋友经过香港去探望她，她一律拒绝接见，也不与我和马兰通信，后来病逝香港。

第十二章 我在香港的文化与政治生活

我是 1949 年 12 月 24 日晚到达香港的。三年前我到过香港一次，只停了三天，说不上有什么印象。这一晚正是圣诞节的前夕，九龙车站灯火辉煌，热闹非常。而我这时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看到人家的欢笑，感慨万千。

我初到香港，有一个感觉，当时中国大陆正是大战之后，田园荒芜，经济凋蔽，人心惶惶，前途迷茫。香港已开始战后的复兴，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我初到香港时，见到书店报摊摆着左中右各式各样的读物，对于一个有理想、酷爱知识的青年来说，真有从地狱走进天堂的感觉。

英国人统治香港，留下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一是自由，一是法治。我一生经过军阀混战、国民党共产党分别统治过的中国，很多在香港住过的中国人，都曾经和我一样，思索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人统治下的殖民地，是中国人享有自由最多的地方呢？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的才华和事业在中国大陆遭受扼杀，而在香港却获得发展呢？为什么近代中国的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或是产生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或是产生在殖民地的香港呢？为什么曾经被慈禧太后称为「不毛之地」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东方之珠」呢？

中国人的政治避风塘

满清当年割让香港给英国人前，香港地盘上的居民只有二百多人，为海盗张保仔所盘据（今天的香港仍有张保仔祠的遗迹）。香港以后人口的变动，都与中国政局的动荡有直接的关系。1842 年英国初占香港，人口上升到 5600 多人。1854 年，太平天国迫近广州，香港人口骤增至英人初占时的 10 倍。抗日战争开始后，香港人口增至 160 万。日占香港时期，港人大批内逃，香港人口减至 50 万，战后

国共内战再起，中共政权建立，香港人口为 230 万。其后经过中共的「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1962 年的大逃亡、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口直线上升。中共宣传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人口已达五百多万。1989 年「六四」以后，香港人口冲过 600 万。在大陆中国人的心目中，香港的生活环境比大陆高出许多，有些人不惜冒险出逃香港，目前香港的人口在 700 万以上。因此可以说，将近两倍的香港人是在中共建政后从大陆逃亡或者移民香港的。

我初到香港时，正是中共横扫中国大陆的时候，香港人担心共军朝发夕至，于是全香港淹没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共政权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涌至香港。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民族资本家、地主，有担心共产党报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等。有钱的难民多数住在半山区，他们或深居简出，或另创一番事业，其中有不少人相当成功。

英治香港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包含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方面。我要特别说到一点，即是香港对于人才的保护，无论是左的、右的、中间的，都可以把香港作为「避风塘」，作为自由的讲坛。政治上的反对派，学术上的精英，技术上的专才，工商经营的好手，都可以在香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港英当局对于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不分左右，一视同仁。例如我住的九龙九华径，曾是茅盾的旧居。有一位左翼作家张毕来当年写道，他到香港时感到，「虽然还不是解放区，我已初步过了解放区的生活」。我很难想象，中国的政局如果再有一个大震荡，中国人要逃避政治灾难，是否还有香港这个「避风塘」呢？

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东方和西方接触的桥梁。英国人从香港赚了很多钱，也通过香港向中国输入了许多现代化的东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早期的民族、民主运动，就是从香港展开的。

香港是我一生中初尝「自由」禁果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在香港我也写文章批评港英当

局，但是从没有惹过一天牢狱之灾。

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朋友赠我《香港组曲》唱片，这是大陆音乐家符任之作曲，古振辉作词。这乐曲其中的一段，很像当年流行的《延安颂》。《延安颂》歌颂的是「革命圣地」，《香港组曲》则把香港歌颂为「自由圣地」，所以我称这个组曲为「香港颂」。

「啊，《香港！
你这繁荣的市场，
你这富裕的金仓，
你这美丽的海港，
你这自由的乡邦！
啊，香港！
哪里去找，
你这自由之港！
自由之港！」

《香港组曲》中一再重复的是，代表香港精神最主要的元素是「自由」。《香港组曲》最后几句是：

「香港人自由意志强，
创业的豪情壮，
使这个小小海岛，
充满着热核的能量！」

香港的反共人士享有言论自由，共产党也一样享有言论自由。在大陆变色以前，香港是中共宣传和统战的主要基地，例如香港的「华商报」即是一例。

冒险家的乐园

香港当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其中有一位董浩云最为典型。40 年代他在大陆经营航运事业，很有发展；中共席卷大陆，他只身

逃到香港，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合作，重新开始经营，在其后的韩战、中东战争、越战期间，董浩云的航运事业空前繁荣，被称为世界第二号船王。董氏交游广阔，与港台高官多有交往，台湾前警备司令彭孟缉是他的儿女亲家。他与文化界的人一见如故，见面总说请客。有时在大餐馆里遇到他，他就说，「相请不如相遇，这一餐算我的了。」完全是江湖大亨的气派。董氏的事业大起大落，他靠战争发财，而战争结束后他总是大蚀本，负债累累。董氏屡向台湾借钱，数目巨大，后来台湾的银行感到承受不了；董氏争取美国人的支持又告失败，1982年 4 月死于心脏病。其长子董建华承继事业，依靠中共的资金解脱困境，董氏企业成为中资占有相当比重的企业。1985 年董建华公开为中共（他的债权人）的香港事务服务，这就是董建华成为香港特首的历史背景。

当时有些金融巨子，跑到香港，是对政局采取观望态度的。

有一位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素称精明，他把自己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分行的名义，资金转移香港。他订出一个四平八稳的计划：一，以香港为基地；二，家暂留在上海；三，到台湾看看时局发展，不好仍回香港；四，如果大陆有私人企业发展的机会，再去上海。中共建政时通过一切统战渠道邀他北上，陈称病未去。

另一位从大陆跑到香港的国民党时代的银行家钱新之，他到香港后写了两封信，一封信致蒋介石，另一封信致周恩来，内容几乎相同，表示效忠，可是放错了信封，把两封信对调了，成了笑话。

有些人以为银行是一种不需要资金的生意，想发财想疯了，都想开办银行。我的朋友曹聚仁也凑过热闹，开了一家中国农工银行，不几天就关门大吉了。

一个叫胡希明的人，是中共《周末报》的主编，住在筲箕湾，他的笔名是「三流」。早年编过《华商报》、《正报》副刊，一向主张党报副刊的文章「趣而不教」，为领导所不满。夏衍一直支持他。当绝

大多数左翼文人北上后，他独自留在香港办《周未报》（属中共南方局）。他虽是共产党员，和什么人都能谈得来。有一次他对我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这个《周未报》，欢迎你写点小东西，既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你可以把《周未报》当成随便聊天的小茶馆。」

我始终认为他的这种「小茶馆论」是一种统战手法，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后日我了解中共文艺史上有所谓「二流堂」，夏衍为首。胡希明也是这一帮中的广东派。

过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都相当彷徨。香港有一家名叫格罗斯打的咖啡厅，生意非常兴旺，座客百分之九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他们到这里花很少的钱，比如只泡一杯咖啡。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碰碰运气。格罗斯打的故事无奇不有，有人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人得到终身伴侣，有人遇到骗子，家破人亡。

其后，难民中出现了各式的小组织，有的微不足道，有的一度颇有声势，昙花一现。留心中国政情的人，就称香港这些活动为「第三势力」，「第三方面」，到处有人举办座谈会。当时香港的情况复杂，要分析这些「第三」谁真谁假，实在很难。

香港的第三势力

「自由人」可能是香港较早的「第三」，它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仅发行一份《自由人》刊物，每周举行座谈会，参加的有许孝炎、成舍我，陈克文、丁文渊、雷啸岑、左舜生、陈伯庄、刘百闵、司马璐等。这些人中，有些是国民党人，有些不是国民党人而认同国府的。所以有人认为《自由人》为国民党的统战刊物，但台湾当局不以为然，反而加以限制——后来这张小报纸不让进台湾了。

国民党时代的各党各派都有人在香港。其中属于国民党的，刘百闵、彭昭贤被视为 CC 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表，梁寒操、陈伯庄被视

为孙科的人。香港青年党人数不少，其中著名的有李璜、左舜生、何鲁之、胡国伟等。青年党人谢澄平另树一帜，发行《自由阵线》杂志。民社党人以张君励为首，张以下李微尘、孙宝刚、宝毅弟兄弟各自为政。民社党另一流派以伍宪子为首。桂系则以程思远最为干练。思远为人潇洒，常在花丛中惹风波。

当时在香港还有一批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孤魂野鬼，例如我的一位结拜兄弟毛健吾，他在抗战期间办《大刚报》很受同人敬重。金仲华曾经批评他「在事业上是个实干家，在政治上是个胡涂汉」。他从国外回到香港，不知何去何从，每天和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去澳门赌场，最后两个人输光一切，相继去了大陆。中共领导人对毛健吾说，你办报经验丰富，将安排你办「文汇报」，结果却被送到劳改农场，后来就死在那儿。包惠僧回大陆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安排了个「国务院参事」的闲职，主要叫他写中共早期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起初在「新观察」连载，由于他回避谈毛泽东而受到批评。后来一再修改，出版了单行本。他死于 1979 年。

过去汪伪系的人马也有不少在香港的，我遇到的有李圣五、樊仲云、朱省斋等。有很多汪伪时代的人，都在香港改名换姓了。中共在海外统战宣传的口号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回到中国大陆，一律会受到优待。也确有过去被中共称为「杀人（共产党）如麻」的「反动派」，去过大陆再回到香港，夸耀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同桌吃饭、毛如何客气让座，周又如何为自己夹菜。听过这一类宣传的人，就编出一段话来：「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后来我听说，这几句话在大陆也很流行。

有位叫吴季玉的，江湖中说，他曾是上海呼风唤雨的杜月笛的门人。他的住宅豪华，有司机、厨师、女佣多人，我有次去参加过他的盛宴，场面不小，他在香港和北京的章士钊、台北的于右任都时有往还，后来吴季玉在台湾被暗杀。

1949 年蒋介石在节节败退中辞去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为代总统。

但是蒋李之间矛盾很深，李氏求和又不为中共接受，四面楚歌。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人，如顾孟余，在美国政府的公开鼓励和李宗仁的秘密支持下，在广州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顾孟余为主席，下设干事会，由立法院院长童冠贤任书记，李宗仁的亲信程思远任副书记。其后，由于李宗仁举棋不定，这个组织也没有什么做为。以后李宗仁下野出走美国，顾孟余等抵香港。与此同时，前国民党上将张发奎也想搞类似的组织，于是以张发奎、顾孟余合作为基础。结合前中共领袖张国焘、民社党领袖张君励、青年党领袖李璜、左舜生等，组成「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推顾孟余、张发奎、张君励、张国焘、童冠贤、李微尘等为中央委员，属下刊物有《自由阵线》、《中国之声》、《独立论坛》、《再生》、《大道》、《前途》、《主流》和《中声日报》、《中声晚报》等。当时我属于所谓理论班子，写出过一本《平民政治》的书。

我写的《平民政治》作为第三势力的理论，自己早已忘记了，1997 年 11 月，台湾《传记文学》有一篇陈正茂的文章，《简述 50 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其中最后一段提及当时「从事民主反共宣传『第三势力』述动」的书籍中有司马璐的《平民政治》。因此我去函《传记文学》，作了些补充说明。我说，50 年代初，我的确写过一本名为《平民政治》的书，书稿请顾孟余、张发奎、李微尘几位看过。自由出版社负责人谢澄平对我说：「我看了你的《平民政治》书稿，很好，自由出版社打算出版。」以后我问谢澄平何时出版，谢答，「现在正由几位青年朋友传阅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追问，谢答：「现在原稿落在谁的手上，不清楚了，正在继续寻找中。」此后这份稿子居然不知下落。今读陈正茂先生文，甚喜，《平民政治》的书稿似乎尚在人间，究竟是否已经出版我未见到，还是陈先生见到的是我的原稿？有人私下对我说，我的「平民政治」原稿，被锁在国民党的情治单位的档案中。

我愿在这里补述一点，初期的香港「第三势力」非常混乱，成份复杂。有些人是逐渐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或共产党，或国民党，或

属于是日、英、美的情治单位。我与三张（张发奎、张君励、张国焘）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分别听过他们的慨叹，说「战盟」的会议，自己内部的记录还没有整理完毕，人家情治单位早已掌握到详细的报告了。

我在香港初期，丁文渊对我热心帮助。他是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弟弟，他本人也担任过上海同济大学的校长。中共建政后，派李国豪（后为同济大学校长）多次游说请丁文渊返沪继续主持校务，被丁拒绝。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关系很深，丁文渊也是驻港的德国总领事的朋友，我常陪同他与德国总领事宴叙。他们建议我去西德读书，一切费用由德国官方负担。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年过三十，学德文不易，加以婉谢。后来，美国在香港的一个援助知识分子的机构又安排我到美国读书，我也以同样原因放弃了机会。这两件事都是可能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最后丁文渊把他自己办的「新世纪出版社」全部资产无条件地赠给了我，大力支持我在香港的事业。我永远忘不了丁文渊先生。

出版《斗争十八年》

我到了香港以后当时最大的兴趣是跑旧书店，搜集烂书（可能与我早年拾垃圾习惯有关）。并下定决心专写中共党史。我又对自己走过的政治道路，作过一些反省。1952 年出版《斗争十八年》，写出了我的思想转变的痛苦经历。

中共席卷中国大陆，余威跨海而至香港，很多香港市民，包括一部分强烈反共的政治难民，都在门前挂上了五星红旗，以求自保。代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基本不见了。

1950 年 10 月 1 日，中共在香港举行盛大的建国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这同时，许多中外记者接到了我以「香港自由作家联谊会主席」名义的请帖，邀请他们参加我们在高士打道六国饭店举行的双十节纪念活动。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声望号召，所以第一次会请了钱穆，第二次会请了伍宪子两位前辈讲话。当时中国记者，包括国民党记者对于

我们的活动并未重视，而外国记者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报导到全世界。

1952 年我出版了《斗争十八年》一书，写出了自己的故事，香港各大报刊都对我的书发表了书评。

香港发行量最大的《华侨日报》的书评说：「这本书每篇都含有不止作者个人的辛酸与血泪，它刻划出整个时代的大悲剧，直接或间接地替我们每个人说出若干心里想说的或是想知的事实和情绪。」「《斗争十八年》是这年代一部有浓厚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文艺性的仅有的作品……以平铺直叙的率真去写真实的动人的故事。」

《学生周报》说：「一个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纯真青年……写他由深深被骗而至基于人性所发生的猛醒与选择自由的过程，极为真切。」

《香港时报》说：「故事生动，文笔简练，因而关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大悲剧的描写，更见深刻。」「由一个人看一个时代，看世界，这是本年度香港第一本最有价值的书」。

其它发表评论的还有英文「虎报」「中国邮报」和「自由阵线」等十余种报刊。

《斗争十八年》出版后，又出版连环图画版、广播版，有人要拍电影，已经编好剧本。但是剧本中突出描写了男女关系、爱情纠葛，而我的书主题是理想的幻灭，因此我不同意这个剧本，电影就没有拍。《斗争十八年》出版了日文、法文、韩文、印度尼西亚文、泰文版，在泰国并作了连续广播。英文版因为同时有王金、Hunter 的两份译稿，版权问题出现纠纷，拖延多时，未能出版。

《斗争十八年》中文版共印五版，加上连环画等共销十七万册，又有其它文字版本的版权费，使我成了「小康」，我也独力创办了「自联通讯社」。

《斗争十八年》记述我从 1931 年（十二岁）童年时，开始接触中国的政治生活到 1949 年中共政权建立，我到香港为止，此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由于顾虑到当时留在中国大陆的亲友和往日同志的安全，虽然基本事实无误，却对某些人物的背景有些改变，同时也对我一生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没有如实的写出，这是一个遗憾。但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也是朋友们所能谅解的。

50 年代生活在香港的人，多对我这本书有些印象，正如余英时教授写的：「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

《斗争十八年》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从 1956 年起，我接到一些亚洲国家文化单位的邀请访问。第一个邀请我的是日本东京的亚细亚大学，该校的中文系主任柳内滋教授是《斗争十八年》日文版译者。在接待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名王继贤的老相识，在四十年代，他是朝鲜义勇队的国民党代表，我是共产党代表。他对我说，当年我们在重庆面对面斗争时，他曾暗中帮助过我，否则我早就被国民党杀了。

香港「展望」杂志

1958 年 4 月 1 日，香港《展望》杂志第一期出版。

《展望》的发刊词说：

《展望》的信条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意见的研究与讨论，我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我们认为，在真理前面，我们大家都应该低下头来。」

在内容方面《展望》反对骂人，注重真实报导与积极建议，另外，幽默讽刺的作品亦多。当时人民对现状不满，而反抗又有无力感，幽默讽刺是最好的武器。

《展望》杂志提倡「左、中、右三结合，」作者们的观点可以完全不同，有支持中共的，也有反对中共的，支持中共的作者中又有老革命和「文革」派之别。在台湾问题上，有支持国民党的，也有支持

「台独」的。在国际问题上，有批评苏联的，也有为苏联辩护的。《展望》差不多每期都有笔战，中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望》是真地这么做了。

《展望〉许多第一手报导，是不断的来自大陆的逃亡青年，由黄启明组织他们提供我们外间不易获得的最新消息。例如 1960 年前后，苏联专家撤出中国大陆，1980 年中共秘密与南韩合作，均由《展望》最先报导，然后传至全世界，并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展望》出版不久，发表了胡适先生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这是胡适先生对于《展望》的一位青年作者的诗作的批评和指教。胡适的这封信发表于 1961 年的《展望》第五期，给所有同人很大的鼓励。我也深切地感到，胡先生如此爱护新人，他在中国知识界的崇高地位不是偶然的。

《展望》出版一年以后，南越总统吴廷琰的顾问雷震远邀我访问西贡，在那里我受到吴延琰的款待。吴氏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位清雅温和的学者型政治家。雷震远神父向总统介绍我是一位「反共专家」，我对这个头衔不很乐意，好在吴廷琰并未真的问计于我。在南越总统府吃到了最难忘的法国菜，也是第一次畅饮法国美酒。

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作为香港代表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亚非反殖民主义会议」，我见到逃出西藏不久的达赖喇嘛。

《展望》在中国大陆也产生了一些影响。1966 年 1 月，《展望》刊载了一篇徐訏批评周作人的文章，徐訏早年和周氏兄弟都有往来。他在文章中说，周作人是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晚年却做了汉奸，实在令人惋惜。徐訏的文章发表后大约半年，《展望》收到周作人自北京的来稿，对徐文加以答复。周作人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附逆作些辩解，他说当时一家大小多少人口，包括鲁迅的原配全由他负担，谈的多为家务，对于研究周氏兄弟、也颇有参考价值。中共对于文化的封锁极严，周作人如何能读到《展望》，并寄出此稿呢？后日的中共

资料，有人为周作人「平反」，说当年周作人做汉奸，掩护了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云云。

中共「反右」对我的启示

1957 年中共号召整风，毛泽东信誓旦旦的要求党内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没想到两个月后，中国大陆的大鸣大放转为「反右」，风云变色，从此，「知不敢言，言不及义，言者有罪，闻者揭发」，「夜来整风声，害人知多少」。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中共的阴谋，毛泽东却说「不是阴谋是阳谋」。我以为，当时的所谓「右派」是可爱的，而毛的「阳谋论」也是坦率的。我曾就当年的「反右」资料，作了以下的分析：

第一，中国民主派人士，对于他们在中共政权中的地位，完全缺少自知之明。1946 年国共和谈时，王炳南对章伯钧说：「国民党凭什么买你们的账？还不是因为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建政以后，周恩来曾与罗隆基有过一场辩论。周提醒罗：「民主党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代表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的。」罗隆基反驳说：「我们之间属于人民阵线关系，你们和我们各代表人民的一部分。」

共产党早有一个说法，所谓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可有可无，可以剃去，也可以美化。而章伯钧却说：「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完蛋？就因为有民主，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章伯钧说的是真话，也是梦话。

第二，中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理解他们在中共政权中的职权。很多人在鸣放中表示自己「有职无权」，独立思考不受尊重，所有国家机关由共产党的党组负责，方针、政策由党组决定。章乃器说：「党如编导，其它都是演员，技术管理人员对政策问题没有发言权。」章伯钧说：「我做交通部长，我和我的警卫员的关系是：我是部长，是领导他的；但他是党的书记，却领导我了。」

这个权职问题的矛盾，即使当时与中共关系极好的何香凝，也有很大的意见。何当时负责侨务工作，她说，她能见什么人，看什么文件，全由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党员干部张干素控制。

第三，中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理解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可以代替一切行政命令。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说：「我对党的不满是很多很多的。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对于文物建筑的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我尤其不满意党在许多措施中专断独行，对许多学术性的分歧意见用狂风暴雨，刮得人淋得人连喘气都喘不过来，更不用说说话了。」

梁思成是位学者，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对于中国城市古典文化的爱，也是感情化的。他的话说明他对中共政权「政治决定一切」毫无认识。

另一著名教授马哲民说：「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是『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就是上帝。』」

第四，中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理解共产党的一当专政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储安平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点头才算数……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

民主人士不了解中共

「党天下」这个概念，毛泽东早在中共建政以前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并没有骗人，而是像储安平这样的民主人士，太过一厢情愿了。

第五，中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理解，中共政权党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有人说生活水平提高，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1949 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罗隆基也要求中共为「三反」、「五反」平反。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引蛇出洞，各个击破，一放二收三整，而罗隆基们对这一点缺乏了解。

第六，中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确错估了形势，也不了解共产党，就连一些老练的政治人物也上当了。例如与蒋介石长期周旋的地方实力派龙云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章伯钧也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清算了，全世界的小斯大林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国家又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中国的政治形势险恶，进退失据，现在民主人士要为共产党收拾残局云云，想法太天真了。

中共「反右」时，流亡香港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左翼人士，有一种无奈感，一见面就说笑话，其中有的笑话反映了那个时代。

例如一个笑话是：在上海，一个牙医对老婆说：「从鼻子拔牙真是太难了！」「怎么要从鼻子拔牙？」老婆说。「是的，」他回答。「自

从反右派，就没有一个人敢开口了。」

又例如另一个笑话：一天，汉口人民医院来了一个奇怪的病人。医生诊视后向这个病人说：「你的耳朵和眼睛都没有毛病。」「让我叙述我的症状吧，」病人说。「我的耳朵听到的，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的眼睛看到的，我的耳朵听不到。」

我们这些说笑话的朋友中，有些人对鲁迅相当尊敬（我个人的看法是有保留的），1961 年 11 月，一些朋友相约聚餐，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周年，参加的有鲁迅生前的朋友姚克（电影《清宫秘史》作者）、徐訏、曹聚仁，和鲁迅生前骂过的黄震遐等。不知谁改写了鲁迅的一首诗，给大家传阅：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假若今日身未死，
天安门外等杀头。」

「展望」杂志一共办了 26 年，到 1983 年底结束。《展望》的作者中，如徐放、笔理等，当时都是二十许年纪，才华出众。徐放的文章编有《徐放文存》，笔理也留有全集。

著名的 30 年代左翼作家孙师毅用笔名曾为《展望》写稿，他有毒品的嗜好，我们拿钱劝他戒掉，他应承了，实际上没有做。江青和孙维世在上海时期的恩怨，是孙师毅最早对我谈的。后来他去了北京。1964 年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见到他歌颂江青的诗。我知道他是上海时代江青的朋友，毫不奇怪。「文革」开始不久，孙师毅便被整死了。

「展望」与你同在

1968 年 4 月，《展望》创刊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的祖国，我的同胞，《展望》与你同在！」副题为「为《展望》十周年

纪念特刊而作」。文中说：

「亲爱的读者，我愿藉《展望》杂志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首先要向你们致意，《展望》属于中国人民，假如《展望》在过去十年中对祖国事业有些微的贡献，亲爱的读者，这光荣是属于你们诸位的！

「我愿再籍此机会向《展望》杂志十年来所有的作家们致意！这10 年中，《展望》这块园地丛花盛放，全靠大家的灌溉与培育。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展望》的读者；许多读者同时是《展望》的作者，我愿籍此机会一并向你们致意。

「我愿再籍此机会向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治家和学者……等各位前聚致崇高的敬礼，他们先后经常为《展望》杂志撰稿，这是《展望》的光荣！我和读者诸君都共享这份光荣！

「同时我要特别向那些不愿我们公开姓名的海内外热心的中国人致意，他们是《展望》的无名英雄！

「《展望》筹备于 1957 年大陆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看法，应该使我们的同胞感到，他们对民主的追求并不孤单，我们正在海外呼应他们，声援他们。6 月间，大陆的『鸣放』一变而为『反右』，我的心情极度激动、悲愤而沉重，我觉得我们更有责任让我们祖国的同胞保持希望，同时也应该把他们的声音在海外继续下去。

「《展望》杂志的立场不能见谅于国共两大政权，是想当然的事。两大政权对于《展望》的喜怒如何，我们也不重视。《展望》属于中国人民，为苦难中的祖国同胞倾诉，正如我们一再申述过的，我们不站在左边，不站在右边，我们站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有也曾有许多次遇到过从大陆走出的同胞，他们来看《展望》杂志就像探访亲人似的，他们在大陆有的见到过，有的听到过《展望》，他们跑出来竟有『希望在《展望》』的想法，遇到这种情形，我们一方面很受感动，一方面感到《展望》的肩头更加沉重。」

我曾写过一篇「送别某先生」的文章，记述《展望》与读者的感情：

「十几年前有一位华侨读者到自联出版社来订购《展望》。

「这位读者先生穿着很朴素，他对《展望》有一份深切的情感！

「这位读者先生有亲属在香港，每到香港时，常来自联出版社，他对我们这个小出版社的刻苦经营，有一份纯洁的同情心，特别是对于《展望》，有一份爱心！

「这位读者先生，每次来看我们时，总顺便买一点书，因为他是多年订户，我们给他优待打折扣，他不肯接受。他说：『你们的《展望》和出版社，在这样苦的环境下维持下去，我知道很不容易。订《展望》和买点书，我是应该的，不要你们优待我，只是我一点点心意。』

「我很感动，尤其当我留心到，这位读者先生的生活似乎和我们一样简朴！

「这位读者先生，每当他对《展望》的文章有不同的意见时，必向我们表示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建议他把这些意见写出来，他又很谦虚。《展望》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似乎仔细读过。我每想及这位读者先生，执笔时觉得更有庄严感。

「不久前，这位读者先生对我们辞别远行，他送给我们他珍藏多年的书资料。当我收下他这些无价的礼物时，感到惆怅。他要远行，以后不能常来香港，我们也不能经常得到他的教益了！我说要请他和他的太太吃一次便饭或饮茶，以作告别。他推却了。

「这位热心的读者先生，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私人应酬，我心里很感不安。《展望》有很多海外订户，都用英文，这位读者先生，我也从没有请问过他的中文姓名，这更是我感到遗憾的。

「这位读者先生已经远行定居了，我祝福他。我因为无法写出他

的中文姓名，只好以『送别某先生』为题，并以此文纪念《展望》进入第二个十年。《展望》能够有今天，有很多位『某先生』和没见过面作者，我永远记得他们，祝福他们！

「我感到，在中国人民中，理想的光辉照耀。我受到鼓舞！这种鼓舞的力量，来自很多很多的『某先生』!」

「展望」的大笔战

《展望》有过几次大笔战。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问题，中共元老张国焘和彭述之的笔战最引人注目，双方措辞尖锐，前所未见。

关于台湾的前途问题，1967 年即已展开讨论，参加论战的有百人以上，当时倾向台湾独立的代表人物是徐訏。反对台湾独立的代表人物是劳思光。

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徐訏所写的「台湾之出路」，笔名秦叔存，在 1967 年 12 月 1 日《展望》第 140 期发表。徐訏文中：「鄙人籍非台湾，素不同意台湾独立之说」，但「我们虽不赞成两个中国，但两个中国存在则已是一个事实」。既然反攻大陆无望，台湾不如学以色列，学新加坡，「变成新国」「从头做起」。徐訏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政论家，他的政论多不愿用本名发表。徐訏有一青年朋友廖文杰，有当今「徐訏专家」之称。也曾在《展望》写稿。

关于中共苏共之争，有一位署名「张大奇」的作者，凡是《展望》上出现批评苏联的文章，他必出面为苏联辩护，他说「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张大奇的地址是纽约华埠，我来美国后曾按址找他，说是没有这个人。另一位笔名「南山」的作者，专写骂苏联和赞扬「文革」的文章，他说唯毛泽东思想能代表中国革命，唯江青能代表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四人帮」跨台后，此人也不见了。

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当时黄启明、孟戈等，都是主张全盘西化

的，胡秋原是反对的。

香港自联出版的书籍有《中国问题论集》、《刘少奇语录》、《刘少奇选集》、《周恩来语录》、《毛泽东语录补编》、《林彪语录》、《林彪专辑》、《彭德怀》、《陈云言论选》、《陈毅言论选》、《邓小平语录》、《邓小平资料汇编》、《江青资料汇编〉、《「四人帮」资料汇编》、《胡耀邦资料汇编》、《赵紫阳资料汇编》、《当代中国政治》、《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新中国漫画选》、《鲁迅语录》、《孙冶方语录》、《王明回忆录》、《谭震林语录》、《陆定一语录》、《燕山夜话》、《鸣放回忆》、《论爱国主义》等多种书籍和「展望」杂志专辑。我们除香港的书店外，在东京成立了东洋图书贸易，出版我们的日文版书籍。在我们的书中，以《刘少奇语录》获利最多，后来的《周恩来专辑》、《林彪专辑》等书都是亏赔。

1966 年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展望》介绍有关资料最多，销路直线上升，有时要加印第二、第三版，订户也在 12000 以上。

《展望》杂志 1958 年 4 月出版，1983 年结束，前后 26 年。我除了办《展望》外，还有自联出版社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除香港外，我们还在日本东京设有办公室。我们的经济来源，一是《斗争十八年》的中外版版税，二是丁文渊捐赠的新世纪出版社全部资产，三是张国焘捐赠的全部存书，四是我搜购中共禁书独家销售，五是在九龙尖沙嘴闹市出售中国工艺品，六是「展望」第一期到第十三期的印刷费，是由印度尼西亚华侨银行家丘秉发付的，七是香港政府保证金和经济周转是由中国联合银行支持的，八是我的世界旅行费用是由香港亚洲协会支持的，九是蒋经国一度大批订购我们的书刊，作为国民党青年干部的学习材料，十是中共向我们买回他们过去的禁书。以上即为我们的主要收入。

我们的卖书生涯中，有过一次奇遇。1977 年，我在香港旧书摊上买到一部 1902 年（清光绪壬寅年）木板印的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出版物，我花了港币五角。后来经许多朋友鉴定，确是难得的孤本。

于是我影印了一百册，每册售价二百元，全部售完，大陆也买去数册。这件事一本万利，对我们出版帮助不小。

中国和平演变论

50 年代初，我参加了一次在香港举行的中外专家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倾向国民党的朋友一致喊「反攻大陆」，又有一些专家列出数字说明国民党没有条件反攻大陆，期待美国出兵协助也不可能。倾向国民党的朋友对这种说法极度不满，却也无法反驳。因此，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除了国民党反攻，能够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大陆的问题吗？我注意到年逾 90 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倡导和平运动。反对核爆，我颇受感动。我写了一封信向罗素致敬，并收到他的回信。

1964 年中共核爆，我应邀在香港联合国协会演讲。我说：「核子科学的发展，正像人类历史上的产业革命一样，带给我们生活上最大的变革。但是，必需保证它作为和平的用途。所以就核子科学发展的本身来说，可以肯定，它对人类有伟大的贡献。」

但是，我反对核子战争，我说：「假如一场大战发生，直接受害的，是不是我们的同胞，广大的中国人民呢？这中间有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亲人在内。核子战争的可怕性，不是杀伤的人多少的问题，而是可能使我们达到绝子绝孙的程度！」

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

1962、63 年中间，中共出版的一些报刊，虽然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有时也偶尔透露一些作家对人性的看法。例如巴人说：「人性和人道主义应是文艺的基础。」也有青年人在《中国青年》、《中国妇女》杂志上提出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想过一点好日子？」「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而活着？」作家的「人性论」和青年对个人前途的忧虑，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思想在变。这种变化正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怀疑，对共产党要求青年「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怀疑。

在这同时，中共的权威哲学家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杨献珍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者由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中国语言把物叫做『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日常语言这类东西很多，如开关、规矩、方圆、呼吸、阴阳、生死、水火、新陈代谢等等。」「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采取『合二而一』的方法。」「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杨献珍的哲学理论受到围剿（同时受围剿的也包括「人性论」等）。中共的哲学理论斗争往往隐蔽着政治路线斗争，杨献珍的理论有「和平共处」的内涵，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分为二」相对抗。

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思想，说明在中国大陆并不是板一块，说明埋藏在人民心中求变的思想。我认为中国一定要变，一定要大变。我的主观愿望是，我不喜欢有人喊打喊杀，我不愿见到中国再有内战。因此，我一方面呼应杨献珍「合二而一」的理论，一方面发挥我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共观点，指出「合二而一」应该有对抗，有对话，有争论，有妥协，有不断的变革与进步。因此我肯定中国以后要走「和平演变」的道路。我出版了《中国和平演变论》这本书。

此书当时受到国共两党的一致「讨伐」，国民党说我的理论是中共的统战策略，共产党说我的理论和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理论差不多。

我的和平演变的理论，是从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实际中形成的。在中共党内，每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清算，罪名都与人情、人道、人性有关。我感到，我们同大陆青年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声音，应该是相通的，我们共同呼吸，这就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基本条件。

我写《中国和平演变论》是 1964 年，当时海峡两岸。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台湾宣布解除党禁和报禁，向一个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发展，这是和平演变在台湾的胜利。我在我的书中是「反对两个中国」的，但是，我寄希望于中国大陆，以台湾为榜样，

与台湾进行民主竞赛。目前两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是政治现实，如果将来大陆和台湾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所谓「两个中国」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失。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和平演变解决的。

我的《中国和平演变论》摘要如下：

「今天的政治愈来愈多地服从科学。政治在过去为少数人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渐成过去。随着尖端科学的发展，现代的政治斗争，不是两雄厮杀，不是两军对垒，而是动辄牵连到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的生命。所以，人们在现代政治斗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与知识的斗争）之前，不能不，也不得不把头脑清醒一点，为了某一个政治目的，在一个重要关头，他必需慎重地考虑到，值得冒战争、冒毁灭的危险吗？意共前领袖陶里亚蒂说过『核战是没有眼睛的，它的毁灭不会区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处于今天这个时代，只有落后、野蛮、无知的人，遇到任何争执，动辄喊打喊杀，人类文化愈高，智慧愈发达，愈应该能够用理性态度看待问题，在暴力与战争以外寻求解决问题的道路。

「这是很明白的，由于人类的知识普遍提高，任何一种绝对性、垄断性的思想与事物，只是昙花一现，绝不可能是永恒的（在苏联，政治上的斯大林，科学上的米丘林，从垄断到破产，就是例子）。人类的科学知识愈丰富，其政治生活愈是多样的、多姿多彩的。

「因此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对政治态度的选择，就像科学家从事的科学实验，一次不成，再来一次：这个不合，再换一个。今天，每一种政治制度，随时都在接受考验与挑战，一切的教条主义，无论左的右的，都要被扬弃。

「现在台湾与大陆和『和平竞赛』已经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眼前的事实。这个『两个中国』的事实，不是别人制造，而是国共两党（两个一党专政）制造的。只要国共两个一党专政存在，就必然

是『两个中国』的局面；只要目前国共在台湾海峡的『和平』相持继续存在，而同时中国人民又反对这种『两个中国』的局面，那么，毫无疑问的，无论大陆与台湾，必然沿着上述『和平演变』——『和平竞赛』的道路发展。

「目前中国的根本病源，皆由党天下、政治挂帅、教条八股、个人崇拜而来；中国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不是共产党的国家，不是国民党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党派或私人的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把它的党权凌驾在国家之上。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割掉中国政治上最严重的毒瘤　党专政，把党与国家分开。

「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为进步、为人道、为公平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进步，我们必需克服落后。为了人道，我们必需克服残杀。为了公平，我们必需克服特权。我们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特权者与不公平的现像，促进社会进步与充实人民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同时消灭违反人道的暴力革命与战争。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作出一个简单的定义：『和平演变』是通过民主道路，在和平中求进步，不断争取全人类的幸福。『和平演变』尽可能地避免流血，绝非向一切落后无知愚昧野蛮屈服。但是，我们相信，科学愈发达，人类文化愈高，一切的政治斗争，愈应该在杀人以外的方法中解决。

「『和平演变』就是和平斗争。是科学的竞赛，智慧的竞赛，物质的竞赛，实力的竞赛。」

向华国锋讨债

1976 年，中国大陆出现「四五运动」，群众籍悼念周恩来以宣泄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愤怒。我在香港大学演讲，我个人对周恩来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但是我在演讲中肯定了「四五运动」的进步意义。

文革初期，中共毁去很多党史资料。「文革」后期，中共的有关部门设法从国外「引进」一些党史数据。中共的一份资料中说，前中共党员张国焘、王明、司马璐手中掌握了一批党史资料。当时，张国焘、王明已经久病不起。他们找到我，我说可以，明码实价——我既已不再是共产党，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走资派」吧。

文革后期，大约在 1974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中新社、对外贸易部等单位都买过我们的书刊数据。至于展望的订户，除了一部分机关单位外，有外国在华使馆、商务代表、通讯社和外国留华学生。其中日本学生较多，总约二百多订户，当时书款及订费，都由香港中国银行付款。

「四人辩」倒台了。这时，中国银行说，「四人帮」的账他们不认。这样，我就在《展望》上发表公开信，向华国锋「讨债」。这封公开信当时颇受香港舆论界的关注。全文如下：

为《展望》半月刊在中国大陆的发行业务受阻

致华国锋先生的公开信

华国锋先生：

《展望》半月刊是一份根据最新资料，报导与分析祖国现状；并根据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解决的原则，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讨论中国前途，反映中国人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的刊物。

《展望》半月刊现在给你这封公开信，不想和先生讨论政治问题，而是因为《展望》半月刊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发行业务受阻，根据「在商言商」的简单道理，认为先生有对这个问题澄清的必要。

《展望》半月刊在大陆有多少订户，相信先生所领导的公安部一定非常清楚，虽然这些订户都有特殊的条件与背景，但是，在我们《展望》半月刊立场而言，中国大陆与我们的业务往来，我们都很欢迎。

今年以来，《展望》半月刊在大陆的订户，纷纷向我们投诉，他们没收到《展望》：其中有的订户是航空挂号，也发生此种情形；有的订户甚至以电报责问我们；有的订户又说，他们已汇出款项继续订阅《展望》，指责我们为什么没有寄给他们订户收据和刊物，否则，就该把刊邮费退还。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收到他们的汇款。

《展望》半月刊全赖读者支持。我们万分重视订户对我们的每一个指责。但是：

一、当我们发现《展望》半月刊在中国大陆的订户最近不能按期收到已不是个别情形，那么，我们相信；只有先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二、当我们《展望》半月刊在中国大陆的订户来信说，他们甚至远在半年前汇出款项而我们又确实没有收到，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外汇信用，我们认为，先生有彻缴查的责任。

以上的事实对于先生所宣传的「大治」，实有阻碍作用，请了解情况，加以纠正。

此致

爱国的敬礼！

香港自联出版社展望半月刊发行部上 公元 1979 年 3 月 30 日

上述公开信果然有效，中国银行通知我们，把账付了。大陆许多学术机关也开始和我们联系。

大陆老朋友纷纷来访

廖承志经过香港时，他的岭南大学同学欢宴他，友人伍树荣、曹耀都是廖的同学，也是香港金融地产界的活跃人物，邀我参加，廖即席讲话，号召大家忘记过去恩怨，团结向前云云。

我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八册中有邓小平在广西领导百色暴动的部分，该书出版时适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对来访的中共朋友说：「我书中的资料说，邓小平于暴动开始不久就逃跑了。这个问题中共历史上有过争论，我倒想听听邓先生本人的说法。」来访者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寄一本给邓小平同志，附上一封信，说明你的希望。」因此我寄书给邓，没有附信，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小平先生，请就广西暴动部分赐教。」不久，中共在香港的一位负责人来看我，对我说：「你的信中央收到了，我们希望你回国看看。」我说：「我没有给中共中央写过信。」后来我明白了，他所指的就是我在书上写的那一句话。当时正是冬天，我对这位负责人说：「我在香港住惯了，香港天气温和，北京太冷，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北京啊！」我语意双关，不知这位来访的先生是否理解。

当时，海内外对中共的改革开放期望很高，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共的宴会，席间朋友们不免谈起往事。我说：「我在延安时，林彪还是不错的。」坐在我旁边的是《大公报》总编辑，他重重地踩了我一脚，因此我不再说下去了。

许多中共干部经过香港时，通过不同的渠道来买书或看资料，其中有很老的朋友，也有新朋友。例如，四人帮倒台后的香港第一任社长王匡，他就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朋友。奇怪的是，有的人来看我。又嘱咐我「不要对别人提起」，又向我打听「别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偷偷摸摸地与我交往，这使我感到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阴影。也有人对我过去在党内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不过他是这样说的：「我在『文革』期间受的迫害比你惨得多啊！向前看吧，不要再纠缠老问题了。」另一位老朋友说：「你过去在党内所受的打击，是王明路线的错误。」这句话与苏联朋友说的「你过去所受的打击，是毛派的错误」，两者的措词、造句、逻辑完全相同。

这些来访的朋友中，有的对我采用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其中有人一面争取我回国，一面又在他们的报纸上骂我是「苏修」。

香港新华社前任副社长祁烽，虽然较左，但有原则。私下对我说，他认为对我的两面手法是不对的。

1979 年 4 月中共提出「四项原则」之后，5 月，我给邓小平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改革开放的四项原则应该是:「言论自由，组党自由，全国大选，实行法制。」他没有给我回信。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公开演讲中，继续表达了我和中共不同的观点。1980 年 4 月，我在浸会书院主办的香港与广东研讨会上指出，没有自由的香港就没有中国的四个现代化。1981 年 2 月，我在香港笔会讲到关于审判「四人帮」的问题，我说，审判的应该是产生「四人帮」的制度。1983 年 2 月，我在香港大学讲「中共的文艺路线与文艺政策」，我认为文艺创作依靠自由，讲路线政策就出不了好作品。

当时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期待和保留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是「打倒走资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帝反修」，「反对霸权主义」，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两个凡是」也被否定了，改革开放上台了。但是，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专制政权，社会主义这块招牌是丢不得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幽灵还是要拜的，一党专政当然更是不能放了。因此，在 80 年代，一时来一个「清除精神污染」，一时来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时来一个整党运动，一时来一个学雷锋运动。今天说保障个体经济，明天又说加强公有制度。许多共产党的豪门后代、领导人的亲信转眼成了腰缠万贯的资本家，贪污腐败横行。改革开放成了中共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共产党的官僚从政治的特权进一步享有经济的特权。

1980 年 6 月间，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社长陈鸣，给我一份在四川发现的陈独秀的书信资料。他问我对陈独秀的看法，我说我很尊敬独秀先生。他没有发表意见。随后，有关陈独秀的资料，由「展望」首先独家发表，不久中国大陆也引用这些资料，当时中共内部对于陈

独秀的评价仍有争议，我们「展望」被中共利用作了政治气球。后来陈鸣又给了我一份有关刘仁静的资料。刘仁静是中共的「一大」代表，后来参加托派，在中共建政后屡受迫害。这份资料中说，「四人帮」倒台后，中共落实政策，给刘仁静分配了四室两厅的房子。资料中还附有照片。陈鸣给我看这些资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的用心我是很感激的。

香港是我从中国流亡后事业上起步的地方，也是我一生住得最久的地方（33 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出生在大陆，而香港是我迈向自由的港口。我爱香港，我爱自由的香港。

第十三章 我的台湾老朋友和蒋氏父子

我早年是共产党员，所以我最初认识的台湾人也是共产党人。我记得 1938 年在延安（当时的中共政治中心）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第一位台湾人是蔡前（又名蔡孝乾），他教过我几句日文。他参加过红军长征。中共在大陆打败了国民党，蔡被派台湾担任领导，不久被捕自首，还在台湾置有产业，后来病死于台湾。当时中共有几个名称不同，没有横向联系，各自独立活动，由上级单线领导的台湾地委或特委。我不知道蔡前是属于哪条线的，也不知道现在中共对台工作的领导方法是否仍然如此；但是，这种领导方法，确有一种作用，一条线被破坏，不至影向其它。

抗日战争期间，我担任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由于朝鲜义勇队与台湾朋友之间有密切合作关系，所以认识了许多台湾朋友。

李纯青、李万居、李友邦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有两位台湾朋友都是日本问题专家。

一位是谢南光，重庆时，他在国府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日本，这个机构当时是蒋介石关于日本动向的咨询中心。谢南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非常乐观。他说，现在我们要考虑，中国的未来，朝鲜的未来（当时我在朝鲜义勇队工作）台湾的未来乃至日本的未来，都要研究。我问到台湾，他说，这件事首先要我们自己谈谈。他又说，东方人的团结很困难。例如我们这里都号称反对日本军阀的两个日本人（指重庆的鹿地亘与青山和夫）就是一个人一个党。我后来听说谢南光组织过一个「台湾民主联盟」，再后来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我的另一位台湾朋友，也是日本问题专家的是李纯青，他当时是「大公报」的主笔。他是一位很认真思考的学者。由于「大公报」在中国高层的影响力大，李纯青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他入党时我已经

退党，但因为我们私交很好，常来常往，私人间有时也讨论一些政治局面发展趋势问题，我说他是书呆子，他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深入。中共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后，谢雪红为主席，纯青为副主席，后来他们都被整为右派。

我和李万居的初见也是在纯青家中，时间是 1947 年，这一年国共内战全面展开，上海人心动荡，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当时国民党捕人，时有所闻，我们三个人，纯青毫不隐讳，谈他的中共观点。我是中共的脱党分子，当时从事和平运动，国共都视我为敌。李万居说，他是青年党，国民党和他们貌合神离，台湾人视他们为「半山」，在「二・二八事件」中，两面都打击他。在那严重危险的环境中，我们三个人观点不同，谈笑自若。这是很不寻常的。

我和连震东初次见面，是 40 年代初，地点在重庆中华路的台湾义勇队办事处，在一起的还有谢挣强（后来的高雄市长）等。连震东当时抱着一个娃娃，看来十分活泼可爱。这个娃娃，就是后日的连战。连震东显得十分拘谨。当时他在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身着二尺半「大兵装」，生活刻苦，正因为如此，我对他印象不错。虽然当时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连震东顿成台湾高官，连府也成了台湾的豪门贵族。我在七十年代应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之邀参加学术研讨会，连战代表该中心主任杭立武接待我，态度友好热忱，我很感激。

我在 1942 年春，日军进攻浙赣之役和李友邦在逃难之间，共过患难。

李友邦早年是黄埔军校学生，在校时参加过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1924 年组织「台湾独立党」，又名「台湾独立革命党」。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一直以国民党的身份从事公开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李友邦在国民党的经济支持和共产党的政治支持下组织「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为了获得蒋介石的更多支

持，他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国民党。李友邦担任台湾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6 年 10 月，我第一次到台湾，对台湾的印象是，山水迷人，风景秀丽，整个台湾就像一个大花园。台湾受海洋文化影响比大陆为早，我感到台湾的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均较大陆为高。

初到台湾，见到好友丘斌存（当时台湾的财政厅副厅长）、谢东闵（当时的台湾省合作金库总经理）等。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台湾政客谈话中是非很多，谢东闵为人最为厚道。

我很想见见一位老朋友李友邦，打过多次电话，没有联系上，后来我就匆匆离开台湾了。

1947 年 2 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李友邦的旧部（包括义勇队和青年团成员）被牵连者不少，李本人并未参加。但被情治单位指为「幕后操纵者」。1952 年 5 月，李友邦以「匪谍」的罪名被处决。当时所谓「匪谍」就是共产党。现在事过 50 多年，一切真相不怕交代清楚了。李友邦和共产党的关系早在 1924 年，为什么他能在国民党不断升官，一直升到中央委员；李友邦组织「台湾独立党」也在 1924 年。不难想象，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认同台独的。李友邦是个很热心而有抱负的人，国共都利用过他。他的命运死于国或死于共都有可能。

雷震引见蒋氏父子

1950 年我们在香港举行双十节纪念会，在当时赤潮汹涌下，被认为是很大胆的。而双十节这样的会，应该是由国民党召开，居然国民党的宣传机构连报导也没有，而台湾报纸刊登的都是外国通讯社的译稿。此事在台湾上层引起注意，蒋介石问他的左右，主持香港纪念会的马义（当时我用此名）是何许人。他的周围无人能答。后来我的《斗争十八年》出版，蒋介石身边的人也对我有了了解，知道我是香港「第三势力」。其时台湾新败，既恐共也恐「老三」。台湾甚至认为，

我们在香港举行的会，事先不通知国民党当局，不但是不妥的，甚至是令人怀疑的。

香港的第三势力在美国的鼓励下展开，国人流亡香港，有欲去台湾而不为台湾当局接纳的，有虽为国民党欢迎却不愿意去台湾的，有政治上与国民党或蒋介石个人存有芥蒂的。人们对台湾的前途充满怀疑与担心，香港谣言满天飞，而这些舆论多是不利于国民党和蒋氏家族的。

其时，雷震还是蒋介石的主要幕僚，他就海外的民主运动，对蒋作了分析。于是蒋介石派雷震到香港，拉拢中间力量，宣传国府团结反共的立场。雷震到了香港，周旋于各种政治派系之间，耐心说服，的确很费了唇舌。他是我所见到的第三位国民党高级人士。我在重庆办《自由东方》杂志时，孙科的秘书司徒德曾把我引见给孙科和王世杰。当时孙科是国府立法院长，王世杰是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司徒德是孙科的秘书，也是《自由东方》名义上的发行人。他给我引见高官，出于他的热心，老实说，当时这两位高官心目中并没有我，我的心目中也没有他们。他们是官僚，讲了几句官腔。我是一个目空一切的青年，我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我在香港见到雷震，他比我大 22 岁，应该是长我一辈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认识的国民党高官中第一位我所尊敬的朋友。

1954 年，我和丁文渊、徐訏等应雷震之邀访台观光。这次访问，我们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期间有国民党为蒋介石举办的祝寿活动。主人既如此安排，我们出于礼貌，也就在蒋氏的祝寿簿上签了名。这事在香港引起第三势力朋友的大哗，《自由阵线》社论的题目是「观光乎？祝寿乎？」有人把我们看作是向蒋介石投降，对第三势力的背叛。

到达台北的当晚，台湾烟酒专卖局为雷震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欢迎我们，可见当时雷震是颇为吃得开的。在这个宴会上，我们认识了国民党第六组主任（相当于共产党的统战部长）唐纵。于是唐纵安排我

们与蒋介石见面。第一次是我们和多位侨领同时见蒋，蒋氏快出现时，有一位不大不小的官儿，像个猴子，一个箭步跳到我们面前叫道：「总统来了，快拍手呀！」我们几个朋友会心一笑，礼貌地两手合十。我们当时对于蒋氏还是很隔膜的，这个「猴子」的表演很令我们反感。这次会见因为人多，我对蒋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我第二次见蒋是单独接见，当时由楚崧秋记录，我不记得具体谈了些什么。蒋介石的态度很认真，他在谈话中还引用了我在香港《自由人》上发表的文章。如果说，第一次我对蒋缺少尊敬，那么这一次我对他产生了敬意。他虽然是在向我发问，但我明白他的真正用意是在探讨国民党大陆失败的教训。

第三次约见，是总统府发来一份油印的通知。在这同时，有一位女士要接我去游一个什么温泉，我想，蒋的约见既是油印的通知，一定是很多人，没有意思，不如佳人的约会有趣。结果我选择游了温泉。事后我才知道，蒋的接见在台湾是件大事，偏偏蒋先生在接见众人时又问起了我，怎么我不去呢？大家都不理解。

第二天，总统府交际科的一位科长找我说，总统见我没有去，要单独和我一谈。他用车接我到中山堂，蒋先生和蒋夫人都在座。蒋夫人态度傲慢，我也自命不凡，没和她搭一句话。蒋介石则对我作了很多鼓励，他的风度是很好的。

蒋单独见我以后，台北的《民族晚报》（《联合报》的前身）曾刊载一篇刘晴（马克任夫人）对我的专访，中央社发了消息，香港报纸登出来了。于是有人写文章说：「司马璐要在台湾做大官了。」

第一次见蒋之后，记得也是唐纵的安排，我们见了陈诚。陈诚客气地说：「我的胃病还没有好，不能陪你们，非常抱歉！请你们到处走走，请你们多多指教。」主人既不多说，客人也不便多问，场面很沉闷，不久我们就告退了。后来我理解，当时陈诚不愿多谈，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他和蒋经国的矛盾。

在蒋经国家中作客

我在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出版以后，王新衡就给了我一封信说我的书在台湾相当轰动，也邀请我访台。

这次我到台湾后，由王新衡的安排，我们又见了蒋经国。王新衡是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也是蒋经国的密友。我和蒋经国见面次数较多，有在他的办公室，有在长安东路他的家，有在王新衡的家。有一次在新衡家，经国夫人方良女士穿着拖鞋也来了。当时海内外盛传蒋老先生安排经国接班，我笑问新衡确否。新衡回答：「不可能，经国也无此能力。」多年后经国终于做了总统，我又问过新衡：「记得当年你说过经国无此能力吗？」新衡回答：「我怎么知道经国如此能干！」我这时才理解王新衡的政治艺术，相当高明。他说「经国无此能力」当时实际上是为蒋经国排除政治阻力；他说「我怎么知道经国如此能干」，才是真正宣传蒋经国的。

有一回我问王新衡：「以你和蒋经国关系之深，为什么不做大官呢？」王答：「我以朋友身份对经国的建议有用，倘使我做了官，我的话就不能发生多大作用了。」实际上，王新衡利用立法院的影响力配合蒋经国，对蒋帮助很大，王新衡退休后终日打麻将，「三张一王」作四方城战，「三张」即张学良、张群、张大千，王即王新衡，王新衡晚年的牌局，时人称为一项「政治麻将」。

又有一回在经国家中，魏景蒙在座。魏景蒙当时等于蒋经国的国际关系顾问，他手上拿着一份海外杂志对我说：「这里有篇文章说，蒋经国是个独裁者。」随后他摸了摸经国的头，笑对我说：「你看，他像个独裁者吗？」我记得在台湾时随魏景蒙游乐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有一次他带我去一家私人俱乐部，一进门见到美女如云，令我眼界大开，领班的小姐一声：「魏三爷来啦。」全场的小姐蜂拥而至，等到坐下时，左右前后被团团围住，变成不是小姐招呼客人，而是客人要侍候小姐了。我想到「红楼梦」里的怡红院，贾宝玉的日子不知怎么过的？别人对我说，魏三爷也带蒋经国出入过这种风月场所，但我没有

亲自见到过。

魏景蒙当时是蒋经国的国际问题顾问。60 年代初，中苏共关系紧张，美国争取中共，台湾担心被美国出卖，也暗中与苏联打交道；当年代表蒋经国与一个化名路易士的俄国人常接触的就是魏景蒙。苏联瓦解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有魏景蒙和路易士的谈话记录。

整体而论，我对蒋老先生的印象是，他威仪严肃。我对陈诚的印象是，他很拘谨。我对蒋经国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国府兵败大陆退居台湾后，重视教育，培养青年，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

香港有三条主要马路，英皇道、皇后道、太子道，当时我们谈到国民党派系，把接近总统府的称为「英皇道」，接近蒋夫人的称为「皇后道」，接近蒋经国的称为「太子道」。老蒋的亲信徐复观公开说过「保皇不保太子」。

国民党的神秘人物——徐复观

当年，国民党这位拥老蒋而反小蒋「保皇不保太子」的神秘人物徐复观，又名徐佛观，是国民党一位有学问而又富于传奇的人物。抗战期间，我初见徐复观于延安，当时他是蒋介石驻中共的代表。1946 年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系统中统、军统合并，称中央联合秘书处，蒋介石自兼主任，徐复观为副主任兼秘书长，当时被称为国民党最高的特务头子。1949 年 1 月，蒋介石由总统任上引退，据当时报纸消息，随蒋介石去奉化的仅蒋经国、徐复观二人。1950 年我在香港再见到徐复观，他当时代表蒋介石慰问从中国大陆逃亡到香港的知名文教界人士，我的朋友中不少都收到他的一份礼金，他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这是我代表蒋总统的一点意思。」

在这同时，徐复观在香港办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和「民主评论」杂志，与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共同发表捍卫中国文化的宣言，这时他以谈儒家学术为多，后来他对我谈起他是熊十力的学生。有人说他留学过日本，当过红军，我对他最有兴趣的是，他

怎么会成了蒋介石的亲信，他不讲，我不便问。有一次，话题谈到他在延安为蒋的代表的一段往事：蒋介石曾经命他调查陕北有多少共军，他当然不能直接问中共当局，于是借口参观边区棉织厂，共方不疑有他，带他去了，他发现产品中有种毛巾上印着「边区人民军爱民、民爱军」的字样，他说这种毛巾好，共制了多少，共方又不疑有他，实说了，他根据这个数字估计上报蒋，后来蒋经过其它渠道核对，徐复观的数字正确无讹。

后来我听说徐复观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好，我问过徐本人，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在奉化时，我向蒋提出国民党改造，蒋同意，嘱我写改造计划，我写好给蒋，后来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按我的计划做了，改造委员却不包括我在内，而且要我去重办党员登记，我怎能接受这个事实，蒋气得把一只玻璃水杯都打破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复观是 50 年代末，在台湾东海大学，我问他一个问题：「我听说孙立人事件你是策划者之一，而且，孙的政变如果成功，你是秘书长」。徐复观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今天的台湾无人反对蒋先生，今天的台湾，需要蒋先生」。

后来，徐复观与中国大陆的往来渐行渐密；他和蒋氏父子的恩怨，外人难以置评。

我因雷震案与蒋经国决裂

我经由雷震和唐纵的引见而认识了蒋氏父子，后来由于雷震对蒋氏的进言过于直率，雷震所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渐成一股势力，蒋氏父子与雷震的关系闹得很坏。我每次到台湾，雷震请我，蒋经国也请我。我对雷震表示，需要耐心说服，争取蒋氏父子接受民主。我对蒋经国说，唯有民主才能团结一切反共力量。雷震和蒋经国对我的话都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热情反应。我在最后一次与蒋经国的谈话中对他说：「假如在台湾出现胡适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公开竞选总统的场面，对大陆人民必富有很大的吸引力，国际上也会另眼相看的。」

我的这个主张，不但对蒋经国当面说过，在 1959 年又在我主持的《展望》杂志上开展了「拥护胡适做总统」的讨论。于是共产党的报刊当时就送了我一顶「拥胡倒蒋」的帽子，继而又把胡适同第三势力拉在一起。其实胡适对政治很淡泊，甚至规避，与第三势力更没有一点关系。

雷震在台湾的处境日非，我的同情渐渐倾向雷震，写了公开支持雷震的文章，从此我和蒋经国不再来往了。不过，在道义上我暗中做了一些偏袒蒋经国先生的工作。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蒋经国接班的形势渐成，香港有一帮人专门写文章骂他，甚至还有人借此敲诈。我认为这不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凡是我碰到这类事，或做劝告，或不予理睬。

有人一向攻击蒋经国，说蒋经国曾加入过共产党，他「始终是个共产党」。经国逝世前，连国民党复兴社的邓文仪在纽约也对我这么说。我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蒋经国没有向国民党自首过。我说，我也没有向国民党自首过。我又告诉他一个事实：当年向国民党自首过的共产党人，根据中共党史的记载，他们多数是忠诚的党员，他们的自首是中共同意的「假投降」。

1960 年，李敖在台湾《文星》杂志掀起东西文化论战，流弹伤及胡适。我又卷了进去，并为此开罪了另一个胡。我和胡秋原相识多年，他在他办的《中华杂志》写了几千字骂我，宣布和我绝交。有人问我：「你和胡适有什么关系？」我答：「我与胡适从不相识。」我只与胡适有过信函的往来，并未谋面。我绝不想因尊此胡（适）而伤彼胡（秋原），但是我的「二胡」没有拉好。

1960 年，雷震等在台湾筹组「中国民主党」，我曾为文赞美欢呼，认为这是中国民主的一件大事。9 月间雷震被捕，我得到这个消息黯然泪下，又写了支持雷震的文章。在这同时，有一些反对蒋经国的人，宣传蒋经国一旦在台湾执政，必改挂五星旗投共。而另一些要给雷震罗织罪名的人，坚称雷是共产党。上述说法我皆斥其非，结果我两边

不讨好。有的朋友听了我的话，睁大眼睛看着我，笑我爱介入政治而又不识时务。我认了。

70 年代，我应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之邀访台，当时民间对蒋经国颇有好评，认为他的思想能接受新东西，不断有进步。不过 70 年代末期，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当局镇压异见人士，蒋经国依然有责任的。1987 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报禁党禁，解除台湾戒严令，对台湾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作出贡献，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凭悼台湾民主播种者先驱

1998 年，我和戈扬应友人陈宏正之邀访台。我们选择在 11 月份访问，以便有机会看一看台湾的选举。我们到达台北时，感到台湾到处喜气洋洋，像嘉年华似地火热。我们询问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选举的看法，说明台湾人的民主意识已经趋于成熟。国民党、民进党竞选之初，以国民党掌握传播媒介之多，政治资源之丰富，政治明星知名度之高，一般人是看好国民党的。而选举的结果，民进党获得大胜。依我的看法，这是民进党的胜利，也是国民党的胜利。因为在国民党执政下的台湾，完成这样公平的民主选举，这就是国民党的胜利，这也就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看了台湾的选举，我们感到。应该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凭吊早期为台湾的民主而奋斗的仁人君子。胡适、雷震、殷海光、郭雨新诸先生，是台湾民主的先驱者。

12 月 9 日，我和戈扬到达南港中央研究院，在研究员钱永祥先生引导下，我们参观了胡适纪念馆和胡适故居。在纪念馆中，我们见到胡适的手迹和他的著作的原版本。胡适的故居有三间卧室、一间书房和一间大客厅。我们在胡适遗像前沉默良久，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代哲人走过的道路。

胡适祖籍安徽，1891 年出生于上海。次年，胡适的父亲胡传赴台湾，就任台湾府的官职。胡适两岁的时随母亲到台湾，先后居住在

台南和台东，1895 年离开台湾。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从小受过台湾的哺育，应该说他也是台湾人民的儿子。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在台湾逝世，参加遗体告别的有两万多人，台湾各地举行公祭，有一百多个团体和三十多万人参加。胡适的遗体安葬时有一万多人来到墓园。台湾人民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通过对胡适的崇敬，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容我如此说，台湾的民主能有今日的成就，胡适是最早的引路者。胡适思想是一种尊重事实，用假设求证的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问。他认为，主义和教条是人类进步的危险。胡适思想是一把钥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开动自己的思想，发挥个人的才能，维护个人的尊严，通过独立思考面对现实的问题。

我们在胡适墓园读到毛子水教授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严，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蔽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们凭吊过一代宗师胡适后，再到自由墓园。这里长眠和安息着当年《自由中国》的一群园丁。

1949 年 11 月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台湾早期民主自由的火炬。《自由中国》创刊时，发行人是胡适，雷震为社长。马之骕在《雷震与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除上述二位之外，还有夏道平与殷海光。夏道平形容胡适是《自由中国》的保护伞，雷震是火车头。我更认为胡先生是传播福音的使者，雷先生是民主运动的苦行僧。」

曾经担任过《自由中国》文艺编辑的聂华苓，在《忆雷震》一文中记述道，雷震原是个恨铁不成钢的国民党人。当年参加《自由中国》的人，有些人认为雷震是国民党官僚，对他采取怀疑的态度。但是雷震「所受的压力愈大，他的干劲也愈大。」1956 年蒋介石 70 寿，《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以其坦率直言，遭当政者不满，备受折磨。

1957 年 6 月，《自由中国》发表了朱伴耘（朱养民）的《反对党，反对党》的文章，其后朱氏陆续发表到《七论反对党》，时贤回应者众。

1960 年 5 月，雷震邀台湾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座谈检讨地方选举，并成立改进委员会，属于「党外人士活动」。及至筹备组党，雷震等于 9 月 4 日被捕，时称「雷案」或「《自由中国》事件」。原计划于 9 月底成立之「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

因「雷案」同时被捕之一马之骕认为，「雷案」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雷震与本省人士组织起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雷案」发生后，海内外为之震惊。雷震被判刑十年。诚如殷海光所说：「自古至今，多少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生命。这些人当时不是被咬定为叛徒吗？时过境迁，那些咬这些志士为叛徒的人，确替历史留下了人类自私、愚蠢和黑暗的记录。」

我和雷震的相识是 1951 年，其时我在香港主持自由作家联谊会。雷震到香港，是蒋介石派他来团结海外反共人士的。雷震的日记中写道：

「2 月 3 日，上午十时约马义谈话……予劝其多联络反共人士，但要慎防不许共匪混入，而反共不必彼此相消，要团结始有办法……」

我最初访台湾，也是经由雷震安排的。后来雷震被捕，我见到消息，不禁下泪。雷震生前已自购一块墓土，称为「自由墓园」。后日，

雷震和《自由中国》战友殷海光、夏道平等相继逝世，同葬「自由墓园」。这些死后同穴的民主战士，我向他们的墓碑一一行礼致敬。

我原定还要拜访另一位朋友——郭雨新先生。雷震发起的「中国民主党」虽未正式成立，有关记录称郭雨新为七常委之一。郭雨新早年组织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等，后日台湾民进党领导人如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以及郭雨新生前的秘书陈菊女士，都称郭雨新是「台湾的民主导师」，「台湾民意的领航者」。张俊宏为文挽郭先生曰：「他确是像一个孤单的园丁，熬过了苦旱风霜的长夜……」

我在香港办《展望》杂志时，曾刊载过郭雨新的文章，其后我们常通信。1977 年，郭雨新到美国出任「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主席。

郭雨新是台湾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他担任过 25 年台湾省参议员。台湾人说，在那个时代，台湾哪里有灾难，哪里就见到郭雨新，他是国民党独裁时代，在国民党体制下坚持不懈的用和平合法的斗争，为人民争取福利的。他和雷震，李万居，高玉树，吴三连等同为台湾的中国民主党发起人。

郭雨新是我在香港所办的「展望」杂志的长期读者与作者。我到美国后，我们常在电话中畅谈。郭先生表示，他将终生奉献给台湾民主运动。在台湾同胞的支持下，他曾不顾一切艰险自己站出来和国民党竞选总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是试试国民党的气度，二是为年轻人起一步带头作用。后来我们相约聚华盛顿畅谈，不久郭先生逝世。我深情地怀念这位从未见面的台湾政治家，他的言论是台湾的良心，他的行为，他的政治素质是台湾人民的榜样。台湾民进党领导人多数为年轻一代，我所知不多，但是据说许多都是郭雨新的学生。1983 年我移民美国，约期晤谈，不幸他在 1985 年逝世。

第十四章 访问西德、东欧、苏联

「文革」期间在香港。开始时，我著文指出，这既是一场权力斗争，又是一场思想文化的斗争。这个斗争很像两个人下棋，一方渐告不支，把棋盘一推，站起来卷一卷袖子说：「我们改比拳头吧！」

以对《海瑞罢官》这戏的讨论为例，双方开始谈戏，进而谈到历史的真实性，进而又谈到对清官的态度问题，进而联系到现实，谁是今天的清官？谁是今天的海瑞？谁是今天的皇帝？开始时借古讽今，进而就发展为一场真刀真枪的政治权力斗争了。

文革初起时我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统治阶层进一步的分化，中共教条主义进一步瓦解的历史闹剧。如上所述，在「文革」中被清算的正是过去正统的左派和功臣，「革命派」是教条主义者，「反革命派」也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与教条打架，教条主义者跌进自己挖好的陷阱。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传统的宗派斗争的一部分，「根据地与军队的党」对「白区的党」的山头之争。一切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都要产生自相残杀，清算彭真与「三家村」事件是这个制度必然的悲剧。

我曾呼吁，要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讨论，讲道理，摆事实，不要对政敌施以迫害，更不要杀人。我呼吁共产党人保护党内的反对派，保护全国范围的一切政治反对派，只有如此，中国才能避免冤冤相报，才能避免清算的悲剧，流血的灾难。我虽和共产党人信仰不同，但是少死一个自己的同胞，多保留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为国家的未来多保留一分元气。

「文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共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给刘少奇定罪的文章，题目就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于是我写了《论真假爱国主义》。我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爱自己的国家，正因为我们深深地理解到，我们必须、我们应该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我们爱国的情操完全是自动自发的。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是崇高的爱国行为。」

1966 年 9 月 5、6 两日，《展望》杂志社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演出田汉的《谢瑶环》。这是一部古装歌剧，故事写的是武则天时代的宫廷斗争，谢瑶环为民请命，被迫害而死。这次演出非常轰动，在剧中饰演王椒的就是后来的影帝郑少秋。导演是吴铁翼。

《谢瑶环》的公演，有各国外交官及记者到场，他们有的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印度专员，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曾随尼赫鲁访问北京。这位印度专员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尼赫鲁访问北京时，希望减少官式应酬，多作私下交往。当时中印友好，中共作了安排。可是林彪的夫人叶群和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在印度人面前互揭对方的短处，所以尼赫鲁有个印象，中共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1966 年 9 月，加拿大进步人士丁文（F. Dingman）访问我，他问我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如何。我说：

「在思想上和运动上，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但由于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爆发往往是地方性的。共产主义常常兼具民族主义的色彩，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要求的重点常常是会转化的。」

应布兰特之邀访问西德

1966 年 11 月，我访问西德。在此之前，香港的西德总领事馆将我的《中国和平演变论》印成德文，引起布兰特的兴趣。东西两德的分治，和中国的情况颇为相似。布兰特当时是外长，后来担任了德国总理。

我在波恩见到布兰特时，主人对我除了礼貌性地表示欢迎之外，

显得非常谨慎小心，对于中国的事只听不说。布兰特说，德国人民愿意重见统一，绝对反对武力统一，绝不容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

接待我的朋友问我，愿不愿意同王殊见面？王殊当时是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西德活动的，实际上是中共非正式的外交代表。他后来担任了中共驻西德大使。我回答无所谓。于是他们设法安排，可是王殊没有答复。据一位西德朋友私下对我透露，在我还未到达西德以前，王殊即不断向西德外交部表示「关切」，希望了解我这次访问西德的真正目的。

当时台湾国府也有一位非正式的外交代表关先生，他直接向我表达对我此行的「关切」，并邀请我回香港以前，先到台北住几天，我没有去。

关先生告诉我，王殊以「记者」的身份作西德中共地下外交活动，一洒千金万金，我们台湾就远不及对手了。

关先生请我吃莱茵河的活鱼。席间有一位荷兰前共产党员，名字记不得了，他说他在苏联曾与林彪同学，他了解林彪与苏联的关系不比寻常，林彪上台后，会同苏联重修旧好。在那个以林彪为「副统帅」反击「苏修」的年代，他的见解是非常独特的。

我访问西德最大的兴趣是想了解，经过法西斯统治的德国。二次大战又经过重大破坏，战后西德的民主化进程何以能较其他新兴国家为快。我所获得的结论是：第一，德国的民主传统；第二，科学基础与人才储备；第三，教育的普及；第四，以苏联与东德为对立面，反其道而行；第五，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在同德国人的交往中，也有少数人还相当赞美希特勒，他们把希特勒和毛泽东说的一样伟大，令我啼笑皆非。

德国人又通过一个阿拉伯团体安排我到东柏林玩了一天，东柏林萧条，贫穷，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可吃，与西柏林相比，真是两个世界。德国人又对我说：安娜王（即王炳南的前妻）正在东德，问我要不要

见她，我说「不必了。」德国人认为，接触可以增进了解，了解可以改变对方。

据我的观察，德国人的性格是综合型的，他们是哲学的，科学的，又是艺术的（特别是音乐的），表现在哲学上的是他们的理智、冷静和逻辑性，表现在科学上的是他们的认真、系统、精致和准确，表现在艺术上的是他们把美术和音乐看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在柏林、汉堡、慕尼黑都看过歌舞，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柏林看描写中国的西洋歌剧《图兰朵》。故事是一位中国王子在欧洲爱上了一位奥国的公爵小姐，他们结婚了。王子继承了王位，但奥国小姐在中国的皇宫中虽享尽荣华富贵，却缺少自由，最后仍然回到自己的国土。这个戏把中西文化揉和在一起，场面热闹，笑声不绝。不过饰太监的演员似乎太夸张了些。

12 月 5 日，从西德到了南斯拉夫的布尔格莱德，分别访问了南斯斯拉夫通讯社、作家俱乐部和《战斗报》。南斯拉夫是东欧比较开放的国家，我对《战斗报》的 Simil 先生说：「在南斯拉夫，何以不能私人办报和组织反对党呢？」他回答：「南斯拉夫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私人办报和反对党就没有必要了。」

12 月 13 日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这个城市的建筑很美，不过多已年久失修。匈牙利人具有东方蒙古人的英雄气慨，蓝色多瑙河的浪漫主义结合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色彩。这里的人民彬彬有礼，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东方人的口味。匈牙利的土豆、西红柿烧牛肉，价廉物美，有中西餐结合的特色。

12 月 19 日我抵达捷克的布拉格时，已是晚上，我们乘航空公司的汽车入市，市内多处街道没有电灯。捷克在东欧素以工业进步著称，这个最初的印象，太使我意外。第二天我游览全市，除了中心区，大部分地区都很萧条，很多商店闭着门，橱窗和货架上满是尘埃，走过几条街都是这种景像。后来我在「展望」杂志写道：「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我到处可以看到有说有笑的人民，在布拉格，很少见到人们

有笑容。」「大多数捷克人不苟言笑，全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在一个国家里，人民过分的沉默是很可怕的。我有一个大胆的预测，这个国家可能发生巨变。果然，一年以后，捷克人民打破了沉默，布拉格咆哮了！

我结束西德、东欧的旅行后回到香港，各大学纷纷邀我演讲，一时成了忙人。

1967 年 6 月 14 日，我应邀在香港大会堂以「中国人应该如何爱中国」为题作演讲，我提出，我们要爱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中国，左右一家的中国，以人民生活为重的中国。我提出十六个字：经济突出，生产第一，专家挂帅，和平至上。不久，我又应邀在香港大学就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发表演讲，当时「文革」已影响到香港，学生中也有类似「红卫兵」的组织。我的演讲着重谈一些历史事实。

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与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在苏联，可以追溯到列宁对普列哈诺夫和孟雪维克的斗争。斯大林在 30 年代的大清洗，拉迪克的被杀，日丹诺夫的文艺政策，都是以清算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在中共，陈独秀的被清算，土地革命时代以「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罪名被杀者成千累万，其中反对派的头子，也多数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以一字一文招杀身之祸，冤案冤鬼冤魂遍地，数字之多无法统计。1942 年的延安整风，中共建政之初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清算胡适思想，「《红楼梦》事件」，「胡风集团事件」，直到 1957 年的「反右」，都是政治斗争，也都是「文化革命」。

我讲到这里，还没有正式谈到文化大革命，台下就有人喊「打倒」；我再讲下去，台下就有人要我交待反革命罪行；我再讲，有人已经跳上台来伸出拳头。这个演讲无法进行了，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同学把我护送回家。第二天中共的报纸也说，我发表了反革命演讲。

在这同时，我出版《刘少奇语录》、《刘少奇选集》。我们的想法是提供读者客观的研究「文革」的背景。当时毛刘的胜负之势还看不

清楚，所以销路很广，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我出版刘著并不等于我同意刘少奇的思想，只不过我认为中国的一切反对派都应该受到保护。法新社说，《刘少奇语录》的出版是很公正的。伦敦世界新闻社报导，毛刘斗争，真相难明，香港出版的《刘少奇语录》揭开了这场你死我活斗争的一些内幕。日本《读卖新闻》把我称为「刘少奇派」。1967年夏天，中共分子组织的「香港斗争委员会」展开恐怖活动。我又首当其冲。1969 年 4 月 3 日，我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以「五四以来的中国政治」为题演讲，我说道：

「文化大革命有一积极意义，即证明中共仍未能解决中国问题。『红卫兵』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年轻一代对中共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中国是一个新的军人分据的局面，党治加军治等于双重的绞索套在人民颈上。中国历史的新课题是，反党治，反军治，中国青年要负起这个救国的责任。『五四运动』时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依然是今日中国政治的主流，但民主科学与独立和平不能分割，必须有独立（中国不能绝对依靠哪一个强国，造成一边倒）、和平（中国不可成为一个黩武的国家），才能有健全的民主科学建设。」

红卫兵火烧自联出版社

1969 年中共「九大」之前，《展望》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梅若秋的《毛林终将分裂》，一篇是洪冬青的《林彪将悲剧收场》。这两篇文章触怒了中共在香港的「斗委会」，因此发生了火烧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的事件。我们虽然受了些损失，可是这个事件第二天就上了香港中英文报纸的头条，图文并茂。这等于帮我们作了一次最大的宣传。中共「九大」之前《展望》还有一篇文章说，中共搞「文革」，有两个司令部。「九大」后《展望》发表评论，认为陈伯达将成为毛林斗争的代罪羔羊。这篇文章中外报刊争相传播，有外国通讯社询问如何得到这一内幕消息，我回答「无可奉告」。为此，中共的「斗争委员会」向我发出警告，「要我的狗头」。在此之前，香港商业电台广播员林彬为「红卫兵」活活烧死。

1972 年 7 月 27 日，我应邀在香港大专学生公社以「中国与中共」为题演讲，我在演讲中说：「中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对于任何不同信仰的政党，都应该尊重它。所以要了解中国与了解中共，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中国可以包括中共，但是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一个国家的代称，而中共只是一个政党的代称。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政党只是这个国家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和信仰的一个组织，所以在这个国家之内，拥护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都不能成为爱国的标准。」

我举出一个例子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一样有光荣的历史。毛泽东在他的词中说『江山如此多娇』，说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然也与中共无关。」

「文革」期间，由于香港得地利之便，加上我们的同人多数来自大陆，与中共的当权派、文革派、保守派都有些联系，从不同渠道得到一些数据。我们对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一视同仁，免费服务，并为他们保密。当时中共的情势一片混乱，「小道消息满街走，谣言闹到党中央」。我们得到大陆的来稿中有一首打油诗：

挨斗不要紧，千万别认真。过关举毛旗，我是过来人。

我们又学着这首打油诗在《展望》上做了一则广告：

常读新《展望》，把握大方向。挨斗好过关，不会再上当。

访问苏联

1969 年我应邀访问苏联，当时我在香港主持三个单位（展望杂志、自联出版社、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我在苏联时，对俄国人的落后与无知极感失望。苏联学者在和我讨论时，我坚持反对共产党的专政，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把党和国家分开。我的观点和苏联学者引起激烈争辩。

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出版过一些刘少奇的书。起初俄国把我看作刘派；由于我对俄国人强调中国人民的利益，俄国人又骂我是「大国沙文主义者」；又由于我既反对中共，也反对苏共，俄国人把我看作一个「怪物」。他们问我：

「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场？」我回答：「我站在人民中间」。

30 年代，中国左倾青年，歌颂苏联的歌曲「祖国进行曲」我们都能脱口而出，可以说，那个时代我们都很崇拜苏联。

我初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和我谈话。问我对学习与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天真地说，想到苏联学习。他笑着回答我说：「现在正是中国革命的高潮，在苏联的中国同志都要回国，你怎么可以去苏联呢？」后来我知道在这个时期内由中共安排到苏联学习的青年同志依然不少，他们大部分是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子弟，我当然不够这个资格。

我绝对没有想到，30 年后，我的政治态度完全转变，公开反对共产党时，60 年代应邀访问苏联。我也联想到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上宾」都是反共「反」出来的。

文革后期，直到四人帮垮台后的前期，中共在反苏修的宣传中，常常把我的名字和苏修连在一起；特别是中共在香港的报刊，一再报导说，我是苏修在香港的代理人。

我访苏是怎样开始的？

我在香港办「展望杂志」旗帜鲜明，我们支持中国的右派言论，我们呼应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60 年代前后，中苏共论战中，「展望」客观地介绍中苏共言论，也同时介绍修正主义。1964 年，我出版「中国和平演变论」，被香港德国领事馆译成德文。1966 年，我应西德外长布兰特之邀访德。1967 年 1 月，就接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信，邀请我访问苏联，参加 10 月革命 50 周年纪念。当时我颇多顾虑，复

信说，我现在很忙，以后再说。

1968 年 7 月，我又收到苏联通讯社（Novost, Press Agency）的邀请信，当时适值苏联红军血洗布拉格，我复信谴责苏联罪行。接着苏方又来信说：「你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对苏联诬蔑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希望你用自己的眼睛，到苏联亲自看看」。

在这同时，我听说莫斯科有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由王明领导的。我也收到一些旅居苏联的华人来信，希望和我做朋友，当时我推测他们可能与王明的活动有关。

因此，我决定正式应邀访苏，当时我因为出版「刘少奇语录」并出售其外文版权，获利不少，飞机票是自己买的。

1969 年 10 月，我开始访问苏联，也同时再访东欧。10 月 13 日，我到达莫斯科，住在留克斯旅馆，苏联朋友对我说，过去中共领导人在苏时，多数住在这家旅馆。他们给我看了替我安排的日程表，我说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王明，他们答应替我安排。

俄国人当时向我提出一个奇怪的意见，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你最好说自己是日本人，因为一般俄国人很恨中国人。」我说：「没有这么严重吧。」他们又提出：「你最好取一个俄文名字。」我说：「我像俄国人吗？」他说：「过去中共领导人到了我们这里，都有一个俄文名字。」我说：「我可不是中共领导人呀」。大家一笑，我当然也婉谢了。

我在苏联一共两个星期，旅行过四个大城市，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现称彼得格勒）、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塔什干等。我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都作过演讲。

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谈话

我在莫斯科大学演讲后，参加了苏联汉学家座谈会，又参观了东

方研究所。晚上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先生请我吃饭，费德林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令我惊奇的，他知道我是从香港来的，还用广东话和我聊。他说他懂得中国几种方言，还表演了几句，我连声称赞。

费德林不仅是苏联著名的汉学家，也是外交家，他曾经担任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代理苏联驻华大使，主管对华政策的副外交部长。他说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中国古典文学。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莫斯科著名的「北京饭店」。我说：「这儿的中国菜很好吃呀，是中国师傅还是俄国师傅做的？」费德林说：「过去中苏两国友好的时候，中国政府把最好的厨师派到俄国来，后来这些厨师都被撤回去了。现在这儿做中国菜的都是俄国师傅，你一定觉得不够地道吧」。我说：「很好很好，的确很好。」

他说：「俄国人做的中国菜和我自己说的中国话一样，『南腔北调』是不是？」

我说：「从香港看，中国人做的中国菜也变成『南腔北调』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据说中国也不易吃到好的中国菜了。」

他问我：「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如何？」

我说：「这是一群病人，一种人是狂热症，一种人是恐惧症，医生一时救不了病人，因为病人控制了整个医院……」

他笑笑说：「这些病人不仅在中国如此」。

我问：「你曾经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翻译，你还担任过苏联外交部主管对华政策的副部长，说说你的感想吧。」

费德林说：「你过奖我了，我那里说得上主管对华政策，我不过是一部翻译的机器。政治人物之间担任翻译工作，总是胆战心惊的。何况汉字的内容非常丰富，我的汉字表达能力是不够的。譬如『中苏友谊万古长青』这句口号，是激情的文学语言，在政治语言中，我的

表达能力就不清楚了。」

我说：「你的确是位文学家，尤其对中国文学造诣很深。」

费德林说：「说我是文学家不敢当，说我爱好文学你说对了。我崇拜历史上的大诗人，我崇拜俄国的普希金，也崇拜中国的屈原。在中国，我曾经到汨罗江研究屈原。我觉得，任何政治人物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只有伟大诗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我说：「你对屈原的评价，证明你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很深」。

他说他想念许多中国朋友。费德林还神秘地笑了一笑说：「我爱着一个人，不过，这是个秘密」。

我故意逗他说：「你爱的是毛泽东？是周恩来？是刘少奇？是王明……？」

费德林说：「不是，不是，你全猜错了。」他又瞇了瞇眼睛，笑说：「是红线女，你想不到吧！？」

饭后，费德林请我看芭雷舞，我对他说：「就我看过的芭蕾舞，若论场面的伟大，技巧的纯熟，舞姿的美妙，俄国的芭蕾舞是世界最好的。」

苏联有关中共的离奇传说

10 月 16 日我到了列宁格勒（现名彼得格勒），列城是由聂瓦河的一群小岛连接而成，市内桥梁特多，有古罗马式的气魄雄伟的建筑，古老的装饰，到处见到雕塑的艺术。这里街道清静，我到的时候雪花飘飘，枫叶纷飞，虽是 10 月的气节，已感到寒风刺骨。

第二天，我应邀在列宁格勒大学演讲，我说，我看过一些最新的出版物报导苏联较过去开放，有点自由化倾向，甚至有人指责你们是修正主义，我很感兴趣。不过在中苏边境纠纷问题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坚持维护中国主权的。这场演讲的主持人，列宁格勒大学历

史系主任指责我是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者。演讲后正要走出校舍，有一位列大的华裔教授从楼上匆促下来，自我介绍姓庞，他说有许多话要对我说，要请我到他家中吃饺子，我说，我的时间都排满了，加以婉谢。于是我们就在走廊上闲聊了一会儿。他对我发了一些牢骚，说俄国人对中国人有偏见，很不公平。

他说：「你这次访问苏联，是中苏关系恶化后第一位被邀请访问的中国人；你的立场公开反共，对于你，认为你是一位有争议性的人，我听说，邀请你的最后决定，是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他还对我说，中苏共之间过去一直很好，斯大林与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以来，就一直互通情报，刘少奇是亲美反苏的，周恩来是苏联真正的朋友，林彪一向骄傲，俄国人不喜欢他，但林彪最后还是会要修补中苏关系的。中共将来最有希望的领导人是林彪、陈云、邓小平这三个人的团结合作控制局面。

10 月 19 日，我到达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斯城是一个沿伏尔加河的长形工业城市，河上可见游艇，路上汽车也多。公园芬芳一片，这个城市是二次大战后重建的，令人有点新鲜气象之感。

在斯城，接待我的党委书记对我说：「这一年，我是第一次接待中国人。」我问：「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他说：「去年（1968 年）中共向我们购买了一批飞机，派人来点收。」我说：「你们和中共的关系，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已经够紧张了，你们还会卖飞机给中共？」他说：「这是生意嘛！如果你司马璐先生向我们买飞机，我们照样卖给你。」

10 月 22 日我到了乌兹别克的首府塔什干。这里到处有亚洲人的面孔，维吾尔和蒙古人很多，也有浓厚的中东色彩，伊斯兰风俗。这里盛产水果和蔬菜，我和乌兹别克人在一起吃大饼、汤面、牛肉汤。感受不错。

塔什干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负责人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他用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采访我。他要我对中国广播，我回绝了。他又要我去参

观一个在文革期间从中国逃亡到苏联的汉回人聚集的小镇，我也拒绝了。

我们在闲谈中，这位维吾尔人告诉我，王明的儿子是他的同事，也在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工作。他还说：

「毛泽东是个托派，在二战期间，毛与法西斯国家有秘密勾结。毛泽东认为，中国反日战争的失败，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早日到来。王明反对毛泽东的上术观点，毛泽东屡次想杀他或者毒死他……」云云。总之，苏联有许多有关中共的离奇传说。

我差一点做了另一个王明

回到莫斯科，我再向苏联朋友问：「我想见王明的事，安排好了吗？」他说「王明同志现在有病，你等着吧」。我问要等多少时间，他说两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我说「不行，我要回香港」。

第二天，苏联朋友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现在带你去见一位重要人物」。我问「是不是王明？」他笑而不答。

汽车开到一座大厦前停下，上了电梯，在一层楼下来，啊呀！真是气派非凡，我被安排在豪华的客厅坐下，我有些讷讷，心想这难道是王明住的？

片刻，翻译陪着一位衣着讲究，举止文雅，有几分像绅士一样的人进来了，翻译介绍：这是 XX 部长，俄文名字我听不清楚，我想问，但想到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把对方的姓名与职位问得多，是不太方便的。我只记得他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K」字。这里所记述的谈话，就以「K」代替这位部长，「马」代表我自己的。

K 问：「你为什么要急于见王明同志呢？」

我说：「第一、我过去在延安认识他；第二、听说他健康不好，想看看他；第三、据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消息，王明

正组织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我对此深感兴趣」。

K 问：「你想参加这个新的中国共产党吗？」

我说：「我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什么党也不想参加。我想看看王明，只是看看他，同时也想听听现在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K 说：「你自己现在对中国问题怎样看法呢？」

我说：「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

K 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这点我们和你的看法是相同的。」他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共产党是讲民主的，只有毛派不讲民主。根据我们的理解，你过去在中共所受的打击，完全是毛派的错误。」

我在听 K 叙述毛派的罪状，他的最后一句是：「一切反毛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后，K 突然问我：「你参加苏联共产党好不好？」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参加苏共呢？」

K 说：「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国际性的，很多中共领导人物参加过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你有这种顾虑」。

我说：「不行」。

K 说：「你既然对新的中国共产党有兴趣，为什么你自己不组织呢？」

我说：「我没这个力量」。

这时，我听到一句令我非常吃惊的话。K 提高嗓子对我说：「我们要你有力量，你就有力量」。我听了的确不知所措，连声说：「我没有这个力量，我没有这个力量。」心里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前中共党员，苏共一位中央负责人怎么可以和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我又想，难道十月革命后俄国人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

个说法吗？当时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

后来我知道，王明当时的确病得很重，他是 1974 年 3 月 23 日逝世的。所以，他的晚年著作「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 50 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等，是否完全由他自己执笔，我是怀疑的。

后记

70 年代初期，香港的中共报纸如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反复报导我访问苏联的消息，其中有夸大和编造的成份，也有些是事实。我相信，中苏共关系即使最恶劣的时期，他们之间仍然有秘密渠道互相通报。中共当时打击我的炮弹，可能是苏共方面提供的。没有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一般人是很难理解我和中苏共之间的这段险恶遭遇的。

我回香港以后，去加拿大看张国焘，对他谈到以上的事。张国焘说：「你想见王明，心力白费了。王明在苏共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利用价值了，苏共对中共某些领导人的利用，一向是很讲现实的。很多过去中共领导人被苏共利用过以后，就像斯大林所说的『榨干了的柠檬』一样，被丢弃了。」他说，我在苏联的奇遇并不奇怪。

我的访苏之行的唯一收获是，我看到和听到了一些中苏共之间的有关资料。相信当时中苏共关系破裂接近大战的传说是正确无误的。

第十五章 移民美国，继续学习

我在移民美国以前，当时在香港已有一定的事业基础，也有一点不动产业，朋友见我下了离港的决心那么坚定，都问我为什么？

我告诉朋友一些故事，当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时，倒有些依靠党，信赖党的惰性，以为只要跟着党走，没有别的想法了。1943 年我脱党以后，才认真的考虑到，要求生存只有靠自己的拼搏，创造自己的前途。

1947 年，我在重庆也已经有了一些事业基础，为了创造和开拓自己的事业，我毅然决定放弃了我在重庆的产业到了上海；1949 年我在上海也有了一些产业，中共的「开国大典」快要开始，我肯定自己是不适宜在中共政权下生活的，于是下定决心，义无反顾的又踏上征途，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又打出一片天。1982 年，彭真号召讨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于香港各界人士分别搜集意见。凡支持中共收回香港者，即使一向是反共的，也视为团结的对象。这是中共传统的统一战线方式。配合这一政治任务，《文汇报》社社长李子诵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的自由》。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是《我爱祖国，我更爱自由的祖国》。李文认为，香港回归大陆就等于「祖国的自由」，而我的观点是，我所爱的是一个以「自由」为前提的「祖国」。我写道：

「作为爱祖国的中国人，今天的重要任务是把爱祖国与爱自由结合，通过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国家。如果人民能对自己的国家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力，岂有不爱自由的祖国之理！」

我对于共产党的知识，使我对于共产党的动向十分敏感。中共宣布收回香港，提出许多个「保证」，多少年「不变」，香港确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热衷于此。例如当今香港的红人梁振邦，早在 1982 年 10 月就上书中共领导人，希望香港保持现状，梁氏的文章曾在《展望》发

表。我乐于见到朋友发表不同意见，如果香港能够影响中国的和平演变，也是我乐于见到的。在中共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必然要反复较量。今日的中国大陆，贫富悬殊扩大，共产党官僚与经济既得利益者的结合，劳民伤财军事势力的膨胀，官场风气的败坏，社会治安的混乱等等，问题很多。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终为少数，广大的贫苦大众，求生不易，不知何去何从。如果中共改革开放不能彻底，不能从经济改革上升到政治改革走民主主义的道路，则中国大陆政局必难稳定。

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1982 年针对彭真收回香港的讲话，我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是讨论香港前途的，我的观点如下：

第一，「我认为，爱祖国与爱自由是不可分的……现代的爱国主义不应该与狭义的国家主义混为一谈。」

第二，「现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基于人民自动自发对祖国的爱心，国家是由个人自由结合的。」

第三，「祖国的自由应建立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国家的自由。」

第四，一个国家的制度，缺乏个人自由，权力过分集中，的确可怕。「自由、平等、博爱」是没有阶级性的。

第五，我以为，作为爱祖国的中国人，今天的重要任务是把爱祖国与爱自由结合，通过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国家。如果人民能对自己的国家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利，岂有不爱自由的祖国之理……。

我认为香港的繁荣与成就主要是香港人的智慧与勤劳的果实，香港人是香港的真正主人。香港人和中国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但是我认为，民族的血缘与国家的主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共的「主权论」就是「祖宗论」、「血统论」。根据中共的说法，中共政权是中国人的「祖宗」，香港又是历史上被祖国遗弃的孤儿，他们或他们的子孙在海外的创业与成就，他们的财富都属于他们自己创造的。中共说：因为我是你们的祖宗，你的血，你的肉，你的每一根骨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中国共产党有权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宗收回香港，统一台湾，根据中共的理论，星加坡和东南亚凡是有华裔血统居住的地方，中共都拥有中国主权。根据中共的逻辑，当年的中苏共关系，按「政治血缘」而言，苏共把自己看作「老子党」，把中共看作「儿子党」，难道是合理的吗？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的中国，这个中国属于人民自己，人民能够行使主人翁的权力，那么，我绝对拥护中国收回香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是同意我这个论点的。

香港的前途取决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没有中国的民主就不会有香港的自由繁荣。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部分，两者是不可分的。

到美国继续学习

我到美国后，一直住在纽约，最初接触的是侨社领袖梁声泰，我们虽属初见，神交已久，当时因为我人地生疏，他和他的夫人赵蓉芬对我指导很多。我每次往访，他们都殷勤款待。其后，我见到唐德刚、夏志清、李又宁、马大任等几位教授，使我感受到纽约的华人世界，不仅温馨亲切，而且学术研究十分活跃。我记得最初参加过的有唐德刚在市立纽约大学举行的「纽约小区研讨会」和李又宁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的「中国妇女问题研讨会」等。其后，我相继认识了一些外国朋友，我发现自己没有把英文学好，是我很大的遗憾。

1949 年底我到了香港，在这块英国人的殖民地上，应该是学习英文条件最好的地方。我当时用中文写了不少文章，也出了几本书，

却没有跳出以中文自满自足的篱笆，虚度了许多青春。

在我的书被翻译成外文后，朋友向我指出，我因为不懂英文，在出版合约上吃了很大的亏，已无法补救。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学习英文的重要性。香港是一个国际社会，我接触过许多外国朋友，他们往往这样说：「你不懂 X 文个不要紧，你就说英文吧。」我尴尬极了，最后还是要借助于翻译。无论如何，依靠翻译要受很大限制，内容上会出偏差，感情的交流更要受到影响。这时我更觉悟到，英文是一种国际语言，能够掌握和使用英文，就可以走遍全世界。

我的确已经认识到英文的重要性了，但是，在六十年代前后，正是我的盛年，在四、五十岁之间，我的确是个大忙人，我经常应邀在外国访问，邀请我的包括布兰特这样著名的政治家，我还参加过许多次国际学术会议，还不断要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这些情况都增加了我学习英文的紧迫感。于是我一方面请英文教师补习，一方面多找机会和外国朋友交谈。但是我又发现，如果我自己准备好一个主题，勉强可以应付；如果不是这样，我便处于被动，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了。

1983 年我移居美国，年已六十有四。我的第一个愿望是，再下决心把英文学好，先后读了两间大学。到底年纪大了，在复旦（Fordham），我读美国历史和宪法，当我用英文写好一篇《中国宪法的发展》，受到教授和同学的鼓励，可是自己却就病倒了。病好后再入丕士大学（Pace）读英文写作，身体又顶不住了。在这个时期，我不断得到朋友的忠告。我的中国朋友总是劝我：「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样辛苦呢？」我的外国朋友则鼓励我：「你真不简单！」「继续努力吧！」

我继续学习英文，但是方法改变了。我回到少年时期学习中文的方法上，以自学为主，每天买一份《纽约时报》，靠辞典的帮助，能读多少读多少。同时我参加外国人的社团。在 Brooklyn 有个叫 Ethical Cultural Society 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要是有人谈起一个背着二十多磅大辞典的中国老头子，到处向人求教的，那就是我。我的那本大

辞典，已经被我翻烂了。本来想丢掉，戈扬说，这东西有意义，收藏了吧。

英文辞典虽然帮我认识许多字，可是我听和说的能力依然很差。有一段时间我借助电视，后来渐渐感到眼力不行了，就到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去练习说话。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叫 Bess Minsky 的女士，她是一位义工，她不仅很细心地指导我的英文，而且常邀我和戈扬到她家中作客，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美国朋友，让我们享受了美国式的社交生活。

在这同时，我又学会与计算机辞典作伴。计算机辞典体积小，内容多，发音清晰。终日陪伴着我，是我这个老头儿一日不可少的玩具和宠物，读报要靠它，处理文件要靠它，与孙女们交谈更要靠它。从少年时代的自学苦学，年过八十岁学而不辍，这是我一生的骄傲，也是我一生的幸福！

我每遇到青年朋友，总劝他们好好读书，力求上进；我每遇到中年朋友总劝他们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我每遇到和我年纪相若的朋友，总劝他们不要停止用脑，以脑力运动来赢得健康长寿。有人对我说，「Too late」。我对他说，「Look at me」！我学英文除了用计算机辞典外，我也认真学过一点中文计算机打字，当我告诉一位好友叶宪我用的软件时，他大笑，说这已经是老古董了。我也只好跟着苦笑，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永远跟不上，但是，跟不上也要跟。我非常感激叶宪，他使我的学习又跨了一步，继续学习吧。我要永远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决心想写回忆录

我到美国后，另一个愿望是写回忆录。

1982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有一篇「司马璐其人」为题的文章，有关我个人的历史资料，兹将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资料」中说：「司马璐又名马义，1919 年生于江苏泰州，1937 年 6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年底赴延安，曾在敌区工作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因受审查而停止党籍。1939 年离开延安到西安。先后任西安《秦风日报》编辑，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所办的《抗战日报》任主笔，社长。1940 年 8 月到重庆，任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若山的私人秘书。这时期他写了一些文章在《群众》，《新华日报》上发表，并经党组织审查，同意恢复其党组织的关系。1941 年皖南事变后，司马璐被派往皖南浙西作党的秘密工作，后因犯错误被开除党籍。」

「资料」中说司马璐「1943 年在重庆创办《自由东方》杂志，开办东方书店。他曾参加民主同盟，因搞小组织活动被除名。」司马璐又组织「中国人民社」，不久改组为「中国人民党」，发行机关刊物《人民周报》，该刊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发表许多反共言论。」「上海解放前夕，他组织了「和平民主同盟」，妄图与我党对抗，后逃往香港。」

「资料」中说：「司马璐 1952 年写了《斗争十八年》一书。」1953 年 9 月，他创办「自联通讯社」，自任社长。1958 年又创办了《展望》杂志。」「1960 年应邀访印。」「1966 年和 1969 年，两次应邀访问苏联及东欧。」「1975 年又应邀访苏。」上述资料中有的对，有的不对。例如其中说我 1937 年 6 月入党就是对的（目前和我同时入党的老同志现在健在的不多了）。又例如说我三次访问苏联是错的。

1952 年我在香港出版过《斗争十八年》一书，记述过 1931 年到 1949 年的经历，由于顾虑到当时留在中国大陆的亲友和往日同志的安全，不少故意把它颠倒位置，对某些人物的背景有些改变，同时也对我一生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没有如实的写出。到美国以后，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决定写一部完整的回忆录。

在美国，我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见到北京图书馆编印的「全国期刊目录」其中有我早年主编的《自由东方》杂志。其后，我购到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其中第五篇

「中国人民党」，有关我个人及我早年草拟的「中国人民党」纲领，宣言等等，资料甚为珍贵。再后，我又购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在这本书中，分别注明一部分数据，引用自马义（司马璐）1942 年出版的《朝鲜义勇队胜利的四年》，和 1944 年出版的《朝鲜革命史话》。我记得当年上述二书印刷和纸张都很粗劣，能够保存到今天很不容易。以上这些书，对于我今天写回忆录非常有用。

办「探索」杂志

1983 年 11 月，我从香港移民到达美国。当时我最想见的是纪文勋教授和马大任教授。我和他们二位曾在澳洲、巴黎、墨西哥先后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中多次晤谈，我对他们的学识渊博很感敬佩，他们对我在会中宣读的论文也感到兴趣，我们曾想配合继续做一些研究工作。我初到纽约后和纪教授联系，惊悉他在不久前去世，心情怅甚，后来才见到马大任，他一直很照顾我。

以后，我重操旧业，在报刊写点文章，和一些旧友新知常常相聚。由此，朋友要我办《探索》杂志，出钱者是一家台湾背景的公司。我们讨论《探索》的性质与内容，对方说，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我一听「民主」两个字，就不问其它，帮他把刊物办起来了。这份杂志初由段克文负责，后由我负责。工作同人中，黄少先、姜湘等都很有贡献。《探索》出版后，我认识了许多新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朋友，其中记得接触最早的是刘宾雁、阮铭等，阮铭在大陆也搞过中共党史，所以我们彼此熟悉的知识多，谈得投机。《探索》年轻作者中，我记得有何频、高新等，他们对大陆问题的反映很快，是我们老一代的作者不及的。

1992 年《探索》九周年兼一百期纪念，举办了一个「如何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笔谈会，参加者包括当时海外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我的总结文章摘要如下：

这次笔谈会，原意是在「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个主题下，分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与教育文化的多元化》重点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来稿，多先从当前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中国当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演变」也好，「演进」也好，改革也好，一切都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分不开。

以下，我分别介绍各位朋友笔谈要点。

参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主题笔谈的有千家驹和戈扬。

千家驹，以自己献身于中国革命 70 年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千家驹引用了毛泽东在 1945 年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进步。可是中国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等等，使中国生产力大倒退，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千家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在和平演变中进步的。「和平演变」能把坏事变好事。中共的「反和平演变」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戈扬一向以生动活泼的散文、中国民族文学特色表达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看法。戈扬分析，中国好比一个蛋，内里已经变成鸡，只是一层壳死死地包住。现在这层壳开始破了，小鸡快出来了。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为重点发言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阮铭、陈安。

严家其详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人大权力机构操作程序，认为中共政权逐渐走向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他提出，从五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第一，推进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第二，推进中国新闻出版自由；第三，推进中

国选举制度的变革；第四，推进中国的结社自由；第五，推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文化的交流。

苏绍智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多元、参与、选择、法制和制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中国的民主化已有基础。他认为，民主需要权威，不是突出个人专制的权威，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宪法上的权威。权威主义较权能主义更能够转向民主化。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民主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阮铭指出，中国的「太子党」正在中国形成以父荫为背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封建力量。目前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自由派与极左两头大中间小。中间力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自由民主力量有可能联合中间力量，取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者。

陈安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中共老一辈死后，中国的民主不可避免。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民主潮流，会有较理性的反应。他认为：假如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下推行民主，开放党禁，任何党派赢得多数取得政权，即使民主派不能获胜，也可以先争取掌握地方政权。他寄希望于中共从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自由选举。

以「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私有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一谘先生、赵穗生先生、吴国光先生。

陈一谘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在 89 民运后，由疲软而复苏，是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公有经济为主路线失败的结果。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在养活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躯壳。这条路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制度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先生劝告中国领导人，早日顺应潮流，积极促进中国根本制度的变革。

赵穗生提出十六个字：「自下而上，从小到大，以民压官，自然渐进」。他说，中国大陆很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以较小的代价，

在不引起剧烈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经济私有化。吴国光认为，一党专制与公有制是共生的。要结束一党专制，就不能不瓦解公有制。中国近期的私有化发展，将有助于打破中共政治权益上的垄断。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私有化正在为民主化准备基础和条件。私有化不等于民主化，可是我们可以顺应私有化的发展而推进民主化。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为重点笔谈的、有杨秉章、林长胜、艾端午先生。

杨秉章指出，军队必须摆脱政治，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以代替革命化，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不可分。

林长盛认为，由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军队思想意识的变化、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共强人时代的终结，解放军具备了由党军变为国军的基本条件。民主派应作的基本工作：第一，支持军队非党论；第二，针对军人的利益提出具体的政策；第三，争取解放军政治上的中立，根据 89 民运的经验这是可能的。

艾端午的看法：「和平演变」的主力是军队。六四事件打乱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撤换，军队素质降低。但海湾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大为震惊；全军上下要求军队现代化、专业化，军队中改革派力量影响正在扩大，目前中共的下级军官是关系中共未来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代人。

以「当前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变化」为重点笔谈的有程铁军。他从人民解放的重要根源来自农民，谈到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 40 年，中国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变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正在社会转型。以开放为转折点，正冲击中国的国家统治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运动最有希望。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文化多元化」为重点笔谈的有苏晓康、高新、刘宾雁先生。

苏晓康指出，「六四」之后文化观念的破产，打破了权能主义的统治，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打破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垄断。他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热」思潮的几个主要分裂：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二是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裂；三是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虽然引进了不少精神文化的新资源，还是缺乏普遍的认同。在创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宏伟构思中，中国知识份子应当从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反传统中摆脱出来。

高新认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首要任务。

刘宾雁指出，苏联和东欧变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民运中的一些弱点，很值得大家反省深思。他又指出，我们反对的不仅是一个政权和制度，同时应正视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素质所受到的伤害。作家的活动不仅限于写作、演讲，应该投身于社会公益，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

上述的笔谈会，虽然时过十二年，我感到这些分析中肯，深刻，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意义。我坚持「和平演变」的信念。

中国大陆的极左派「中流」杂志曾把我在笔谈会的文章加以转载。「中流」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主办的，该刊有一段「编者的话」说：

1992 年，《探索》杂志为纪念该刊在海外「复刊」9 周年和发行满 100 期，专门组织了一次「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包括千家驹、戈扬、严家其、刘宾雁、苏绍智、阮铭、苏晓康在内的老、少「精英」式头面人物，均纷纷亮相，围绕这个「主题」竞相发表了各自的「高论」。「笔谈」结束时，该刊主编司马璐写了一篇关于此次笔谈的综述和总结性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笔谈」和这篇文章，竟引起了台湾官方宣传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特别青睐。他们如获至宝，在 1992 年下半年对

中国大陆的广播中，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播送了它的全文。并一再用了画龙点睛的三句点题式的导语：

「和平演变——中共的唯一选择」；

「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出路」；

「唯和平演变可以救中国」。

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传播，则无非是想以这种方式在大陆寻找知音和「内应」，从而「加速」、「促进」社会主义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进程而已。

「中流」的文章中最令我吃惊的是说：「司马璐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明『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宣言和政治行动纲领」。我不明白我的延安时代的老同志邓力群，这样给我的文章定性，是恭维我呢，还是要准备把我送进秦城？

不过，我的确衷心祈祷中国的和平演变，我从 1943 年脱离中共的第一天开始，就讨厌「斗争」这两个字，到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后虽很轰动，当时我很不喜欢这书名，但是出版商认为在那个时代「斗争」两个字有市场价值，就这么定了。事实上我在香港居住三十年，无论私人谈话或公开演讲，都是主张和平的。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和平竞赛，民主政治的道路，我早在 1964 年就出版过「中国和平演变论」阐述过这个主张与信念。

我移民美国，在纽约一住 20 年，由于纽约的交通方便，资讯迅速，所以我接触过很多中国大陆访美的学者，其中包括王若水、李慎之等，在中国政治运动频频之中，他们能坚持学术独立自由的精神，成就骄人，真是令人敬佩！

我和大陆学人的交往中，有时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交谈和通信中，彼此都能尊重对方，例如李慎之，有次我发表过一篇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论文，寄给慎之，他用长达数千字批评我，由此我对他治

学的严谨的精神更为尊敬。王若水对于我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作过多次关键性的提示，都是我终生感激不尽的。

给江泽民的公开信

1994 年 5 月，我在美国《世界日报》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泽民贤世侄：

我是前中共党员，现在是独立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也是令尊江上青先生的故友，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者之一。我本来不便于和你高攀。我今年七十五岁了（写这本书时，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笔者注）。已绝无政治兴趣，更无个人野心。但有感于国难当头，大厦将倾，全国同胞人人自危，我想及令尊江上青先生的话，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今天中国人民自由乎？解放乎？

我向贤世侄回溯一段我与令尊江上青先生的交往经过：我和上青相识于 1935 年五、六月间，至今已近六十年。当年我们常相会于江苏镇江水陆巷 26 号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该馆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调查科长陈涛主持（创办人为贾静哉我当时是该馆职员。上青于苏州国民党反省院出狱后，在陈涛身边做事。任弼时的妹妹，当时化名徐若萍者，如仍健在当知其详。上青在我的图书馆楼上办公，我当时是一个思想左倾的少年。有一段时间我和上青差不多天天见面。上青身材高大，非常英俊，举止文雅，待人和善，谈笑风趣。上青出身扬州书香世家，父亲工诗善画。上青 1911 年 4 月生，1928 年加入共青团，1930 年入党。上青曾就读暨南大学，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在国民党监狱中屡进屡出。大陆出版的《大江南北》一书中有一篇《江泽民的父亲江上青烈士》一文说，上青「多次被捕……始终不屈不挠」。上青的经历极不寻常，所以我的左倾朋友有的说他是叛徒，劝我不要和他来往。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上青是一位半师半友的兄长，我很喜欢

和他接近。他每次出狱，可能运用了他的智慧，博取到国民党的信任，而出狱后照样宣传共产主义。而他在被捕出狱后总要表示对妻子的思念，可见上青伉俪情深，我想他是人性高于党性的。

抗战前一段时间，我就和上青失去了联系。我后来得知上青在扬州办《抗敌》周刊；组织救亡团体，一路宣传到安徽六安。他与盛子瑾关系较密切，盛子瑾为国民党行政专署专员，办了一个「皖东北军政学校」和一份《皖东北日报》，实际上都由上青主持。后来盛子瑾与苏北的国民党韩德勤磨擦甚烈，盛处境恶劣，内部也出现分裂。上青坚持盛子瑾投新四军，为反共派的许志远枪杀，时为 1939 年 8 月 29 日。上青死时，仅 28 岁，令我至今深为痛惜。

我于 1937 年参加中共，1943 年脱党，1945 年组织过「中国人民党」，此后大半生都从事文化学术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关我的历史，贵党 1982 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出版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保存了我的原始资料，这里我就不再写了。

我现在给贤世侄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因为 1989 年北京六四屠城，天怒人怨，举世震惊、迄今五周年，余痛犹深。中国的经济改革虽有进展，但经济改革无政治改革作基础，永难稳定。我再引用令尊江上青先生的话，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想当年天安门学生不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吗？今天，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建议你考虑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现代进步国家无不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容忍政治的反对派。一个政权的文明与野蛮，首先见之于人权记录。我希望中共当局立刻释放全国政治犯，开放新闻自由，开放结社自由。

第二、中共政权、中华民国、香港问题皆中国历史特殊背景的产物。必须互相尊重为政治实体，尤其民意基础的代表性。大陆台湾之间，应通过文化经济交流，和平民主竞赛，在国际社会充分合作。在

人民均富的前提下,「谁不吃掉谁」之说始能令人信服，为中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第三、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殊为混沌，改革、整顿、调控，朝令夕改，何所适从？民间盛传，贤世侄曾说过「要那些个体户倾家荡产」，是否属实，贤世侄应予澄清。中共当局应明确立法保阵人民财产，保护个体户与私人企业。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为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则大陆经济发展前途危矣，人民苦矣！

第四、中国应民主，应统一，人民要安居乐业，凡此皆应依宪法行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联合全国各党派（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召开和平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中国民主新宪法，放弃一党专政，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公有制。在这个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全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大选，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贤世侄今天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你有条件有可能实现令尊上青先生的愿望，你应该为邓小平的身后中国早做准备。如果你不介意我再说一句言重的话，目前在国内外。「共产党」这块招牌已经实在太臭,「中国共产党」不如改名，只要人民得救，国家得救，亡党何妨？贤世侄，你的政治前途，你的历史地位，你的个人荣辱，将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愚世叔心所谓危，为爱护贤世侄计，不得不坦诚相劝。我的这封信基于私情又基于大义。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苏共领袖戈尔巴契夫，虽然今天在野，但他的历史贡献，则普受世人的肯定与尊敬。贤世侄把握时机自救救人，犹未晚也。幸贤世侄三思之。遄颂

健康！

愚世叔马义（司马璐）

1994 年 5 月

十年前我这些话是对江泽民说的，也一样适用于今天中共领导

人，我现在无党无派，中国任何党派执政，我认为只要有民意基础，实行民主政治都是无所谓的。

中华学人联谊会

我以前没有做过生日，到美国以后，1989 年 7 月，朋友为我做 70 寿。我认为做生日应该自己请朋友，不应该收礼，但是还是有朋友送了礼。当时正值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海外民运初起，我当场连收到的朋友支票数字都没有看，就签字捐出去了。

1999 年 7 月，朋友们又为我做寿，我应该特别感谢兰征和保延昭、杨玉清等几位年轻朋友对我和戈扬的生活照顾一向非常周到，这次对我的寿宴特别热心，但是，使我感到为难的，朋友们又送来一些贺仪，怎么办？我和戈扬商量的结果，决定把这些钱成立一个非牟利的基金会，做些对社会对中国两岸三地和中美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的工作，因此成立了「中华学人联谊会」。

中华学人联谊会简介

中华学人联谊会为非营利机构，于 1999 年 7 月在纽约州注册成立。

中华学人联谊会，以司马璐 80 寿宴时朋友所赠礼金，为注册成立基金与活动经费。

中华学人联谊会坚持学术独立，促进文化交流，不对外募捐，不寻求津贴，不排斥任何学派。以会员会费及自由捐款和义工支持，作些如演讲会、座谈会、研讨会等等的活动。

2000 年 9 月至 12 月，选举成立理事会。理事有马大任、于浩成、阮铭、陈奎德、廖大文、李怡、李晓路、司马璐（会长）、戈扬（执行秘书）、兰征（财务秘书）。并聘请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柏杨、黎安友等为名誉理事。2003 年 1 月，补选李录、程晓农、王军涛为理事。

我们的会员中有几位高学历的教授，如李德怡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航天学教授。陈琴曾经是台办大学海洋学院院长。杨正民是巴西大学教授（正民四子女共获得九个博士）等。

中华学人联谊会成立以来所作的主要活动有：

1999 年 9 月 12 日，于浩成教授，资深记者陆铿等，讲两岸形势。11 月 6 日，巫宁坤教授讲《沈从文》

2000 年 4 月 1 日，举办「刘绍唐，朱养民，王映霞纪念研讨会」，唐德刚、李又宁、马大任等主讲。

2001 年 4 月 22 日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当局，尊重学术自由，释放被捕海外学人。7 月 14 日，举办「文化大革命」35 周年研讨会。由丁抒、宋永毅等主持。

2002 年 2 月 2 日，举办「王若水先生追思会」。6 月 1 日，举办「五四运动，胡适思想研讨会」。

2003 年月 29 日，举办「李慎之先生追思会」。

2004 年 1 月 27 日，举办「迎春联欢会」。

2004 年 1 月 27 日的「迎春联欢会」中，我宣布，司马璐和戈扬因年老退休，李录接任会长，兰征接任执行秘书，唐柏桥接任总干事。李录年富力强，学养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双博士，他曾主持过一场中华学人联谊会研讨会，魅力十足，散会时大家都缠着他，不愿离开。兰征从「中华学人联谊会」成立以来，实际操作从未间断，管理财务丝毫不苟。唐柏桥和他的新婚夫人龙宗泽有青春有朝气，人际关系也好，可以做些联络工作。（宗泽是中国名将龙云将军的孙女，也是我的义女，她和柏桥的婚礼是我主持的。）

由于「中华学人联谊会」坚持不向人伸手要钱，所以没有很多基金。但是有几位自动捐款的朋友，如梁声泰夫妇、郭静子夫妇、陈宏

正、徐放、李德怡、范止安、曾华汉、李录、邹达、李龙镳等，在此都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

在海外做学问的年青朋友中，我非常欣赏何清涟、程晓农、傅正明、王军涛、王丹、胡平、林保华等，我另外有位青年朋友吴东黎，他是位医生，屡次和他谈话，他的见解，给我印象很深。我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在学术上将来都会很有成就。

我们进入晚年，对一般的社会、文化、政治活动都极少参加，但是每逢六四，如果体力容许，我们会争取去的，因为这一天是我们从电视上目睹的当政者屠杀青年震惊世界的一日，也是中国最大的国耻纪念日，其伤痛的程度不在日本人对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之下。

第十六章 与戈扬结婚，共度晚年

我和戈扬在纽约所见到的朋友，大部分是我们彼此原来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有一天，戈扬给我介绍认识一位黎和平小姐，我知道她是中国历史学家黎澍的女儿，黎澍与戈扬都是「新观察」的创办者。后来当黎和平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叫马义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我的爸爸曾经写文章骂过你，不过，他如果活到今天，思想也可能和你一样。」关于黎澍骂我这件事，发生在 1947、1948 年之间，那时候我早已脱党，写了一些呼吁国共和平的文章。黎澍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在他主编的一份中共地下刊物「文萃」上，指责我的和平论调。当时中共的口径一致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那文章不是黎澍个人的想法，又过去很多年了。黎和平小姐的一句话，她的爸爸「如果活到今天，思想也会和你一样」，令我非常感动。同时，也使我想到，黎和平出生在斗争的年代，她的爸爸为什么替她用了「和平」的名字。

我和戈扬的大陆朋友中，郁风与戈扬长期在「新观察」同事。相交最深，她们的通信，每每像年轻的情侣一样，一封信常在千字以上。我在香港与郁风、苗子伉俪也见过，在纽约因为戈扬的关系，更熟了。

大陆的朋友中，有一位范用是我和戈扬少年时代的朋友，他写过一些文章都是怀念我们十几岁在镇江的一些故事。范用后来是三联书店总经理，朋友中都称他「范老板」。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是李普，我和戈扬都在 40 年代前后认识他，当时他是新华日报记者，后来是新华社总社副社长。当年中共开始打击我，孤立我，他和我继续保持友谊，令我印象至深。

「六四」以后，在纽约再次见到戈扬。我说「再次见到」，因为我们初次相识，至少是 70 年前的事，彼此都是十多岁的孩子。由于我们都在年少时参加「闹革命」，有过几次聚散。我们又是江苏海安小同乡，在镇江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读书会。后来我坐了牢，又被国民党释放，再后来我们又在海安重聚。再后来我们又在重庆重聚，

以后我们在纽约「再次见到」时又相隔 50 年了，戈扬有一篇文章中说：「七七抗战开始，小马义（马义是我的原名）到我家里说：『卢沟桥打起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到外面贴墙报（也就是日后的大字报）。我奇怪，马义当时的消息为什么那么灵通？我又奇怪，马义为什么又突然失踪，在海安消失了呢？」我给戈扬看了一份中共党内的内部资料。她说：「原来你入党的时间比我早呀！」我那时真是小小年纪，一颗红心，神出鬼没。

我和戈扬的纽约重聚

1940 年我们在重庆重聚，当时她已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我则到过延安。我们当时都在为共产党工作，而见面时彼此绝口不谈各自的工作，守口如瓶。1941 年皖南事变后，我们又「突然失踪」了。后来我在香港，留心大陆出版的书刊，我发现《新观察》杂志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又知道了它的主编戈扬被打成右派下放 22 年。等我在纽约见到戈扬，果然就是 55 年前孩提时代的朋友树佩华（戈扬原名），戈扬所写「曼哈顿」诗中「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即记其事。

我和戈扬闲话当年，在那个十足稚气的孩提时代，我们当时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几个字吧。今天相聚海外，我们要追求的仍然是这些东西。50 几年前我们做过同一个梦，今天我们还做着同一个梦！

我一生是个理想主义者，说的确切一点，是个梦想主义者。不管有多少挫折，多少创伤，我还是在继续做梦。童年的梦，像断了线的风筝；中年的梦，像疲惫的骆驼；老年的梦，才感到精神的解脱。我要雕塑一件象征生命象征宇宙的艺术品，这就是我的梦。

我给戈扬写过一首诗：

少年革命梦一场，
而立方醒闯四方。

不惑苦学渐悟道，
古稀才情更飞扬。

戈扬也回我一首：

语不成诗近十年，
再遇老友又成篇。
回首风雨苍茫事，
相看鹤发与童颜。

我和戈扬纽约再见后，真是有说不完的故事，彼此叹息不已。很多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朋友，都已故去，大部分死于冤案。在那个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视死如归的时代，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

有人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相恋的？」

这段故事是很神奇的。50 年代初，戈扬在北京主持《新观察》，这份杂志起初是中共的官方背景，其后，戈扬的民主倾向愈来愈明显，她就在 1958 年 3 月被打成「右派」。而在这同一年的 4 月，我在香港出版《展望》杂志，当时我们的「发刊词」说：发扬民主精神，反对一党专政，尊重个人价值，打击文化垄断，继续高举中国大陆右派的旗帜……等等，《展望》创刊号转载了大陆被称为右派的艾青等人的作品，我当时办这份《展望》好像与戈扬配合无间，而事实上，当时我和戈扬因为参加革命都改了名字，彼此都不知道谁是谁，但是又怎么会巧到配合得这么好，似乎是，她刚刚被缴械，我又拿起武器接着战斗。更妙的是，《新观察》与《展望》的刊物名称无论是中文和英文解释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我和戈扬都是无神论者，如果要解释我们的相恋，首先应该说是《新观察》与《展望》的相恋，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神，应该称为「民主之神」，是「民主之神」引导我们相恋和结合的。「六四」发生以后，树佩华（即戈扬）的影子在我身边隐隐出现，我怀疑一个叫戈扬的就是她，当时我已认识阮铭，我问他：「你知道戈扬在哪儿？」他回答

我「不知道」。后来我明白阮铭有保密的习惯，对我说了「善意的谎」。

不久「探索」杂志收到莫利亚小姐访问戈扬的文章，附有戈扬的照片，龚文谟当时是华侨日报记者，摄影技术很好，我一看便认出是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树佩华，于是，我们通了电话，相约在华埠凤城饭馆相见了。时间是 1989 年冬。当时，我对戈扬的印象是，中国已经大变，我们同一代朋友的变化，或是高官，或是巨富，而戈扬身上依然是少女时代的纯洁、稚气、真情。

我和戈扬在纽约相见以后，到底因为离别的时间太久了，许多生活习惯观点不同，我很早就脱党了，习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戈扬还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从争吵中我发现她的善良，彼此也增进了理解。吵呀吵呀 10 多年，我们终于发现，我的生活中少不了她，她的生活中也少不了我，于是我们决定结婚。我们毕竟两个人都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结婚，不需要年轻人的浪漫气氛。两位老人要结婚，有人听了很新奇，我们自己觉得是件很平常，却也是件大事。

我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潘绮玲律师。

她说：「好，我立刻就办，我从来没有办过结婚，但是，对你们的事，我一定要办好，因为我为你们的结婚太高兴了。」潘律师和她的丈夫陈健华开车接我们办婚姻注册，因为他们是一对青年夫妇，办公室人员都以为我和戈扬是他们的家长，来为他们办婚事的，结果一听清楚，是年轻的律师为两位 80 多岁老人办结婚，看着我们，不时笑笑，又不断抬头把我们上下打量，看了又看，好像是说，这对老人要结婚，多有趣。

我们正式宣誓结婚的日子是 2002 年 9 月 13 日，潘律师特别请了一位大法官 Judge McManls 和她自己为我们证婚，当时我们决定什么亲友也不通知，就简简单单由我们夫妇、潘律师夫妇和大法官在场就好了。戈扬临时想到，她的亲人当时都不在纽约，她对我说：「曾慧

燕也算是我们的女儿呀，约她一起来吧。」我同意了，我又请马大任作为我的家长。事有凑巧，正在我们快出门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好友陈宏正刚从台湾来，要请我们吃午饭，我说不行，我有要事，他说「什么要事，这么重要，不可以改期吗」，我顶不过他，只好从实吐出，这么一来，我们的婚礼也就增加了曾慧燕和陈宏正。

我们的结婚仪式是由潘律师和大法官安排在政府的一座精致礼堂中单独隆重举行的。我和戈扬宣赞了以下的誓词：

我们的结婚宣言（2002.9.13）

司马璐戈扬

我们相识了 70 年，从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战，不断的接受挑战。

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新观察》，一个在香港办《展望》，连结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姓名。

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

感谢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感谢高贵的法官和潘绮玲律师，以及亲戚友好的见证。见证我们的——结婚宣言。

司马璐（原名马义）时年 83 岁。
戈扬（原名树佩华）时年 86 岁。

我和戈扬的结婚过程，一切费用甚至吃饭全是潘律师付出的，她的先生全程开车接送，他们为我们忙了许多天，事后我和戈扬商量，我们应该送一点钱去。我去了，当潘律师一见到我掏出红包时，态度严肃、正色的对我说：「我不是以律师的身份替你做事的，如果你把我当作朋友，你就把钱拿回去；如果你不把我当作朋友，你就把钱放下。」言下大有「我放下钱」就等于宣布从此「绝交」。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钱收回了。

我和戈扬在美国是靠福利金生活的，拿福利金的人，我们因为年老，加上英文不好，所以对于政府要办的手续，常常疏忽引起麻烦，潘律师每遇我们有困难，无不全力以赴，有时他们把自己准备好的假期也取消了，替我们解决问题。

我和戈扬在美国能够安享天年，固然受益于美国的福利制度，也因为有潘绮玲、陈健华这样好的朋友，在我们有生之年，绝对难忘，感激一生。

我和戈扬婚后仍各住一房，厅中有五个大书架，堆满了书，终日与书为伴，墙壁上有两幅条幅。

一幅是中国著名书法家苗子的「出气」两个艺术字，还附有一首诗：

「天地有正气，一出便太平，如何禁闭之，人民不安宁。」苗子的字潇洒，诗的意义深远。

另一幅条幅是前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洪林写的：「清浊分径谓，岁寒见松操。」

邹鲁公子邹达送我们一幅张大千写的「八十不希奇，九十多来西，百岁笑眯眯，七十还是小弟弟，六十睡在摇篮里。」

另外还有史量才的女公子史明明的一幅山水画等等。我们厅中还有一盆王鼎钧夫人王棣华的艺术盆景，是花艺的极品，弥足珍贵，巧

夺天工。

我们婚后，朋友们写诗词祝贺的很多，其中有：柏杨、张香华的「二位来到世间将近一个世纪，才终于结为夫妇，真是为你们高兴。同时使人想到一个问题：灾难或挫折，是不是人生所必需？假定没有六四变化，大家到今天恐怕仍然互不相干，而六四使你们走到另外一个国度，成为连理。至少证明一点，有情的人一定都会有缘，有缘的人一定都会有果。」

刘再复的「你们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余英时伉俪的「您俩位真是『理想』的最后结合。」

李又宁的「您们的爱情故事与近现代史密切关连，是一个动人的传奇。」

于浩成、严家其、高皋、马大任均有贺诗。

夏志清除贺词以外，还写了一段老树开花的故事。

周策纵伉俪给我们写了一首诗：

你们已相识了七十年，
只忘记了说一个「爱」字。
跌倒了又爬起，
跌倒了又爬起，
一个在北京重新观察，
一个在香港不断展望。
虽然改变了姓名，
只改不了爱自由民主的个性。
我找遍古今中外，也找不到你们的样，
且让我来恭贺这一对「最年青的老夫妻」!

策纵这一首诗，很像我早年喜爱的胡适体白话诗。我们收到的贺

卡很多，其中最美的是华培明、舒燕夫妇送的，舒燕具有高雅的锹术素养。

另外，还有一件事使我们感动的，北京老朋友知道我们在纽约结婚的消息，于 10 月 9 日为我们在北京美林阁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参加的有郁风、苗子、丁聪、沈峻、李慎之、张贻、沈昌文、吴彬等。可惜不到半年，慎之去世，令我们遗恨不已。沈昌文是我们老朋友中活力充沛的「小青年」，他也曾是三联书店的老板，活跃在两岸三地的文化圈内，人缘很好。

我们的朋友中还有李德怡伉俪，他们像嫁女儿似的为我和戈扬特地订制了几套新装。还有周国勇、张鹤夫妇，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他们一家三代，都来和我们团聚。

坦然回归大自然

我今年 85 岁了。中国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便是个孤儿，从小流浪。我童年的灾难，使我一辈子痛恨这个不合理的中国社会，家庭的爱，社会的爱，国家的爱，都距离我很远，我一生在自生自灭中长大，叫我何处去寻根？又叫我何处去认祖呢？

我生来就是一个乱世中国的孤儿！

我的大半生是在颠沛流离，自生自灭中度过的。我一生多灾多难，能够活到今天，的确真是太偶然了。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时，我从窑洞里走出来，山腰间一片断肢残骨的死尸。日本飞机轰炸浙赣铁路时，我被压在一座草房子下面，走出四周看看，只有我一个人未死。抗战期间，我屡次出入国军、共军、日伪军边界地区，分分钟都会中流弹或者抓走枪毙杀头。我这个人生来就是一副土头土脑的模样，似乎一向不怎样受到注意，可能阎王也不大欢迎我，死神「走过场」掠我而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过去是怎样活过来的，我是在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奇妙环境中成长的。

许多次有人问我：「你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从没有进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没有读过。问者又说：「你没有读过大学，怎么可以写文章，编杂志，又出版那么多著作呢？」在我接受许多国家的邀请去访问时，为了解释我不是什么教授，也没有拿过什么博士学位，费过不少唇舌。我说：「我听说过假博士，哪里有真博士不肯承认自己的博士学位呢？」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青年中流行过两个名词，一个是「自修大学」，一个是「社会大学」。这两个名词对我很适合，我就是「自修大学」和「社会大学」的学生。

在中国，我是作为一个野生动物长大的。

我与戈扬结婚以后，我们生活得自由自在，颐养天年，我们都感激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

我一生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见到我的生母。中国旧伦理在我身上不多，但我总觉得我是生母的罪人。

我坦然面对大自然的召唤。

我借用希腊盲诗人荷马在「奥德赛」一书中的诗句：

我的丹心早已千缍百炼，
不畏痛苦！
因为我经历忍受的痛苦，数不胜数！
我坦然面对大自然的召唤。

我再借用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诗句：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我的一生近于传奇，我的故事不足为训。我羡慕学校的生活，只是由于动乱的时代和个人的不幸，没有好好受教育。我怀念所有过去我爱过的人，也包括批过和斗过我的人。我祝福他们！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现代的中国青年不再遭遇像我一样的悲惨命运。

我的最后一个愿望，希望中国青年学习蔡元培精神，编在本书最后的一篇，作为全书的结尾语。

第二篇 中共第一代人物

我见、我闻、我思：

毛泽东神鬼人集于一身

周恩来是个中国好演员

张国焘、王明都很不坏

本书第二篇和第三篇部分细节，感谢以下几位前辈和朋友：

张国焘：中共创党人之一，一大主席。

抱朴：原名秦涤清，曾与刘少奇同时留学苏联。

李希逸：又名李秋生，中共共青团四大中委，参加过罗章龙领导的反对派。

龚楚：又名龚鹤村，早期红军领导人之一，红七军及江西中央苏区留守处参谋长。曾与邓小平共过事。

蔡前：又名蔡孝前，曾任江西中央苏维埃一大代表，台湾地委书记，我在延安抗大时就认识他。

孟伯谦：早期陕北红军司令员之一。曾与习仲勋共过事。

郭潜：曾任中共川陕边区民运部长，南方局宣传部长，曾与廖承志共过事。

项迺光：曾任中共河南地委书记。

徐锡根：中共六大中当选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成为反对派。

上述这些人物，皆已逝世，我了解他们生前都受过政治委屈，没有机会申诉；我写出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道出被中共埋葬的历史真相，一方面也为了纪念曾经为理想而奋斗过的我过去的师友。

第一章 陈独秀的学术、政治与感情生活

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与政治史，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是叱咤风云、名震遐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友人还是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陈独秀的一生，爱学问，爱江山，也爱美人，他一生的风流韵事很多。像我一代的人，都是在陈独秀思想引导下走过来的，我们不必掩饰陈独秀的缺点，正如我们不应该掩饰自己的缺点一样。

他的一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陈独秀生于 1879 年。1884 年，独秀 5 岁，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开始读书。独秀思想敏捷，智慧过人，幼年对于古训，即有离经叛道的倾向。

1896 年，独秀应考中秀才。他后来谑称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玩猴子」。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后，独秀立志投身救国。此后是康梁维新，辛亥革命，驱袁世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直到北伐战争，独秀或积极参与，或站立潮头。第一次国共分裂，独秀入狱，出狱后又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史。晚年，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独秀学问渊博，日，英，法文都很有根底，诗词书法及文字学的造诣皆深，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但演说缺乏吸引力。他的性格明朗，刚直，爱沿分明，嫉恶如仇，有棱有角，但固执而缺少亲和力。他对于玩权术的人十分讨厌，有时脾气暴躁，有时与人搞得很僵。他是书生，是名士，是思想家，往往有过人的远见，不断随时代而进步。他是中国革命思想的树立者，但是他不善于处理组织的内部矛盾，不善于实际的领导和行动，这是他一生的悲剧。他的一生

波澜起伏。他组织过许多团体，办过许多刊物，帮助过许多人成功，哺育过许多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婆。

陈独秀 18 岁（1896 年）中了秀才，乡绅纷来说亲，独秀依母命于次年 9 月与曾任安庆副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结婚，婚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家庭不和。

1900 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他在东京与苏曼殊、章士钊同居一室，这同住的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人物。陈独秀在思想文化政治活动中独领风骚；苏曼殊是一位终生为情所困的和尚；章士钊成为一位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不倒翁，苏曼殊曾赠诗独秀，诗句有「行云流水一孤僧」、「纵有欢肠已似冰」，表示自己对人生的悲观。而当时的独秀，生命像一把火，所以章士钊评论陈独秀是「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山弗上，回头之草不啮。」

独秀年轻时，有过一次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而他不屑一顾。陈独秀是叔父陈衍庶的嗣子。陈衍庶有田产、巨宅和投资上万两银子的生意。1913 年逝世时，独秀是这笔巨大遗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社会上都说陈氏家财万贯，可是独秀视家产如敝履，不闻不管。胡适在北大演讲中曾提到，有一次，独秀到北京，他家在北京一间大铺子的掌柜请「小东家」去看一看。独秀却说：「这铺子不是我的。」

陈独秀初期的爱国民主思想

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后，独秀立志投身救国。此后是康梁维新、辛亥革命、驱袁世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直到北伐战争，独秀无役不与，他是时代的潮流与先锋。

20 世纪初，陈独秀组织爱国团体，屡败屡起。他的思想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他从爱国运动进而认识欲救中国必须革新中国政治，欲革新中国政治必先革新中国文化。早在民国以前，他就在安徽办了一份《安徽白话报》，提倡白话文，并宣传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当时写道：「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不是皇帝一人私有的国家』，『国

家的权力来自人民』，『行使之权乃归全国国民的政府』，所以『国民第一步当争的就是政治参与权，即民主立宪的政治。』」

1914 年 12 月，陈独秀在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认为「爱国者何？爱其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提倡新文化运动

1896 年陈独秀虽然中了秀才，他谑称科举制度是统治阶级「玩猴子」。所以他的祖父断言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五四前后，陈独秀提倡新思想时，保守人士诋毁陈独秀为「陈毒兽」。甚至说陈独秀主张杀父的，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民国十年（1921 年）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们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国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在新文化运动中批评儒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时，陈独秀当时也是反孔的，他在「答吴虞」一文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以近世文明社会绝不兼容者。……」陈独秀此说，胡适也表示信服。

在陈独秀提倡新文化运动时，有一个崇拜独秀的女学生闯进陈独秀的感情世界，这个女学生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个妻子高君曼，为高登科的续弦元氏所生，高君曼与高晓岚为同父异母姐妹。

据高君曼的朋友描述，高君曼生得很美，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幼年随熟师读过一些书，很有些天分。后来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更加开放，与陈独秀颇多共同语言。

高君曼回家度假期间，陈独秀与高晓岚感情不和。那时高君曼眼

中的独秀已是学术权威，一代大师。而独秀眼中的高君曼正值青春年华，与她保守的姐姐有天壤之别。双方一见钟情。据说当时高晓岚也有一个想法，既然丈夫是天生的风流种子，自己驾驭不住，能和自己的妹妹好总是好过外人。所以独秀和君曼相聚时，晓岚往往故意避开。

姐妹共事一男，在当地又引起了轰动。陈高两家都认为，此事大逆不道，有辱家门。独秀与君曼遂相携私奔，在杭州正式结婚。

独秀与君曼生有一子一女，女子美（1912 年生，2004 年 5 月逝于纽约），子鹤年（又名哲民，1913 年生）。陈氏家族对君曼始终歧视，称为侧室，对他们所生的子女称为庶出。1930 年晓岚逝世，君曼率子女奔丧。晓岚所生第三子陈松年拦在门外说：「你们不是陈家人。」君曼与独秀颠沛流离，风雨同舟过了许多年，这时她百感交集。

「新青年」杂志

1915 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文史哲兼容并包，主要作者是当时北方知识分子精英，如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敬告青年」，提出青年的六条标准：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红线是科学与民主。

1917 年，陈独秀继胡适后，发表「文学革命论」；1918 年发表「偶像破坏论」：1919 年 1 月，发表《新青年》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等等。当时，陈独秀的基本思想是倾向民主主义的。

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胡适和陈独秀共同领导。陈独秀与胡适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他们有时争论，有时相容，但终生彼此相敬。当时两人同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大彗星。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他并提出由人民制定宪法，选举国会议员，依法治国。

陈独秀认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国民必须自由自治，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实行人的解放，一切言行，不听命于他人，不从属于他人，国民必须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

1919 年 6 月 8 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一篇「论爱国」的文章。陈独秀说：「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不合乎理性。」「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与中共初期活动

中共领导人物都受过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我的革命思想最初是受到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等等。我们又读过中共党史上对于陈独秀的各种谩骂，例如，「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是托派」，「陈独秀是汉奸」，「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云云。

中共对于陈独秀有许多赞扬，也有许多辱骂，每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怎样想呢？我们这一代的人，不都是沿着陈独秀的道路走过来的吗？陈独秀的历史功过，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也确切地反应了我们这一个时代。

1919 年 6 月间陈独秀因散发「五四运动」的传单被捕，7 月 14 日，毛泽东在他所办的「湘江评论」写道：「陈君之被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19 年 4 月 20 日，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是他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同年 12 月 2 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但不是没有保留的。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陈独秀为早，他在 1919 年 10 月发表《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二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

1920 年 3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来华，他在北京访李大钊，提出要李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维丁斯基根据李大钊的建议，5 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同意了维丁斯基的建议，他言必信，行必果。1920 年 6 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陈独秀领导下在上海成立，当时又称中共临时中央，与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遥相呼应，时称「南陈北李」。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冲突

1921 年七月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于 9 月间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陈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话不投机，发生严重争执。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按自己的国情摸索。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建者，也是中共「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同年 10 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出狱后知道是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素重感情，从此改善了与马林的关系。陈独秀在狱中，又遇到一位崇拜他的女性，两人出狱后秘密同居，高君曼也离开了陈独秀。

1922 年 3 月，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陈独秀加以反对。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小团体，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不如钻进国民党，打国民党的旗帜，才能有作用。陈独秀认为，他不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必须光明正大，建立党对党的「党外合作」；如果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又在国民党内

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是很危险的。7 月间，中共举行二大，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认为中共对上级（共产国际）的指示，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陈独秀在此压力下终于屈服。

据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和李达回忆，陈独秀为提出共产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人。中共建党之初，独秀对共产国际一直是相抵触的。

所谓「陈独秀机会主义」

1922 年 6 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是陈独秀认为，形势既然如此，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第二阶段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共三大的宣言中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宣言为陈独秀起草，他用心良苦，认为国共既然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必须坦诚说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后来中共认为，陈独秀这一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认为，俄国共产党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在欧洲连续发动德国和匈牙利的暴动，不久以失败告终。因此，俄共的东方政策，如何利用中国革命以摆脱俄共的孤立，遂成为俄共领导人争论的重心。

1924 年 1 月，列宁逝世，俄共（包括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当时俄共有两个中国问题的核心，一个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另一个是斯（大林）、布（哈林）联盟。托季联盟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旗帜鲜明，不断革命。斯布联盟主张，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一定要拖住国民党一起干，打国民党的旗帜，争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夺取国民党的群众。例如当时的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之一汪精卫密切合作，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为副部长并一度代理部长。中共当时对国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对国民党笑脸相迎，陈独秀以党的领袖的身份，不能不担任

这个「卖笑政策」的主角。当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执行了斯大林路线。

但是，共产党暗的一套，如分化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工会农会的极左行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秘密小组等等，也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1926 年 5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整党案，蒋介石公开表明，国民党内不能容许有小党派的活动。

共产国际朝令夕改，一旦发生路线错误，都要由中共领导人承担责任，陈独秀苦痛已极。

1926 年初，陈独秀在上海突然「失踪」，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十分紧张，以为他遇害。正在中央讨论「善后」之时，独秀突然出现，他说到医院看伤寒病去了。陈独秀的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多方了解，知道陈独秀和一女医生住在一起。女医生名施芝英，年轻貌美，平时爱读陈独秀的文章，又是一个陈独秀的崇拜者。陈独秀常常借口胃病去看她，日久生情，已经有了一个秘密的家。

70 年代末期，有三个下放新疆的青年男女上书中共中央，说陈独秀，施芝英是他们的外祖父母。经中共中央调查核放，当年施芝英确有一女，因施未婚，对外称「养女」。

陈独秀拒绝参加六大，组织反对派

1927 年 3 月，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罗亦农等在上海组织暴动，企图夺取中国这个最大都市，结果失败。继之国民党在上海、广州清党。当时汪精卫在武汉与南京的蒋介石对抗，共产国际又严令陈独秀与汪精卫合作反蒋。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秘密指示，要中共广泛展开农民运动，准备农民起义，指示中又说，汪精卫是革命的，罗易就把这份文件给汪看了。汪精卫这时才明白共产党的「两手策略」于是决定分共。

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卖笑」已经不能再发生作用，斯大林对中共的指导路线也证明破产。当时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7 月，共产国际下令改组中共中央。8 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职务，并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陈独秀又拍着桌子大骂：「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猴儿（指国际代表）牵着鼻子走了。」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中共反对共产国际「凡是派」的，陈独秀确实是第一个，不过陈为环境所迫，一度委屈。郑超麟回忆说，「八七会议」的决议，中共撤消陈独秀中央领导职务，党内一些领导人如彭述之，郑超麟等不服，组织了一个拥护陈独秀的运动，这个运动为陈本人所反对（见郑超麟「回忆录」)。1928 年，陈独秀拒绝到到莫斯科参加「六大」，其原因他后来解释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黄珍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黄曾为陈独秀秘书）。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斗，坚决拒绝参加六大。他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中国问题，而是要我承担罪责。」（60 年代中苏论战时的油印小册子提到这段史实没有点名。）

1929 年 7 月，中苏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反对上述口号。8 月，陈独秀再函中共中央，反对中共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拥苏立场，并要求党内

民主，就当时的中苏纠纷进行讨论。1929 年 10 月，周恩来以中央组织部名义召开各级代表会议及座谈会，有系统地批判陈独秀，并将陈的罪名定为「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12 月 10 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承认中共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而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独秀等被开除后，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刊载托洛茨基文章。1929 年底，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1931 年 5 月，反对派的中央成立，即中共所谓托派中央。1932 年 10 月 15 日，陈独秀等人被国民党逮捕。1933 年 10 月，陈独秀受审讯，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辩护。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陈在国共合作期间对国民党有功，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他的托派活动与国民党的反共目标一致。章士钊宣读辩词后，陈独秀拍案而起，愤怒指出：「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的答辩词中的「误信共产主义」改为「坚信共产主义」。陈独秀当时既为中共所排斥，又在国民党法庭上正气凛然，令人尊敬。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从 1932 年起，陈独秀在监狱住了 5 年。1935 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到监狱去探视，见陈的独立牢房堆满了书，陈在狱中潜心做学问，刘说：「你伟大。」陈独秀提笔给刘海粟写了一副对联：

行无愧作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表达了当时陈独秀心情泰然，豪气未消。后来，抗战发生，1937 年 8 月出狱时，铁窗五年，读书万卷，使陈独秀的思想更

成熟，更升华，更进步了。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独秀出狱后，说自己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思想独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于他的学术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罗汉与叶剑英有过接触。叶代表中共提出，如陈独秀接受三个条件可以恢复组织关系，三条件为：1，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2，拥护党的路线：3，以行动表示诚意。陈认为不能接受。其后，康生、徐冰、章汉夫相继发表斥骂「托派汉奸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在 1938 年 3 月 17 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如此吗？」（此信《新华日报》未刊出，同月 27 日在《扫荡报》上发表。）中共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当时激怒了很多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著名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发表公开声明，指责中共对陈独秀的诽谤，「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诸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加诸异己……」。沈钧儒也表示不满。

陈独秀在抗战期间的主要言论，包括拥护抗战，赞成各党派合作，支持全民动员和政府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国际问题上，他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类的希望。

陈独秀说：「『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1940 年 11 月，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

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1937 年 11 月，陈独秀给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陈独秀认为，「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

陈独秀还有一个重要见解，他反对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他说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时，才有所觉悟」「然而太晚了」。（1940 年 12 月，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胡适又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 6、7 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最后一位忘年伴侣故事感人

1930 年下半年，当时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出党，同时也仍处在国民党的通缉中。陈独秀隐名埋姓，找到一处偏僻的石库楼，分租一房。这就与一位不识字的年轻女工潘兰珍为邻。一天独秀昏倒在地，兰珍送他就医。两人渐渐往来，独秀教潘兰珍识字，潘兰珍帮独秀洗衣做饭。当时独秀 50 多岁，兰珍 20 多岁，相差 30 岁。不久后，兰珍以身相许，厮守终生。

独秀当时躲避政治干扰，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一文收入，家用全赖潘兰珍做工维持。兰珍称独秀「李老先生」，她根本不知「李老先生」是什么人。

1932 年 10 月 15 日，陈独秀被捕，报纸上刊出大幅照片，潘兰珍才知道「李老先生」原是「老西」（即 CP，当时上海人都这样称共产党）。兰珍去探监，知道独秀要长期坐牢，于是自己打点一切私务，决心一辈子在狱中陪伴独秀。这使独秀老泪纵横。他托好友劝阻潘兰珍这样为自己葬送青春。潘兰珍声泪俱下，说自己已经是铁石心肠，一辈子伴着独秀。抗战开始后，陈独秀被释，他们在武汉正式结婚。

陈独秀对生母的感情很深。他幼年从祖父读书，祖父管教很严，动不动就把他打一顿。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最强有力的命令。」中共出版的「陈独秀年谱」中说，1899 年，独秀在沈阳获知母亲病重，「匆匆南返，抵家，其母已故」。

陈独秀的继母谢氏（即陈衍庶之继室）1939 年死于四川江津，陈独秀披麻戴孝，并在给友人杨鹏升的信中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

陈独秀早年为了革命，可惜他们父子之间，既缺少天伦温情，又都受到共产党的党性教育，重阶级关系而轻亲情，所以父子开会时均以「同志」相称。中共「五大」时，长子延年曾指责父亲「独秀同志领导软弱无力」。中共「八七会议」时，次子乔年曾指责父亲「实行右倾机会主义」。延年、乔年都在革命期间被害。陈独秀晚年很想念这两个被他自己教育成「六亲不认」的为革命奉献生命的儿子。他在抗战时，曾对张国焘说，他永不与有「杀子之仇」的蒋介石合作。

潘兰珍与陈独秀相识时，正是陈独秀的清贫时代，后来他们迁居四川江津，贫病交迫，受尽苦难。1942 年 5 月 27 日独秀病逝，享年 63 岁。潘兰珍以青春之年，送完独秀生命的最后行程。故事感人。

陈独秀一生的总结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1913 年，1919 年，1921 年，1922 年，1932 年。他在第五次被捕中，正如他自己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的若干著作是在监狱中写的。最后一次在狱中致力中国文字学的研究。

陈独秀长期贫病交迫，坚拒国共两党显赫人士的馈赠。蒋介石送钱，他退了；周恩来说，如果陈独秀接受两个条件，一不对外讲话，二不发表文章，中共可以把他的生活和医疗包起来，陈独秀当然也拒绝了。峥峥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陈独秀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的创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到最后回到民主主义。他的不断探索与寻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个人的基本，气质是爱好自由，倾向民主。五四以后，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长期冷静的思考，从苏联与中共的实际经验中理解，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根本问题。陈独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就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业而言，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生的反对派。我更感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绝代巨人」。我对陈独秀先生最后的两句总结是：

一生正气撼天地
长留哀思在人间

第二章 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我于 1937 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听到他的演讲，那年我 18 岁，我简直形容不出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兴的事是听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讲。我相信多数共产党人的演说一流。我所听过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有的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属于政客型，用词圆滑，说话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朱德外形老实，婆婆妈妈，说话很受大兵的欢迎；张国焘书卷气很重，像个大学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讲话受欢迎的程度吃亏；刘少奇和陈云的讲话，党八股多，但陈云讲话较受欢迎；王明的讲话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力，听多了又觉得总是那一套。平心而论，我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最为深刻。

我曾经爱过毛泽东

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当时看来很清瘦黝黑，有烟容和病容，后日中共所发表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意气飞扬，容光焕发的毛泽东照片，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

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我也是个粗人，年轻的时代也爱听粗话，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个绝对的好人，也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这个「巨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中共关于毛泽东的资料仍属于禁区，他的功过是非很难有真正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许多「毛学家」等，他们所写的毛泽东各有独见，他们与毛的关系亲的程度可能超过我，而我与毛初见的时间也可能早过他们，所以我们对毛的理解不尽相同。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在江西苏区时代，曾经批评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偏偏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秦楚称霸，而毛泽东正是出身于楚（湖南）成熟于秦（西北）；陕北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流寇张献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张延安人，李米脂人，他们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曾经震动整个中国。张献忠首创以走制敌，拖垮敌人的游击战术；李自成屡败屡起，以「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煽动口号，发展为百万大军。两人都建立过政权，张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称帝两年左右，最后战败而死。延安时代，毛确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

乐，缺少众生观念。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造反的时代，中国恰好输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性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中国被压迫的贫苦大众来说，是一种煽动群众的造反武器，英国一位女探险家 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对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读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资治通鉴」……从而敏锐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心态，政治谋略，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麦克 • 哈特的《影向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中国政治人物被排进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三人。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隋文帝皆有惊人相似之处。中国这块土地，中国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创造了这个毛泽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从中国的山沟中发展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把马克思搬进了中国的山沟，一变而为「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一向被共产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哲学思想，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 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 年毛领导以反 AB 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泽东的神权

文学世界的毛泽东，他把中国的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言情小说，

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全都当做了兵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因为他兼具《红楼梦》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决断像王熙凤，他的伪善象薛宝钗，他有时又惹人怜爱得像林黛玉。毛泽东还熟读《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百宝全书。毛说他一共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一派，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浪漫主义的作品，有可爱之处，但是，毛泽东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时到达荒诞的境界。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本身颇于知识分子，自幼就争取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当过兵，他当兵时自认为是读书人，不应挑水，宁可花钱买水，他非常重视自己「读书人」的优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乡人，住湘乡会馆，就读为湘乡子弟设的学校，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气，后来在学校中又受了很多责罚。使他逐渐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产生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相信作个知识份子可以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觉得读书愈多的人愈能作伪。因此，他也怀疑，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敌视知识分子，甚至污辱与凌虐知识分子，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都可能与他年轻时的自卑有关。

毛泽东对中国儒家采取鄙视态度，他也是一个最会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国「中国通」费正清，还一度把毛泽东称为「儒家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儒家，像对于女人的态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样，不属于爱情，而属于实用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

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也重视宗教的利用，对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用到一些「天无绝人之路」「救命菩萨」一些话，可见他的心灵中仍然另有一个神权的世界。达赖喇嘛回忆他在 1954 年访问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佛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释加牟尼虽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却终生致力于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改善。」毛又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慈悲的女性」。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达赖说：「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于一身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人鬼神集中于一身的怪物，客观地评论毛泽东这个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的宣传太过于把毛泽东神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为人与性格，随处表现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也的确不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戏剧化的场面，集神道和魔道于一身，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毛泽东喜欢附庸风雅地和人谈「楚词」。屈原是战国时的楚国诗人，他的投汨罗江自杀是一段神话，他写的「九歌」是一篇充满鬼气的作品。有人说毛泽东爱「九歌」是因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过一个传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同看京剧。当

剧中人曹操说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刘对毛说：「你看，曹操多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这话就不会讲了！」这个传说，其实是从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套来的。但是，却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般的，纯朴的，概念化的看法。

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毛泽东这段话，更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样的狂热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善于以蛮压众，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蛮无人敢抗。中共六届六中，辩论国共统一战线，毛骂王明是婊子；庐山会议时，毛骂彭德怀我操你娘。抗战期间，林彪指挥平型关作战，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都被毛泽东骂过，毛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消灭国民党政权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共和谈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军事，运筹帷幄，分秒必争。

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中共与苏共关系中，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合作。他们绝不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关系。毛斯之间的长期的暗斗，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泽东要清除中共的亲苏派，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双方打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只是因为它是斗争的武器而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这个人，「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

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 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毛泽东的幽灵

我在延安时所见和我后来所理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在我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而在毛泽东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笔者相信，一个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条件，一个人最后的失败也有他一定的背景。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辩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提法与解释。今天我们阅读有关毛泽东复杂的资料，了解毛泽东其人，和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向，的确是要非常非常冷静的。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

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 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记起托洛茨基生前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的话，他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对斯大林个人绝不怨恨。」上述这段托洛茨基的话，我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第三章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我与张国焘先生交往较多。中共官方党史中，丑化张国焘，每多违反事实真相。本文所写的多是张国焘对我谈的第一手资料。

张国焘是中共主要创党人之一

张国焘是中共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组党前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系者，中共一大的主席和一大选出的组织负责人，中共工运史上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中共早期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极少数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曾经是中共最大的实力派，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袖，1934 年，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在江西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饥寒交迫，士气低落，逃命到四川时，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弹药、粮食、兵源。等到中央红军元气渐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为了摆脱红四方面军，叶剑英谎称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加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徐向前生前曾表示，他根本未见到这份电报。张国焘本人则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我怎么可能做这样愚蠢的事，给别人制造口实，打击自己」。后来，中央红军奔逃中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地，又制造了陕北冤案，将陕北土共主要领导者一网打尽。陕北土共在中央红军各个击破之下瓦解。等到 1936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这时主客互易、周恩来巧妙地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分开，毛泽东盗用张国焘的名义，把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编为西路军，借刀杀人，以回教的马家军消灭了西路军，从此张国焘在陕北，在中共中央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到陕北以后，表面上还有几个副职如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宁特区（后称边区）副主席等，真正主要的工作是忙于反复写检讨

和参加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斗争会节节升高，但无人能否认，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红军早期最主要的创造者。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正如大陆出版的一本《张国焘的浮沉》（师博著，人民中国出版社版）的简介中说：「张国焘，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早期的重要领袖之一，其影响之大，绝不在任何一个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之下。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也充满了传奇。」

我于 1937 年到达陕北延安。不久就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听到过一堂张国焘讲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和以后在香港的交往中，始终觉得，他像一位大学教授，宽面厚耳，举止斯文，眉宇间常露出深思，书卷气很重。初见时，很难想到这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

1938 年 1 月，我参加过延安由张国焘主持的欢迎梁漱溟的晚会。当时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的代理主席（主席林伯渠常驻西安）。晚会上，张致欢迎辞和梁的答词，在我的记忆中，都很沉闷。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与张国焘在延安时，没有直接谈过越么话，后来香港再见，长期交往，他对我研究中共党史帮助和指导很多，其中谈到他从延安出走的经过，紧张有趣，有一部份中共官方也报导过，但张国焘对笔者所谈的具体生动得多。我想，有一天中国的局面如果改变，张国焘的故事会拍成电视剧的。

1938 年 4 月 4 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趁机脱党，黄帝陵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历来当权政府，每逢清明节，必派大员致祭。张国焘到中部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同时祭陵。祭陵时，两个人站在一起，张国焘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座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蒋

介石）。」

延安方面，获悉张国焘去了西安，立刻电告西安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林伯渠，要林「严加保护」，林对张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由于张态度坚决，终于摆脱了林的阻挠。

4 月 11 日，张国焘到了汉口，李克农率一批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了，李克农派人追踪他，把他的行李从旅馆偷偷搬走，然后又再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了。李克农、童小鹏等和张国焘之间的三「请」三逃。过程曲折，惊险万分。其中，有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的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当时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身为国民党的高官，也有国民党的特务秘密「保护」，惊问何事。周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指张国焘）去看病」。周恩来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扬长而去。由于国民党的特务已把所见的经过报告上去，所以张国焘被周「请」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很受礼待。但是实际上软中夹硬，准备挟持回延安。

张国焘与周恩来

当时中共在武汉最高的机构是长江局。长江局书记王明对张国焘说：「你是党的般高领导人之一，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你应该是知道的。」秦邦宪附和王明的话说：「你的行动应该通过组织，报告中央；你是边区代理主席，擅离岗位，自由行动，错误严重！」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暂时不要谈这些吧！国焘同志一路辛苦，我们办一桌酒席，为国焘同志接风；然后，让国焘好好休息。」饭后，周恩来又笑对张国焘说：「国焘，你大概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了，这是西湖最好的龙井。」

张国焘呷了一口，也笑说：「果然是好茶，好茶。」周恩来见气氛缓和，于是就进一步向张国焘说：「老朋友，老同志，随便谈谈吧，这些年，你对党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你对党的贡献太大了，因此党

对你也特别关心。国焘，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你这次到武汉来，到底是准备做一些什么呀？」

张国焘见周恩来如此这般友善，心也软了一半，就随口说：「看看老朋友，做做统战工作嘛。」

周恩来笑说：「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散散心而已，原来你随时都想到党的工作，做党的统战工作，真是太好了。」周恩来接着又问：「你打算见些什么人呢？」

张国焘坦率地说：「我想见蒋介石，蒋委员长，我既然是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到了武汉，是应该向他报告边区工作的。」

周恩来脸色一沉，向李克农招呼了一声：「你把张副主席好好侍候，好好侍候，我有点事要办。」说完，周恩来就匆匆走了，李克农会意，与张国焘寸步不离，连张国焘上厕所，也守在外边。

4 月 16 日，周恩来对张国焘说：「长江局已向中央请示过，中央同意你见蒋介石，我也与蒋介石的侍从室联系好了，我现在就陪你一起去见蒋介石。」

「你陪我？」

「是的，我一定要陪你，这是中央指示的。」

于是，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武昌见蒋介石，在汉口到武昌的轮渡上，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老毛的确胡来，但是，只有留在党内才能制止他，如果大家都走了，老毛不是更加胡来吗？」

我问张国焘：「你当时对周恩来的这段话，怎样看呢？」张国焘答我：「我被周恩来骗过很多次了，他总是明一套暗一套的，怎敢相信他。」

到了武昌，周恩来吩咐李克农说：「在进入蒋介石官邸以前，你们必须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避免蒋的警卫人员产生怀疑。李克农当

然遵命。张国焘、周恩来见到蒋介石，彼此只说了几句客套话，蒋说改天再详细谈。他们前后大约 20 分钟就出来了，在远处等候的李克农绝没有想到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张国焘这么快就草草结束。当他们从蒋氏官邸走出时，周恩来突然见到一位熟人，正想闪避，对方叫了一声：「恩来，你看望委座（蒋介石）来了？」周恩来连忙向对方行了一个军礼，答了一个「是」字。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委任的中将，张国焘一看周恭敬的神态，断定对方一定是国民党中比周恩来官阶高的官儿，正当周走向对方寒暄时，张心想，天赐良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拔脚就跑，周恩来也顾不得他和国民党高官的礼貌，随后就追，两个中共大人物在武昌大街小巷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绕了几个圈，国焘终于又逃了。

正当这时，李克农所率的人马刚刚赶到，周恩来气呼呼的吼道：「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同时命令李克农说「你一定要把张国焘找回来，我估计他还在武昌市内。」这李克农果然不愧为特务高手，他手持蒋介石委任的上校证件，率领一班身着国民党军人制服的中共党员，在武昌市内作地毯式的搜索，声称「捉拿逃犯」，终于在一个旅馆内又把张国焘找到了。

李克农向张国焘鞠了一躬，抱歉地说：「张副主席，你受惊了，这里不方便、随我上办事处吧？」张国焘坚持不去办事处，他对李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

李克农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周指示说：「他（张国焘）已在蒋介石前露了面，千万不能对他的身体有任何伤害，也不能让他再跑掉，严密的守着他。」

4 月 17 日，周恩来到旅馆见张国焘，面色凝重，向张国焘提出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第一、回延安，第二、向中央请假，第三、声明脱党，再由中央宣布开除。

张表示接受第三个办法。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

我对张国焘说：「你的出走，我在第三天就知道了，比中共中央的宣布早 13 天。」

张国焘说：「当时中央严格保密，怎么可能呢？」

我说：「那一天，我和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当时冯是部长级）在一起烤火，（当时陕北还是严冬），冯就这样随便代说了一句：『张国焘跑了』。他还补充了一句：『我看他搞不出甚么名堂。』」

张国焘听了一笑。

张国焘脱离中共的原因

后日张国焘对我说，他下定决心，脱离共产党，主要由于中共内部的斗争和整肃往往与共产国际、苏共内部的斗争有连带关系。他承认自己属于苏共的布哈林派。

张国焘又说，周恩来过去也属于布哈林派。在那个时代，他和周恩来、瞿秋白等都被称为旧留俄派。1928 年中共六大是由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指导的。1929 年布哈林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其后中共的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共的权力斗争经过一再反复，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路线下发展的。我问到周恩来这期间所扮演的角色。

张答：「周恩来本来是德共党员，后来到苏联又成为苏共党员，1924 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1927 年中共五大才成为中央委员的，所以周恩来早期与中共的关系浅，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深。」周恩来一向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在苏联，在中共内部斗争中，错误的政治路线往往出于莫斯科的指示，一旦失败，周恩来总是勇于承担错误的责任。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普遍不满，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这是国际的决定，中国党必须服从，否则纪律制裁。」「国际指示的正确，绝对不容怀疑。」

共产国际由于苏共权力斗争，领导多变，周恩来也跟得快，这是他的天才。

我问张国焘：「六大后你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中共的一部分党史说，你在四中后为了争取回国，向共产国际认错，向王明派投降了。」

张答：「我在共产国际的检讨是 1930 年 12 月，六届四中王明派的上台是 1931 年 1 月，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每一次中共受了挫折，虽然出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事后都要由中共领导人出面代人受过，承认是自己的错误。我举一个例子，1927 年国共两党分裂后，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后号召组织暴动，对抗国民党；南昌暴动前夕，我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阻止暴动，保存革命力量。结果南昌暴动失败，我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认了错，我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秋白的罪名是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上我和秋白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和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公开的对质和认错。私下秋白却对我幽默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说我错我就认错好了。』」

张国焘说，「1931 年 1 月回国，说我受王明派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蔡和森的影响。」

1930 年秋，立三路线失败，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找到蔡和森要他回国帮助处理立三路线的错误。

蔡和森一向恨透了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提到国际代表和苏共领导，他总是说「这个毛子」「那个毛子」。

蔡和森反问柏金斯基：「为什么要我去呢？」

柏金斯基说：「李立三这个人很难缠，你有一种技巧，能说服对方，而又不惹怒他，所以你是最适宜的」。

蔡和森说：「如果说我有这个长处，那么，我认为张国焘比我更合适。」蔡和森随后去见张国焘，对张说：「我学了『三国演义』中徐庶推荐诸葛亮的故事，把你老兄举上了。」

张国焘说：「我不行啊，我正受国际的处分呢？」

蔡和森说：「我和你一样，不也一样受国际处分？现在机会主义当道，没有什么是非。国际认为你有利用似值，你就是正确的。我劝你写个检讨，向国际认了错，虽然对你个人来说，委屈了一点，可是只有如此，你还能对中国革命继续发挥一点作用。」

张国焘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见，经过表态和共产国际的政治考虑，在这期间，李立三已经垮台，到了莫斯科。1931 年 1 月张国焘到达上海，六届四中已经召开，王明上台了。

张国焘谈长征途中

张国焘说：「当年共产国际的威信很高，毛泽东也屡次表示，他绝对服从国际的决议。毛在江西苏区受处分时，还说过要向共产国际告状呢！1935 年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回国调解一、四两个方面军的纠纷时，毛对张浩说：『你是国际来的，中国党听你的。』1937 年 11 月，王明从莫斯科飞抵延安时，毛泽东主持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也在场，毛泽东把王明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我见了真不是滋味。后来他们结成了毛王反张国焘联盟，周恩来一直是站在王明一边的，他们度了一个短暂的蜜月，然后就完了。」

有一次我问张：「你在领导方式上，和毛泽东有什么不同？」

张国焘起初轻松的回答：「我们领导的方式确实不同，红军行动时，我总是骑着马，老毛总是坐轿子，有时躺在担架上。我骑马，随时要应付设际的战斗，老毛呢，他在轿子里或担架上，可以安静地思索更多的问题。」张国焘突然严肃地说：「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代价。」

我问：「你有什么不同呢？」

张国焘脸上闪出一片光辉，似乎在回忆他的过去，他说：「我们红四方面军过去打胜仗，主要依靠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不扰民，鄂、

豫、皖、川、陕的苏区人民拥护我们。」他一面说着，还提起笔在纸上写着数目字。同时解释说，我们那时组织一个战斗，多少军队，多少时间，多少后勤，多少粮食，都经过讨论的。」

张国焘还补充了一个笑话，他说「我和老毛还有一个不同。我们四方面军一向反对吃狗肉，他们一方面军在老毛带头下吃狗肉，我和老毛还有过一场狗肉路线斗争。」

据张夫人杨子烈女士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

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我问张国焘：「有一个传说，你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回党，有这回事吗？」

张国焘答：「没有这回事。不过，1956 年张向华（发奎）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一位你的老朋友想见见你」，张对我始终没有提及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张继续说：「这位老朋友带来口讯，表示毛对我的关怀，问我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张国焘说：「我的二儿子楚江想考广州中山医学院，但又担心我的问题，这位『老朋友』说：『没问题，没问题，因此后来楚江就去广州读书了。』」

有一次张发奎和我谈到，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时，叶剑英怎样地利用过他，他又怎样把共产党压制下去，张发奎又说：「不过我和叶剑英至今还是朋友，他秘密来过一次香港，就住在我家。」张发奎所说的叶剑英秘密访港，时间和张国焘的「老朋友」相晤，时间上大致吻合。

张国焘想与陈独秀组新党

我曾问过张国焘：「听说你计划过和陈独秀先生合作另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有这回事吗？」

张答，「我和独秀先生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要另外组织共产党，一定要独秀先生领导。但是独秀先生一再坚决表示，绝对不能与蒋介石合作。因为独秀先生认为蒋与他有『杀子之仇』」。另外，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彭述之（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也力阻陈独秀张国焘再度合作，周恩来则屡次派王若飞访陈，向陈解释过去他们辱骂陈独秀『托匪汉奸』是一种误会。又要求陈保证三不：「一不要发表政治文章，二不要公开演讲，三不要与张国焘搞在一起」。周又提出陈可到延安去看看老朋友，在延安长期休养也可以。如果陈不愿去延安，在四川的生活、医药费用，一律由中共负责，陈全部加以拒绝。但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组党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周恩来确实收到了破坏陈张合作的效果。

张国焘说，国民党方面，蒋先生经常总是被一些人包围，容不得外人插足。我和蒋先生谈过几次话后，有人就对蒋先生说：「国民党应付一个共产党够头痛的了，如果张国焘再领导一个共产党，我们国民党的麻烦岂不是更多了！」还有人说：「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出于个人野心。」

国民党在 1938 年 6 月通过决议，恢复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这些中共党人都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张在重组中共的计划失败以后，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有时作些时事分析的政治报告，当时国民党似乎很重视他的分析，编印成书，分发给训练班的学员作为「学习文件」。1945 年，张国焘在国民党六大中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张国焘不惯于国民党官场习俗，两个月后便去了上海。

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当时标榜独立超然。由于时局急变，便停刊去了台湾，不久又到了香港。

张国焘早年在北京大学是读经济的，他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有过研究，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经济学知识颇为自负。

国民党政权经济危急时，蒋介石也曾经要张写出他对挽救经济的意见。我和国焘在香港谈话时，他还有一个习惯，在分析问题时，用一支笔在纸上画数目字……。

正因为张先生对于他的经济知识太过自负了，到了这个商业社会的香港，很快便卷进了炒黄金的买卖，最初赢了几次，最后输了。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我曾问张国焘：「中共的史料中说，你在苏区杀了许多红军领导人，是事实吗？」张答「红军的整肃属于独立的肃反系统，如果四方面军的肃反要张国焘负责，那么，红一方面军在赣闽一带的肃反，红二方面军在湘鄂西一带的肃反，杀的人比四方面军多得多，毛泽东、周恩来、夏曦、邓发等都直接领导过红军肃反，我张某算得什么？」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毛）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胡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政治人物往往看别人易，看自己难。

文革期间，张国焘出版《我的回忆》，杨子烈出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68 年，张国焘夫妇移民加拿大。1974 年我旅行加拿大，曾去看望过他们。国焘先生于 1979 年 12 月逝世。

中共的资料中说，张国焘晚境凄凉，冻死异邦，在我的印象中，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 83 岁，张国焘逝世时 82 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 1 年而已。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时期，假如张国焘还在中国大陆，绝对活不到 82 岁的。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的功过如何，有待中共秘密档案的开放。张国焘与我亦师亦友，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历史的真相，虽属片面，但自信忠实。张国焘为人自然有他的缺点，否则他怎么到最后一败涂地？假如由于他的失败而否定他在中共的历史地位，这是很不公道的。

第四章 我所认识的周恩来

1938 年，我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 代年，我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中共党内对周恩来毁誉不一。「文革」期间，周恩来的确庇护了许多老干部，就中共党的利益而论，周恩来屡次把中共从分裂的边缘挽救过来，他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把他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的党。他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他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

周恩来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党内任何一个路线最狂热的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我检讨者，他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周恩来这个人到底如何，甚至他的夫人邓颖超也不能完全了解。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是个道家，也是演员

周恩来（又名周绍山，周少山，伍豪），1898 年生。祖籍浙江绍兴。祖父当过江苏淮安知事（县长），从此落籍淮安。周恩来也在淮安出生。周恩来的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常常失业。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小叔父为子。不久小叔父病故，由嗣母抚养。9 岁时生母、嗣母相继过世。周恩来的幼年是在十分不安定的环境中成长的。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他在性格上有绍兴师爷的机智；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他在性格上有苏北人的干劲，加上他自幼在十分不安

定的环境中成长，使他善于应付逆境，与人周旋；周恩来青年时代的道家功夫，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屡次化险为夷。

平心而论，周恩来这个人在外表上给人的印象是不坏的。他文质彬彬，具有若干现代知识；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早年如果不是从政而选择演戏，相信他也一定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个电影明星。

周恩来早年崇信过道教，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何道也？日，常道也。」「尊生死之轨，后天地之经，不戕其生，不变其本，则死无所见，焉用其生，知其人死，又安知其生。是生有常道也。」（1916 年南开〈校风报〉）

周恩来自幼信奉道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后日的政治生活，凡事能在「忍」字上下功夫。以道家精神的「内涵不露，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无为而治」，制敌于机先，化敌于无形。文化大革命时，各帮派的头头互相指责对方，周恩来要求各个不同山头的红卫兵团结，他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了，还不是靠一个『忍』字。」

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相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1960 年，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

访问北京，美国青年问周恩来：「听说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是真的吗？」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的事，你们倒知道了。」周恩来要打倒一个人，必定高举他。周恩来要打倒蒋介石，必定高举蒋介石；周恩来要打倒毛泽东，必定要高举毛泽东。他的聪明是懂得和利用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踏脚石。

中共最早的国际派

1920 年 12 月，周恩来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到法国，他利用的又是天主教关系，担任《益世报》通讯员。不久，张申府夫妇介绍周参加德共，再不久又由赵世炎介绍参加中共旅法小组。

1921 年 1 月，周恩来致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力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1982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周恩来旅欧文集续编》）

1923 年 4 月 15 日，周恩来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周恩来写道：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可不顾。」根据列宁这种「无孔不入」的策略，早在 1923 年 6 月，周恩来在巴黎即已参加国民党。据当时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岐山的通信中说，当时周恩来表现的是一个对国民党极为忠贞的党员，言必称「我总理孙中山」。

1924 年 7 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他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辩护说：「列宁此举，可谓通权达变。」（1925 年 10 月 15 日，天津「益世报」）

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回国，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周恩来必须紧跟蒋介石。1924 年 9 月上旬，周恩来到达广州。由于当时广州的局面混乱，形势特殊。周恩来到了广州，声称「拥蒋」，在蒋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安排下，周恩来很快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法处长，党代表，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东江行政专

员等等，一路不断升官。1926 年 3 月，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共产党员企图劫持蒋介石被扣），周恩来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共产国际在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时，就同时培养中共的军事领导人。最早被国际重视的是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杨殷、周恩来三个人，后来陈、杨早死，就剩下周恩来了。

周恩来是共产国际为中共最早培养的领袖之一，他在政治上也绝对服从国际路线。

很多年以后，胡耀邦在 1985 年 4 月 11 日的一次讲话中说：「30 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党内有一种不好的做法，就是党内争论、吵架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去找共产国际打官司。」

中共党内斗争与发展与生俱来。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在斗争中不断发生变化，直接影向到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往往以路线斗争为外衣。路线斗争是一面旗帜，也是整人的工具，同样的旗帜，今天是这一派的武器，明天也可能是另一派的武器。共产党根据唯物辩证哲学，谁有权力就跟谁。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是因为他的个人声望成为中共领袖的，张国焘担任一大主席是维丁斯基和马林先后向共产国际反映作出决定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是由马林提议的。周恩来在中共五大中出任秘书长和当选中央委员，以及实际主持中共六大，都出于布哈林的支持，其后，随着布哈林的垮台，周恩来很快成为干部派，即斯大林派。

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复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周恩来权倾一时

1927 年 4 月 24 日，中共举行「五大」，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兼中央军事部长，即后日的中央军委书记。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改组，

选出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等五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从此周恩来进一步为中共核心成员之一。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一书中说，这五个常委名单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指定的。

中共一大到六大，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直接指挥的。一大至五大是陈独秀当家的。周恩来在五大中担任秘书长，渐露头角。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复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而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

中共历史上所谓路线斗争，从「五大」以后，每一次都与周恩来有关。国际的每一个指令，周恩来无论理解不理解，总是冲锋在前；继而国际的又一个指令，说中共没有好好执行国际的决定，犯了错误，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检讨自己。

1928 年 6、7 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拒绝参加，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指导，周恩来、向忠发主持。根据布哈林的建议，中共六大必须提升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所以，向忠发为总书记，顾顺章指挥中共特科行动，项英主持上海工总，苏兆征主持港粤工总，这四个人除苏兆征是自然死亡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项英一直反毛，最后在皖南事变中为身边的保卫人员所杀。六大选出的常委蔡和森反对国际被撤职，补上了李立三，中央权力由周恩来集中领导。

在六届一中上，周恩来所担任的职务有：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主席。李维汉说，六大以后，周恩来是政治局实际决策者，胡乔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周恩来条目中说，六大以后，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六大以后，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最高的主持人，有一个偶然的因素，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1924 年与周同时经苏联回国，在莫斯科极受共产国际的欣赏，认为他具有领导才能，他又是陈独秀的长子，国际有意培养他接独秀。恩来与延年到广州后，鲍罗廷在国际指示下

宣传陈延年，甚至说陈延年是「东方的小列宁」。延年当时担任中共广东最高的领导人。据中共最早的 49 个党员之一徐彬如回忆说「延年的工作能力很强，在同志中的威信最高」,「当时广东的整个政治局面都由他掌握」（见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记实」)。在广州时，陈延年是周恩来的领导，如果陈延年不是因为 1927 年国共分裂时被杀，次年（1928）的中共六大的主持人，很可能就不是周恩来而是陈延年，中共的党史也可能要改写了。

1929 至 1930 年，国民党内战不已，共产党的内斗也高潮迭起。苏俄红军借口中国东北与俄国连结的中东铁路纠纷，入侵中国，发生中苏边境战争。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刘伯承等当时在苏联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苏联红军对中国作战。以陈独秀为首反对当时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结果被周恩来的中央开除出党。

1929 年 10 月 29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由库西林起草的给中共的指示，认为中国内战危机加深，中共应克服党内右倾，坚决全面进攻，组织暴动，夺取大城市。

1930 年 1 月 17 日，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上述指示，在中央政治局报告说：目前蒋冯阎军阀的内战即将爆发，「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2 月 1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又说，把握形势，集中红军攻坚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周恩来的讲话 30 日作为中央文件发表。当时在上海直接领导周恩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周的意见。3 月 3 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把上述分歧要求斯大林裁决，获得了斯的支持。周恩来把斯大林的指示又传达给在国内主持党的李立三，这就是所谓「立三路线」。

立三路线与反立三路线，真正负责的也都是周恩来，而当时的王明只是「红旗」杂志编辑，听命于周，中央的决策，特别是苏区，王明根本是插不上手的。

1930 年 5 月，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中共势力大为扩充，正规红军有十余万，根据地及游击区约 20 多处。周恩来、李立三、毛泽东的头脑都发热了。6 月 11 日，李立三主持中央通过「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将党、团、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动总。提出「组织军事化，党员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兵营，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口号。在此同时，毛泽东也提出「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政权」，「争取江西一省的红色政权的首先胜利」。毛当时对立三路线不敢公开反对，不过在具体执行上耍了手段，所以后来立三路线失败，而毛的实力反而扩大了。

立三路线开始，共产国际和苏共都很振奋，共产国际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作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斯大林对周恩来表示嘉勉。

其后，红军两次进攻长沙失败，「立三路线」全面受挫，共产国际命周恩来、瞿秋白召开三中全会，清算李立三。

周恩来在三中全会讲话。作了自我检讨，他首先主动地为共产国际承担责任。他说，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中国党的理解不够，周恩来巧妙地为自己辩白说：「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中共中央只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周恩来突然用锐利的眼光扫了一下瞿秋白，话锋一转说：「立三同志的错误是有历史根源的」。

瞿秋白立刻理解到，周恩来暗示要他承担错误的责任；瞿秋白天真地为周恩来的话所感动，他完全不知道周恩来这「历史根源」四个字是个圈套，瞿秋白不懂政治手腕，也不懂得怎样为自己开脱责任。瞿秋白竟痛哭失声地说：「立三同志的错误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

共产国际决定「去瞿留周」，瞿秋白被撤除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的权力更大。共产国际撤了李立三，又送来了王明。王明成了米夫和周恩来的傀儡，李立三长期在苏联接受审查，并一度入狱，几乎被枪毙。而周恩来又往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上演「王明黄袍加身」

的新戏，这一节，我写在有关王明的部分中。

中央实际上第一把手

如上所述，周恩来六大以后，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而在这同时，毛泽东领导了秋收暴动，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发展为赣闽苏区，成为红军最大的实力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

六大以后，中共党内有两个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际派，另一个是以毛泽东、罗章龙、何孟雄为代表的土共派。国际派挟莫斯科的权威号令中共中央；土共派以毛泽东的枪杆子，罗章龙的地区党委，何孟雄的工人运动，再加上当时左翼文化人的活动，他们都是反对国际派的。土共派的声势远远超过周恩来的国际派。

在此同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也发生变化。中共六大是布哈林指导的，不久，布哈林垮了，斯大林完全控制共产国际，斯大林清洗中共的旧留俄派，米夫是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追随米夫，自然地成了当时中共的「王储」。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在此以前，王明受过党的处分，1930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根据米夫的指示作出三个决议：1，撤消李立三时代对王明、秦邦宪的处分；2，把本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秦邦宪、王稼祥等塞进党中央；3，任命王明当江苏省委书记（又称江南省委，包括苏浙皖），当时中共所领导的全国性中枢都在这个地区。所以米夫对王明说过：「谁能控制江苏省委，就能领导整个党中央。」

六届四中没有开场，王明还没有加盟以前，反对派认为，这幕戏的实际主角是周恩来，反周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反对派说，周恩来积极领导了立三路线，又积极领导了反立三路线，反复无常，中共许多领导人耻其所为，展开了反周恩来运动。毛

泽东、罗章龙、蔡和森三人早年一度在上海环龙路住在一起，他们自称为「三户楼」，取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罗章龙诗中也有「亡秦主力依三户」之句，可能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毛派小组织。毛罗蔡三人都是湖南人。这个小组织的反对对象逐步针对周恩来。

1931 年 1 月 1 日，全国总工会在罗章龙主持下举行，会上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罗章龙说，「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是一丘之貉，不堪教育。」周恩来是「隐藏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机会主义者」。会议中通过，立三路线犯错的人全部下台，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另组党中央。

罗、毛、蔡三人早年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中共三大时，罗章龙、毛泽东、蔡和森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六届四中以后，国际派上升了，周恩来上升了，毛派也上升了。其余的反对派就日渐式微或者转向，或者改变形式活动。

领导地下工作与统战

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工作与统战、情报三位一体的。

当时中共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他们利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制造矛盾；利用国民党和资本家的上层人物和他们的家属，布署成一层一层的情报网。他们利用一批人，又消灭一批人，然后再以一批新人代替旧人。由于被利用者往往属于单线联系，有的同志至死还不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有一件中共和国民党避谈的秘密历史，就是，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特务。国民党保密是因为宋是孙中山的如夫人，曾被奉为「国母」；共产党保密是因为宋庆龄在国民党的身份特殊，通过宋的关系，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元老和高层人士，掩护和保释了大批中共重要人物的活动。宋庆龄在 1927 年 8 月去莫斯科，两次出席由共产国际召开的「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后，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公

开领导「互济会」「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等的名义，秘密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和从事中共的国际宣传工作。当时上海租界当局也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对她没有办法。宋庆龄死后，廖承志写了一篇追悼文章，文章中说，1933 年廖承志被国民党逮捕，宋庆龄把他保释后，要他以最小的字体，把他所见的中共重要政治犯在狱中的表现写出，那是一张很小很薄的纸片，宋庆龄打开烟盒，把香烟内的烟丝抽空，然后把写上情报的小纸片装进去，把香烟的两头封好，宋庆龄对廖承志说：「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的。」然后她又补充了两个字「国际」。廖承志当然理解，国际就是共产国际。（资料来源：1982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宋庆龄有位漂亮的女秘书，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这位女秘书与周恩来秘密的罗曼史，后来成为一部畅销小说「沉重」写作的背景。

周恩来地下工作中一个著名的特务，是他运用杨度。杨度是曾经组织捧袁世凯做皇帝「筹委会」的首恶份子，是才子也是鸦片鬼，无行，袁世凯帝王梦失败后，替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由于他在民国初期的上层关系网很广，多次提供中共机密情报，对中共贡献很大，周恩来屡次说，杨度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无价之宝，要中共党史为杨度树碑立传。

周恩来地下工作中另一个著名特务是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此人广交国民党高层人士，为国民党中统第一任上海负责人，和日本特务机关，租界的英法巡捕密切合作，常能掌握关键情报卖给中共，立功甚多。后来中共因为他敲诈过高，隔断与他的联系。解放后此人在上海讨饭度日，向周恩来要一份工作，周恩来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红岩的「影子内阁」

周恩来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第一高手。直到今天，我还看不出中共有人能像周一样集统战、特务、组织、宣传于一身的人。他以宣传配合组织，统战配合特务，合法斗争配合非法活动，利用灰色面孔，中

立立场，广交朋友的手段扩大中共的影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敌人的钱，办共产党的事。他还善于暗中掌握敌人的宣传机构制造舆论。

1940 年重庆的文化界为沈钧儒祝寿，我参加了。在座的有各党派人士和工商界著名人士。周恩来即席致词。他说：「诸位不用担心，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 50 年甚至是 100 年以后的事。」当时掌声雷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颗定心九。

周恩来善用祝寿统战，这种祝寿，周恩来认为是一种斗争方式，既可以祝寿为名，公开聚会；又可以广交朋友，我记得他为郭沫若、马寅初、梁希（科学家）等都举办过祝寿，影响不小。周恩来还把请人看戏当作一种政治工作。周恩来说，进步话剧的演出，本身就是政治斗争，请人看戏，又可以收到宣传和交朋友的双重效果。

周恩来还有一种急智。1940 年 11 月 7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在重庆举行招待会，国共两党的高层来宾甚多。我以朝鲜义勇队秘书的身份应邀参加。忽然有人在场散发小册子，主人大惊。因为散发者是蒋介石的顾问王芃生，又不便阻止。周恩来见状，立刻上前对王说：「王先生，我来帮你卖书。」顺手就将王芃生手上的小册子接过去。周一看书的内容是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又笑嘻嘻地对众人说：「王先生这本书太好了！」周恩来机敏地处理了一个尴尬场面，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这位蒋介石的日本问题顾问王芃生，我常与他接触，向他请教。因为我在朝鲜义勇队也要研究日本问题。

抗战时，重庆是中共延安以外一切活动的指挥中心。重庆有三个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机构。一是红岩，这里对外公开的是八路军办事处，对外不公开的是南方局，二是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三是民生路的新华日报门市部。

中共领导人会客，差不多都在「周公馆」，开会在红岩的多。「周

公馆」周围国民党特务甚多。所以「周公馆」有一条地下道，平时称作防空洞，可以直接通到嘉陵江畔。但是我自己没有走过。

红岩人才众多，也被外间称为中共的「影子内阁」。这个内阁的核心人员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其中叶剑英主管军事情报（包括与苏共之间的情报交换），成员有王梓木，薛子正等。外交方面的人最多，周直接掌握，章汉夫协助。其中的分工有：乔冠华主管国际情势分析，龚澎主管外交情报，陈家康主管亚非联络。财经方面由许涤新，薛暮桥，钱之光，熊瑾汀分别主管。政治研究以宋平为首，其次有吴克坚，王炳南，童小鹏。文化宣传工作由徐冰，潘梓年，张友渔，熊复分别主管。妇运由邓颖超，张晓梅主管。青运由刘光（后冯文彬）主管。我与陈家康联系较多，遇有重大事件，由周恩来，董必武决定。

南方局以周恩来为首，政治上的第二把手是董必武，军事上的第二把手是叶剑英。当时八路军有三位参谋长，左权是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滕代远是应付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叶剑英是专门应付国民党的。他本来就是国民党，北伐时张发奎倚为心腹。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叶剑英还在张发奎司令部参与机要对付共产党。张发奎曾对笔者说，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地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张发奎还对我说：「后来叶剑英参加广州暴动，我大吃一惊，不过我们的私谊一直很好。」

第五章 我所了解的王明与「王明路线」

中共党内斗争中，历时最长的是清算王明路线。其实，王明路线是个代名词，王明本人在中共内部是没有根的，他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挥中共的一个工具，中共领导人中具体执行王明路线的代表就是周恩来。

「王明路线」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盖子，据我了解王明和「王明路线」是两件事，王明是一个人，「王明路线」是一个「政治符号」。而这个「政治符号」所代表的是以斯大林为主的国际路线，通过王明的传达，周恩来的具体执行，甚至当年毛泽东为争取苏联的援助，也利用过「王明路线」，这些历史真相，中共党史有所避讳。因为他们自己难以说得清楚。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的说法，所谓王明的宗派主义和「王明路线」统治党达四年之久（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到 1935 年遵义会议）。1937 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到 1942 年延安整风，被称为所谓第二次「王明路线」。我于 1937 年入党，1943 年退党，正处于第二次「王明路线」期间。我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路线哪一派，不过「王明路线」从广义的解释，我们那个时代（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都可以泛称为「王明路线」者。所以，延安整风几乎整到每个白区地下党党员，如果当时我仍在延安，很可能遇到王实味相同的命运。

王明这个人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 年生于安徽金塞县，幼年读私塾，所以他的国学有相当基础。1919 年入小学，其后读过农料与商科，在考试中屡获第一名，也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 年夏，在武汉参加共青团和中共。同年 10 月，被选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被选为中大学生会主席。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大俄文最好最活

跃的中国留学生，为当时中大副校长米夫所赏识。

王明于 1927 年作为米夫的翻译回国参加中共五大，次年又以翻译主任的名义参加中共六大。由于当时俄共权争激烈，中大校长拉迪克被认为接近托洛斯基，副校长米夫是斯大林的亲信。中大留学生也介入俄共党争，在米夫支持下以王明为中心的一派的小组织称为「支部派」渐成为留俄学生的主流。此即二十八个半标准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的来源。王明这个小组织中，最知名的有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

王明成为这一派的领袖，当然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俄文好，不仅做过米夫的翻译，甚至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有时也通过他的翻译；第二他用功学习，记忆力强，在与别人辩论时，引用马恩列斯的语言，背诵如流；第三，从入党以后，他在中共的「向导」、「布尔什维克」、「红旗」、「劳动」等刊物，写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王明的文章很多是反陈独秀、反瞿秋白、反李立三的，他基本上反映了苏共党争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当时苏共中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二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经济务实」论：三是以斯大林在苏共权争中利用左右两派的矛盾而取得控制权力的。中共对王明的清算，说到王明时左时右，是不错的，其实这正是斯大林「两手策略」的政治性格。我第一次见到王明的名字，是 1936 年初中共秘密在上海印刷的一份小册子，原文的说明是「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的讲话」。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王明的讲话就是根据国际「人民阵线」的总路线精神而发挥的。当时王明和康生都是中共驻国际的代表。王明这个讲话，时间是 1935 年 8 月 1 日，以后被简称为「八一宣言」，同年 12 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中通过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1936 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创办了「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出版，由吴玉章主持，反复宣传「八一宣言」和王明，自此，王明的「八一宣言」已成为中共从「土地革命路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代表性的文件。

1938 年春，我在延安初见王明，我记得当时对他的印象是，面团团，方敦敦，矮矮的身材，像中国一般小说里所写的白面书生。但是他穿着一身列宁装，足登一双长统靴，又像一个外国归来的留学生。我在延安记不清见过他多少次，早些时候见到他，他总是笑咪咪地，有时在延安街边还和我们普通同志也包括老百姓聊几句，后来见到他，笑容不见了，也不说话了，再后来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了。

1969 年我访问苏联，主要想看看他，但是苏联官方用各种借口不让我见他，不过，我从有关的朋友中，也获得一些他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中共和苏共官方都避谈的。

六届四中的经过

1931 年 1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报告出席代表人数有：王克全、张坤弟、陈郁、余飞、徐锡根、王凤飞、徐兰芝、袁乃祥、邵泮林、沈先定、韩连辉、史文彬、张金保、萧道德、许畏三、王明、秦邦宪、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孟庆树、夏曦、陈原道、向忠发、周恩来、罗登贤、关向应、康生、李维汉、陈铁铮（孔原）、任弼时、温裕成、顾顺章、贺昌、何孟雄、罗章龙等三十九人加上列席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共四十人。

关于这次会议经过，我听到过两个内容稍有出入的版本，一个是李希逸，即李秋生（曾任中央青年团中委）的叙说：

会议还没有开始，何孟雄、罗章龙就和周恩来吵起来了，他们说，他们在开会前数小时才接到通知，是周恩来耍了手段。何孟雄问，这个会是什么时候决定召开的？是谁决定的？周恩来答：「是国际决定的。是米夫同志决定的。」罗章龙问：「要讨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思想准备？」周恩来答：「你问米夫同志。」

开会一天，吵了一天，开了一天，闹了一天，向忠发宣布，现在决议案已经通过，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选出，结束散会。何孟雄说，「我还有话说。」米夫看看手表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再不散会，很

危险。」

周恩来说：「今天同志们没有机会充份讨论，实在是不得已的，在国际精神，在国际代表米夫同志的指导下这个会是成功的，请同志们要以团结为重，要以安全为重。散会吧。」

罗章龙还在骂：「奴才，奴才」，上海女工代表张金保对罗说「侬说得小声点儿，快走吧！」

有人边走边骂：「会上通过了什么，我全没有听清楚。」「向忠发识几个大字，他念的稿，自己懂吗？」

这个骂：「赤佬」，那个骂「瘪三」。六届四中就这么结束了。还有人在叫：「我有话说。」听到的回音是：「再不走，老子揍你。」

另一个版本是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叙述的：

这一天，会议还未开始，罗章龙就和周恩来吵起来了。罗章龙问周恩来：「四中全会是谁召开的？」周答：「中央。」

罗问：「既然是中央全会，为什么有的中央委员没有通知？」周答：「有的中央委员最近参加过中央别的会议，所以没有通知。」

罗问：「四中全会为什么事先没有准备？」周答：「为了安全的理由，同时也是国际代表米夫同志的意见。」

罗问：「四中全会开几天？」周答：「一天。」

罗问：「二中开了六天，三中开了五天，这一次会只开一天，为什么？是你决定的？」周：「是国际代表米夫同志决定的。」

米夫接着补充说：「这确实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时会上支持罗章龙的大叫大闹，米夫在周恩来身边耳语，接着周恩来大声说：「安静，否则纪律制裁。」会上，闹声更大，等到周恩来说：「现在，我自己做检讨。」大家就洗耳恭听了。

周恩来说：「立三路线，我有责任；三中全会，调和主义，我也有责任。我们不断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对国际路线的认识不够。我们要用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会上有人喊：「你是布尔什维克吗？」

王明接过话去，「三中全会的要害是调和主义，周恩来同志已经认识自己的错误；三中全会的另一要害是左倾掩盖右倾。我们要在国际的帮助下，全面改造党的领导。」

接着，会上又有人喊叫：「下台，下台，立三路线者下台，机会主义者下台。」罗章龙高呼：「周恩来应该现在就下台。」

周恩来接着说：「我提醒大家，作为共产党员，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这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认识。」

罗章龙说：「照你这么说，党内只有服从，没有民主了？」

周恩来语塞，米夫看看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大家的意见也都说得差不多了，为了安全，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结束会议，现在，进行选举。」

中共六届四中，有人说，当时王明虽是主角，听从米夫的指导，故意表现得谦虚客气，不多说话，主要的重头戏都在周恩来身上。

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中说，他是很反对王明的，但被周恩来说服支持王明，其它反对王明的同志，也被周恩来一一说服。张国焘也对我这么说过。

徐彬如（曾担任中共革命博物馆馆长）在他的回忆中记述，罗章龙对他说，他们坚决抵制王明，对周恩来在四中的表现很有意见，认为他（周恩来）不应该支持王明上台。后来一般同志对四中的态度都经由周恩来审查。

中共六届四中通过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和中央第一号文件，「红军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都是周恩来起草的。

周恩来扑杀反对派

周恩来在六届四中表面上虽然胜利，但党内反对派的实力依然很大。周恩来用尽全力分化与瓦解反对派。

1931 年 1 月 9 日，即六届四中开会的第三天，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由何孟雄主持，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告同志书」，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并选出何孟雄、罗章龙、王克全等为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委员，自此中共一分为二，一是周恩来、王明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的一派称为「临中派」。「临中派」展开全国活动与「四中派」对抗。1 月 17 日「临中派」的江苏省委成立，当时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左联都在江苏，江苏省委是全党最大的实力派。

1 月 18 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立的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时，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处死。当时盛传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国民党告密的。笔者曾查看过国民党的「匪情档案」中也见到这份资料。王明晚年的回忆中说，告密的人叫王拙夫，当时是锹的交通员。美国费正清回忆中说，中共高层人士有人私下对他表示，当年的确有人想「一箭双雕」，既可以消除党内的敌人，又可以作为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鲁迅当年同情中共的反对派。何孟雄事件中死的有五人是著名左翼作家，其中如柔石、殷夫、白莽等都是鲁迅的朋友。

1 月 21 日，即何孟雄等被捕之第四日，周恩来约了罗章龙、王克全谈话。周恩来要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周说：「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罗章龙正色道：「是你们出卖了他们。」周恩来也拍了台子说：「你侮辱中央。」罗章龙说：「你做走狗我不做。」王克全也指着周恩

来的鼻子骂：「你周恩来，赤佬，卖身投靠。」(注：「赤佬」是上海人的粗话，「下贱」的意思)。

周恩来一怒拍案而起说：「限你们五天之内解散你们的分裂活动。」罗章龙拉住王克全，向周恩来挥一挥手说：「你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周恩来把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向米夫作了汇报。米夫大怒，1 月 27 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罗的中央委员和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1 月 31 日，反对派的非常委员会中央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铁腕之下，打击威胁与利诱说服双管齐下，反对派不断分化。反对派的最后一任中央书记王云程被捕后，向国民党的交代中说：「他们（指中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中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二十余人，都死在康生、周恩来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

张金保（女工出身的中央委员）逝前说，四中全会几乎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戏，她曾表示不服，周恩来以停止生活费威胁她悔过。

后日在中共七大中，有一份为何孟雄平反的提案，其中说到某些同志，往往牺牲同志保存自己。他对人的利用，往往榨光了对方，然后抛弃。又提到当年何孟雄等被捕党中央有责任。虽未点名，但是矛头暗指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是可以看得出的。后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也表扬了何孟雄。1969 年我访问苏联，问到一位与王明接近的人，我问：「王明所指何孟雄等当年被国民党逮捕是一个叫王拙夫的告密的，这王拙夫到底是谁？」答者说：「王拙夫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被认为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了。」

30 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共敌对派系都向国民党告密，打击对方。

1931 年 4 月，顾顺章被捕；6 月，向忠发又被捕。顾顺章是上海的流氓，1927 年第一次国共分裂上海第三次暴动时，是周恩来的副手，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特科行动。向忠发是名义上的中央总书记。顾、

向被捕后相继向国民党投降。当时国民党采取共产党员自首认人的办法对付共产党，监狱，路边到处都有向国民党自首者去找他们相识的同志向国民党举报，因此，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之下上海绝对不能立足了。

王明在苏联打开新局面

六届四中以后，周恩来手握中央人事调动大权，派往江西苏区的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三人代表团，派往湘鄂西的是夏曦、关向应。派往鄂豫皖的是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派往赣东北的是曾洪易。其中张国焘和关向应本来都反对过王明，是周恩来尽力争取和说服下支持六届四中的。

1931 年 2 月 22 日，周恩来致电共产国际，「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政治干部百分之六十，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当时康生为周的主要助手，负责安排。

1931 年 1 月 24 日，中共政治局委员，特务头子兼管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6 月傀儡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康生当时以上海租界工部局华董虞洽卿秘书的身份把周恩来、王明救出。安置在尼姑庵中（当年的虞洽卿在上海租界是特权阶级，康生驾驶虞的私人汽车无人敢加以阻止，这是康生在延安枣园亲自对我们说的。），9 月王明、康生相继去了苏联，10 月周恩来去中央苏区。这三个人当时是党中央的核心。

上述三人离开上海以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指定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垣、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织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其中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垣为常委，由秦邦宪负总责。后又称为总书记。

1931 年 11 月，王明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中国正发生「九一八事件」，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苏联也担心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苏联的远东边境产生威胁。国际新形势使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国民党

的剿共政策同时陷入迷谷。中国反日的运动再加上受到苏联的影响。王明当时的名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实际上也是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的代表，因而中共中央在上海受了挫折，王明在苏联的地位重要性反而提高了。

1933 年 1 月 7 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愿与全国各军队联合反日，并在「共产国际」发表文章提出，「反日统一战线」的口号。10 月 27 日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不久并获得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名支持。1935 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中当选中央执委和书记处书记。并以「王康指示信」代表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东北抗日联军。在这同时，南京的国民政府也有联俄抗日的打算，1935 年 12 月，蒋介石的代表邓文仪与王明的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开始秘密会谈。当时日本借口反苏反共，向中国深入侵略，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在反日的前提下有了共同语言。

在这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远东，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件不断发生，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因此，一部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酝酿联合对抗法西斯，这种概念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就形成人民阵线的组织，共产国际再通过王明就形成了中共从反蒋到逼蒋，到联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中国红军在陕北的确也已经走投无路，面临绝境，所以，中共也感到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当时中共统战的主要对象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北军。但是同时中共也并未放弃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企图。

1936 年 8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王明说，为了使红军靠近苏联「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9 月 8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红军「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9 月 19 日，毛、周电共产国际，「向甘西及宁夏发展，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决定的一环。」当时中共之所谓西征，指的是已经溃不成

军的西路军；但是，斯大林正为了争取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中共领导人要求苏联提供飞机大炮的支持，可谓完全估错了形势。

1936 年 12 月，函安事变传到陕北时，中共领导人最初的反应，主张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莫斯科指示中共，中国需要抗日联合战线，争取和平解决，促使张、杨释放蒋介石。随后张学良陪蒋介石悄然离开西安去南京，与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关。

1937 年 7 月，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表示支持。

11 月 29 日，王明偕康生、陈云等由苏联飞抵延安，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当时的身份是国际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加上他离开莫斯科时分别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所以当王明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倾巢而出到机场欢迎。

我到延安后不久，有一位参加过欢迎王明的同志对我谈到，当日王明的专机没有能准时到达，毛泽东在机场苦等了大约三个小时。等到飞机到了，王明等人下机时，毛泽东迎了上去，和王明作俄国式的拥抱，两人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群众欢呼雷动。

机场上临时举行了欢迎会。

毛泽东对王明的欢迎词中说，「王明同志喜从天降，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王明同志不仅是中国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世界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我们对国际同志要饮水思源，感恩图报。」

王明在答词中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最敬爱的领导者。」「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接着，毛泽东和王明两人又拥抱，又亲嘴，群众又接着鼓掌欢呼……

附带一说，延安时代，毛泽东到飞机场欢迎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明，另一个是林彪。

我于 1937 年底比王明稍迟到达延安时，街头墙上还依稀见到「王明同志万岁」、「拥护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领袖王明同志」的标语。当时「王明」两个字在延安红得如日中天。王明与毛泽东的「蜜月」开始，两个人都各有一个梦，王明的梦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代表国际，是中共当然的领袖。毛泽东的梦是，中共的确很穷，需要共产国际的援助，改变国际对毛不信任的状态，王明是最适当的桥梁了。

王明、周恩来的「第二中央」

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王明作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报告。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呼应了王明的意见，并举例说「由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以上王明和周恩来的讲话，实际上代表的都是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意见，斯大林认为中国抗战，必须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重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因为中国抗战有利于苏联。

在这次会议中，补选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又同时宣布成立召开七大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书记王明。中共中央文件的排名都是毛王并列。当时王明是中共中央书记兼长江局书记，又兼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周恩来）。

中共长江局成立后，等于形成两个中央，延安的中央以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刘少奇为中心。武汉的中央（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项英、陈毅、方方、李克农等。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王明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叶剑英为参谋

长，秦邦宪为组织部长，董必武为民运部长，李克农为秘书长，声势比延安为大。秦邦宪曾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说：「长江局工作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新四军等」。当时的「两个中央」之说，延安被称为「小中央」，长江局被称为「大中央」。据笔者粗略估计，从 1938 年 1 月至 3 月，延安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达十四次之多，我当时住的窑洞，和「新中华报」社长向仲华为紧邻。

王明和毛泽东在延安初见时，表面上似很友善。不过两人各怀鬼胎，各有打算，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希望通过王明要求斯大林直接援助中共，而王明向毛泽东传达的资讯是，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中国抗日力量团结的扩大，包括拥护蒋介石及联合中国一切地方势力等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包括唯有对托派的斗争绝对不能妥协。

有一回，王明到抗大演讲时，我见到抗大教育长许光达，王明进场，许光达向我们介绍说：「王明同志不仅是中国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世界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在场，态度严肃。可能凭他的特务嗅觉，已经闻到火药味了。

其后，王明开始讲话了，在我看来，当时他的态度似很谦虚，他说：「王明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最敬爱的领导者，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的印象中，王明讲话修辞优美，像朗诵散文诗，热情洋溢。我很欣赏他的演说天才。

正如李维汉的回忆录中记述的，王明返延安后威望如日中天，毛泽东变得很孤立。毛泽东自己曾说，他的命令出不了他的窑洞。王明的权力重心在武汉，所以 1938 年 3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让王明回武汉。政治局 8 名成员中，支持毛的提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三票，支持王明的有王明、周恩来、

陈云、康生、何凯丰五票，结果毛的意见被否决，王明仍回武汉。

康生，周恩来出卖王明

1938 年 9 月中旬，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亲率高级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热烈欢迎。这时王明对毛泽东布置好清算他的圈套似乎毫无所觉。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一件事是，这次王明回延安后，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说到这几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我们要严肃自己的私生活，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当时听到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意义。后日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流言渐多，才想到王明这段讲话正是毛泽东与江青热恋的同一时间，王明这段话可能有一定的针对性。

另一件事是：1938 年 9 月 29 日，中共六届六中开始前，全体参加者合影了一张照片，毛泽东让王明坐在正中央，自己站在一边，这张照片在「新中华报」刊出，不仅蒙蔽了王明，而且一些王明的支持者，全没有想到，这正是王明面临审判的时候。

中共六届六中开始，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支持毛泽东（我后来认识的一些王明支持者，都表示怀疑王稼祥传达的这份「指示」是不确实的）。11 月 5 日、6 日，毛泽东化了两天时间集中攻击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路线。王明站起来要答复，毛泽东愤怒地说：「你的统一战线就是婊子路线，就是同蒋介石上床睡觉！你要说什么？你要当婊子就去当吧！」当时在场的康生，本来是支持王明的，他见到王明遭毛泽东如此辱骂，竟无还手之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康生慨叹王明「演说像个天才，斗争像个侏儒」，从此康生离开王明，成了毛泽东整治异己的工具。

六届六中以后，王明留在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柯庆施）。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王明在延安的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有一次我见到王明形单影只，漫步街头，低着头不发一言，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当时

我并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中共六届六中，毛泽东对王明展开全面的攻击，王明在党的地位已经从最高峰落下来了。

六届六中决定，长江局撤消。改设南方局和中原局。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周恩来在 1940 年 6 月 17 日南方局说：「在斗争方针上，中央要求（对国民党）针锋相对，不必完全遵守合法。」表示听毛的了。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长期的暗斗。抗战开始以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中共的国际派声势重振，毛泽东开始认识到，要掌握中共的领导权力，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行的。毛泽东在党内一方面打击国际派，一方面表示对斯大林的效忠。1939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毛泽东逐步亲自抓中苏共的关系，中共中央秘密成立了一个对外称为「农委」的机构，由任弼时负责。许多向莫斯科的报告和请示是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据曾任任弼时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1945 年底。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毛泽东要师哲将中苏共往来文件全部烧毁。

1940 年，由于国民党抗战中在华中、华南的失利，中共认为这又是一个全面夺权的机会。毛泽东于 1940 年 11 月 4 日，致电共产国际季米托洛夫、努伊尔斯基，要求「苏联支持军备，包括飞机、坦克、大炮，由中共派共军十五万精兵打入国民党基地，抄其老窝。」斯大林没有答应。

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蒋介石帮毛泽东消灭了毛的党内一贯反毛的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加上苏德战争中的苏联红军的崩溃，共产国际解散，这些变化都使毛泽东相信彻底清算中共党内国际派的条件成熟，继之延安整风开始。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但是他坚持一个观点，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利益的一致，中共绝对不能

因「王明路线」与苏联闹翻，尤其要尊敬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个观点，后来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证明苏联红军对中共辽沈战役的支持起了决定作用。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对解放全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当年周恩来的牺牲王明，维持中苏共关系立了大功。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他在 1944 年 2 月代表毛泽东劝降王明时，王明对周恩来说：「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起草人是谁？主要负责人又是谁？怎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呢？又怎么能称为王明路线呢？」周恩来为之语塞，如前所述，六届四中决议的起草和具体执行，负责的都是周恩来。

1943 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人的关注。毛泽东回电报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在 10 月 27 日、28 日，12 月 1、2、3 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引号内为毛电原文）

1949 年 1、2 月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访问西柏坡，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记述：「米高扬同我私下交谈中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的适当人选。」米高扬的话，可能是代表斯大林故意为周恩来吹风的，也表示当时苏联对周恩来始终是信任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出任中国总理是斯大林亲自点将的。

第六章 我对刘少奇的印象

在延安时，刘少奇当时是中央干部教育部长，常对我们作政治讲话。不过我一向不喜欢听刘少奇的讲话。他总是沉着脸，腔调不男不女，阴阳怪气，讲的内容也很沉闷，死板的教条极多，好象他一身全是「党性」。「文革」期间，我在香港出版过《刘少奇语录》和《刘少奇选集》，中外报刊居然把我当作「刘少奇派」。当时中共清算刘少奇，我认为应该客观地公正地介绍刘少奇的思想与观点。

抱朴谈刘少奇

我在香港办《展望》杂志时，有位作者秦涤清常为我们写稿，他的文章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我到纽约，见到彭昭贤，他说，「你有一位老朋友叫抱扑的，急于想见你。」接着彭打了电话，抱朴来了，一谈之下，抱朴就是秦涤清，秦涤清是他的本名，早年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到中国时当翻译的杨明斋在上海办过俄文专科学校，秦涤清是该校的学生，后来他与刘少奇等同去俄国，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留俄学生。

我问秦涤清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是最早去苏联的，又是最早与共产党决绝回国，为什么呢？

秦先生说，他在莫斯科时，最受不了的是日以继夜的批斗会，他当时和刘少奇住在一个房间，刘忙于开会，秦则帮他做饭。当时他们就读的是中山大学。中大表面上是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实际上完全由苏共操控。刘少奇总是批评我学习不积极，当时苏共还顾及维持国共合作关系，我提出退学，他们就让我回国了。当他把回国的决定告诉刘少奇时，刘惊问：「你有没有向组织反映？」秦答：「我不是共产党员，不需要组织决定。」

秦涤清对我说：当年，中国的留俄同学受苏联党争的影向，互相斗得很利害。在共产党内部，许多领导人的上升，都是踏着别的同志

的肩膀，先把别人打倒甚至踏着血迹而攫得的。刘少奇就是踩着王明和周恩来爬上去的。

我问秦：「王明和刘少奇，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

秦答：「王明浮躁，刘少奇深沉，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从「毛周联盟」到「毛刘联盟」

刘少奇回国后，主要从事职工运动和地下工作，他和周恩来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刘指周太左，周指刘太右。秦说：「其实两个人都紧跟共产国际，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的。不过，刘这个人跟得很笨。上海人形容不会跳舞的叫『拉黄包车』，被善于跳舞的拖着走，刘就是这个样子的。周呢，左腿来右腿去，右腿来左腿去，他跳舞如此，政治戏法也如此，刘就远远不及周了。」

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上，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在五大才当选中央委员的。他们早期与争夺北方局的控制有过斗争。中共六大后，1928 年 12 月，北方局称为顺直省委，韩连会为书记，刘少奇为组织部长，陈潭秋为宣传部长，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实际当权者，认为刘少奇工作不力，将他撤职，改派张慕陶为组织部长。这个张躲陶后来在陕北的中共党内斗争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我将在第三篇第九章「陕北党争秘史」中写到他。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仍然是党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刘少奇主持职工运动，他上书中央，认为中央的职工路线太左，曾被周恩来扣上右倾帽子。1932 年 3 月，临时中央又撤消刘少奇对职工部和全总的领导职务。1932 年底，刘少奇到达江西苏区，重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4 年 10 月，随红军到达陕北，这时张国焘的败局已定，毛泽东的矛头转对周恩来，大力支持刘少奇，因此新的「毛刘联盟」逐渐代替过去的「毛周联盟」。后来王明回国，又形成新的「王周轴心」。中共党史高潮迭起，好戏连台，值得看的。

刘少奇重建北方局

1935 年 12 月中共举行瓦窑堡会议，刘少奇被派到华北重整北方局。刘少奇到达天津，才知道北方局只剩下寥寥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后来在延安认识的高文华、柯庆施等。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当时华北抗日情绪高涨，必须争取领导学生抗日运动。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共的领导干部，都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

据王光美回忆：「1936 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系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速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挺身赴险。」

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提出，要展开北方局工作，必须要使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干部争取出狱；当时国民党坚持，共产党员出狱必须要办一个「自首」的手续。刘少奇明白，这种「自首」就是公开宣布反共的意思。当即表示可以办假「自首」，等我们的同志出狱了，不是一样可以为党工作吗？但兹事体大，必须请示党中央。因此，刘少奇向延安正式提出此一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在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正式批准。当时刘少奇发出一个指示说：「华北形势危急，……共产党员不要再蹲在监狱里搞斗争了，应争取出狱，迎接抗战局势，不过出狱时要履行一个手续，就是要在指定的报纸上登反共启事，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根据上述指示，1936 年有大批在狱的共产党员公开在报纸上刊登脱党或反党声明。

1936 年 6 月，刘少奇告诉柯庆施，中央已经批准。并指示柯庆施、徐冰等共同处理共产党员假自首争取出狱的案件。刘少奇指示，假自首骂共产党，怎么骂都可以，将来为党继续工作，中央不会追究的。于是，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等都在表态后，相继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是后日文革时期「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来源。就当时而言，刘少奇的这项工作对党的贡献很大。这时由上海临时中央撤退的王世英也辗转到了天津，成为北方局的主要干部。王

世英和杨帆，后来都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因为他们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熟悉江青的私生活，认为毛泽东不适宜和江青结婚，这两个人都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都先后遭到江青报复。

1937 年春，刘少奇从平津回到延安，给中央四封长信，检讨白区工作过去太左，领导错误，需要彻底转变。5 月 17 日，延安举行白区党的代表会议，刘少奇的「万言书」在会上散发。刘少奇又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刘的观点又被认为有针对性，因为过去中共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在这次会上，刘周两派对骂，场面火爆。起初毛泽东没有表态，后来董必武报告，据许多老同志向中央的反映，过去白区工作过左，使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确是事实，董的报告并没有针对谁，在会上被认为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被认为公正，受到肯定，继之毛泽东作出总结说，刘少奇的意见是正确的。

刘少奇白区工作的转变，确有大收获。比如薄一波，他是山西人，是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同乡。阎锡山对薄一波的才能很有印象，薄的自首，阎锡山信以为真，抗战开始后，对薄委以重任，由他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后发展为「新军」，最后「新军」并入八路军，使国共在华北的力量对比大大改观。在南方，刘少奇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局、华中局，并直接掌握了新四军。周恩来与刘少奇两人之间，无论对白区工作，还是对军队工作的影响力，都是周消刘长，发生根本的变化。

1937 年底，我到延安时，刘少奇已经是大人物了，当时我听中央的政治报告，除毛泽东以外，记得刘少奇作的报告最多。中共重要干部调动工作也经由刘少奇谈话。王明回国后，武汉长江局隐然成为「第二中央」。毛泽东压制王明、周恩来，刘少奇在延安所扮演的角色，不断上升。

刘少奇为两个口号作总结

30 年代，在左翼文艺圈里，以周扬、徐懋庸为代表的「国防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相当轰动。中共尊鲁迅为「大师」，鲁迅骂周扬为流氓，而周扬又是左联的负责人，我们当年的左倾文艺青年，对于当时这场争论相当迷惑，其后才逐渐理解，两个口号之争的背后，也是一场党内斗争。周扬 30 年代是上海左联的风云人物，当年代表中共在上海主管文化的、社会科学的是胡乔木，文艺影剧的是周扬。周扬主管的部分，当时控制了上海许多大报的副刊，电影公司的编导部门，声势很大。周扬属王明、周恩来一派，在当时来说，是中共的主流派。

不久，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上海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发生变化。冯雪峰是参加过长征的著名作家，在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他要好好利用鲁迅这面旗帜，因此冯到上海后直接掌握鲁迅，甚至封锁鲁迅与周扬的联系。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当时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致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比较左，当时认为国共合作抗日是投降主义，「国防文学」也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相对抗。

试想，我们当年那些左倾文艺青年，怎么可能理解到这两个文艺口号论战的背后是一场党内文化领导的权力斗争。

1938 年 10 月 19 日，我在延安参加边区文协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晚会」，由诗人柯仲平主持，刘少奇作报告。刘少奇的讲话，就我记忆所及，他对「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作出以下结论：「国防文学」是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中国革命进一步提高和深化的口号；「国防文学」是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现阶段的战斗任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众」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未来的战斗任务。这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矛盾。他讲话时把这个意思重复了许多次。后来我见到一份中央文件，吴亮平代表中宣部传达中共中央对上述两个口

号所作的结论，与我所听的刘少奇的讲话内容完全相同。可见当年刘少奇代表中共政策讲话的份量和权威。但是，1942 年 5 月，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公开指出「国防文学」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周扬这个被称为中共「文艺总管」不断受到批评。

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

在我听过的很多刘少奇的讲话，其中包括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的这个讲话，后来出现许多种不同版本，每个版本内容都有一些修改。这个讲话成为「延安整风」的主要文件之一。

很多刘少奇的讲话都是冲着王明、周恩来的，对王明是点名的，对周恩来是不点名的。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对我说，刘少奇曾屡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刘少奇在别的讲话中，一再强调他的「工具论」，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当党的工具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刘少奇又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偏他当不了领袖；一个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不计个人得失利害为党工作，会自然地获得党内同志的支持与拥护……」刘少奇的话，当然是冲着王明的。

1940 年 5 月，王明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学习毛泽东」

的讲话。本来这是王明表态拥毛的。不久，刘少奇就说王明「学习毛泽东」是假的。在这同时，王明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再版，刘少奇在这本王明的书上写道：「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

刘少奇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段他的典型的「工具论」，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1949 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又要王明在会上表态。王明就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接上去说：「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于是，王明又接上去说：「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少奇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时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一样为人民服务。」这话的意思除了党的「工具论」，还加上政客的伪善。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公开整的是王明，实际上整的是周恩来。开始时刘少奇不在延安，毛泽东用十二道金牌把刘少奇召回延安挂帅。

延安整风，具体的执行者是刘少奇与康生。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还通过，中央会议的召集不定时，由主席决定；中央会议的

决议，由主席同意才生效。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处理主席交办的日常事务。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有：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八人，刘少奇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直到 1944 年 5 月，才补进了周恩来、朱德二人。由此可见，早在 1943 年，「毛（泽东）刘（少奇）体制」就已建立，毛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刘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毛以下最大的赢家。

延安整风中，柯庆施受到冲击。柯早年是留俄的，而且受共产国际重用过，后来回国在周恩来安排下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延安整风时，康生责问柯庆施：「北方局被国民党破坏时，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被逮捕，你哪里去了？」事实上，当时柯庆施去了绥远，在冯玉祥、方振武领导下的「反帝同盟军」做兵运工作，后来回到北京，又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执行共产党员假反共假自首争取出狱中立了功。在延安整风中，康生要搞他，刘少奇保了他，中共建政后，柯拥毛最力，毛也最欣赏他，柯和康生在苏联时就是死敌，柯死在 1965 年，否则第二年文革开始，柯庆施与康生谁死在谁的手里，就不知道了。

周恩来报了 30 年的仇

1945 年中共七大时，陈赓代表周恩来反对薄一波当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毛泽东把薄一波提为中央委员。刘少奇派另一名大将彭真，在审查参加代表的资格时，也故意对周恩来的党龄提出疑问，结果被毛泽东宣布搁置讨论。

刘少奇在七大中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周恩来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员的二十三位。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

1964 年 3 月 22 日，苏联「红星报」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贯

反苏，可能与他每次讲话必骂王明有关。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派刘派互揭疮疤，周派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事件」打刘，其时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个当事人张闻天，联名要求周恩来复查档案，周未答复。原件呈毛，毛批确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周恩来下令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后，「刘少奇项目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项目组」，两个项目组的组长皆为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提刘压周」是 1936 年，文革开始于 1966 年，周恩来总算等了 30 年报了仇，其实周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

第七章 一些权力边缘的人物

1937 年的延安，中共有「五老」之称。这「五老」之中最年长的是徐特立，60 岁；其次是吴玉章，59 岁；再次是谢觉哉，53 岁；董必武和林伯渠两位都是 51 岁。当年朱德也是 51 岁，如果把朱德算进去应是「六老」。

中共「六老」我都见过，除董必武外，其余都不熟悉。徐特立四十多岁到法国勤工俭学，五十多岁参加长征，给人印象深刻。吴玉章和杨尚昆的哥哥杨闇公 1920 年在四川组织过「青年共产党」。由于中共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所以吴玉章的党龄，长期争论不清。后来拿到中央委员会去讨论，决定从 1925 年算起。谢觉哉管事很多，政法、教育、统战、新闻样样管，样样都不专，被人称他为「不管部大臣」。林伯渠早年是国民党，对国民党的派系最熟悉，每次国共谈判都有他参加。

记朱德

朱德不服老，不喜欢人称他「朱老」。我听过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平均年龄二十多岁，国民党人平均年龄四十多岁，斗年龄，我们也胜过国民党。」朱德当时是八路军总司令，历史上称「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并列的。遵义会议以后，「朱毛」的提法在文件中消失了。有人说到朱德对红军的创造与贡献，朱德一定赶快纠正说：「党的武装斗争的开创和发展，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1935 年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握有中共军事的最高决策权。朱德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此后经常留在延安，彭德怀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根据毛的指示，直接指挥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朱德变成了一个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个闲人。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旧军人，为人颇豁达，是个老实人。他的模样象个伙夫，说话婆婆妈妈，常和大兵聊天，大兵也喜欢他。

中共有一幅油画，朱德和周恩来等宣布南昌起义，由于违反历史真相，1961 年朱德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笑对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说：「这大概是艺术家的想象吧？」因为他自己明白这段历史，南昌骚动时，朱德是南昌公安局长，负责与国民党周旋，7 月 31 日夜，朱德用一群妓女包围着国民党高级军官把他们灌醉了，所以次日暴动得顺利进行，但他不是南昌暴动的直接指挥者。

中共军事领导人物中，就我所见的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我的印象都是不错的，毛泽东初上并冈山是不懂军事的，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后来又在德国正式学过军事。彭德怀上井冈山带的是国民党受过正式训练的部队。林彪出身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学生，最年轻。毛泽东领军，最初依靠朱德，后来用彭德怀制朱，再后来又以林彪制彭，毛在治军方面惯用「将将之道」。

中共上述几位著名军人，政治头脑都不简单，朱德最早看出毛泽东要做皇帝，绝不露口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朱德以明初朱元璋得天下大杀功臣为训，以打猎，种兰花安度晚年。彭德怀在抗战期间，就爱谈中国战后治国，需要民主。林彪在抗战时，蒋介石一度不愿接见周恩来，国共谈判几乎中断，毛改派林彪为代表，林与蒋会谈十分愉快，中共获益不少。蒋林会谈，国民党有详细纪录，中共党史中所谈不多。

记董必武

在中共一大的十三个参加者中，张国焘以外，我与董必武有较多的接触，我曾在董老的领导下工作过，我对他十分尊敬。

董必武不但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最早提倡法制的人。他在红军时代和中共建政以后，都担任过最高法庭庭长或院长，他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新旧交替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坚信共产主义，而又执着地要实行法制：他尊从「洋教」（马克思主义）而又爱穿长衫；他做事一丝不苟而又通情达理。黄炎培曾对我说，董老为人「平而不

苛」，这个评价我认为公正，董老为人正派，如果不是董老，中共历史上的肃反，不知要多死多少倍人。

张国焘曾对我说，董必武是毛泽东的耳目。他的确是长期支持毛的。在抗战初期，中共有两个中央，延安中央与武汉的长江局，董老属于长江局，而又作为毛的代表，使双方的对抗降温。董老一直帮助毛泽东排除政治障碍，也尽力阻止酷刑与滥杀。在大跃进失败后，他感到党的领导有责任，个人也内疚不已，自己的健康也日益退化。七千人大会时，他接近刘少奇的观点，他的三叉神经痛发作。「文革」初起，他自动搬出中南海。他的儿女皆被捕。他作诗寄给狱中的女儿，诗曰「颇有聪明蚕作茧，亦多能力鹊为巢」，兼有自嘲自悔之意。

董老逝于 1975 年 4 月 2 日，我在香港曾为文悼念。董老逝前一月，最后一首诗有句：「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他也曾说，「明知火坑而故蹈之」，并解释此句出向《聊斋》的「商女」一节。董老还曾告诫青年，要甘做跑龙套的，不要争做主角。董老晚年的诗文，其鸣也哀，发人深省。

记张闻天

我在延安时，中共的张闻天和苏共的斯大林，名义上同为总书记。斯大林是苏共名实相符的最高领袖，而张闻天在中共的地位和权力，绝难和斯大林相比。当然，他有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策性讲话，也很有份量。在我听过的他的讲话中，有一次是宣告中共对于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的。

张闻天说：「民族战争不可忘记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必须夺取民族斗争的领导权，第二阶段是建立工农社会主义政权。」

张闻天的讲话具有纲领性，而实际上他只是中共的事务长而已。

我的印象中，张闻天的气质内外不一。他总爱着工装，戴工帽，

一付工人打扮，但是讲起话来文质彬彬。我也爱听过他的讲课。「二张」（张闻天、张国焘）的讲课都很认真，他们两人都属于教师型的。

张闻天编过《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我在抗大听他讲过这门课，我认为他讲得很好。后来我到新华社以后，他也来讲过话，讲的是新闻工作问题。

张闻天多才多艺，好学深思，他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青年时代读的是袁世凯办的公立学校，先是学水产，后来转到水利，再后来又转到体育，而他本人又爱好文学。五四时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填写个人兴趣时他写的是「哲学」。他一度学习法文，却去了日本，后来又去了美国。他 1925 年参加共产党，再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苏共党争激烈，他积极投入反托派的斗争，不久被选为「红色教授」，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29 年夏，中山大学的斯派与托派摊牌，拥护斯大林的被称为「标准的布尔什维克」。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写过许多交代，其中说到 1929 年夏的那一场斗争，他和王明、王稼祥等都不在场——由于他们的观点一致，就被人归为一个宗派了。

张闻天在党内斗争中，永远是被人利用的「棋子」，1934 年周恩来利用张闻天主持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实际上是利用张闻天架空毛泽东的中央苏维埃主席。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要张闻天接秦邦宪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总书记），实际上张闻天事事要请示毛泽东。我在延安时听说，张闻天在毛泽东前面，温顺得像一只小绵羊。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的主要决策者，实际上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张闻天重要的事都要请示毛，而毛的答复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张闻天要反复领会，细心揣测。毛泽东「不十分明确」的指示，张闻天落过为政策时，「成」则为毛正确路线的光辉，「败」则由张闻天为错误路线承担责任。对于张闻天这个可怜的角色，有很多对他讽刺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人说他是老牌的风派。有人说成他是毛泽东手上的玩具。

1937 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曾指责毛泽东滥用党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此后，毛泽东改用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联署的办法。张闻天自己说，「1938 年 9 月，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我曾多次向毛请辞。」而毛泽东把他留住不放。后来他没有别的办法，索性搬到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办公，「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很多中共的文章是用「毛洛」或「洛毛」发表的，洛即洛甫，也就是张闻天。

红军长征期间，张闻天一度有职无权，感到消极，表示想回上海做地下工作。会理会议中，张被认为反毛。张在「1943 年整风笔记」中写道：「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是王稼祥同志造的谣。」

1959 年庐山会议，张闻天支持彭德怀。毛泽东对张闻天说：「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毛指张闻天一生多变。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撤消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60 年 4 月，他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工作。刘少奇接见了他，告以他的「里通外国」一案未了，不能接触外事工作，安排他在经济部门担任「研究员」。「文革」期间，张被称为「王明份子」，「苏修特务」，受到长期斗争和审查。他死于 1976 年 7 月 1 日，正是中共党庆的第五十五周年纪念日。

记王稼祥

红军长征途中，高级领导人都是坐担架的，有两个重要人物既坐过担架，又做抬过担架的苦力。这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用担架把毛泽东抬上了遵义会议。

王稼祥自称是中国红军的四大领袖之一，他在江西苏区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规定红军列宁室中必须要挂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四个人的照片。他在部队中走动时，很重视红军中有没有「欢迎王主任」的标语和口号。他在部队中作报告，一定要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突出报导。

我在延安见到王稼祥时，他是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和一群抗大同学到总政见王稼祥，要求一件事（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王稼祥总是哼哼哈哈的，我们中的一个同学当即指出：「这不是官僚主义吗？」王稼祥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回答了一句：「官僚主义？哪儿没有官僚主义？你能说国民党没有官僚主义吗？」就这么几句话，把我们全吓跑了。

在莫斯科，王稼祥本属于国际派，他擅长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在毛泽东、周恩来、王明之间搬弄是非。秦邦宪阻止王稼祥当选六届四中中委，他们的关系特别坏。长征途中，他挑起毛泽东反对周恩来。遵义会议以后，他又挑起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即会理会议）。延安时代，他又挑起毛泽东反对周恩来。他也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员。1943年王稼祥写过一篇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共高举「毛泽东思想」以他为最早。这个人长期为党内同志不齿，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落选，后来是毛泽东把他的名字补上的。中共建政后他担任驻苏大使，后来主持对外联络工作。60 年代初，他感到中共的外交四面树敌，危险太大，遂以孤臣孽子之心，上书中央，主张和平外交，孤立敌人，各个击破。「文革」时，他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昏，倒在楼梯上。夫人朱仲丽发现时，他已经死了。他的独生子王命先被拷打后投河自尽。而在「文革」之后，朱仲丽反而对毛泽东以德报怨，写长文记述她与毛泽东的甜蜜回忆。我感到我很难写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个人，他们的下场很悲惨。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优点与缺点，在他们身上表办无遗。

历史家如要研究毛泽东过人的地方，在于毛善于用人和善于嫁祸于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多，但是他善于使用中共的马列主义秀才。如张闻天、王稼祥都是。他们都是毛派的著名打手。

第八章 被遗忘了的中共早期人物

我对瞿秋白的欣赏

我研究中共党史，开始因为我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诗文的兴趣，以及从他悲剧的一生中，看到许多追求真理的知识份子，消失在沮丧之中。1962 年，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瞿秋白传》。我的书是客观评论和同情瞿秋白的，据当时香港报刊载，毛泽东把我这本书掷在地上说：「这就是瞿秋白叛变的证据！」我的书里关于瞿秋白说了些什么呢？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领袖，1927 年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死时年仅 36 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多彩多姿，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

向中国介绍俄国十年革命

瞿秋白是第一个有系统地把苏联的「十月革命」、共产主义的基本典籍、布尔什维克的具体教义、唯物史观的文学和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是第一个使中共获得布尔什维克理论武装的人；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瞿秋白路线」的代表者。在中共的出版物上，瞿秋白的名字，往往是与所谓「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瞿秋白自己说，这是「历史的误会」，因为「自己的一生，等于在做戏」，而且演的是「滑稽剧」。1913 年，瞿秋白 14 岁，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即后来江苏省第五中学）。他和张太雷是同班同学。张太雷也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而且是瞿秋白参加共产党的介绍人。

1920 年 10 月，瞿秋白启程去苏联，在苏联时期给北京《晨报》所写的通讯，总题为《饿乡记程》，当时俄国饿殍载道，后来改名为《新俄国游记》。

1923 年 1 月，瞿秋白随陈独秀回国，参加中共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1924 年国共合作，瞿秋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

1924 年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杨之华原是中共另一元老沈定一的独生子沈剑农的妻子。11 月 7 日，杨之华与沈剑农离婚的广告，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婚的广告，同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出。沈剑农也前往祝贺，参加了喜宴。在当时的中国，杨之华的开放大胆，沈剑农的故作大方，在社会上颇为轰动。

在这以后，瞿秋白先后担任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前锋》的编辑工作。中共最早出版的几种理论小册子，如《CP 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全出自瞿秋白之手笔。瞿秋白还写过一本书，也叫《三民主义》。

戏剧性的中共领袖

1927 年中共清算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导演下，瞿秋白戏剧性地如旋风似的，扫荡了党内许许多多权威人物，成为最高领导人。在「八七会议」中瞿秋白很为痛苦，因为他担任这个角色，绝非出于自愿。这次会议成立了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暂代总书记，瞿秋白任书记兼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雪维克》的主编。从此，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宣告结束。这以后一连串的暴动展开了，又一个接一个失败了。于是有人指责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瞿秋白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陈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对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就感到空谈无聊。但是，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象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多余的话》）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召瞿秋白赴苏。共产国际是当时中共政治路线的真正制订者，应该为「八七会议」及其后的错误负责的，可是它严厉地指责瞿秋白，要他承担一切错误。瞿秋白写道：

「1928 年 6 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瞿秋白此时代人受过，逆来顺受，心情可想而知。1930 年 9 月，奉命清算李立三的瞿秋白理解李立三和自己的过去一样，都是为共产国际受过，两个人竟相对而泣。瞿秋白写道：

「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1930 年 9 月底），我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不出李立三的错误程度。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未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

我对政治实在倦了

瞿秋白对于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实在有些倦了。1931 年 1 月，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请长假」的要求，没有获准。但是，这个时期中央也没有给他许多事做。瞿秋白写道：

「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复发的时期，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1931 年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至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瞿秋白在这里说的较为含蓄，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怀疑就等于犯罪。在这以后，他在抑制自己内心的矛盾之下，勉力写作。他用过许多笔名，如：陶畏巨、何苦、维宁、史铁儿或 S.T.R，屈维它或 V.T，林复、董龙、陈笑峰、司马今或 SMA.KIN、巨缘等，其中有的笔名和鲁迅共享。他们文章的风格也极为相似。1953 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中说明，他们有的文章是合写，而有的文章是瞿写而用鲁迅的名字发表。

1934 年 2 月 5 日，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名义上是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实际上有职无权。他每天一大部分时间，就消磨在瑞金附近的一所破庙里，带着一群男女孩子排戏。

1934 年 10 月，中共开始长征，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装成商人，准备由厦门搭船往上海，在福建武平被国军逮捕。国民党人知道捉了一位喧赫一时的共产党头子，有些人前去探望，才知道，他们心目中三头六臂的瞿秋白，竟是一位文弱书生。瞿秋白在狱中作诗，贴在小房间内，他常感慨地说「书生是不宜搞政治的。」

瞿秋白的一生是个悲剧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被枪决，时年 36 岁。他死前留下一本《多余的话》，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卷入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是大错。瞿秋白一生的总结，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赤俄心史》）「新的知识分子和旧的知识份子」，「一是民主派的健将，一是专制派的镖师。」（《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瞿秋白自认是「民主派的健将」的。

他又说：「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准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大家安静些，仁慈等等。」（《多余的话》）

我为什么写《瞿秋白传》呢？因为我一面看瞿秋白的有关资料，一面对照着自己，又看看我们同一代的朋友，觉得我们身上都有瞿秋白的影子。我尤其欣赏瞿秋白的「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过日子」这两句话。

笔者在另一本写《红楼梦与政治人物》一书中，曾将瞿秋白比作《红楼梦》里的晴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和纯洁的少女情怀，一样令人神怡。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感人之处是真情，像晴雯临死前和宝玉的话别。

瞿秋白最后一首自悼诗是：

夕阳泯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这首诗对自己政治生活中所受的委屈，消极作了总结，读来令人凄然，有鬼哭神号的感受。

附带说一个笑话：我的《瞿秋白传》出版后，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为中共领袖立传，禁止进口。后来盗版者把书名改为《瞿秋白血泪史》，同一本书，台湾国民党当局又认为是反共的，可以发行，于是在台湾发行很广。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我于 1953 年，在香港出版的《斗争十八年》一书中，曾提到一位张申府（又名张崧年）。他是我的亦师亦友的长者。这位张先生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非凡，而中共绝少提到他的名字。

张先生生于 1893 年，去年是他的一百一十岁冥寿，我应该说一点历史事实，凭悼这位历史人物。历史不应该任意篡改，历史人物也不应该任意被抹杀的。

张申府于 1917 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管图书馆。当时毛泽东做过他的抄写员和编图书卡，工作不太认真，受到张的指责，毛对此终生未忘。

张先生参加领导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张申府就已经是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之一，与陈独秀，李大钊齐名。

张申府不但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也是中国留学生欧洲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者，周恩来、朱德等著名共产党员，都是张申府介绍入党的。

张申府是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他是第一位介绍英国学者罗素思想到中国的。罗素是一位举世尊敬的学者。他是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也同情社会主义，他以科学论证，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罗素在学术上的地位与影响，张申府深受启发。张申府从此在思想上与共产党愈走愈远。1923 年，在巴黎的中共欧洲支部，由周恩来主持批判张申府的自由主义。其中包括罗素思想中的学术中立，思想自由，多元文化，和平主义等。1925 年，中共三大时，张申府坚持自己的理想，被迫退党。

1943 年，我从中共把我置身濒于死亡的危境中逃到重庆，见到张先生，对他谈了经过，开始时他的反应十分冷静，他说：「我青年时代也是为这个理想奋斗的，抽象的共产主义不错，具体的共产党人不是东西」。突然，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激动地说：「五十号的人更是混蛋」。当时的左派人士都知道「五十号」所指的就是周恩来的公馆。其后，张先生谈了一些往事说：周恩来是我介绍入党的，他不久就把我出卖了。

1946 年国共和谈期间，据我所知，双方当事者都以和平为名，把战争进行到底为目的。当时民主人士中，忧心如焚的，我记得的就有张先生，他对我说，国共打到底，中国出现一党专政，至少要后退 50 年。

1948 年 10 月，张先生在储安平的「观察」发表了一篇呼吁国共和平的文章，在这同时，另一位中共创党人施复亮（又名施存统）在「时与文」也写道，内战继续，生民涂炭，无论谁胜谁败，人民总是受害者，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当时在上海，正好为中国人民党发表一项宣言。号召人民团结，以行动制止内战。我退出中共以后，思想上也受到罗素的和平主义的影响，反对以任何借口为名的战争。

我当时和张申府、施复亮两位前辈毫无联系，中共的佳木斯电台用责问的口吻指责我们说，张申府、施复亮、马义（司马璐），你们过去背叛了革命，现在中国革命快胜利了，你们害怕是不是？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时候，你们没有提出和平停战；现在，国民党快完蛋了，你们口口声声反对内战，这不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吗？

其实，中共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对的。我们从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之际，就不断呼吁停止内战，和平解决国共纠纷，实现民主建国。中共对我们的攻击，当时对张申府的冲击最大。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刊有一篇「痛斥叛徒张申府卖身投靠」，其后还有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也是中共第一批党员）的离婚启事，以及其它人身攻击的文章。

中共建政开始，冠盖满京华，高层忙于分官，把当年创党有功而当今无权无势者差不多忘了；低层干部根本不知道张申府当年中共初创时是何等重要人物。只知道张申府是一个教书的又懂历史，就把张先生分配在北京文史馆工作，工资仅足糊口而已。

共产党人的恩怨如戏，正当张申府「斯人独憔悴」的时后，有一天遇到一位贵人，这贵人是谁？当今「丞相」周恩来是也。

前面谈到，张申府是周的入党介绍人，周入党后不久批了张申府。

1925 年张申府脱党。这里必须补充说，当年周恩来在欧洲参加的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周恩来于 1924 年才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周的党龄应从何时记算，在党内有过争论。在 1945 年中共七大时，周恩来请张申府写了一份书面材料，证明周确实是于 1921 年在德国入党的。张申府的这份材料中说，他和周的初识是 1920 年 8 月，周到北京大学来看张，后来他们先后到了欧洲，张申府先参加了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德国共产党支部。不久他又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他把情况都报告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张申府的这份材提出时，他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作为历史档案，中共中央认同了。当然，这份历史纪录，对周恩来十分有利。

中共当政，张申府的工资不多，也很安贫守分，这一天，他偶然遇到周恩来，周问他每月工资多少，张如实以报，周连说：太少太少，没有多久，张申府的工资被大幅提高，他心领神会，那一天他所见到的贵人，正是当今的「丞相」。四人帮倒台后，张申府被补为政协委员，当张先生被通知时，他幽默地说，解放初期，我有很多话想说，老同志对我说，要我老老实实，不要出名，不要说话，不要动笔，我如果没有这「三不」，能活到今天吗？现在我快 90 岁了，步履艰难，也说不出话了，政协委员是多大的官，对我来说，也没有用了，我只求多活几年就算了。张先生逝于 1986 年，享年 93 岁。

沈定一，政治家，诗人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又名玄庐，浙江萧山人。清末时先后任云南广通知县、武定知县、省会巡警总办等职。因协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清廷通缉，逃到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参加同盟会。1910 年回国后联络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时为上海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为浙江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被通缉。他又逃到日本，潜心研究各派社会政治学说，尤醉心社会主义理论，1916 年回国，当选为浙江省议会会长。

沈定一是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17 年，他

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沈定一所写的诗都是白话诗。他当时常为《新青年》写稿，又主编《星期评论》，这两份杂志都对五四发生过重大影响。

中共最早的 59 个党员之一

1920 年 5 月，中国最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参加的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等八人。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第一次成立会议时有 13 人参加，代表全国 59 个党员。沈定一就是这 59 个党员中的一个。当时的沈定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十分狂热，他不仅为初期的中共活动提供大量捐款，而且介绍自己的儿子沈剑龙和儿媳杨之华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安排他们到上海在沈定一的《星期评论》工作。小两口子原是按旧式婚姻成亲的，婚后很不美满，杨之华独自回到萧山老家，她的公公沈定一很同情她，就鼓励杨之华再去上海读书。

1923 年国民党共产党开始合作，沈定一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所谓「跨党份子」，并于同年随孙中山访问苏联。

由于沈定一的家族原是浙江的大地主，富甲一方，加上自己又在云南做过官，有关他的资料都说他当年毁家抒难，赞助革命，其中有一次捐款两万银元。沈定一同时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写出了他的革命情怀，诗中写道：

两万两黄金科手不见踪影
只为那余勇可贵

儿媳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婚

1924 年初，杨之华进入中共党人主持的上海大学，也同时正式入党。杨之华第一次在上海大学出现时，全校师生为之轰动。包括几位著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等都惊为「天仙下凡」，他们对沈定一开玩笑说：「你的儿媳妇真是一位大美人！」

杨之华在上海大学选读的是社会系，系主任是瞿秋白，据杨之华的回忆中说，1924 年 1 月，她初见瞿秋白，瞿的仪容谈吐就深深打动了她了芳心。

1924 年 5 月，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约杨之华到他家中作客，并谈些中国妇女问题，杨之华入座时，眼睛为之一亮，原来另一位客人就是风度翩翩的瞿秋白。瞿对杨说：「鲍顾问今天请的是你，我是来当翻译的。」

杨之华和瞿秋白开始谈恋爱了，杨之华的丈夫沈剑龙把情况报告给他的父亲，沈定一对儿子说：「现代的妇女自由恋爱是对的，你应该面对现实。而且我知道，你的媳妇儿对瞿秋白同志崇拜已久了。」

1924 年 11 月 7 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头版，两条启事并排刊出，前条是「沈剑龙、杨之华离婚启事」，后条是「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次日新闻中，还还报导了沈剑龙亲赴瞿杨婚宴道贺的消息。当时被传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佳话。他们选择 11 月 7 日结婚，当年兼有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

在左右夹攻之中

沈定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鼓吹反左，被共产党严重警告，而在同一时期内，国民党内力主联俄容共的廖仲恺，也在国民党内成为怨责的对象。

1925 年 2 月，孙中山逝世，8 月，廖仲恺被刺身死，沈定一写了一幅悼廖仲恺的挽联：

上联是：「不招人忌是庸才，滚滚红尘，那有闲情向休咎？」

下联是：「能破天鹭非枉死，堂堂白日，全凭正义作光芒。」

这幅挽联中，沈定一对廖仲恺之死有猩猩相惜之感。

不久，沈定一在一个集会中被国民党的极端反共份子打了顿。

沈定一又用诗写出了他的愤慨：

狂情把酒烧，
天上星摇，
地上山摇，
手上杯摇，
思也难熬，
怨也难熬。

被开除出党，又被暗杀

1925 年 1 月，瞿秋白、杨之华双双参加了中共四大，瞿秋白当选中央委员，杨之华被任命为妇委主任。当时杨之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最美丽、最干练的女同志。而在这同时，当年，赞赏与培植杨之华的，她以前的公公沈定一在党内被称为右倾与反党，被开除出了共产党。

1927 年 4 月，杨之华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委。同年 8 月，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以后的第二任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两个月后，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下台。

这时国共全面破裂，暴乱、屠杀、报复……全中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赤色恐怖的双重恐怖之中，一个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外，几乎没有自由的生存空间，沈定一辞了国民党的官，又著文批评国民党，也批评共产党。共产党说沈定一是伪君子，是最险恶的敌人，国民党说他包庇共产党员，沈定一在左右夹攻下回了浙江老家。

1928 年，沈定一决定按照自己的理想，在他自己的家乡办一个自治实验区，为穷人服务，有无息贷款和免费医疗等，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扬言，沈定一是个大野心家。同年 8 月 28 日，沈定一被刺身亡，谁是凶手，国共双方都无人追究。

沈定一为何被暗杀，是谁杀的。1993 年，美国一位汉学家肖邦

奇教授曾经亲自到中国浙江省萧山县，找到沈定一的另一儿子沈剑云和孙子沈忠良，协助他深入调查。他想为中国历史的一段空白寻求答案。没有结论。

沈定一是一位诗人、政治家，又是革命怪杰。他的浪漫主义大过政治气质。他为了追求革命，捐输了全部家产。他具有诗人的自我陶醉，艺术家的自大狂，赌徒的孤注一掷的性格，为了坚持，他不惜舍身以赴……他的身上纠缠着自我矛盾，我们怎样评价这样一位不大不小的历史人物呢？

有人写说沈定一是机会主义者，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沈定一的传奇》作者美国汉学家肖邦奇说，沈定一是 20 年代中国政治的精英人物。也有人和早年杨之华的说法一样，认为沈定一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沈定一的政治生涯短暂，他像一颗流星，从天空疾驰而过，然后变成一粒陨石，在中共建党八十多年的今天，这粒陨石，中共一大 59 个党员之一的沈定一，当年的狂放，思路的复杂，过程的曲折，结局的悲惨，在 20 年代初中共成立时，中国知识份子的迷惘、彷徨、绝望，颇有一定的代表性，著名左翼文学家茅盾（即沈雁冰）也是中共建党时 59 个党员之一，他曾经用小说《追求》、《动摇》、《幻灭》写出了类似沈定一的故事。

一个个悲剧收场

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中共政治风浪中一再受到冲击。

1929 年，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瞿秋白在莫斯科一度受过审讯。

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前后，新老留俄派斗争激烈，瞿秋白杨之华为了逃避党内是非，一度藏身鲁迅家中。

1935 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处决。瞿临死前，写了一篇《多馀的话》，感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担任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

「历史的误会」。杨之华继续作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下场就更为悲惨了。

1966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起，中共出版《讨瞿战报》，对瞿秋白鞭尸。杨之华受到长期折磨，她在受审时屡次被迫交待：「你为什么做反革命沈定一的儿媳妇？」「你为什么和叛徒瞿秋白结婚？」天啊，杨之华如何能说得清楚。杨之华还有一条罪名是，她早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沈定一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据杨之华的女儿独伊（与沈剑龙所生，也是沈定一的孙女）回忆说，杨之华在狱中不断受鞭打、毒刑、呼号，渐渐地叫不出声音了，1973 年 10 月 20 日断气。

这段沈定一、瞿秋白、杨之华三人之间的历史故事，到此结束。

一个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是喜剧的角色，还是悲剧的角色，或是悲喜交错的角色，往往不是能由自己个人的意志所能定位的。此所谓往事如烟，世事如戏，人生如梦。其实，瞿秋白和杨之华的政治生涯也和沈定一一样，像一片浮云，灿烂一瞬间，到头来都以悲剧收场。

第九章 中共情欲与政治斗争之间

政治、文学和女人的世界往往有关联，很多政治上有魅力的人，在女人心目中也一样有魅力，有些女人常把政治狂热的人物看作性感的动物。毛泽东一生中，多数的时间都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女人。在中共资料中，有的女人自称为「毛泽东的保卫员」，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忠实的学生」，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亲密的战友」。至于周恩来，对于女人的吸引力更在毛泽东之上。著名的左翼作家韩素音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似的，如果周恩来命令她去死，她一定会服从。

前文说过，1937 年我初到延安时因为年轻，最初触到我的神经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我总记得陕北女孩子多数很美。我印象最深的陕北美人（遗憾的是从来不知她的芳名），那女孩子不施脂粉，白皙皮肤，有迷人的浅笑、优美的身段、温柔的举止，我对她虽属惊鸿一瞥，却毕生难忘。我记得她是陕北米脂人。《三国演义》中的貂婵也是米脂人。当年，对于我这个刚接触女孩子不久的少年来说，整个陕北的女孩子都是美人窝挑出来的。

共产党人也是人，七情六欲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共产党人的男女关系是「一杯水主义」。我的理解，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男女挤在一间房内发生杂交，这只是个别的情况，不代表共产党有一杯水主义的政策。「一杯水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一位瑞典女共产党人柯仑泰说的，她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男女就是杂交的，这种杂交就是「一杯水主义」。这是柯仑泰女士个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份共产党的文件证明是提倡「一杯水主义」的。

情欲与政治之间

共产党人既然有七情六欲，当然也有男女之间嫉忌，争夺男女的私人情结，在中共党人的斗争中，其中有真正坚持自己政治立场的，

这种斗争还是比较理性的，有一定原则的。但是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

我说到没有任何中共文件证明所谓共产党人的「一杯水主义」。但是，早期中共党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同志是极少的，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有争夺「女同志」的斗争。在那个时代，也有的女性为了表现自己的解放，女同志成了三角四角恋爱的主角。据早期留俄的老同志说，当年莫斯科的女同志，如果不拥有几个亲密的「男同志」，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封建，早年中共领导人中的男女纠纷常常闹到党中央，党中央无法讨论，就由陈独秀裁决，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大家长」。

现在我讲几段早期中共领导人情爱与政治之间的故事：

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夫人王一之，当年被称为「中共之花」。共产国际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过上海，施存统请他到家中吃饭，张太雷一见王一之就动了心诱奸了王一之，不久公开同居，施存统气得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双目失明，直到他另外结婚，施存统改名施复亮（意思是双眼恢复光明）也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中共初期闹得很大的事，当时因为张太雷属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说，只要张太雷的工作表现好，中共无权干涉他的私生活。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委。在上海，她的一家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当年的向警予，也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同时去了莫斯科，两个人心情都不好，蔡和森又和当时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和一个蒙古人结了婚。当时有一个说法是，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和政治上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蔡的。

蔡和森和彭述之为了争夺向警予，这两个人在中共五大中斗争激烈，后来成了终生的政治敌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原是中共创党人之一沈定一的媳妇，杨之华很漂亮，到上海大学时，上海大学全校引起了骚动。后来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儿子离婚，与瞿秋白结婚。婚后瞿派去苏区，中央坚持要杨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当时党认为杨之华既然长得漂亮，可以利用她的女色为党作出很多奉献。杨之华当时的任务是和男同志假扮夫妻，她在假扮夫妻时为了拒绝「上床」，得罪过不少高级领导人。杨之华的公公沈定一后来退党，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共产党玩女同志，简直是赤白党。」赤白党是上海话骂人无赖的意思。反驳沈定一的人说，男女同志间为了党的工作，私人间偷鸡摸狗，不属反党，党是无权干涉的。

贺子珍在西安

中共名女人之间，有些谁是谁的妻子，爱人，情人，有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且多数中共领导人是没有结婚形式的。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

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文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我初到延安时，贺子珍刚去西安。准备去苏联。当时延安对女同志的消息最敏感，也易于散播，有人对我说，毛泽东和贺子珍不断吵架，贺动了刀，对毛的生命有威胁，也有人说，贺子珍和毛的另一警卫员有性关系，毛泽东说贺子珍有了神经病。

贺子珍到西安，是由邓颖超陪着去的。当时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秦邦宪的夫人刘群仙都在西安，杨子烈准备去延安，刘群仙准备去武汉。于是，四位中共要人的夫人聚在一走聊话家常，笑谈革命夫妻之道。

刘群仙首先发言，她说：「夫妻都是属于党的，谁反党，就可以用手枪，把对方一枪打死。」

杨子烈接着说：「我和国焘之间，什么事都会坦诚互相商量，夫妻既然是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嘛。」

邓颖超说：「政治上我听恩来的，回家恩来听我的。」

大家催贺子珍讲话，贺始终低头不语。

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乡；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

「你这个洋婊子，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

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乡，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的。）

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

间从来没有报导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 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聪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苹）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复写检讨外，也很清闲。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撞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延安初见江青

我于 1938 年 1 月 28 日，在延安大会堂（原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一个晚会上见到江青与孙维世合演话剧，不久，延安即传出江青追求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徐以新，徐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共二十八个半标准的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而徐以新又正在追求年轻漂亮的孙维世。其后，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结束了上一传闻。江青当时在延安女同志中，算是个尖儿，她会唱歌演戏，跳舞也跳得好，能写文章，善于骑马，缝得一手好针线为同志补衣服，又为女同志美

容等等，多才多赛艺，当时大家都喜欢她。

这些是我当时对江青的直接印象。

我当时年轻，有时无聊，注意到毛江相恋的过程，延安有一部仅有的中型汽车（等于大陆一般所称的面包车），是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作救伤车用的，车上还漆有「海外华侨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这部车留在延安作了毛泽东的私人座车。我注意车停之处，毛江可能就在附近出现，当时从白区到陕北的男女青年，住了一段时间往往都抛弃过去的盛装，改作大兵装了，江青一直穿着她上海时代的海勃绒大衣，相当招摇，引人注目，所以我往往能从很远处就会认出她。我在延安，喜欢参加晚会，我留心到，晚会中最好的前座总是留着两个座位给毛泽东，当毛和江青在晚会中出现，会场鼓掌，毛江也跟着鼓掌。

毛江相恋时，中央高层确实有过重大的争论。我们下面的同志，不知其详。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不论怎么小，往往最容易传出。何况毛江相恋已不是什么大秘密，党中央所讨论的只是他们能不能正式结婚问题。当时周恩来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和王明保持一致，但在毛江问题上却不相同。王明公开反对毛江正式结合，我听他亲自说过：「领导人不应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位接近王明的同志对我说：「江青月经不调。」我不懂「月经不调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志说：「月经不调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不适合和毛主席结婚。」

很多年以后，我才在中共资料中找到「月经不调」就是暗指江青有政治问题。当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江青的问题的有，北方局的情报负责人王世英，和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秘书杨帆，都说江青过去的私生活糜烂，有「公共汽车」之称。也和国民党人员关系暧昧……。

当年周恩来力挺江青，说她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贺龙也说了一句重话：「主席要个娘儿，你们管得着？」结果中央通过毛泽

东与江青结婚，但江青可以作为毛泽东的主妇，不得参与政治。

毛、江、周关系微妙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请了客，周恩来、张闻天、康生、朱德、刘少奇、王若飞、贺龙等都到了。周恩来和康生还即席讲了话。

周恩来说：「主席、江青同志，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江青对着周恩来，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深情地说：「周副主席，我永远忘不了，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接着康生（康生和江青是同乡，在延安互认为师生的）说：「为了党的工作，主席与江青同志的结婚，也是党的一大喜事，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比我强多了，真是主席的好帮手啊！」

毛江相恋很显然是周恩来促成的，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据我的了解，毛周关系几度分合，缠斗不已，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开始提刘（少奇）压周。周恩来这个时期给毛泽东送上江青，江青这个角色很像中国历史上西施或貂婵的故事。

贺龙也讲了话，他说：「堂堂主席，讨个娘们儿当然是件大喜，今天主席给我们喝喜酒，主席，你要多请我们喝喜酒啊！」周恩来感到贺龙这句话说得不妥，阻止贺龙再说下去，周说：「你醉了，酒喝多了。」任弼时喝道：「贺龙同志，你胡说什么，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是私情还是毛周政治合作的需要，不得而知。1939 年 7 月，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几乎导致残废，当时中共对此事极力保密，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1940 年我快离开延安时，见到毛泽东与江青往延安南门外小校场一座临时搭的戏台上拍戏，由著名左翼导演袁牧之拍摄。我在归途中遇到任白戈，他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我见到毛江拍戏的经过，

他摇摇头，然后对我说：「千万别对人说啊！」

很奇怪，这段毛江同台拍戏的事，在有关毛江纪录中，从来没有人写过。

如上所述，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青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周恩来在政治上善用「美人计」是毫无疑问的，周把美人送出，邓颖超也求之不得，周的「美人计」，得到邓颖超充份和高度的支持。

1953 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又是周恩来替她开路的。

毛江婚后还有一段插曲，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 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时江青不但是毛夫人，也是毛的秘书，黄敬在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把黄敬叫来大大的辱骂了一阵，不久黄敬自杀身死，另一说黄敬是被毒死的。

周恩来、张若名之恋

我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资料，张若名是周恩来身边的第一个女人。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 20 世纪「20 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天津的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叫「觉悟社」的团体，据觉悟社成员之一谌小岑（也是我的兄长）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早已认识，他们同时参加了觉悟社，当时这个团体有个规定，会员活动时，一男配一女，由抽签决定，当周张配成一对时，他们欣喜若狂。从此，他们手牵手地共同参加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一对革命情侣，当时羡煞了许多同志。张若名是才女，她写过一篇「急先锋的女子」很为轰动，邓颖超也写过文章。周恩来与张若名的爱情赛跑中，开始杀进了邓颖超。颖超比若名小二岁，恩来叫她「小超」。1920 年 1 月，周恩来、张若名同时被捕，9 月获释，11 月他们就双双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周恩来到法国以后，若名在身边，小超常通信，周旋于两女之间，初露了周恩来圆滑的政治才华。邓颖超后日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你伯伯没有和张若名结合，是因为他当时坚持独身主义者。」

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三角恋爱的关系，张若名当初是胜利者，最后却以投河自尽而告终。邓颖超当初处于下风，因为她一直留在国内、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在巴黎热恋时，这时中国国内正酝酿国共合作，邓颖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她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于是国民党的「太上皇」，邓颖超与鲍罗廷夫妇非常亲近，也因此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普遍熟悉。当周恩来回国后，1924 年底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邓颖超是个幕后对鲍罗廷有影响力的女人，周恩来认识到「小超」的威力，1925 年周恩来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与邓颖超正式结婚。此后周恩来在国民党一路升官，甚至一度非常赢得蒋介石的信任，都与邓颖超的幕后铺路有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邓颖超当选候补中委，排名在何应钦等国民党元老之前，当时的周恩来是榜上无名的。所以，周恩来抛弃张若名与邓颖超的结合，很像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与宋美龄的结婚一样。都属于政治婚姻！

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回国，经昆明时与张若名秘密会见，当时张若名是大学教授。1958 年反右期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邓颖超为张若名料理后事，并且掩瞒真相。不久，张若名的儿子也自杀了。

周恩来在 1920 年去欧洲勤工俭学以前，是信仰道教的。周恩来当时写过一些宣传道家的文章。中国所谓道家，尊老子为始祖，留有「道德经」，后人有不同解释，其要点，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行为上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伦理上主张「去知弃己」，「情欲寡浅」，「绝仁弃义」。道家在情欲问题上是绝对自私，不受男女私情的束缚，换言之也就是无所谓情的。1918 年 2 月 7 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夫妻不一定有恋爱，恋爱也不一定要做夫妻。当时他 20 岁，他要做一个独身主义者。周恩来政治上是个弄潮儿，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个弄潮儿。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漏，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

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孙维世与江青、周恩来

我是同一天见到江青和孙维世的，当时江青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孙维世虽美还有些稚气。我见到这两位美人是 1938 年 1 月 28 日，这天晚上延安举行「一二八」晚会，会后演出话剧《血祭上海》，主角是孙维世，配角是江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在 1935 年就已经在上海同台演出过夏衍编剧的《摇钱树》，其时江青叫蓝苹，孙维世化名李琳，年仅十四岁，是演的配角；这次延安演戏，主角配角的地位互易，当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私人间的恩怨。不久，她们又同台演出《团圆》，延安相当轰动，好事者又评头论足，说孙维世既年青美丽演技又好。不久，我们又听说，孙维世和江青、徐以新有三角恋。

孙维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母亲任锐，原名任培长，也是任弼时的妹妹，我在延安时，她担任保育院长，我见过她。我认识任弼时的另一个妹妹，当年在镇江化名徐若萍。1937 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

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 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8 月 27 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 年 2 月 25 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 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 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 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三个权势女人的共同情敌

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期间，林彪和他的前妻张梅也在苏联，不久，他们离了婚，林彪追求孙维世，孙未答应也未拒绝，只说了一句：「我

们回国再说吧！」后来林彪先回国，1946 年孙维世回国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了，孙维世经过东北时，林彪设家宴招待，当天林彪的心情很坏，叶群看得出，林彪对孙维世依然一往情深，林彪对叶群还骂了句：「都是你……」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认为孙维世是她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叶群表示，你的仇家也是我的仇家，支持江青，誓诛此妹。

如上所述，江青与孙维世的交恶，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舞台上主角配角的易位。第二个原因是，江青一度追求徐以新，徐以新追求孙维世的三角关系。第三，江青与另一剧作家章泯在上海同居过，章泯与金山关系很深，与孙维世也熟悉，因此江青认为，维世与金山结婚后，孙维世掌握江青上海时代最多的秘密。第四，江青留心到，毛泽东对孙维世仍有兴趣。

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干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的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干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

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这个大美人何罪，只因为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

孙维世后来惨死狱中，死状可怖。孙维世一生从事戏剧，根据中国历史鬼剧说法，孙维世这样的故事，一定是个鬼剧。

文武百官的夫人都陪过毛泽东

毛泽东爱游泳，尤喜与女同志同泳。江青不会游泳，于是满朝文武的官太太，凡是善泳，长的不错又被毛泽东看中的，陪主席游泳是一项任务，她们也引以为荣，毛主席随召随到，陪毛游泳。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很苦恼，周恩来则不断吹捧江青，使江青在政治上得到满足。在中共九大，十大期间，江青的权势不断扩张，都是经由毛泽东暗示，周恩来正式提名的。

陪过毛泽东在浴池旁的高官夫人，有的不一定会游泳，不过毛泽东有这么个习惯，他穿着泳衣，高官的夫人围着他，其中我随便举几个人。

曾志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文革期间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毛泽东早于北伐前在广州就已认识，算是老朋友，所以陶铸虽被打倒，曾志没有，后来一度还当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的回忆录写到，在江西时代她曾与毛泽东、贺子珍三人同床。贺子珍曾对曾志说：「毛委员喜欢你比我多啊！」

朱仲丽也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王稼祥的夫人。我初见朱仲丽时，她还没有和王稼祥结婚。当时我有个朋友叫林萍，一度是边区医院的化验师。有一天她指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大夫对我说：「她叫朱慧，蓝苹的好朋友。」蓝苹就是日后的江青，朱慧就是日后的朱仲丽。朱仲丽常对人说「仲丽」二字是毛泽东替她起的。毛说：「仲丽者，人中丽人也。」

朱仲丽写有回忆录，对于她的丈夫王稼祥文革惨死，着墨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写她与毛泽东的，她坦言她一生最崇拜和最爱的是毛泽东。

王光美是刘少奇夫人，同时是毛泽东的亲密泳友。她的泳装很时髦，江青一见王光美的三点装，就骂「狐狸精」。文革期间，周恩来曾承江青的旨意批示将王光美枪毙，是毛泽东保住她的。

5、60 年代人民画报上刊有很多毛与高官夫人泳池照片，当时还是相当有透明度的。

周恩来单线领导名女人

周恩来与女人的接触都是高度机密。周恩来由于集统战与特务的大权于一身，许多名女人，都在他的对外绝对保密的单线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和这些女同志辟室谈心，是无人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中央时，身边有一个女人叫黄慕兰，又名黄淑仪。她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代，原与贺昌扮为夫妻，后来贺调去中央苏区，黄慕兰担任互济会（共产党专门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救援部长，在上海以交际花身份活跃于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有租界的暗探，翻译官等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时，她最先得到消息，中共在上海的迅速转移，没有受大的影响，周恩来公开表扬过她。1955 年她以叛徒、敌特的罪名被捕坐牢，有人为她曾向周恩来申诉，周说：「共产党员都要受考验的。」

抗战期间，有一对著名的姊妹花，姐姐叫胡楣，妹妹叫胡绣枫。我认识胡绣枫时，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过去也是共产党，中共要他合作，他提出一个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感到为难，因为胡绣枫当时正为周恩来传递国民党的重要情报。胡绣枫的姐姐胡楣，又名关露，是 30 年代初着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她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过情报。胡绣枫写信请李士群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这样就替李士群与关露拉上了关系。关露以汉奸的公开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姊妹俩兴高采烈地到了解放区，自以为立了大功，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结果双双被捕。胡绣枫和她的丈夫李剑华被称为国民党特务，关露被称为汉奸。有一天周恩来总算让她们见了面，姊妹俩拥抱痛哭。关露年轻时与周恩来身边主要助手王炳南相恋。关露被放出后，她和王炳南提出结婚，为周恩来反对。邓颖超说：「关

露作过汉奸，无论是什么原因，名誉已经太坏了，她若是和炳南结婚，会对党和恩来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关露最后吞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一首诗「别了，恋人」，其中有几句是：「在一切不回顾的当中你去了，去远了，到如今，已不复也再不能看见你的背影。」还有一句遗言：「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党了」。言词凄切。

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手下有一著名女将王莹，她是一位作家兼电影明星。当时金山在周领导下主持一情报网，金山原名赵默，他的哥哥赵班斧是上海市社会局长，是杜月笙和戴笠身边的红人，他们的姐夫又是国民党 CC 系大将潘公展。金山利用这些关系在国民党的情报网内建立中共的情报网。金山和王莹既同台演戏又成夫妻，王莹把金山获得的机密情报，传递给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介绍王莹与另一潜伏在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联系。抗战后期，王和谢在美国结婚。中共建政后他们回国，「大鸣大放」期间，谢和赓提出中国的中南海要和美国的白宫一样，开放给人民参观，全国各地没收的豪门巨宅也应该学美国，改建为博物馆。结果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王莹也被捕，1974 年 3 月 3 日死于狱中。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多少个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他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她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不讲。」（「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的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为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别人就更不易知其详了。

毛周共同的「亲人」——张文秋

周恩来一生，政治生活多采多姿，他的私生活也一样多采多姿。政治生活与私生活之间，由于周恩来长期领导地下工作，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为用，极端隐蔽。在地下工作中，男女同志临时配作一对夫妻掩护工作，很多情况下，男女同志挤在上海一个小亭子间大被同眠是常有的事；像周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个「家」。

我在延安时，知道有位和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都很深的神秘女同志张文秋，也在延安，我见过她，也认识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振亚，因此我了解张文秋的一些浪漫传奇的革命故事。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身份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的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后来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国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张文秋在抗战时到了延安，虽是徐娘半老，依然风骚迷人。周恩来、邓颖超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特别是邓颖超十分卖力，急于把张文秋推销出去。毛泽东、张文秋初见，彼此都有消魂的感觉，于是就互相亲热起来了。

张文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许多著名的中外共产党人都亲热过，其中周恩来是她最亲最亲的。张文秋正式结婚二次，共生三女，长女思齐，到延安后被毛泽东收为干女儿，1949 年 10 月 15 日，即中共建政后十五天，与毛岸英结婚；其后第二女邵华（原名少华）又嫁与毛泽东的第二子毛岸青（生子毛新宇）。张文秋被称为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周恩来有没有私生子女

周恩来有私生子女，这个说法很广，周恩来私生子中有一个是德国女人生的，1966 年我访问西德时，曾就这个问题向德国朋友打听过，德国朋友说，周恩来在德国时，当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到处女多男少，中国的留学生多寄宿在这样的家庭，有艳遇的很多。有的一家都是女人，来了一位中国青年作客，把他像皇帝一样侍奉。我问到 50 年代我至少见过香港两家报纸报导过周恩来在德国先后与两个德国女人同居和生育子女的事。其中还有个德国混血儿的照片，生得和周恩来一模一样，我问「是真的吗？」德国朋友很有礼貌的回答：「德国人一向很尊敬中国人，我们也听到这些事。如果是真的，我们是亲戚啦！」然后，他又补充说：「安娜·王（王炳南离婚夫人）现在东德，她也是你们贵国周总理的朋友，她对这些事最清楚。」我说：「如果是真的，周恩来在德国，可能已经儿孙满堂了。」

90 年代初，有一本「叫父亲太沉重」的畅销小说，作者艾蓓小姐，中国文化圈内认识她的人很多，艾蓓的小说使人联想到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引起一些争论。

我认为艾蓓的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

周恩来临终前的四个「托」字，关于此事大陆流传的有三个不同说法。

第一个版本是民间的传说，托罗青长好好照顾他的私生女——艾蓓，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说明周恩来晚年还有一点人情味。

第二个版本是，周恩来四个「托」字，不是对罗青长一个人说的，周临终前，先后对身边的人托了四件事：

一「托」澄清「伍豪事件」，「伍豪」是周的化名之一，国民党曾用「伍豪」等人的名字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周恩来认为，这件事明明是假的，而毛泽东却抓住这个「假案」始终不放手，说明毛泽东准备要利用周这份材料，把周整为「叛徒」。周恩来坚持自己清白，托人澄清。

二「托」「杨度事件」，民国初期杨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虽然为人所不耻，但后来对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斗争，提出过许多重要情报，对中共贡献很大，甚至说他救过周一命。周恩来「托」人要把杨度写入中共党史。

三「托」同志们照顾他的遗孀邓颖超。

四「托」死后不留骨灰。

以上对四个「托」字的说法，如果是真的也合情理。

第三个版本是，罗青长自己说的，周恩来「托」他和平统一台湾。罗青长不过是周恩来身边的一个特务头子，他何德何能处理台湾问题？所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十分可笑的。

1994 年 7 月 6 日，罗青长在美国的儿子罗振（华荣集团总经理）向新闻记者坚决否认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但是他也没有说清艾蓓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由于罗家是有名的特务世家，当年罗青长属于「伍豪之剑」。他的儿子的谈话，等于是一个警告，其后艾蓓这个人就消失了。罗青长儿子的否认艾蓓不是罗青长的女儿，等于反证艾蓓与罗青长的确曾受过周恩来「托」，关系是不寻常的。罗衙内的否认又等于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

邓颖超盛宴众首长夫人

1960 年 7 月，邓颖超突然在北戴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中央众首长的夫人，除江青叶群以外，几乎全到了。

邓颖超一向为人谨慎，没有周恩来的指示，邓颖超不会也不敢有这么招摇的政治大动作的。那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大跃进失败，全国饿死人无数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骤跌的年代，刘少奇接班之声扶摇直上，是不是当时的周恩来也跃跃欲试呢？

看邓颖超北戴河盛宴高官夫人的这张名单吧。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张荣荣（聂荣臻夫人）、曾志（陶铸夫人）、胡明（簿一波夫人）、卓琳（邓小平夫人）、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于文兰（柯庆施夫人）、唐慕兰（张平化夫人）、余叔（曾希圣夫人）、何莲芝（董必武夫人）、林佳楣（李先念夫人）、张茜（陈毅夫人）、于若木（陈云夫人）、李培芝（任弼时夫人）、王定国（谢觉哉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刘素菲（刘澜涛夫人）、林月琴（罗荣桓夫人）、傅涯（陈赓夫人）、萧李（李井泉夫人）、王于耕（叶飞夫人）、郝治平（罗瑞卿夫人）、钟月林（宋任穷夫人）、徐明（孔原夫人）、将彤轩（林铁夫人）、张惠芳（程子华夫人）、水静（杨尚奎夫人）、周屏（徐海东夫人）、杨刚（张经武夫人）、王新兰（萧华夫人）、萧慧纳（王任重夫人）、葛慧敏（谭震林夫人）等七十余人。

这是中国政治最动荡的一年，彭德怀等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毛泽东的威信也受到伤害，刘少奇在党内的声势正在上升，当内分裂危机正在增加。邓颖超这个盛宴高层众夫人，似乎是配合他的丈夫周恩来暗示，把党从分裂的边缘挽救过来，现在要靠咱们娘儿们啦！邓颖超这个大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中共第一代名女人中，还有几位应该提到的：

向警予，她是中共二大的的候补中委和三大的中央委员，中共最早的妇女领袖，我没有见过她。她与蔡和森、彭述之的三角恋爱，早年在中共非常轰动，死于 1928 年，我入党时，她早已做了烈士了。

蔡畅，我在延安时，她是当时中共妇运的领导者。她不算太漂亮，但举止大方，待人和善，人缘很好。她是蔡和森的妹妹、李富春的夫人，曾留法，担任过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江西苏区和延安时代，比她年长的很多中共领导人也尊称蔡畅为大姐，因为她曾为他们介绍过爱人，早年有关共产党的配给老婆之说，可能由此而来。蔡畅御夫至严，李富春风流，回家常受蔡畅罚跪。

孟庆树是王明的夫人，我觉得她非常美丽，身材苗条，气质高贵，是我印象中延安领导人夫人中第一号美人儿。孟庆树当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主任，她的政治水平高，演讲很动人。她和王明站在一起，一个修长，一个矮胖，看起来有点滑稽，不喜欢王明的人，在背后常拿这事取笑。

第三篇 毛泽东、周恩来的斗争

亲密时如胶似漆

斗争时你死我活

他们缠斗了一生

谁捂住这个盖子

第一章 还中国共党史的本来面目

我在延安的时候，喜欢听故事，听革命的故事，尤其喜欢听中共领导人男女之间三角、四角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同志，如果不直接冒犯领导的威信，甚至还赞美几句，当时还容许的。这样的故事很容易牢记，后来发现不同的故事之间，有些是联系的，有些是矛盾的，也发现情爱与政治的关系。这些故事有些人是可以写小说的，我后来脱离中共，写了些片断，以后愈钻愈有趣，这就走向研究了。

我认为，研究中共问题，只有从历史上去研究，才能对中共有全面完整的了解。共产党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我们也需要用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它。

我认为，由于共产党是一个强调一切知识要为政治服务的党，所以，共产党的历史，党与历史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党要求一切配合政治，而历史则要求真实性。所以，一切的共产党，都要不断改写党史，以适应权力斗争的发展；权力的重新分配，新的领导者必然需要一部新的党史，新的领导者都希望把自己写得伟大，而他的党内政敌，或是被丑化，或是名字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与要求之下，中共的党史存疑很多，有的原始文件失落或被毁，有的称为「原始文件」的真实性，也有问题。

1950 年。我到香港决心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那时候似乎留心这个问题的人不多。我在香港的旧书摊上，廉价搜购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我的研究工作，过去许多年是以香港为基地的。由于得地理之便，国际上许多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在访问中国大陆或台湾经过香港时，都乐于和我交换意见。他们认为我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别于国共之外的独立见解。

中共党史，权力斗争是纲

共产党人说，党是从斗争中发展的，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斗

争。权力斗争是中共党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共一方面不断反对宗派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说，党内斗争属于政治路线斗争，而不承认派系斗争与权力斗争。我的看法是：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以派系为核心，以路线为旗帜，以权力为目标。通常中共内部有组织的派系斗争极端秘密，等到揭开，可能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由胜利的一方公布失败一方的罪行。如高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等。

中共从一大到五大，总书记是陈独秀，五大后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斗垮了。在那时期，斗争陈独秀的主导权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上。共产国际内部也在不断斗争中，国际的领导人不断改变，所以共产国际扶植的中共领导人，也随着国际转移斗争的对像。

早期俄共操纵中共，通常是两手、三手、四手策略，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一向如此。权争瞬息万变，亲密战友顿成死敌，所谓革命烈士，是权争的炮灰，也往往是代罪的牺牲者。同志相残，多数党员死于党内的整肃，中共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

共产党的官方历史，往往受到权力斗争的影响，不断改写党史，每一批新当权者都借党史美化自己，笔者试图用时事求是的态度，揭开中共历史的真相。

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纂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共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资料，应该采取诚实的客观的态度。严肃的态度：以中共原始文件作证，不偏袒中共党内任何一个宗派，进而冷静地分析，这是我研究中共党史的态度与方法。

但是，坦白的说，我的努力在很多关键之处还是很难解决问题。原因是中共党史档案，至今仍视为高度机密，所以中共官方党史有些

只能有片断的透露，而这些片断与片断之间，往往不能联系，作完整的了解与判断。某些中共历史的具体真相，在当年地下工作和内战流动期间，根本就不可能留下记录，所以中共官方党史工作者的确也有难言之苦。因此，笔者的写作方法，以中共的正式文件为本，以中共当年有关的当事人的谈话串连成篇，基本背景都是有根据的，其中有些中共高级领导人对骂的粗话可能有夸大之处。这种写法与我的严肃求真态度是不理想的。我的目的是揭出中共历史上不愿谈不敢谈的一部分真相；我用抛砖引玉也可以解释为引蛇出洞的方法，请中共提出证据，批评我的错误之处，请中共当局公开历史档案。即使不尽可靠完整，但多少使研究工作者有更多参考价值。

我下笔写这本书时感慨万千。

我想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的确有理想，有热情，有献身的精神，质量高贵，我对他们深表敬意。

我想到，中共建党艰辛多，当年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从容走向刑场。

我想到，当年多少个同志、多少个美梦、多少个幻想！有鲜花也有鲜血，有英雄也有冤鬼，绝大多数的冤鬼是死在自己同志刀下的。

今天中国的现实，与当年创党时的理想主义，已经挂不上钩了。

往事如烟，政治如戏。中共建党时的风流人物如今都已逝去，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光辉灿烂的故事，有多少无名烈士像流星像陨石，从天空疾驰而过，无声无影地消失。南京雨花台的幽灵在愤怒，北京八宝山的幽灵人鬼不分，这是何等残酷的历史讽刺！

许多历史的真相被中共官方党史所隐瞒了，现在我举出一些最早的历史事实。

中国最早介绍共产主义的人

中国最早介绍共产主义的人，后来都不是共产党，他们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介绍到中国的。

中国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朱执信，他曾协助孙中山编写「建国方略」。

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复与刘师培（师复广东人，师培江苏人）。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理想早年的兴趣，主要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早期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分不开的。

刘师复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大师。他于 1911 年组织「晦鸣学社」，「心社」，1913 年发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他的主要政纲是「公有」，「废除资本制度」，「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他同时反对国家政权成为专政的机器，这个文件被称为是中国共产主义最早的纲领。刘师复逝于 1915 年，时年 31 岁。

刘师培也是无政府主义者，1907 年，他在北京「晨报」介绍「共产党宣言」，1908 年创刊《天声报》，连载《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各一部分。1915 年刘师培在杨度的拉拢下参加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时人耻其所为，皆谓「刘师培死了」。实际上刘师培死于 1920 年。杨度先是拥袁的帝皇党，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

最早的中共党史

根据共产国际的档案，1919 年 3 月 2 日至 8 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有「中国华工联合会」代表参加。

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说，列席共产国际一大的有「旅俄工人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刘泽荣）和张永奎。

又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编着的(共产国际大事记)一书记载，1921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张太雷，瞿秋白，江亢虎，杨和德。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日期是 1921 年 7 月 23 日(以往的说法是 7 月 1 日，1980 年中共的资料订正为 7 月 23 日)，所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会期间，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正式组织。张太雷是俄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是《北京晨报》的特派员，以记者身份参加，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领袖，杨和德背景不详。

据江亢虎在《新俄游记》中记载，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有五派之多。江氏说:「自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君，于君二人来俄，适值国际大会时，遂自承中国共产党代表，俄人欢迎而承认之，是为第一共产党。」

「嗣后，青年团学生陆续入俄，改称少年共产党，而后来者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

「黑龙江省之黑河中国社会党之旧支部，自部长刘谦遇害，有龚君、于君者率众避入俄境，改组中国共产党，是为第三共产党。」

「有杭人张君者，只身游俄，自称支那（中国）共产党之代表，是为第四共产党。」

「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已为专使，是为第五共产党。」

「此五党各不能相（容），而皆自以为是，互为正统之争。」(江著「新俄游记」，1922 年上海商务版）

江亢虎亲身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言当有参考价值。江亢虎作为领袖的中国社会党，于 1911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成立，比辛亥革命还早。中国社会党的政纲主要有「土地公有」,「资产公有」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也是中国社会党党员。1921 年共

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及次年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中国社会党均获邀请，由江亢虎代表参加。江曾获列宁、托洛茨基接见。

中国社会党出版有《社会星》，《社会杂志》，《天铎报》，《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刊》等。

中国社会党曾经提出以江苏省的崇明岛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实验区。

江亢虎于 1939 年参加汪伪政权，任考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国府以汉奸罪判他无期徒刑，1954 年死于上海提篮桥狱中。

中共最早的国际派

1920 年 3 月，旅俄华侨杨明斋随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和马林先后来华，此后杨即留在上海办俄文专科学校。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多数留俄，其中著名的如刘少奇、萧劲光等都曾经是杨明斋的学生。杨也积极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杨明斋后来回到俄国。从 30 年代初苏共肃反开始，他的名字即已消失。很多研究党史的人都追踪他的下落。曾经长期留俄又担任过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的师哲说，杨明斋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受「战犯」待遇。戈尔巴乔夫当政时，中共的党史工作曾经请戈尔巴乔夫协助追查杨明斋的下落，戈正式答复，杨明斋已于 30 年代的俄共肃反中，被迫害而死。

中共建党时有几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维丁斯基是最早的中共建党的联系者，马林正式参加中共一大，代表国际指导。陪同马林参加中共一大的还有尼科尔斯基，他是国际职工代表，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也参加了中共一大，不算是代表。

中共建党时有两批人没有直接算入中共党员，一批是留俄的如瞿秋白、刘少奇等，他们当时是俄共党员。另一批是留欧的。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四川就有一个「青年共产党」，领导人是杨尚昆的哥

哥杨闇公。后来四川和湖南的共产主义青年大部份去欧洲，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活跃，他们分别参加了法共、德共、比共，后来又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后来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其领导人先是张申府，后来是赵世炎，再后来是周恩来。张申府是周恩来人党的介绍人。中共旅欧支部一向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

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后来被驱逐出境，他们转入苏联与留俄的共产党员结合，成为后日中共内部国际派的基础。国际派的政治文化水平较高，中共土著派的斗争经验则较国际派丰富。

中共一大前的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由共产主义小组（或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变而来的。

1918 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 年 6 月，上海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由陈独秀领导，当时又称为临时中央。不久，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又称北京小组）成立，由李大钊领导，时称「南陈北李」。当年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上海约 20 人，北京约 24 人，湖北约 13 人，湖南约 18 人，广东约 10 人，山东约 9 人，共约百人左右。

中共成立时包括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山东、日本东京七个小组，东京小组只有施存统、周佛海两个人，都是从上海去的，应该算是上海小组的一部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许多交叉性的人物，例如陈独秀先在上海，后去广州；张申府先在北京，后去欧洲；李汉俊先在上海后去湖北等等。上海小组的浙江人最多，常往来上海与浙江之间，也有人认为另外还有一个杭州小组的。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正式参加共产党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强，所以中共一大时，党员人数有 53 人、55 人、59 人各种说法，我个人比较倾向 59 人的说法。

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而没有参加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有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

共产主义小组期间，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共产主义者相信，取得政权才是目的。北京小组的黄凌霜，广州小组的梁冰弦等，都是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就和共产党人分裂了。

当时四川和湖南的共产主义青年大部份去了欧州勤工俭学，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主要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周恩来是 1924 年才转为中共党员的。

中共的成立日期

关于中共的成立日期，说法很多。有人把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说成是中共的成立；有人把 1920 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说成是中共的成立。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也是这样说的。提到中共成立于 1921 年的，又有 5 月，6 月，7 月 1 日，7 月 20 日，7 月底等等。中共正式成立于 1921 年，绝无疑问。

中共早期并无党庆之说，一则当年最大的节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二则中共正式建党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当时中共领导人也记不清了。

1939 年 10 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发刊词，原文有「1921 年 6 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将「6 月」二字删去了。1940 年毛泽东在延安得意地说：「明年是党的 20 岁生日，从 7 月 1 日起，我们庆祝一个月吧」。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 1941 年 7 月 1 日，庆祝党的 20 周年纪念。1941 年 6 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 7 月 1 日作为党的纪念日。其后大量资料证明，7 月 1 日中共诞生之说是错的。

陈公傅的回忆中说，一大的召开是 1921 年 7 月 20 日。陈潭秋的

回忆中说，一大的召开是 1921 年 7 月底。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更写到 1921 年 7 月底上海的社会新闻，与中共一大期间情况吻合。

我曾经致函我的苏联朋友石克强（K. V. Schevelyoff，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请他帮我查一查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他回答我说，根据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开会的确实日期是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5 日。

这是 1978 年的事，当时石克强教授还寄给我一份莫斯科出版的 1972 年第六期《亚非人民》双月刊，其中有马林报告的原件，1980 年中共的《人民日报》也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 1921 年 7 月 23 日的说法。

但是，7 月 1 日的中共党庆之说仍是不能改的，因为那是毛泽东亲自订的。

中共一大的代表和决议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括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刘仁静、陈潭秋、包惠僧、何叔衡、陈公博、周佛海、王烬美、邓恩铭等共 13 个人。

中共建党时有几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维丁斯基是最早的中共建党的联系者，马林正式参加一大，代表国际指导，随同马林参加中共一大的还有尼科尔斯基，他是国际联工的代表，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也参加了中共一大，但不是正式的代表。

中共一大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理由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都在争取中国实力派军阀的支持，陈独秀在广州担任教育厅长，做陈炯明的工作；李大钊在北京接触北洋军阀，做吴佩孚的工作。

中共一大主席是张国焘，他奔走南北，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联系者。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最早的接触者之一。湖南代表和山东代

表在会上没有发言，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都是中学生，在会上没有人注意他们。湖南代表何叔衡听不懂大家讲些什么，提早离开。毛泽东在法租界警探搜查后从厕所走出来，探头一看，知道出了事，问了一句：「怎么，大家走了？」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唯一的一句话，不算是正式发言。

中共一大期间，刘仁静认为，凡是承认工农专政，接受党的纪律的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李汉俊认为，党员在入党以前，必须先接受党的教育，对共产主义有足够的理解。结果，刘仁静的观点占上风，刘仁静后来是中共托洛茨基派的著名领袖；而李汉俊则在中共成立后不久就脱党了。

中共一大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陈公博 1922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凭记忆以英文写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国际所存的俄文档案，1979 年出版中文版。两者内容有些不同，反映了当时并没有正式通过纲领文件。

中共一大以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严重的争吵，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他们吵得很厉害，后来陈独秀被捕，马林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以重金贿赂上海租界当局使陈独秀获释，双方才取得妥协。

陈独秀是中共最早反对「两个凡是」的。

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后称总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当时陈独秀还在广州，往陈未到任前由周佛海代理，周又去日本，由李汉俊代理，李又和陈独秀意见不合，一气而去武汉，再由李达代理，李达又在 1922 年脱党。

中共「一大」到「五大」的中央书记（后称总书记）都是陈独秀，核心成员则屡有改变。毛泽东虽然参加过中共「一大」，他到「三大」

才进入中央委员会。项英也在「三大」当选中委。周恩来、刘少奇是在「五大」才当选中委的。邓小平和林彪是「七大」当选中委的。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共在组织上既是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决议和人事安排都必须经由国际批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委，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名的。

中共成立时的双包案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1920 年底在四川成都已经有一个「青年共产党」的组织，发起的人有吴玉章，杨闇公（杨尚昆的哥哥）等。

吴玉章的回忆中说：「这时成都高师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当时年已四十四岁，于是杨闇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没有四川代表参加，而且「中国青年共产党」被认为是一项「分裂活动」。吴玉章解释说，「由于四川地处僻远」，1923 年「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925 年吴玉章、杨闇公相继参加中国共产党，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

「中国青年共产党」与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有密切关系。「少年共产党」又称「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赵世炎。巴黎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于 1920 年，也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早。当时的成员如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何长工，聂荣臻，李维汉，陈毅，张昆弟，蔡和森，邓小平等都分别属于德共、法共或比利时共产党，所以「少共」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后来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实际上「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是 1925 年的事。

由于共产党一向很重视「党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关于周恩来、吴玉章的党龄经过了一番争论，结果周恩来的党龄从 1921 年算起，吴玉章的党龄从 1925 年算起。

1921 年 7 月，和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一时间，北京也出现另一个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对外称「今日学会」，发行《今日》、《共产主义》杂志，这个共产党当年又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

1922 年「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给共产国际一份报告，宣称参加该会成立大会的有四十八名代表，全国有十二个地方小组，会员总数有一万一千多人。

「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一度也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该会代表彭泽湘曾在共产国际会议中与中国共产党互争代表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书记为胡鄂公（又名胡南湖），此人长袖善舞，参加过同盟会，担任过北洋政府部长级的高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最后在孔祥熙支持下办《时事新报》，1951 年死于台湾。

陈炯明、吴佩孚与中共

中国著名军阀陈炯明和吴佩孚都差一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22 年在广州炮轰总统府，背叛孙中山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即致电列宁表示仰慕，积极支持讨论社会主义的小组织，并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厅长。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陈炯明是中国同情俄国革命的最大的实力派，也的确认真考虑过支持陈炯明组党。据当年陈炯明的助手陈其尤回忆，列宁曾计划将一批存储在海参威的军械供陈炯明使用。陈炯明致俄共的信则称「列宁吾师」。

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在广州访问过陈炯明后，他给莫斯科的报告是，陈炯明意志坚强，就其谈吐举止看，他是一个革命的清教徒。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广东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负责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全与陈炯明关系密切。陈炯明的喉舌「群

报」实际由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主持。

北方军阀吴佩孚的主要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中记述，李大钊和他往来密切，曾向他试探地表示，问吴佩孚愿不愿意领导中共？白坚武的话，我认为至有少三点可以帮助考证的。第一，当年北方军阀混战，吴佩孚内外受敌，不择手段寻找暂时的同盟者。第二，当年苏俄与共产国际也有一个天真想去，认为利用中国军阀的矛盾，和利用中国实力派领导中国革命是一条捷径。当时苏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说，「吴佩孚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三，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他的回忆中说，在 1923 年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以前，共产党员受过吴佩孚的照顾。

台共建党与中共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史实，也间接与早期中共有关。台湾共产党是 1928 年成立的，参与台湾共产党建立的彭湃是广东海丰人，日本留学生，1921 年参加中共，五大、六大的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共党内与毛泽东齐名的农民运动专家。

根据共产国际的资料，1927 年 11 月，共产国际指示日共的渡边政之辅，中共的彭湃，朝共的吕运亨等三人筹备组织台湾共产党。当时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共又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由彭湃负责领导。

台共的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民族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这段史实又证明台湾共产党最早是主张「台湾独立」的。

1928 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彭湃与谢雪红曾发生路线斗争。彭湃以中共的经验，主张台湾革命应发展农民运动，谢雪红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台湾具体情况的结合」，主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联盟」。

1929 年 8 月，彭湃在上海被杀，谢雪红逐渐成为台共的代表人物，她在 1925 年参加中共，1926 年又在莫斯科参加俄共，不久又参加日共，1931 年被捕，后被释，日本投降后，1947 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风云人物，同年底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并重新参加中共，1958 年在中国被打成右派，1970 年 11 月 5 日死于文革。

台共另一领导人蔡前（蔡孝乾），他曾经参加过中共的长征，中共在大陆建政初期，任中共台湾工委主委，他到台湾后不久就被捕，参加国民党。

台共在历史上一向有亲中派与亲日派的斗争。据日共资料，谢雪红属亲日派。迄今台湾还有几位台共元老，他们与世隔绝，秋风落叶，花果飘零，似乎已经不为人注意了。

与大陆学者交流研究中共党史

我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竭力希望能和中共的党史工作者合作。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有时还遇到阻力，但是，我感谢中共的有关研究者的合作与帮助。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的资料中屡次提到，「四人帮」有一份他们的党史。我以「展望」编辑部的名义，致函北京「历史研究」杂志社，索取「四人帮」的党史影印本。1978 年 1 月 17 日，「历史研究」编辑部答复「展望」编辑部的函件如下：

展望编辑部：

来信收到。关于「四人帮」伪造党史原件（或影印件）我部没有，请你直接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联系为盼！此致

敬礼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七八．一．十七

我根据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建议，再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 年 2 月 14 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答复「展望」编辑部函件如下：

展望编辑部：

接 1 月 29 日来信，关于索要「四人帮」伪造的党史影印本问题，据查，此书在「四人帮」控制时期上海并没有公开发行过，只是个别大学作为内部课本的讲义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曾企图修改后公开出版，但这一阴谋来不及实现，「四人帮」就被彻底粉碎了。此书并无影印本，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深以为歉。此致

敬礼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

1978 年 2 月 14 日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史文献大部分被毁，70 年代我写的中共党史，等于帮助中共党史研究者填补了他们的空白。中共购买了我的书。「四人帮」倒台后，国内又大量翻印。正如中共中央出版的《党史研究》中说：「《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现已在国内流行……。」「一些在历史上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如张国焘、王明、盛岳、司马璐等人的手中也保存很多中共党史文献。」

目前中国大陆研究中共党史的学人中，我对李锐、杨天石、杨奎松、吴思、高放、高华等多位十分敬重，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的功力很深。

第二章 毛、周在苏区的反复斗争

六大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无论谁挂名总书记，当家的总是周恩来，无论共产国际有什么风浪，谁倒了谁上台，周恩来在中共的地位是不倒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样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从农民运动的领袖，逐渐成为中共游击战争中最大的实力派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同时出了两个红太阳，按共产党的说法是「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从 1929 年红四军内斗中，毛泽东就破坏了这项原则，毛周的反复较量，是党史上的重头戏，中共官方党史避而不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部分。他们既是亲密的战友，又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亲密时如胶似漆，斗争时你死我活，彼此既敌对又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彼此不能相忍又不能不忍，彼此不能兼容又不能不兼容，他们缠斗了一辈子，又合作了一辈子。中共官方一向以「王明路线」代替周恩来在苏区的反毛斗争，其实王明本人从未到过江西苏区。

毛周的斗争之初，周恩来是占优势的，因为周是中央军委书记，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对周积极支持，周恩来对党的领导具有合法性。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政党，毛的农民运动不能代表共产党，工人选出的工人阶级领导如苏兆征、项英、向忠发、顾顺章等都是周提出的，其中苏兆征不久病死，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毛泽东在江西以 AB 团胡乱杀人时，项英与毛面对面斗争，其后周毛妥协，又把项英逼下台了。

在江西苏区（中共苏区）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毛的力量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在红军与根据地。周恩来的力量遍及全国。他掌握中共中央最高的人事任免大权，他不仅领导白区组织，也直接指挥苏区的党军政工作。周恩来的力量基础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留欧学生，中共的留俄学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以及他在追随蒋介石期间拉拢的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期斗争中，周长毛消，毛长周消，反复多次，真像中国旧小说中所写的「说时迟，那时快」，一再出现高潮。

笔者在延安时，听过一些长征干部谈到他们在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惊险遭遇，据他们说，什么长征？是夺路逃命啊！我们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主要领导人都是战士们用轿子、担架抬着他们过雪山草地的呀！

井冈山「火并王伦」

1927 年国共分裂后，中共继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失败以后，正式有一个落脚点是从江西井冈山开始的。

井冈山在湖南、江西边界，是红军最早的根据地。形势险要，历史上是绿林好汉藏龙卧虎之处。红军到达以前，山上有两支以王佐、袁文才为头目的土匪队伍。1927 年 10 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失败，决定上井冈山。上山前毛派何长工与王佐、袁文才做工作。10 月 6 日，毛泽东到井冈山宁冈大仓村见了袁文才，双方交换见面礼，毛送袁一枝手枪，袁送毛大洋六百元。当毛泽东表示要在山上长住时，袁文才说：「这事要我们的大哥王佐点头才是。」

袁文才领了毛泽东去见王佐。这时何长工正在王佐身边对王说：「这毛泽东能文能武，足智多谋，大哥，你要好好款待他啊！」于是王佐命人宰了一只大肥猪，两担老酒，欢迎毛泽东。王佐首先举杯说：「欢迎毛将军！」何长工在旁提醒他：「红军不是这样称呼，你应该叫毛委员。」于是，王佐改口说：「欢迎毛委员。」

毛泽东接着说：「两位大哥都是江湖好汉，劫富济贫，小弟敬仰久矣，今日投奔井冈山，又蒙两位大哥相助……」毛泽东正要说下去，袁文才接过话头说：「毛委员千万不要叫我们是大哥，我和王佐同龄，王佐比我大几个月，我一向叫『王佐大哥』，如今毛委员上山，毛委员比我和王佐都大五岁，我们今后都应该叫毛委员为毛大哥。」

王佐应声说：「好哇，毛大哥，敬你一杯。」王佐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毛大哥，我王佐是个粗人，不识一个大字，不过袁文才是个读书人。」毛泽东接着说：「不识字好，自古皇帝都是识字不多的，你身边有个袁文才做你的宰相就行了。」王佐听得前扑后仰，开怀大笑，连连和毛泽东干杯。

何长工向三人一鞠躬，然后说：「我今年二十七岁，比毛大哥，王二哥，袁三哥都小，请受小弟一拜。」

王佐、袁文才齐声说：「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了，从今齐心合力，生死俱共，患难相助。」

毛泽东说：「上有天，下有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毛某如违此誓，天诛地灭。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我毛某赴汤蹈火……。」

毛泽东正说着，王佐突然说：「毛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件事请大哥替小弟作主。我上山是为了报仇，我有个仇家叫尹道益，是民团总指挥，专和我作对头……」

毛泽东说：「我们一定为你报仇。」

说着，大块肉，大碗酒也就吃喝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对王佐说：「何长工老弟对我说，你事母至孝，这里有一些金银首饰，是我孝敬伯母的。」王佐称谢。毛泽东说：「这是我们打土豪得来的，我们红军就是为穷人打天下啊！」

不久，红军与王佐、袁文才配合，把民团打败了。王佐、袁文才被编为红军一个团，立了不少战功。但是，王佐、袁文才惯匪成性，对于红军纪律命令每多不能服从。1928 年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彭德怀领导的平江暴动，先后失败，都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当地的资源有限，给养发生困难。外来的红军和王佐、袁文才之间的摩擦增加。在这同时，国民党大军围剿，红军为了摆脱困境，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转移至闽赣地区，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红四军与红五军分兵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正在党内传达，六大决议中有一条是关于争取土匪和打击土匪头目的政策，因此特委秘密讨论处理王佐、袁文才的问题。

1930 年 2 月 20 日，王佐、袁文才被通知参加军事会议，他们到达永新、就被扣押，由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审问。王佐说：「要整老子啊，我要找毛委员。」彭清泉说：「毛委员说你们目无组织。」袁文才说：「你们过河拆桥啊。」彭清泉立刻拔出手枪，袁文才应声倒下。王佐逃出，才发现桥已被拆了。王佐叫了一声：「毛委员，你好狠。」耸身一跃，淹死在河里。因王佐、袁文才牵连被杀者有五百多人。

红军在井冈山杀掉王佐、袁文才，很像「水游传」上的「火拼王伦」的故事，在中共历史上后来被认为是一个冤案。至于什么人应该负责，则说法不同，有人认为毛泽东应该负责；有人认为彭德怀应该负责；有人则认为，杀王佐、袁文才是根据中共六大整土匪头子的决议，所以，周恩来应该负责。不过当时周恩来人不在井冈山，彭德怀没有这个胆子，对这件事直接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毛泽东。

周恩来的「调虎离山」计

毛泽东杀了他的恩人也是心腹之患的袁文才、王佐以后，成为闽赣苏区的最大的力量。而这同时，周恩来控制党中央。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

在这同时，毛泽东与江西的土共的矛盾也增大，毛泽东被称为江西的土皇帝。毛的主要干部多数是湖南人，与被称为地头蛇的江西土共摩擦甚烈。

当布哈林仍在共产国际主持实际工作时，考虑到上述情况，又考虑到红四军的实力不大，领导人过于集中，有被国民党聚歼，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指示中共中央，要朱德、毛泽东离开军队，红四军分散打游击。周恩来得到国际这个指示，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个把毛泽东调虎离山最好的机会。

1929 年 2 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命令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当时的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朱毛离开，主要是针对毛的，按当时红军的体制，毛的前委书记权力高于军长朱德。朱德对周恩来的「二月来信」表示接受。毛泽东则拒绝。朱毛对骂，毛骂朱是军阀，朱骂毛是痞子，前委包办一切，是家长制。

5 月，周恩来派刘安恭为红四军军委主席，并指示毛泽东的前委须受刘安恭的军委领导，因为军委直接代表周恩来的中央军委。刘安恭是留德和留苏学生，又是苏联伏龙芝学院毕业，当时被认为军事资历最高。

6 月 22 日，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举行。会议由陈毅主持。刘安恭代表周恩来致词，刘说，「毛泽东在红四军的权力过于集中，不服从中央，拒绝中央『二月来信』违反党的纪律，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毛泽东在前委暂时停止职权。」

当时红军会议中发言很粗。刘安恭、朱德、陈毅都是四川人，声声「格老子」，毛泽东是湖南人，也声声「操你的」，乱哄哄互相对骂。最后，陈毅对毛泽东说：「老毛，现在参加这个会的代表多数反对你，你的前委书记干不下去了，我建议由代表投票选举前委书记，如何？」毛泽东无奈地表示同意，投票结果陈毅当选前委书记。毛骂陈毅玩了手段。毛泽东说：「你懂得前委是干什么的，前委就是管操娘，过去人家不满意我，因为我操了他们的娘，现在由你陈毅操他们的娘了。」（前红四军参谋长龚楚对我说的原文如此）陈毅说：「老毛，你冤枉我了。」毛泽东后来又改口说：「你陈毅做前委书记我同意，他娘的（转对刘安恭）军委，我就不承认。」刘安恭说：「老毛，你这种态度还算是个布尔什维克吗？」毛泽东又不断骂娘。最后大家都劝毛泽东冷静一点。毛泽东一摆手说：「红四军这个烂滩子，我不管了。」

随后，毛泽东就歪倒在椅子上，不言不语，众人走到毛的身边，有人以为毛泽东死了，林彪哭着说：「毛委员是这里唯一的中央委员，

死了不好办。」毛泽东眼睛一瞪，对林彪说：「你们希望我死，我死不了，不过现在红四军有个托派就是刘安恭，苏联有个托落茨基，中国有个刘安恭——刘安恭死鸡。」

毛泽东嚷着要去莫斯科告状。刘安恭说：「可以，可以，你直接找马克思告状更好。」当时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走来对毛说：「老毛，你今天受刺激太深，为了革命事业，你需要休息。」毛泽东真的病了，在傅柏翠的安排下到傅的古蛟家中休养。

毛泽东改任闽西特委指导工作。红四军在毛离开后，一连打了几个败仗。红四军举行八大，在刘安恭的主持下，争吵了两天，检讨七大以后，红四军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极端自由的观念，往往一个战役「能不能打」「要不要打」都要由战士讨论，以至坐失战机，一败再败。大会时，刘安恭和陈毅都被批得十分狼狈。会后陈毅急去上海，向中央请示。

1930 年 2 月 15 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4 月 15 日，中央致电毛泽东说，「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苏维埃代表会议」，要毛「务必参加」。4 月 26 日，中央又致电毛说：「对四军特别指定毛泽东同志来出席，迄至今日，毛同志还未到沪……中央认为此次毛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即使苏代会过期，「毛同志亦必须出来一次。」但是，毛泽东的警惕性很高，他仍然不理。

毛泽东重回红四军

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 月，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进入中央领导都和周恩来有很深的关系。他们的叛变，对中共破坏很大。因此，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9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赴苏联。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以便内外配合，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直接控制苏区及红军。在此同时，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局，委员有康生、陈云、张闻天、秦邦宪、卢福垣、李竹声等。由卢福垣

任总书记，卢和向忠发一样，没有文化，他当然听秦邦宪的，其后秦邦宪直接取而代之，这一年，上海又发生共产国际代表牛兰被捕事件，自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不便直接联系，秦邦宪上承王明从莫斯科转发的国际指示，下转「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周恩来具体执行。周当时虽还在上海，但是江西苏区的项英和任弼时都是直接听命于周恩来的。陈毅到上海后，向中央汇报说，「红四军根据中央『二月来信』和举行七大后，毛泽东离开，军纪涣散，战斗力削弱，问中央该怎么办？」其时党中央的确为难，因为「二月来信」是周恩来发出的，如果由周恩来承认错误，一定有伤中央的威信。因此由李立三出面批评陈毅，李立三说：「你陈毅接前委，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根本是个错误。」当然就是周恩来的错误了。其实周恩来也受了委屈。「二月来信」时，布哈林还在共产国际负责。布哈林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说，目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为了保存中共的实力，游击队的目标不宜过大，朱德、毛泽东都应该离开红四军。周恩来认为布哈林的指示，正符合他的主观整毛的愿望，因此以中央名义发出「二月来信」。陈毅到达上海，正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垮台的时候，因此，李立三对陈毅说：「中央决定收回『二月来信』。」其后，陈毅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给红四军另发指示，史称中央「九月来信」，决定毛泽东重回红四军。

11 月 26 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并致电中央，今后「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在此电中，毛泽东特别给李立三写了几句私话，请立三「抽暇写信指导」报答他的「平反」。

12 月 28 日，红四军举行九大，史称「古田会议」，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第三章 AB 团事件真相

红军的武装对抗与互相杀戳，从 1929 年就已开始，以周恩来为背景的反毛派，称毛派是富农路线的右派；以毛泽东为背景的反周派把敌对者称为反共的 AB 团份子，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为了争取红军的控制权反复交锋。相互指对方为 AB 团，红军屠杀红军，死者无数，史称「AB 团事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左派于 1926 年底在武汉确有一个 AB 团政治小组织。成立时，邓演达、陈公博、徐谦、顾孟余等都在大会上讲过话，由于这些讲话的人，当时都是拥护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或后日的第三党人，第三党又是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所以中共有关资料中，将 AB 团与改组派和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混为一谈。

据早年 AB 团的组织者之一程天放说，当年组织 AB 团的目的，A 代表省级，B 代表县级，AB 二字表示组织的架构。

据 AB 团另一组织者段锡朋说，1927 年 4 月 2 日，中共在南昌一度夺权成功，当时国共还没有公开分裂，共党拘禁异议分子，所以 AB 团就宣布解散了。

后日中共所称的 AB 团，与上述的 AB 团，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时在苏区出版的「红旗」周报说，AB 团始于武汉，后来总部移到南京，江西也有一个总团部，各级苏维埃，层层有组织。在红军，成人、青年、妇女中也有 AB 团独立组织。中共当时说，AB 团遍地皆是，无所不在。至于这个组织为什么用 AB 两个字呢？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刘亚楼说：「AB 是英文 Anti-Bolshevik 的简写。」即反对布尔什维克之意。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 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1929 年 11 月 13 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江西苏区，「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展开反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

反AB团是周恩来籍党中央的名义首先发难，随后毛派立即接招，在 AB 团莫须有的罪名下，毛派与反毛派互整。黄克诚的回忆中有一段简要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动员打 AB 团」「但是在严打 AB 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黄克诚自述」）。黄克诚的几句话，说明了两点：第一，打 AB 团最初是中央（周恩来）提出的；第二，打 AB 团「扩大化的偏差」是毛泽东造成的。

1930 年 9 月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的工作以苏区红军为重点，成立苏区中央局，统一中央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9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又说：「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苏区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各苏区军委应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挥。

这就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在江西苏区短兵相接了。10 月 4 日，毛派红一军团攻入吉安，据说获得的敌人文件中，有一份是 AB 团的暗码，签字的是李文林的父亲。毛泽东接到报告，得意地说：「我早就知道，AB 团就在共产党内，就在江西省委，AB 团的头子就是李文林」。这李文林是什么人呢？

李文林是中共一大时 59 个党员之一，党龄和毛泽东差不多，是江西红军最早的创造者，是江西苏区的地头蛇，也是最大的实力派。李文林这时刚从上海参加过苏区代表会议回到江西。

李文林时年 30 岁，自视很高，火气很大。他回到江西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便责问毛：「你为什么不去上海参加中央苏区会议？」毛瞪着眼没有答他。李文林挺着胸，一个箭步向前，指着毛泽东说：「你毛泽东不敢打南昌，你毛泽东一贯拒绝执行中央路线，你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李文林，你懂得个屁。」李文林又激动地说：「毛泽东，你听着，江西苏区是我们江西工农拼出来的，不容许你的逃跑路线。」

10 月 14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说：现在赣西南的党和团内充满 AB 团反革命分子，必须「改革全部党的组织」，「严厉地镇压 AB 团，处决 AB 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这时，毛派抓 AB 团的「指示」「通告」满天飞，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第一方面军有四万多人，抓了四千六百多人。陈正人（毛派）的紧急通告中说：「最近破获 AB 团最多的，莫过于赣南及一方面军。赣南 CY（青年团）干部大批是 AB 团分子。」「红军 AB 团自总部（设在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一直到团部，师团部以及下级整个组织，几乎全部破获……」

当时毛泽东关于抓 AB 团，说了几句有趣的话。他说：「每个同志坦白交待好比脱裤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脱裤子。」「肃反好比身上捉虱子，一个一个捉，它往衣缝里钻逃了，捉虱子要打歼灭战，把所有的衣服在滚水煮，虱子才能完全消灭。」「革命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滚水里煮一煮。」

1930 年 12 月 7 日总行委政治部主任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毛派）李韶九率领人马，直扑富田，按名单抓人，当时李韶九打的旗号是帮助行委肃反，把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秘书长李伯芳，组织部长江克清，宣传部长袁绍黄，委员段良弼、王怀，省苏维埃秘书长马铭，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全被称为 AB 团核心分子的一百二十余人逮捕。其后受株连被捕者有五千二百多人。

李韶九漏夜审判被捕者。毛泽东又加派他的秘书古柏协助李韶

九，古 8 日也赶到富田。

当时的审讯有一条规定，不准否认，只准供人。因为李韶九说，你是 AB 团，我们绝不会抓错人，所以「不准否认」，现在的任务是彻底消灭 AB 团，被捕者「只准供人」，供出你的 AB 团同党。供不出，用刑；再供不出，再用刑。毛派的一份紧急通告中说：「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非用拷打，不肯招认，必须用硬软兼施的办法。」「不招供，不停刑。」「AB 团近在眼前，无所不在，组织严密。」

所谓「硬软兼施」根据当时总前委的指示，软的是「态度诚恳」，骗出对方的口供；硬的是捆着犯人，双手吊起，人身悬空，或者用牛尾竹杆子鞭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

有的被捕者完全无辜，因为受不了酷刑，便作伪证，胡乱咬人。当时胡乱咬人，有的为了自保，有的为了私怨，有的为了男女之争，有的为了看到几个人一起引起怀疑，有的为了对某人看不顺眼，有的为了个人某种企图等等。同志出卖同志，亲人出卖亲人，被捕者不断扩大，怕死者编造谎言，争先立功。有的被捕者被逼疯了，便乱咬毛派是 AB 团份子。被咬者便抓，一抓便审，今天审人，第二天又以同样的罪名被别人审判。在延安时，有一位井冈山时代的老干部曾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 AB 团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而另一部份，则因为党冤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党当时处在万分紧张的斗争情况下，正需要把党内的这两种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种份子意志薄弱，本质上是易于动摇的，后一种份子对党抱怨，正证明他对党的忠诚不够，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另外还有一些乱用 AB 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

了……。」

他还补充说：「革命嘛，哪有不杀人的道理！杀人嘛，像打靶一样，哪有百分之百射中的。」

富田大会指控毛泽东

被捕者中有一个叫刘敌的，是二十军的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他和李韶九是同乡又是朋友，他被捕后对李韶九说：「我拥护你，抓二十军的 AB 团，我执行你的指示，保证办好。」李韶九说：「刘敌，你好好立功。」刘敌说：「我是你和毛泽东同志的老部下，执行命令，绝对坚决。」

刘敌向李韶九提出「保证」被释以后，星夜赶到东固二十军军部。刘敌扬言：「不得了，李韶九在富田抓人杀人，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被抓了，李韶九还准备到我们二十军抓人，我们如果不制止他，就快被杀光了。」全军哗然。二十军的一部红军，在刘敌带领下，从东固打到富田，释放了被逮捕的谢汉昌等，毛派的李韶九、曾山、古柏、陈伯钧等本来被捕的，刘敌对李韶九说：「你对我讲过义气，咱们义气还义气。」就将李韶九等释放了。

12 月 16 日，李伯芳、金万邦（江西苏维埃委员）等被释放出的反毛派，在富田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指控毛泽东不听中央（周恩来）的命令。会上有人说：「毛泽东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会上还有人说：「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许克祥是 1927 年国民党军队屠杀共产党的头子。

1930 年 12 月 20 日，江西省行委写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认为以 AB 团罪名被逮捕的，其实是反 AB 团有功的，如段良弼等。江西行委又说，他们截获一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信中说：「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段指段良弼，

李指李伯芳，王指王怀，均属江西行委成员。毛派说，这封信属于伪造。

富田反毛大会推出萧大鹏为二十军军长，他们结合江西的反毛派，把队伍拉到赣江以西，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对抗毛派。

1931 年 1 月，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为书记。项英是周恩来的亲信，他到苏区的首项任务是处理 AB 团问题。

1 月 15 日，项英宣布，江西行委，红军前委，各级苏维埃统归苏区中央局的领导。1 月 16 日，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件作出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由于党的领导不健全造成的，富田事变实质上是反革命，但参加者不一定都是 AB 团分子。毛泽东的处理是过火的行动，项英并派前二十军军长曾炳春为二十军政委，希望缓和双方的敌对关系。

2 月 19 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通告，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党内无原则派别斗争纠纷演进而成的。在这同时，毛泽东的总前委也作出决议，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领导，与项英的苏区中央局针锋相对。

正在项英准备安排富田事变的双方在宁都的黄陂举行会议解决分歧时，党中央的态度突然变了，周恩来的态度当然也变了。原来派项英到江西主持苏区中央局，是三中全会决定的。1931 年 1 月，项英到达苏区的同时，中央举行四中全会，当时中央的路线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因此把一切失败的责任都推在李立三和三中全会身上，周恩来从三中的主帅一变而为四中的主帅；同时又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实力地位，因此只好暂时牺牲项英。

2 月 20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宣布，肯定 AB 团为反革命组织，也等于肯定了毛的血腥镇压，周恩来又派了任弼时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处理苏区纠纷。2 月 23 日，周恩来致电苏区各领导系统，在三人团未到达前，停止争论，服从前委（毛泽东）领导。

4 月 17 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抵达黄陂，由项英召开黄陂会议的反毛的江西行委代表团，完全不知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已与毛派秘密妥协，行委代表团于 4 月 18 日也到达黄陂，立刻被毛泽东逮捕。三人团表示支持毛泽东压制 AB 团的行动。毛派大受鼓舞，将行委代表团团员和二十军在黄陂的干部全部杀害。其中包括被毛泽东称为地头蛇的李文林和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王怀等，史称「黄陂惨案」。李韶九被毛称为肃反有功，升为苏区保卫局长。

反毛派至此，见大势已去，反抗无力，只好服从，在河西的二十军残部一千七百多人，于 7 月中旬奉命东渡作战，军行至宇都平头寨，受到林彪、彭德怀、陈毅包围聚歼。这场红军屠杀红军的场面惨绝人寰，两方红旗遮天，梭标如林，分不清敌我，见人就杀，尸体横七竖八，有人拼着最后的一口气哀号：「马克思，你在哪里？」最后二十军无一生还，被杀的人中包括二十军军长萧大鹏和政委曾炳春，前军长刘铁超等。曾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二十军被完全消灭后，番号也被取消了。

当年反毛派的一份紧急通告说：「乱捉，乱打，乱杀。」「苦打成招」下承认自己是 AB 团。「若我们一味相信 AB 团的口供，江西全省的干部大半都是 AB 团，过去江西斗争的局面，是谁创造出来的。」

被称为 AB 团要角的段良弼，后来逃到上海，找到党中央，秦邦宪和他谈话。段良弼对秦邦宪说：「江西肃反，我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政策，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我是江西肃反委员会的委员长，我是捉 AB 团的第一人，怎么说我是 AB 团呢？」段良弼要求平反，秦邦宪始终未发一言。

在江西，凡是因 AB 团受牵连的家属或熟人，或是远走他乡，或是隐姓埋名，甚至自己的儿女听到有人提到 AB 团，会当场昏倒。1976 年毛周逝世以前，对革命贡献最大的江西赣西南老苏区，被称为「哑区」「鬼区」没有人敢说话。甚至党委书记领导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群众也不敢鼓掌，害怕站错队遭杀身之祸。

AB 团事件的责任的反复

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时，才有江西上访者对中央说：「我们是当年 AB 团事件死难者的儿女。」谁都说不清他们的父母是被什么人杀掉的。

江西省委党史室主任戴向青搜集了大量有关AB团的骇人听闻的资料，送到胡耀邦身边，当时中央负责人兼管党史的冯文彬奉命到江西一一核实问题弄清了，胡耀邦正准备平反这个早期党内最残酷的大冤案，不久 1987 年胡耀邦下台了。

这份资料后来由中央主管党史的杨尙昆给中央负责同志传阅，其中一段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肃反中，以 AB 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以改组派罪名处决者有二万多人，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者有六千二百多人。」正如原资料说，这是「不完全的统计。」

毛派在消灭二十军过程中，第七军军长李明瑞非常积极，李明瑞原是国民党军队在广西暴动中参加红军的，他在消灭 AB 团最后的战役中立了功，他自己的第七军也消耗殆尽。李明瑞本人于 11 月也以 AB 团的罪名被杀。前红七军参谋长龚楚对我说，早年中共的广西暴动，李明瑞和邓小平都是参加领导的，在暴动几近被国民党消灭时，邓小平逃了，是李明瑞坚持把部队带到江西的，邓小平担心李明瑞向中央说出真相，就以 AB 团的罪名把李明瑞杀了。

这里附带要补充一段史实，1931 年 4 月，任弼时等三人到达中央苏区，为毛泽东翻案，宣布以毛泽东接项英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突然又提出一个奇怪的意见，他主张放弃江西，转移到四川去。任弼时此言一出，毛泽东立刻感到，这又是周恩来的调虎离山之计，泼口大骂「娘的，娘的」。朱德是四川人，发言附和任弼时的意见。毛泽东责问任弼时：「你的意见是你个人的还是中央的？」

任弼时答：「是斯大林亲自说的。」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后来了解，中共六届四中以后，米夫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中共已经建立

斯大林正确路线的领导班子，不过，党在江西苏区的内部斗争，武斗十分激烈。于是斯大林说，要他们全都退出江西，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吗？斯大林又补充说，退出江西，建立新根据地，以四川最为理想，四川的地理与经济条件都比江西好，是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当时中共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周恩来告诉任弼时，再由任弼时向江西苏区传达。后来因为适逢国军对苏区第二次围剿，战情紧急，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

1931 年 11 月 1 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中对 AB 团问题又重新作了检讨。

项英说：「中央局早已作了结论，富田事变客观上是反动的，但不能说参加者都是 AB 团，但是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AB 团取消派的富田事变』。违反中央局的决议。」

任弼时说：「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由于少数人拉帮结派的结果。许多同志对党有意见动机是好的，把他们打成 AB 团，毛泽东同志应该负责。」

朱德说：「AB 团份子是少数人，肃反的同志打击了一大片，的确很影响红军士气。富田事变中有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后来又有人用我们的名义发拥护毛的宣言，又有人骂我是毛泽东的走狗，布尔什维克党，怎么有这些怪现象。」

赣南会议上骂毛泽东最激烈的是顾作霖。顾说：「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的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你驾临党的领导，个人包办，独裁主义，你简直和蒋介石的作风一样，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拒绝中央的正确路线，你的游击主义，小组织分裂主义，包办主义，农民意识，保守主义，乱打乱杀，缺少无产阶级观点，犯有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警告你。」

顾作霖当时不是中央委员，而是三人团代表之一。他是「伍豪之剑」成员之一，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所谓「伍豪之剑」是当年周恩来制裁党内政敌和叛党份子的杀手。顾作霖大骂毛泽东后，1934 年 1 月，在六届五中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个月后他就死了，死后一个月中共才正式宣布，死因成谜。有人说顾是被毛派暗杀的。

赣南会议中，王稼祥以嘲笑的口吻对着毛泽东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赣南会议决定改组苏区中央局，选举委员时，任弼时和毛泽东各提出一个名单，任弼时的名单有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项英、朱德、顾作霖、邓发、王稼祥。毛泽东的名单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周以粟、曾山、王稼祥等，结果任弼时的名单获得通过。赣南会议又通过周恩来为书记，周未到任前由项英代理。毛泽东逐步淡出红军领导地位。

1931 年 11 月 7 日，苏维埃全代会在江西瑞金（改称瑞京）举行。主要决议有：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根据苏维埃宪法，主席是个虚位，没有实权。

1931 年 11 月，中共正式通过宪法，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周恩来一再宣布，国共内战是国与国的战争。苏维埃中央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的「两个中国」自此开始。

第四章 宁都会议，大败毛泽东

1931 年底，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于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斗争，就更进入短兵相接了。

毛周短兵相接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有一系列的分歧，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游击战术，坚壁清野。周恩来主张，全线出击，先发制人，死攻坚城。毛周战略也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主张围点打援的。

1932 年 2 月 3 日，周恩来下令毛泽东攻赣州。由于赣州三面临水，地形易守难攻，国军工事坚固，双方激战三十五天，红军损失惨重。无功而撤。3 月 9 日，周恩来主持江口会议。毛泽东说：「我早指出，赣州为敌人强力中心城市，不应打不该打。」当时王稼祥站在周的立场，他在 3 月 23 日的「红星报」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反对进攻中心城市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游击思想是右倾主义。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如能攻下赣州，闽赣、赣东北、湘鄂赣几个分割的游击区可以打成一片，苏区中央局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也准备从瑞金搬到赣州。3 月中旬，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率军入闽，为了毛周不致于全面决裂，毛泽东表面上仍然表示尊重周恩来的领导地位。3 月 20 日，毛致电周请示作战方向。4 月初，周批准毛的进攻龙岩、漳州计划。4 月 14 日，毛向周报告攻占龙岩战况，周对毛表示嘉勉。但双方仍处于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状态。

周恩来强攻赣州战役的失败与毛泽东迂回攻占漳州战役的胜利，毛在红军中的威望又提高了。4 月下旬，拥毛派的声势重振，毛派与周恩来为争取红军的主导权，进入拉锯状态，漳州战役后，周命令毛扩大战果，乘胜向闽南、粤北进攻，毛以避开敌人主力为理由，拒绝执行中央命令，攻向粤赣边境行动。于是周恩来公开对毛泽东游而不

币避实就虚展开攻击。同时又鉴于毛派军力确实有所扩充，也予以安抚。

5 月 30 日，周恩来在「实话报」发表「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指责毛的保守主义，等待主义「割据而守」「闭关主义」。周恩来说：「全面出击」的意思是，「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的进攻」。5 月 20 日，周恩来根据国际指示，指责毛泽东犯了「迟缓」「等待」的错误。6 月 17 日，苏区中央局指示「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去」。周恩来又说：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红军与国军属于「国与国的作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打到外线去，响应国际事变」。所谓「响应国际事变」就是配合苏联的战略防御。

1932 年 8 月 1 日，刘伯承在「革命与战争」发表文章说，毛泽东「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拿半世纪前的曾国藩集作为兵法之传。」

在这批毛的同时，7 月间毛周两派相持屡有反复，恢复了毛派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8 月 8 日，毛泽东重新被任命为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在这同时，党内拥周排毛的声浪也在提高。谁上谁下只问实力多少，行情朝夕数变。

宁都会议

1932 年 10 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扩大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一次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反毛会议。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0 月上旬，「会议过程中，『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会议未正式开始前，由于周恩来未到，大家谈话比较随便。毛泽东大谈他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心得。认为敌人要进攻苏区让他进来，

没有什么可怕。避实就虚，避其主力，攻其虚弱，各个击破，战无不胜。

彭德怀说：「如果让敌人占了我们的首都瑞金，红军士气和人心都大受影响啊。」

毛泽东说，「敌人占了瑞金又有什么可怕的，你不懂得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八阵图』吗？」

刘伯承哈哈大笑说：「你是诸葛亮吗？」

毛泽东说，「如果我指挥，我的确可以做到『屈指一算，计上心来』，有把握打胜的。」

刘伯承又哈哈一笑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遇到老学究，见鬼了。」

毛泽东正要继续讲下去，突然，周恩来走进来，表情严肃，全场肃静。周恩来立刻宣布，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红军应付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他首先点名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发挥了他的传统军事理论，主张诱敌深入，寻找敌人最弱的一点突破。毛同时指出中央「制定政策，不作调查研究」。会上立刻反问：「你搞经验主义，行吗？」

刘伯承说，「你一点不懂现代军事，你以为现在是那个『三国演义』的时代吗？你的思想太陈旧，已经是古董了。」

毛泽东说：「你照抄苏联军事理论，在中国革命中是行不通的。」

朱德说：「如果红军每一次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那么红军将失去主动性。而敌人可以从容的布置进攻。」

毛泽东说：「诱敌深入就是把敌人诱进我们的口袋，一口口吃它。『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让敌人先尝点甜头，再消灭它。」

任弼时说：「过去红军力量小，苏区也不大，可以采用游击战，

诱敌深入，现在情况不同，何以仍然采用保守主义。等待敌人深入是不是真有把握歼敌？」

毛泽东说：「红军采取进攻路线，如果集中攻坚，我们进攻屡次失败已经是个教训：如果同时分几路进攻，分散兵力，顾此失彼，又怎么样？」

项英说：「你一贯反对中央路线，你的观点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看来你简直替反动派筹谋划策，你是在长蒋介石的士，气，灭红军的威风吗？你的『诱敌深入』，实际上是『引狼入室』。」

邓发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不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一贯是个失败主义者。我们和毛泽东的斗争，是胜利路线和失败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

会上有人喊出「打倒失败主义，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周恩来要大家安静下来。

顾作霖说：「毛泽东同志的等待主义实际上是退却逃跑主义，逃跑到我们失去活动的范围和失去主动，最后变成投降主义。」

陈毅说：「苏维埃和红军都是从无到有的，必须依靠进攻才能发展和创造新的苏区和红军，我拥护周恩来同志的进攻路线。」

最后周恩来作出结论说：「敌人采取主动进攻，我们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今天的苏维埃是个国家，我们绝不容苏区土地被敌人蹂躏；我们不仅要进攻，而且要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

毛泽东说：「红军全面攻势，等于伸出两个拳头打人，我反对。」

会上又是一片打倒声，骂毛声，周立加制止。周恩来说：「今天的结论是苏区中央局根据国际精神和中央指示所作的决议，要执行，这是党的纪律」。毛泽东哼了一声，顾作霖上前指着毛泽东说：「我要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毛一惊，以为顾作霖出拳打他，赶快

退后一步说，「我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拥护周恩来同志的进攻路线。」

周恩来用敏锐的眼神向毛泽东扫了一下，提高嗓子又重复了一句：「这是党的纪律。」

宁都会议中一致批毛，公开要求毛泽东退出红军领导，把毛的总政委撤职，由周恩来负总责，这个反毛会议是由周恩来挑起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刻，周恩来又假惺惺地说：「毛泽东同志还是有功的，这样吧，毛泽东同志还是负总责，我当他的助理。」全场一片反对声。周恩来接着说：「既然同志们反对我的意见，那么，由毛泽东担任我的助理好不好？」毛泽东没有待到众人反映，「卜通」一声从座位上倒下，后来被送到汀州养病。王稼祥常说：「在宁都会议中，我是唯一没有骂过毛泽东同志的。」

毛的总政委被撤职

反毛派获胜后，中央苏区的主要人事的布局大致如下：

周恩来，中央局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

任弼时，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度代理书记。

陈寿昌，职工部长兼全总执行部书记。

朱德，军革委主席兼红军总指挥（军革委属于苏维埃中央）。

刘伯承，红军参谋长。

王稼祥，红军政治部主任（王受伤后，由顾作霖兼）

毛泽东，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

顾作霖，宣传部长兼少共中央局书记（顾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由胡均鹤代）。

项英，中央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委书记。

邓发，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

王盛荣，少先队总队长。

张爱萍，少先队参谋长。

邓小平，江西省委书记。

罗明，闽粤赣边委书记。

王首道，湘赣边委书记。

宁都会议后，任弼时在「实话」报著文说，红军应乘着敌人大举进攻，尚未完备以前，以集中的力量，迅速「突破一方来各个击破敌人」。

宁都会议通过「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据贺子珍回忆中说，当时毛泽东对她说：「他们说我右倾机会主义，把我的军内职务撤了，不让我管军队……」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会回来的」。

1932 年底，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陈云，杨尚昆都从上海撤退到江西苏区，周恩来这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仍然是党和苏区的第一号人物。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1933 年 6 月 14 日「红色中华」报赫然的巨大标题是「肃反工作的伟大胜利，AB 团要犯段起凤捕获就地枪决」。这段起凤富田事变时，曾是二十军最有影响者之一，朱德、彭德怀等曾经写信要他出面调解。毛泽东、周恩来合作歼灭二十军时，段置身事外，毛周也未加追究。这时他不甘寂寞，去找毛泽东叙旧，他不知道毛泽东这时有职无权，管不到中央局的事了。国家保卫局奉令将段起凤立即逮捕处决。

1933 年底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改用堡垒战，毛、周的战略思想都感到难以应付。当时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的办法，但是因为李德不懂华语，短促突击贵在反应迅速，通过翻译就难以及时了。其后李德改用以堡垒对堡垒的办法，国共双方兵力悬殊，红军当然处于「分兵防御」,「拼消耗」……。周恩来到苏区直接掌握红军指挥权后，毛泽东多数是处于挨批挨骂的地位，毛泽东被批的最主要的一条是，毛是一个逃跑主义者。整个苏区反围剿的过程中，周的进攻路线与毛的逃跑路线的斗争之争。周在进攻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毛在逃跑中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军事路线斗争中的大概形势。

毛派虽在宁都会议中受挫，毛泽东仍然是苏区的实力派。毛在失败后到汀州养病是个借口，真正的意图是重组力量，维备对周恩来进行反攻，夺回中央苏区的控制权。

罗明与毛成了「难兄难弟」

毛泽东到汀州时，当时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也在汀州，罗明正到傅连璋的医院看病，见到毛泽东拱手对毛说:「我们是难兄难弟啊。」

「此话怎解？」毛泽东问。

罗明说，1930 年 4 月，我到闽西担任特委书记。立三路线时，我被批右倾；三中全会批立三路线，我又被批左倾；现在，我又被批为右倾，去年底（1931 年）周恩来同志经过闽西到中央苏区，我问他:「我到底该怎样走，才算是正确的。」周恩来同志答:「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周恩来只好这么说吧。」毛泽东说:「你问他这个问题，的确使他为难。恩来身不由主啊。」

罗明指一指四周墙上的标语:「不让国民党进苏区一步。」「血战到底，誓死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然后罗明又指着中央文件上的

字句：「我们必须严重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坐待敌人的包围，甚至悲观失望而投降，这种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无情迎头痛击。」罗明说：「这不明明指的是你和我吗？所以说，我们是难兄难弟啊。」

罗明靠近毛泽东，悄悄地在毛的耳边轻声说：「傅柏翠出事了。」

毛惊问：「傅柏翠被肃反了？他是 AB 团吗？」

罗明说：「你们江西肃反叫 AB 团，我们闽西肃反叫社会民主党，他提出什么反对烧杀，反对暴力，难怪邓发把他定罪为社会民主党了。傅柏翠拥有地方武装，红军进剿，傅扬言保家自卫。和江西清剿二十军事变一样，红军自相残杀的事也在闽西发生了。傅柏翠上山打游击。在古蛟地区一度处于对抗状态。老毛，你想想，打游击本来是我们对抗国民党的，怎么傅柏翠上山打游击来对抗红军了？」

毛泽东低头不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回顾往事，1929 年 6 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惨遭斗争，几乎不省人事，当时身为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把他接到傅的古蛟家中休养。这傅柏翠当年为什么对我姓毛的施了「仁政」？这傅柏翠现在为什么上山和红军对着干？毛泽东想着想着，呼呼入睡了。

罗明路线

当时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在汀州、上杭、永定一带指挥作战。他向苏区中央局反映：1，目前敌我力量悬殊，应避免与国军主力作战，保存元气：2，有些条件太恶劣的根据地，不如暂时放弃，以便集中兵力：3，群众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很难动员，即使把斯大林本人请来，或者从坟墓里把列宁救活，也很难说服群众。

当时罗明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周恩来认为罗明的观点与毛泽东接近，在敌人面前的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的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在福建苏区前线实地指挥作战的，如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闽

粤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等也都是同意罗明的看法，由于这种观点与周恩来的进攻路线针锋相对，中共中央认为非常严重，张闻天时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主编，他写过多篇反罗明路线的文章，罗明的职务也被周恩来撤了。当时任弼时、顾作霖等都主张把罗明枪毙，周恩来说：「『罗明路线』就是反革命路线，用铁拳粉碎『罗明路线』」。

1933 年 9 月，国军千余人向福建黎川进攻，当时守城的是萧劲光，城内仅有守军七十余，萧劲光想，这仗怎么打呢，根据上级的命令坚守不是等于让敌人全部消灭吗？

萧劲光曾经也读过「三国演义」，想到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将全军带出城外，转战敌后，把黎川城全部撤空，上演了一幕真正的「空城计」。

可是，指挥攻城的国民党将领周浑元是个粗人，从来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国军大摇大摆的进了黎川。周恩来接到敌占黎川的消息，脸色铁青，盛怒之下，传令：「萧劲光不战而降，杀。」后来周恩来接到详细报告，知道萧劲光并未投降，根据当时的情况，黎川的确不能据守。但是周恩来要杀萧劲光的金口既开，怎么收场呢。于是，周恩来拿起笔宣泄他的愤怒。写了一篇「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文章发表于 1933 年 12 月 12 日中央局出版的「斗争」。

周恩来公开指控萧劲光「动摇、恐惧、退却、逃跑、悲观、失望、惊惶失措的种种右倾情绪。」认为「萧劲光的问题，绝不能以处罚为了事。」必须追究「其一贯的思想与历史根源。」周恩来如此说，很明显的，他所指的萧劲光这些罪状，实际上也是指控毛泽东的。

周恩来余气未消，又提出公审萧劲光。这时红军中很多人同情萧劲光，但是又不好违反周恩来的旨意。于是由董必武、何叔衡主持审判萧劲光，对萧「明审暗保」，周恩来与萧劲光当面对骂，萧被判刑五年，周恩来不服，认为判刑太轻，于是又提出开除萧的军籍党籍，实际上萧劲光只坐了一个月的牢，就重出工作了。

1933 年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了苏区，周恩来在欢迎会中说，李德同志是个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他来到中国，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后来，周恩来把萧劲光的「空城计」事件反映给李德，李德说，这个问题的确太严重了。

江西时代毛右周左

1933 年 4 月，江西省委举行会议，正式点名江西有个罗明路线的四人帮，这四个人是：

邓小平，江西省的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市委书记。在红七军军长李明瑞被作为 AB 团整肃时，邓立了功，其后被称为江西最早的毛派。

毛泽覃，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东的弟弟。

古柏，红四军秘书长。

谢维峻，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

这四个人当时被称为罗明路线的小组织，由于他们都与毛泽东的关系密切，被称为最早的毛派四人帮。当时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甚至称为「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个「四人帮」又一度被加上谭震林称为「五人帮」。1933 年 12 月 12 日，周恩来在「斗争」上发表了一篇「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再加上萧劲光，这就成为罗明路线的「六人帮」了。

顾作霖说，罗明路线的要害是「派别观念」，「邓小平、谢维峻等反党的派别观念」。

陈寿昌说，「谭震林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欧阳钦说：「谭震林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他甚至说，「谭震林要保存实力，向党进攻。」

当时在苏区，还有一些公开被中央局点名指责的人，其中包括：

邓子恢，时任财政部长，他向中央局反映，苏区农民负担太重，地主富农也已打尽，筹款不易。被指责说，「苏区湃款不易，为什么不向白区的地主富农身上打主意，你办不到，是官僚主义。」

何叔衡，时任工农检察长，谢觉哉说，「你太手软了，因为你政治动摇。」

陆定一，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兼「实话」报主编，他写的文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够，调和主义和实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丨

「罗明路线」被斗时，周恩来要他到瑞金检查自己的错误，罗明对周恩来说：「为什么我坚持游击战争，中央说我退却逃跑？」周恩来说：「你要懂得军事的辩证法，过去用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是正确的，现在事物变化发展，红军不能那一套，否则就是路线错误。」

毛周土地政策路线的分歧

当年在苏区，毛周的分歧，除战略问题外，还有土地分配的复查问题。1933 年 6 月，中央局展开「查田运动」，先后发出两次查田运动的指示。当时中央局和整个苏维埃都在周恩来控制之下，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土地政策上一向较毛派左，毛泽东表面上听中央的，实际上暗中搞「两手策略」。毛派和周派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区别，略举如下：

毛派认为，通过清查，重新分配土地使用权，中央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错误的，而且中农与富农很难区别，土改中常常把中农打成富农，把富农打成地主的。地主、富农可以用捐献方式改变成份，平均分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可以发动农民为土地而斗争。

周派认为，毛派是富农路线，毛派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为地主富农翻案。必须通过查田运动，深化土改的斗争，清查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改造党和苏维埃的全部工作。查田运动必须与肃反相给合，

与扩充红军相结合。

严格的说，毛派强调地主富农自动捐献，周派强调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毛派周派在土地问题基本区别是，毛派指周派抛开群众，周派指毛派不相信群众。实质上毛派形右实左，周派形左实右，两派多次较量，互有反复。这场斗争从开始到 1934 年 10 月，党中央退出江西苏区，一直没有结论。

周恩来一直认为，毛派的小组织在苏区。潜力很大，力量不小，周的反毛采用「无情打击」，但对直接打击毛泽东，还是有顾忌的，周恩来政治上打击毛泽东，采用迂回战术，专打毛的枝干，以达到孤立毛泽东的目的。查田运动也是在农村排毛的一种手段。

周恩来强调查田运动与肃反相结合。形势严峻，确实如此。苏区有三个政治保卫系统，属于中央局的由邓发领导，属于苏维埃政府的由李克农领导，属于红军的由戴季英领导。三者皆听命于周恩来。邓颖超也管肃反。

当时中共的肃反，对反革命的名称，在江西的叫 AB 团，在福建叫社会民主党，在湘鄂赣边叫改组派，没有适当名称的就叫托落茨基派。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党人称党内政敌为托派，十分普遍。邓颖超常用「托派自由主义者」这个罪名。1932 年 6 月苏区的「工农剧社」被邓颖超称托派组织，由于剧社的成员多属少年，因此少共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爱萍被迫写悔过书。八月苏区中央局分别举行斗争大会，并给张爱萍以警告。12 月，苏区中央局又作了关于开除郭化若、危拱之、罗欣然和处分左权、张爱萍的决议。这些决议当时被认为以反托派为名而实质上是警告毛泽东的。斗争大会由邓颖超亲自主持。当时邓颖超代夫出征，挂帅肃反，十分凌厉。危拱之不过是因为说了一句「工人阶级领导」而忘记加上一句「工农联盟」，邓颖超立刻指出是托派观点。另一钟姓干部因为说了一句「目前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邓颖超立刻指出「你的意思是过去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吗？」也被斗了。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肃杀声中的柔情故事

在邪一片肃杀声中，也有一些柔情的故事，值得一记。中共在江西反罗明路线的时候，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在当时是一直紧跟周恩来的，对推行李立三路线和反罗明路线都十分卖力。当李维汉处理罗明路线邓、毛、古、谢四人帮时，牵连到一件他们之间与金维映的三角恋爱故事。

1928 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时，当时李维汉是政治局常委，留守上海。李维汉身边有秘书邓小平（后日中共党史把他改称秘书长），和另一女同志金维映。据说金维映艳丽非常，身段优雅，热情奔放，李维汉苦追不成，金维映却和邓小平结婚了。

苏区的邓毛古谢四人帮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隔离审查，金维映求救李维汉，李对她说，邓小平的问题很严重，可能要当作反革命处理，你也不安全。就留在我身边吧。李维汉这一「留」，金维映就同邓小平划清政治界限，和李维汉结婚了。

差不多和江西的邓、毛、古、谢四人帮的同一时间，1933 年 11 月，福建的十九路军反对蒋介石，史称「闽变」。当时红军和十九路军曾签订协定合作。这其中也有一段粉红色的故事。

傅连璋有个侄女叫傅维玉，是个奇女子，她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共产党，回到福建工作。肃反时，她的一个亲密的女同志廖履冰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了，傅维玉一惊之下逃到上海，为了生活，常在男女社

交场合出入。跳脱衣舞，据说她还是东方天体会的会长。当时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正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缘和傅维玉见了面。蔡问：「你为什么这么大胆？」傅维玉答：「蔡将军有所不知，我还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女兵，打仗都不怕，还怕脱光衣服。」

傅维玉被蔡廷锴委为上校秘书，参予机要，又成为蔡廷锴的秘密情人。所以闽变时的中共与十九路军一度合作，傅维玉穿针引线，并且掩护了中共在福州的工作人员。后来闽变失败，国民党说中共在闽变中使用了美人计，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

第五章 红军放弃中央苏区

1934 年 1 月 22 日，紧接六届五中以后，中共召开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

中央苏区从 1931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开始，到 1934 年 10 月放弃苏区差不多三年。「苏维埃」这个字是俄文的音译，原意是「代表会议」，这样生硬的名词移殖到当时的中共苏区，人民都以为「苏维埃」是个人名，有老百姓称为「苏维埃大人」的，有把「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改为「马列苏维埃」神位的。后日中共官方党史也少用「苏维埃」这个名词，而改用「土地革命」。

二苏大会中，主席团中除了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外，还选出了一个名誉主席团。其中包括苏共领袖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德共领袖台尔曼，日共领袖长冈等等，表示中国苏维埃属于国际共运的一部分。

毛泽东是一苏的主席，在六届五中接受了「严重警告」。二苏仍由毛致开幕词和「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毛泽东非常牵就周恩来的观点，他说：「苏维埃争取全国胜利，首先争取一省及几省胜利的任务放在我们肩上。」毛泽东赞扬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是胜利的。而且比以前毛的领导「有了长足进步」。毛泽东一方面赞扬周恩来，一方面向周表示要求自己去苏联学习，不久周答应毛，共产国际不同意。当时的毛泽东有落漠感，他认为自己屡受打压，是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有「去苏联学习」的想法。

二苏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全国苏维埃主席（虚位），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等于总理），毛泽东本人虽然保留主席虚位，而所谓毛派如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峻、邓子恢、陈正人、罗明等全未入苏维埃中委，与邓小平划清政治界限与李维汉结婚的金维映，当时风头最健，她不仅当选二苏中委，而且是主席团之一。二苏当选的中

委中，很多都是成双成对的，李维汉、金维映是一对，周恩来、邓颖超是一对，李富春、蔡畅是一对，秦邦宪、刘群仙是一对，梁柏台、周月林是一对等等，革命情侣，红色鸳鸯，传为一时佳话。

根据红军与十九路军的协议，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即闽变事件），红军应有援助的义务。当时中共对闽变有争议，毛周两派都认为闽变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反动的，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可以利用。周恩来的设想，十九路军绝非蒋介石的对手，同十九路军一起作战等于殉葬，不如「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该敌」（周恩来年谱）坐山观虎斗，再由红军收拾残局。1934 年 1 月，蒋介石的军队迅速推进，1 月 13 日占福州，闽变政权面临土崩瓦解，中共向闽变领袖喊话，提出十九路军并入红军。但是十九路军的将领权衡利害，投降了蒋介石，闽变宣告结束。

六届五中全会

1934 年 1 月 15 日，闽变快要结束时，中共举行六届五中全会，由于国民党军队处理闽变势如破竹，与会者人人面色凝重，周恩来更是心事重重。毛泽东反而感到轻松。会议一开始就谈到反罗明路线：而且点了毛泽东是整个罗明路线的总后台。董必武说，罗明路线是有的，小组织也是有的，但是毛与罗明路线的关系证据不足。秦邦宪指着毛泽东叱责，「不管你与罗明小组织的关系如何，总之，红军中滋长的失败投降主义，你要负责。」张闻天说：「关于毛泽东罗明组织的关系，可以押后到政治局讨论。」周恩来不同意，最后根据周的提议，给毛泽东「严重警告」。毛表示服从党的决定。

六届五中选出周恩来、秦邦宪、项英、陈云、张闻天五人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连中央委员也没有当上。周恩来的爱将顾作霖不但当选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六届五中时，秦邦宪明白自己虽然是个总书记，实际是傀儡，他对周恩来说：「中央你负总责，就由你担任总书记吧。」周恩来说：「我

要全心全力集中精力投入军事，还是你继续当总书记吧。」

闽变失败以后，国民党军队摆脱了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向苏区进攻，国军这一次的进攻，采取新的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使周恩来的进攻路线和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战术，两者都不易发挥作用。

中央苏区面对此一严重局势，周恩来再问计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说：「敌人现在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准备以持久战消耗红军。」李德又分析说：「目前敌人的第五次进攻同以前的根本不同。在战略上敌人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目前敌人的企图，是在逐步消耗我们的兵力及资材……这一战术的主要特质即是堡垒主义。逐步地紧缩我们的苏区，剥夺我们进行运动战的可能性，将我们的游击队隔断在他的后方，离开我们的主力军，结果在苏区及红军的周围，造成了紧缩的堡垒圈。」（李德这一段话，同时以华夫笔名发表于 1934 年 4 月，苏区出版的「革命与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最高的决策者周恩来急着问：「李德同志，我们应采何种对策？」李德说，「通常国民党军队不离开堡垒一二十里，我们应该是乘其离堡垒时，实行短促出击，一举突击，迅速解决战斗。在此同时，我们应对敌人后方急袭或偷袭，实行运动防御。我们必须坚守的险要之地，也要赶筑堡垒，实行堡垒对堡垒，以上三者结合制敌，保证胜利。」周恩来连称：「李德同志不愧为当代共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战略家，中国党保证彻底执行。」当时应声表示拥护李德的短促出击军事战术者还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他们并且公开发表了文章。

1934 年 4 月，国民党军十一个师，进攻广昌，广昌被称为中央苏区的大门，红军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精锐，建筑坚强工事，决定死守，周恩来坐守瑞金，秦邦宪、朱德、彭德怀、顾作霖等皆亲往前线督战。史称「广昌决战」，自 4 月 10 日至 28 日，双方反复冲杀，白刃肉搏。张闻天还在「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篇「死亡或者胜利」

的文章，表示死守广昌的决心，就在张文发表的同一天，红军全线崩溃，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广昌。

红军决定放弃苏区

据周恩来说，「1934 年春，李德就对博古（秦邦宪）说，要作一次战略大转移。」4 月底，广昌失守。5 月 4 日，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检讨广昌之战的失败，据「周恩来年谱」记述：「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7 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又开始新的攻势，周恩来在红军广昌会战大败后，完全慌了手脚，敌人六路进攻。周也命令红军六路分兵把守，处处被动防御，阵地被迫放弃，节节后退。这时的周恩来焦头烂额，走投无路。7 月间，苏区展开三大运动，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准备从江西突围。多数资料中都说，决定这次突围的只有周恩来、秦邦宪、李德三个人知道。不过，李维汉、伍修权、杨尚昆的回忆中都说，在突围之前，已有一些迹象。

第一，中央没有正式文件，说明中央苏区有转移的必要；「红色中华」报一直宣传红军在胜利中，只有张闻天在文章中提到游击战争的重要，这种「暗示」一般干部是不易理解的。

第二，红军出发前瑞金等地还举行过庆祝胜利的大会，高呼「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大会具有遮盖败像的作用。

第三，突围前夕，唯一的迹像是苏区到处征集民夫，其后上级有口头传达，苏维埃政权下的许多工厂设备暂时搬家，包括印刷厂、兵工厂、造币厂等一切机器设备全要抬走，口头传达中说，这些「家当」是苏维埃工农的财富，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保护云云。传达中还有一

个说法，当时奉上级指示，电台必须抬，印刷机必须抬，造械的设备必须抬，黄金银元必须抬。上述几个口头传达，内容出入不大，都是我在延安时，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对我谈的。

所以，中央苏区突围开始时，多数干部的理解是暂行搬家。后日周恩来也承认：「最初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这次战略转移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的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有两件鲜为人知的事

其一，当时苏区的紧急情况，一般的伤病人员，除了极少数的高级干部受到特别的照顾外，凡属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对像，都以断然的手段处理。否则随军行动一定增加负担，活着成为敌人俘虏，吐出秘密，也对党不利。

突围前夕，即 1934 年 10 月初，周恩来下令枪决了一批控制使用高级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季振同。他是 1931 年底率领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投共，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投共后，其部下的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为说了一句：「我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打内战。」也被杀了。

其二，1934 年 10 月初，即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前数天，两座四人抬的花轿从粤赣边境的苏区过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到达粤北一个寂静的山村罗塘一座洋房，这是国民党剿共副总司令陈济棠的别墅。陈济棠是广东军阀，人称「南天王」反共也反蒋。

两座花轿在陈济棠的别墅前停下了，走出两个「女人」，卸下艳装，露出真正的面目，一个是潘汉年，另一个是何长工，他们是周恩来派来的代表。原来周恩来了解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与陈秘密联系。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决定突围西进，当时国民党军在苏区周围大军密布，堡垒林立，红军插足难飞。作为真正的最高统帅周

恩来，想到陈济棠了。

「周恩来的谱」记载：1934 年「10 月上旬，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去寻邬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其中一项是「可以互借道路」「这个谈判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有利的准备」。「10 月 21 日夜，中央红军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地区驻守的国民党军就是陈济棠的部队。

周恩来的「三人团」

「周恩来传」中说：红军突围时，「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一个三人团，这个三人团主要从事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这三人包括周恩来、秦邦宪、李德。中共官方党史中，或则说，秦邦宪独断独行；或则说，李德瞎指挥云云，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秦邦宪是个文弱书生，少不更事，遇事束手无策，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怎说得上「独断独行」？至于李德，他一句中国话不懂，如何直接指挥？他只能在地图上装模作样「顾问」而已。所谓「三人团」者，周恩来一人拍板。

红军突围时，以林彪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战斗力最强，为突围的先头部队。周昆的第八军团拱卫左翼，罗炳辉的第九军团拱卫右翼，董振堂的第五军团担任殿后。中央领导人在行军中居于全军的最中间，陆定一日后的回忆中称这个红军阵容是「抬轿子」。彭德怀在通道会议说是「抬棺材」。上述两者说法都相当形像化。中央领导人又分为两个层次：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保护的对像是中央最核心的人物，如周恩来、秦邦宪，国际顾问李德等。中央纵队司令员为李富春，党政团高级干部如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董必武等都编在这一队。军委纵队的代号为「红星纵队」，中央纵队的代号为「红章纵队」。

军委纵队受保护的都属于中央顶尖儿的人物：中央纵队是和民夫编在一起的，民夫抬的东西当然很贵重。但是被编在中央纵队的另一

些中央领导人感到不被重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王稼祥初到苏区时本来是反毛的，后来他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对他的顶头上司总政委周恩来产生反感，认为毛比周老实。张闻天感到自己身为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突围前动员布置，周恩来发号施令，他奉命行事，有意见而不敢言。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个人同被编在中央纵队。王稼祥放言高论，毛泽东沉潜观察，张闻天经不起王、毛对他的谥美之词，于是三人彼此「交心」，成为另一三人团，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形成两个「三人团」的对抗。不过，张闻天正式表态是在 11 月湘江战役以后。

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分别出发，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实际的路程是华里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中共史上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夸大的。

中央苏区突围时，红军战斗部队有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总兵力约七万多人。另外加上非战斗部队的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万五千多人，总计共有八万六千多人，号称十万人。红军出发时称野战军，朱德为总司令。国军最初不易捉换红军的作战目标，以为红军可能像历次反围剿一样，绕几个圈再回中央苏区，当时许多干部的理解也是，这不过是暂时的搬家。

中央苏区保卫战的失败，最后决定放弃江西中央苏区。1945 年 4 月 20 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白指出，周恩来应负主要责任。这个中央文件中说：「在第五次反围则作战中，他们（指周恩来等——马注）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

第六章 突围长征

国军对于苏区的围剿，由于采取碉堡政策，步步推进，稳扎稳打，红军全线溃败。周恩来提出红军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保存实力。1934 年 10 月，江西红军开始突围。12 月，先后在湖南的通道，贵州的黎平、猴场举行中央紧急会议，毛派酝酿把秦邦宪、周恩来、李德这三个核心人物轰下台。毛派第一步最重要的决定是，抛弃周恩来「西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选择向国军防守最薄弱的贵州突进。

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突围，原来的战略目标是到湘西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1934 年 11 月 12 日，国民党军队占广西全州，准备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13 日至 17 日，国军与红军鏖战于湘桂边境。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上有飞机，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军指战员自嘲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逃。」士气低落，前途茫茫。红军中有很多士兵是在转移前动员扩充的新兵，听到炮声就嚎叫，大哭，脱逃。政工干部高声叫喊：「同志们，冲啊杀啊，粉碎敌人的封锁线。」「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后退者枪毙」，红军兵败如山倒，不断减员，第八军团损失惨重，被打得七零八落，番号被取消，军团长周昆受到军法审判。

后来毛泽东指责周恩来说：「兵贵神速，搬这些缸缸罐罐，一天只能走十里八里，还能打仗吗？」民夫遇一次战斗，放弃一批辎重，翻一个山沟，再放弃一批，先是把印刷机丢了，由于民夫一批批死亡，抬的人少了，其它的机器也被迫丢掉。只有电台，银元，黄金继续抬着走。

红军饮恨湘江

在行军中，指战员普遍表露出对周恩来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不满。陆定一所说的「抬轿子」，就是指党中央领导人稳坐「轿子」，全

体红军的任务是保卫「轿子」。所以红军指战员中有用谐音谑称「红星纵队」为「狠心纵队」，「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的，当然，这也不过是表达一种内心的发泄而已。彭德怀口直心快，说中央的纵队等于两口棺材，我们抬着棺材，怎么能打仗呢？正当周恩来感到走投无路之际，国民党军队中由于白崇禧与何健的矛盾，双方都不想和红军硬拼，在全州、兴安一带防线出现缺口。红军认为，欲渡湘江，此乃天赐良机。

1934 年 11 月 25 日，周恩来为了鼓励士气和懊丧的指战员。向红军发出号召「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的一切敌人抵抗，不惜任何代价征服湘江天险。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

11 月 27 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在林彪、彭德怀指挥下在界首强渡湘江。当时红军作战非常困难，大部分主力要保护中央首长；笨重的东西又多，行军缓慢。受伤的兵和民扶到处都是，根据当时的行军纪律，伤者必须「处理」，担心留下泄漏红军的秘密。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1 日，红军澈夜抢渡湘江。红军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纪律了，拼命向前推挤，争取上船。江水太急而船又不多。后面的红军把前面的红军推落水中。刘伯承也说，过江时，挤死的人太多了。「这么过江不是办法，我们自己人都把自己人挤死了。」周恩来也重申红军纪律，凡是挤人的不听命令的一律枪毙。民夫只顾逃命，把一部与莫斯科联系的重型电台也抛弃了。银元、黄金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首长分别缠在身上。

周恩来说：「我们渡过湘江，就是胜利。」红军政工人员在高呼：「同志们，冲呀！」「为革命牺牲最光荣！」也有人轻声骂政工人员是「卖膏药的。」

枪声、炮声、划船的声音，国军照明弹闪烁而过。有的船被炮弹击中了，江上的血浪像火花。政工人员又在叫：「同志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湘江在咆哮，人在哭，鬼在嚎，也有柔弱的呻吟

的声音：「马克思，救命呀！」

离开中央苏区号称十万的红军，这时已只剩三万零五百人了。

担任殿后的第五军团，差不多全部打光，残余的队伍后来编入第七军。

红军渡过湘江，由于损失惨重。中央领导和指战员对于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渐渐产生怀疑。周恩来的战略布置本来是要到湘西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重建新苏区的。这时大量的军事情报都指出：大事不好，大事不妙，蒋介石似乎已经判断红军的去向，在湘西摆下「口袋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

形势严峻，红军面临生死关头。中央两个「三人团」（一个三人团是周恩来、秦邦宪、李德：另一个三人团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争吵不休。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2 月上旬，「从过老三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张闻天）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中共领导人以往的争论，都请示国际裁决。但是，这一回过湘江时，红军把电台丢了。当周恩来听说失了电台，不禁整个人呆了。这部电台对周恩来的重要，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失去了「通灵宝玉」一样，周恩来失去电台与国际联络中断，他不禁喑暗叫苦。

上面在争吵，下面也有一篇「顺口溜」：

根据地已经完了。红军也愈打愈少，明天要往哪儿去，领导们也不知道。

两个「三人团」的争吵

据「毛泽东年谱」：「1934 年 11 月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

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这段记述中，可能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对周恩来只字未提，事实上，当时周恩来「反对」或「支持」毛泽东，都是关键性的角色。

红军攻打贵州，是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中提出，而由黎平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四周都是强敌，只有一个方向是弱敌。我一向主张『雷公打豆腐，先拣软的欺』。这块软豆腐就是贵州。贵州的军阀王家烈的军队一向是带两根枪的，一是真枪，二是烟枪，红军入贵州打这些鸦片烟鬼，我们一定胜利。」

毛泽东还浦充说，「现在我军给养困难，到贵州搜些烟土向老百姓换粮食，也是一个补充的办法。我们能打到云南更好。」朱德接上去说，「说到鸦片烟，云南的最好，云南的罂粟花，有鸡蛋那么大；云南最出名的烟土称为云土，我们到云南后，仅靠云土就可以取得革命胜利。」

周恩来说，「我贵州、云南之战，是一场鸦片战争啊！」

毛泽东说，「没收烟土，全要归公处理，不可毒化红军。」

于是，大家齐唱：工农红军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秦邦宪一度想自杀

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央红军到达湘南通道县，全军上下怨声四起，周恩来也一改常态，放下「一言堂」的身段，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的有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彭德怀、刘伯承、林彪、陈云、叶剑英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多数不是政治局委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宁都会议以后，一直被周恩来排斥于中央决策以外的毛泽东，这次也参加了。

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首先发言：「这次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

前未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又未在干部和群众中作思想动员，仓促决定，今天虽然渡过湘江，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周恩来未说完，毛泽东插话：「大老爷们纸上谈兵，打这里，打那里，不顾到战士行吗？战士们除打仗外，也要吃饭、拉屎、睡觉嘛……」毛泽东开始说得十分风趣，又转为严厉的口吻，针对周恩来说：「岂仅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们今天的处境危险，可能全军覆没。」

周恩来说：「不错，很危险，所以，党和红军需要更加团结。毛泽东同志，当前蒋介石在湘西集结重兵，数倍于我。看来我们和他硬拼是不行的。」

这时，李德要伍修权替他翻译，李德的意见是，我们可以避开正面的敌人，从敌人的后面向北与第二、六军团结合。

其后，在王稼祥的动员下，聂荣臻、李富春、刘伯承等，都相继发表了意见。

刘伯承说：「我们继续北上，但是改道不去湘西，而向湘鄂赣边发展，也可以与四方面军会合。」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夺路逃命。

1934 年 12 月 31 日，到了黄平县猴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猴场」之名的由来，据说历史上猴子真正在这个镇上称过霸王。周恩来说：「同志们辛苦了，今晚除夕，大家加个菜吧。」毛泽东一语双关的说：「今天我们红军是真老虎，老虎来了，猴子就该让位了。」毛泽东提议第二天开会，周恩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明天这个新年的日子过了，后天开。」毛说：「军情火急，还有什么新年！」这时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乖得多了，听毛这一说，不敢怠慢，立刻传令开会。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这个会议有称为政治局会议的，有称为军委会议的，有称为猴场会议的，不管叫什么会，反正就是那么几个人。会前，王稼祥对毛泽东说：「恩来认错不让权，

不是办法啊！」

毛泽东说：「斗争要讲策略。」

王稼祥说：「我已和彭德怀、刘伯承几个同志谈过，要把他们（指周恩来的三人团）拉下来。」

毛泽东说：「我所指的策略是要把他们三个人分别处埋，孤立李德，集中打击博古（秦邦宪），对周恩来嘛，要采取争取的策略，因为他在党和红军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会议开始，周恩来宣布：「今天元旦，向同志们报告一个胜利的消息，刚才我们把一股民团消灭了。」王稼祥说：「你的报告就这么一点，啊，我明白了。也算是冲喜吧。」

猴场会议正式决议，以后作战，不能由周恩来的三人团独揽指挥权。「今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做报告。」

周恩来示意秦邦宪要他发表意见，秦两手一摆，耸耸肩说：「恩来同志，在军事上我一向听你的，现在什么方案都可试试。」

王稼祥从担架上坐起，指着秦邦宪说：「你们是什么布尔什维克，中央谁负责，你说恩来，恩来说你……」

据聂荣臻回忆，秦邦宪当时举枪对着自己想要自杀，是聂从他手上把枪拿下的。王家祥笑对秦邦宪说：「你这就更不像一个布尔什维克了。」周恩来也对秦说：「我们要对党负责啊。」

彭德怀突然走到李德面前，指着李德说：「我操你娘。」

李德问伍修权：「他说什么。」

伍修权犹豫了一会儿，机智的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他很喜欢你的妈妈。」

李德说：「很好很好，你喜欢我的妈妈，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国际主义者，绝对没有关系。」

彭德怀又问伍修权「李德说什么？」伍修权脸色一沉，严肃的说了一个「好」字，彭德怀会意自己打了一个大胜仗，狂笑不已。

林彪看到这情景，对彭德怀有几分醋意，突然也一个箭步走到李德面前，举拳便打。林彪接着对李德说：「顾问同志，你不是在军事上要我们『短促突击』吗？老子这一拳就是对你进行『短促突击』!」

伍修权对李德翻译说：「林彪同志问，短促突击是不是这么打法？」

但是，这一回李德看出来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态度都是不怀好意的。李德用英文转对周恩来说：「今天这个会，乱成这个样子，对国际毫不尊重，反对国际就是反党。中国党脱离国际的领导，很严重啊。」

周恩来没有答话。

李德又问：「那些反对中央领导的，他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意见。」

周答：「他们主张放弃去湘西。」

李德续问：「你自己的想法呢？」

周恩来答：「能够入贵州先打几个胜仗，争取部队休息，补充给养，重振士气，然后我们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李德问：「你要不要请示国际？」

周恩来答：「我们现在没有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了，怎样请示？」

李德忿愤地走出会场，他以为自己可以代表国际。

关于通道会议，延安整风时，1943 年 11 月周恩来交代说：「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毛派说：「恩来太欺负人了！」

1934 年 12 月 13 日，周恩来用军委的名义发出指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周的这个指示，当时并没有明白提出，打贵州的目的是否放弃到湘西与第二、第六军团的会合。

在此同时，周恩来又致电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指示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这说明当时周恩来手腕灵活，既使毛派认为，他已接受了毛派放弃去湘西的战略路线；同时他又使国际派认为，他没有完全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

中央红军从去湘西转道为去贵州，通道会议造成一股声势，黎平会议作成正式决议。

12 月 14 日，中央的「红星纵队」与「红章纵队」抵达贵州黎平。黎平四面环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易守难攻，居民多侗族，与汉人少往来，这是一个易于隐蔽的地方，因此红军获得暂时的休整，两个三人团也继续展开角力。

周恩来这一边，秦邦宪对周说，在通道会议中，李德顾问一怒走出会场，这件事如果共产国际知道，是不得了的。秦说：「恩来同志，现在我们既然避开敌人的追击，不如再入湘西，那是国际同意过的路线，我们不会犯错误。宁可多付出一些伤亡，我们千万不可再犯错误。」

周恩来一面点头称是，一面继续玩他的两手策略。12 月 17 日，周恩来下令中央红军由黔东去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同时他又说，贵州这个地方太穷，不是理想的苏区根据地，红军最好由贵州继续向富庶的云南西进，建立云、贵苏维埃苏区。

毛泽东那一边，毛与王稼祥、张闻天聚首会商对策。毛泽东首先说：「恩来提出西去云南，真正的目的是掩饰他的坚持去湘西。现在强敌虎视耽耽，红军唯有避实就虚。恩来的去湘西，去云南，都是要

把红军自投罗网。」

王稼祥说：「我们这三个人，泽东有病，我在养伤口，闻天怕事，真是人微言轻，恩来太欺负人了。」

毛泽东说：「稼祥，你说错了，你我两个，一个伤，一个病，可以说『人微言轻』，洛甫（张闻天）可是个大官儿呀！」

王稼祥说：「对了，中央常委只在中央苏区的就是恩来，博古（秦邦宪），洛甫，项英四个人，项英没有参加突围部队，现在中央红军的常委就只剩下你们三位了。」

张闻天说：「我这个常委有什么用，中央苏区转移前没有开过会，人家不理会，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说：「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中，他们把我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主席让给你，我只挂了中央苏维埃主席个名，别人说我被架空了，有职无权了，我自己倒觉得轻松。不过，今天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关头，我们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行了。」

王稼祥说：「毛泽东同志，我拥护你领导，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把脸贴近张闻天，亲切的说：「洛甫同志，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你的地位不在博古之下，甚至也不在恩来之下，至于那个毛子李德，管他妈的什么顾不顾问，我们不要去理他。洛甫同志呀，道德文章，理论水平全党没有第二个人及得上你的，洛甫同志呀，只有依靠你的领导，才能把党和红军从悬崖挽救过来……」

于是，毛派这边决定了先把张闻天捧出来的策略。

12 月 18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以张闻天为首所提的战略方针，承认去湘西已不可能，建立黔北川南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周恩来在发言中把一切错误的责任说成是李德同志不懂中国

话，语言上有误会，所以李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周恩来也承认，他的西去云南的构想错了。

第七章 遵义会议

1935 年 1 月 7 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毛派夺权的会议，毛派称之为「回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反毛派一向认为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当时毛泽东和邓发都不是政治局委员，是在会上临时被选的。参加会议的一些红军将领不但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也不是。毛派为了夺权的目的，硬把他们塞进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红军将领表过态支持过周恩来的，如彭德怀、林彪等，这时摇身一变成了毛的打手。周恩来在遵义会议的报告，最令人瞩目。他坦承中央领导的失败，坦承自己的错误，推崇毛泽东的指挥才能。他痛哭失声，要求中央处分自己。周恩来本来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他的表演出色，他从被告人一变而为控方（毛派）的证人。

红军进入遵义，周恩来、秦邦宪、李德等住在旧城，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住在新城。开会的地点是旧城的一座贵州军阀的洋楼，当时红军总司令部也在这里。表面上，旧城和新城是两个司令部，可是旧城的司令部很沉寂，大家忧心忡忡，各怀鬼胎；而新城的司令部，正在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组织动员，策划斗争。当时刘伯承担任遵义城防司令，陈云为政委。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顾作霖已死，其余张国焘、任弼时、关向应、项英、王明、康生等都未随中央红军行动，未能参加遵义会议。毛泽东和邓发的政治局委员是在 1935 年 1 月 10 日、11 日的预备会议中临时会议中「补选」的。很多红军高级领导人以「扩大参加人员」的身份参加。至于邓小平（红星报主编）、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伍修权（翻译）都属于列席人员。邓小平担任遵义会议秘书长之说不是事实。

遵义会议首先由秦邦宪作报告，秦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立无援；任何优秀的军队，也难挽回军事失败的局面。」他同时说，「党的军事上有失误，政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充份执行。今天我们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兵员减少了，根据地也没有了，虽然客观因素是主要的，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秦邦宪态度诚恳，一再要求对他的错误作深切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

周恩来继秦邦宪讲话，他眼神中那种不可一世的统帅的威严看不到了。他好像哭过一夜似的，还在哭。他在念着讲稿，一字一泪。他说：「我把红军带到这个地步，真是无地自容，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有负国际的重托。」周恩来强调，「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国际指示的反立三路线没有彻底，我们继续错误地执行立三路线，所以导致今天的失败……。」周恩来对于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精神，认为还是正确的。……

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催着张闻天说：「现在该是你的戏了。」

张闻天不自在地点点头，然后犹豫再三，终于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提纲，并声明说：「这是我和泽东、稼祥三人的共同意见，我们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和敌人拼主力，拼消耗，分散兵力，分兵防御，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战略上的『御敌于国门之外』陷于被动，放弃运动战。伍豪同志（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李德）在作战指挥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周恩来突然嚎淘大哭，全场动容，有人感到心酸。）

张闻天在继续讲下去，他说：「闽变时，伍豪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利用敌人矛盾的有利战机。

广昌战后，伍豪同志等组织突围，惊惶失措，迷失方向，忙乱逃跑……。伍豪同志是实际的指挥者，应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木然地对着张闻天，想答辩几句又不想了。连声说：「我错，我错。」有人响应说：「勇于认错的就是好布尔什维克！」周微笑点头。）

毛泽东讲话了，这是遵义会议的一幕重头戏。毛泽东首先指着秦邦宪说：「你说第五次反围则是由于敌强我弱，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

毛泽东话锋一转，又指着周恩来说：「你在军事路线上一贯错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证明这种军事路线根本破产。」毛泽东还讽刺周恩来说：「你对那边的话，言听计从，奉若神明。」毛泽东并没有明言「那边」指的是谁，听的人可以听出「那边」就是「共产国际」。

凯丰（何克全）听出毛泽东骂周恩来事小，骂了共产国际，这还了得，跳出来说：「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和毛泽东同志是两条路线；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是『孙子兵法』的军事路线。」毛对着凯丰大吼一声：「你放屁，放屁，放狗屁，狗放屁！」

彭德怀也指着凯丰骂：「什么两条路线？只有一条走狗路线和中国红军路线，你是走狗，你代表狗的路线。」

秦邦宪说：「这是一个庄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骂人的请出场。」

彭德怀胸口一拍说：「老子不理你那一套，什么庄严？老子今天就是齐天大圣，要大闹天宫！」随后众人都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意见，彭借口前方军情紧急，跨步走出。李德也站起来把凳子推倒了，想跟着出去，伍修权怕李德要去和彭德怀打架，把李德拉了回来，他俩就在门口坐下。

王稼祥激动地说：「李德是个顾问，他只能纸上谈兵，看看地图，

他也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要追究瞎指挥的责任，李德当然是一个，但不是主要的……」

1 月 16 日，遵义会议的第二天上午。

第一个发言的是刘少奇，他要求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的白区工作加以全面检讨。

刘少奇说：「党的白区工作在错误的领导下瓦解，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责任。」

陈云起而答辩：「白区在白色恐怖下，应该坚持斗争还是放弃斗争？要坚持斗争，党与群众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以把坚持斗争说成是冒险主义者。」

秦邦宪呼应陈云的意见。秦说：「刘少奇同志的冒险主义论，是托洛茨基——陈独秀的取消派观点。」

刘少奇听到秦邦宪的话，不禁火起，你秦邦宪支持陈云反对我，倒也罢了，你给我扣上「托陈取消派」的政治帽子，事关我的政治生命，我要和你秦邦宪一拼了。

刘少奇进而提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对党的四中、五中以来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进行全面检讨。」

周恩来说：「我请同志们慎重考虑，我们不能用对国际对立的观点，检讨中国党的错误，我建议少奇同志的意见可以押后再说。」张闻天和王稼祥本来是反对周恩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了周的意见。毛泽东坐在刘少奇身边，对刘少奇说：「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啊！目前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时不讨论政治问题；只要军事问题上让他们靠边站了，其余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周恩来、秦邦宪都一致表示，我们犯有错误，但是，党的政治绝

对不存在分歧的问题。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于是两个三人团产生暂时不讨论政治问题的「共识」，毛则全心全力夺得军权。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算是放了一炮，没有打响。刘少奇却为毛泽东暗地里欣赏了。

1 月 16 日。

刘伯承在遵义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过去在中央苏区时反对过毛泽东，是错误的。他说：「广昌战败后，我们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结果怎么不失败呢？」

聂荣臻说：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因为李德干涉太多。他说：「李德是顾问，对战场情况不了解，动不动横加干涉，我们应该向国际提出撤李德的职。」

刘伯承、聂荣臻同时提出，贵州太穷，没有前途。红军要打过长江，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遵义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黎平会议中的以黔北为中心的战略布署，正如「周恩来年谱」所记，1935 年 1 月 20 日「军委决定，由黔北经川南，渡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月 17 日上午。

遵义会议的第三天，秦邦宪又再表示，他以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承担一切责任。王稼祥喝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吗？现在必须改组中央书记处，撤消你的领导职务，才是挽救党和红军的唯一办法。」

凯丰接上去说：「不能因为一个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就撤下来，经过这次会议博古同志可以改正错误嘛。」

毛泽东怒责凯丰：「你又放什么屁了。」转对秦邦宪：「你到底下台不下台。」

秦邦宪问：「下什么台。」

毛泽东声色俱厉的说：「撤换你的总书记。」

这时，周恩来笑嘻嘻的说：「按党的资历和威望，这个总书记，只有毛泽东同志当之无愧。」

毛泽东一听，脸色大变，骂道：「我要这个屌总书记，屁用。」又转对秦邦宪问：「你配当总书记？谁给你的？在共产党只有斯大林同志配称为总书记，你在我们党内，不过是个管事务的总负责人而已。」秦邦宪听了，唯唯称是。声音有些发抖。毛泽东又转对张闻天：「这个总负责人由你来。」张闻天说：「我怕干不了啊。」

毛泽东很郧重的向大家宣布：「今天这个文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检讨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是你洛甫起草的，你还不配做党的总负责人吗？」

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周恩来宣布，原先的三人团（周恩来、秦邦邀、李德）解散，补选毛泽东接替项英为政治局常委。

2 月 5 日，会理会议中，秦邦宪被正式撤职，张闻天接秦为党的总负责人（总书记）。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决议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上是，周恩来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 月 11 日，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心的新的三人团成立。8 月上旬，周恩来病倒。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由毛泽东接管周恩来有关军事上的全部职权。以后周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毛泽东用了三个策略打败反毛派：第一是把周恩来、秦邦宪、李德分别处理，孤立李德，集中打击秦邦宪，争取周恩来。第二是分化留俄派，把张闻天推在主角的地位，让他去对抗留俄派。第三是再从周恩来手上夺取军权，又利用周顶住军队。毛的这一招被陈云称作「联洛（张闻天又名洛甫）代博（秦邦宪又名博古）」。陈云还说：遵义会议「换了两个人的职位，实际上这是会议的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毛早想代周的总政委，所以联洛代博的总书记。」（1936 年第一、二期合

刊中文版「共产国际」，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

第八章 毛、周连手打倒张国焘

遵义会议，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上夺得军权，并非一次完成，其中阻力重重，几经反复。毛、周之间，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之间，矛盾不断出现转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毛泽东利用周恩来顶住反毛派，周恩来又借毛泽东顶住一切反周反国际派的人。其中诡诈多变。

遵义会议中有一条尾巴，鉴于过去指挥上的失误，决定以后重要战役，必须要经过政治局通过。当时的情况，表面上军事上仍由周恩来负责，实际最高决策者为毛泽东。行军途中，红军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部队疲劳，兵员又继续减少，干部战士埋怨，只顾逃命不打仗，不是办法。

会理会议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央常委在四川、贵州、云南边境的鸡鸣三省河开了一场名为谦让实为斗争的会议。周恩来再度提出，请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毛泽东认为，还是张闻天好。张闻天说：「不行啊，还是毛泽东同志好。」毛说：「你干吧，我支持。」张说：「我只能办点事务。」毛说：「那就行了。」

毛泽东转对周恩来说：「洛甫（指张闻天）是莫斯科回来的，既可以国结留俄回国的同志，又易于为国际承认。」

秦邦宪心情很坏，十分沮丧，为了使秦邦宪能接受这一决定，周恩来去做他的工作。当时所谓「党中央」者，就是秦邦宪的一只箱子的「公文箱」。周到秦处，两眼盯着公文箱，秦会意说：「你是老毛派你来要这个的。」随手就把公文箱交给了周恩来。2 月 6 日，周恩来带了几个人，从秦处把公文箱搬到张闻天处，算是完成「党中央总负责人」的移交手续。

3 月 10 日，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鼓新场，毛泽东以为不可，交给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多数认为可打，大家叫「少数服从多数」，表决通过。毛泽东说：「你们要打你们去，我不干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慌了，连说「这怎么行？」政治局闹成僵局，张闻天拉了周恩来在一边，对周说：「你看怎么办好？」周说：「军事作战交政治局讨论这一条根本行不通。」政治局最后通过管军事的新三人团，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个人，周要毛做团长，毛坚持让周，周说：「好，就这样吧，我挂个名，一切听你的。」

3 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5 月渡金沙江。到达四川、云南边境的会理。

1935 年 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举行。中共党史上称为「会理会议」，会上一片反毛声。罗瑞卿、成仿吾、萧华、王明的回忆中都说：会理会议是一个反毛的会议。王稼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杨尚昆都发言指出，老毛指挥，走来走去，正如陈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毛指挥军队小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当时张闻天、李维汉、陈云都表示消极，声言要回上海做地下工作。

王稼祥对张闻天说：「这样下去，老毛会拖垮部队的。」王稼祥又对毛泽东说：「会议中的反毛，是张闻天煽动的。」毛泽东又对张闻天说：「现在你顶政治台，我顶军事台，一个顶不好一起完蛋。」张闻天又对王稼祥说，「对军事指挥有意见，对老毛当面讲。」王稼祥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他喜欢暗中煽风点火。

朱德在会理会议中说：「如果允许我们在中国腹地开创根据地，倒是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会理会议中，周恩来「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协助毛泽东把一场反毛风波平息了。

两个方面军的会合

当江西苏区的红军主力逐步为国军战败突围时，红军的另一主力，张国焘、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正在四川、陕西边区迅速发展。江西苏区土崩瓦解时，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边区向四川北部、甘肃南部、西康东部继续扩展，川陕苏区领导机构改称为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西北特委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联邦政府主席。

会理会议中决定，立刻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 年 6 月 8 日「周恩来年谱」记载：「鉴于国民党军在后面又占泸定桥，红军只有北上一条路。」中央军委指示：「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6 月中旬，从江西逃出的中央红军，过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六千公尺，终年积雪，气候变幻无常。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或坐轿子或坐担架，秦邦宪、张闻天被背着。红军战士及挑夫，因体力不支，饿死、冻死者无数。6 月 17 日，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当时号称十万，到遵义时，只剩下三万，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不足一万，四方面军已经发展到八万人以上，兵强马壮，士气高昂，服装整齐，装备齐全，弹药充足，而毛周率领的中央红军，衣不敝体，食不果腹，弹药缺乏，狼狈万分。以致红四方面军的士兵称中央红军为「叫化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提出一个问题：「这样的党中央，这样的中央红军，怎么配，怎么能领导我们红四方面军呢？」当时代表张国焘首先接待毛泽东的是李先念，李是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毛问李：「你们三十军有多少人？」李答：「两万多人。」毛听了一惊，倒吸了一口气。心中在想，我们全部中央红军还不及你半个军呢？

两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补充了大批给养，双方并举行

了一连串的会议，讨论红军今后行动。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遵义会议后，毛派的认为他们是法统上的中央，张派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实力派。

1935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布尔什维克」杂志，有一篇文章说：「四方面军拥有第一线兵士二十万，以及预备队和地方部队二十万人。」这篇文章对张国焘的领导能力评价极高，不过把张的部队数字夸大了。

两军初会合时，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一方面军急需张国焘支持，毛、周对张国焘都表示老老资实。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听话得很。

1935 年 6 月 17 日，张国焘电毛泽东，表示在懋功四方面军总部恭候中央诸位。当时的中央基于「张强毛弱」的客观形势，不能不牵就，毛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应邀前往，见面时，毛等皆当面称张国焘为「张主席」以示尊敬。

张国焘说：「你们辛苦了，欢迎欢迎。」

毛泽东说：「论朋友，我们是十六七年老朋友了，论同志，我们今天生死之交，听李先念同志说，你交待他安排接待，热情可感。」

张说：「红军亲如骨肉，你怎么来这些客套。」

毛说：「我们翻过夹金山，饥寒交迫。四方面军补充给养，很及时，很及时啊。」

张说：「我们共产党人发扬阶级友爱，这是应该的。」

毛张在懋功，皆欢呼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实际上两人皆心中有鬼。毛、张会见后，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指张国焘）我已摸清他的底细，他是一代枭雄，野心很大，一心要当曹操，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否则一个个会被他杀掉。」

毛泽东一方面当面恭维张国焘，一方面授意张闻天组织批评张国

焘路线的错误。6 月 28 日，凯丰在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写文章，批评张国焘在五月间成立的中央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是反列宁主义的。张国焘责问张闻天：「你们抛出这篇文章，是不是要清算西北联邦政府？」张闻天说：「这是国际的意见，我们不可违背国际的路线。」

当时中央红军的干部，也私下对中央批评张国焘路线错误，发生一个疑问：如果张国焘路线不对，怎么四方面军有这么多人呢？

两河口会议

1935 年 6 月 25 日，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在两河口举行会议。开始时气氛愉快，进而互相摸底，张国焘问及中央红军的兵力，毛、周坚不吐实。周恩来对张国焘谈到一些往事。周说：「国焘啊，想当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你我都是直接参加的，开始时何等轰轰烈烈，然后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我们都逃得很狼狈；不久我们又站起来了，革命的火种星火燎原，今天我们的红军不是更壮大吗？不过，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曲折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一时的挫折的。」周恩来等于向张国焘委婉地透露了这次中央红军在江西的失败，同时也暗示张国焘，以当年南昌起义失败为例，中央红军一时的挫败不足为惧，同时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强大也不应自满。周恩来最后又意味含蓄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不足道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依靠的是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国焘，你说是不是。」

「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动摇。」张国焘坚定地说。但是他回避了周的「政治路线的正确」这句话。

毛泽东说：「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师，党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毛泽东说完，大家齐声说「是。」然后会议的主题开始。

两河口会议中，讨论到红军未来行动与战略方针时，双方提出的方案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双方都主张建立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的根据地，向新疆发展。重大的区别在于，张主张以四川、西康为后方，毛周主张以陕西、甘肃、宁夏为后方。简单地说，毛派主张北上，张派主张南下。

两河口会议中，讨论到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张国焘指出，「六届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遵义会议也是不合法的。……」当时张闻天主持会议，打断了张国焘的话。两张对骂，张闻天说：「你以为有枪有地盘，就可以对中央无礼吗？」张国焘笑答：「你们损兵折将，放弃根据地，现在居然摆臭架子，岂不可笑。」

两河口会议中，两派为打松潘的问题争执不下，毛派主张打，张派主张不打，最后决定留待下次开会再议。散会后不久，周恩来往见张国焘，笑容可掬地说：「国焘，我特来报喜，中央决定增补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并同意你的战略部署。国焘，你领导的四方面军战绩辉煌……」

晚上，周恩来又来访张国焘，随手放下一份「松潘作战计划」，说是中革军委已经通过了，张国焘正待追问原委，周恩来一转身飞奔而去。

张国焘感到受骗了，两河口会议上不是说打松潘延后讨论吗？要打松潘，所谓中央红军兵力既少也还没有恢复元气，这个仗要打，当然要用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的主力硬拼，很难有胜利的把握，或者至少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值得吗？

张国焘又盘算，我们四方面军手上有军事实力，但是「党中央」的招牌，在他们手上，党中央握有决策权，「党章」上规定「全党服从中央」。在这点上我们处于下风，必须先与他们周旋，拉他们一些人支持改组中央。正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又来了，他对张国焘说：「国焘，前次丢下『松潘作战计划』，我来不及向你解释，这次我来，我向你说一点『私心话』，你打下松潘，你和四方面军的威信一定大大提高，届时要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改组中央，国焘啊，论

党的资历，论领导能力，论今天四方面军的实力及根据地的党和群众的基础，在党内有哪一个及得你的？国焘，你是个明白人，目前我跟老毛，是不得已的……。」

1935 年 7 月初，毛派中央又派李富春以慰问团的名义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实际任务是代表毛与张进行政治交易的。李问张：「把总书记让给你好不好？」张答：「让润之（即毛泽东)自己干吧。」李又问：「总司令好不好？」张答：「玉阶（即朱德）做得很好，不要动。」李又问：「总政委如何？」张答：「可以考虑。」

毛张两派讨价还价之下，7 用 8 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毛泽东断然拒绝。毛转对周恩来说：「李富春同志带来的信讯，国焘对总政委有兴趣的。」周说：「那我就将总政委让给国焘好了。」毛说：「我看国焘的野心还不止于总政委，他还是要军委主席吧。」周说：「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议，我们应集中主力，控制松潘，国焘不积极。现在我们要取松潘，非以四方面军为主力不可，不如这样，他要多大的官，我们就给他多大的官，国焘要当大官，我们就利用他这个。」于是，毛周商量的结果，决定由张国焘接周恩来为总政委，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毛泽东又说：「必须加上一条，由你（指周）协助国焘工作。」

7 月 9 日，张派川陕省委书记黄超致电毛派中央，要求改组党中央，中央军委，红军总部。7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昌浩与川陕省委的要求，毛泽东故意说：「就由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当时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都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说，「张国焘的价钱越来越高了，人多就称王，他简直不配称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7 月 18 円，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会议，毛对张闻天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两个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于是中央通过，张国焘任总政委。

7 月 21、22 日，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情报告。」接着周恩来说：「中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周恩来这几句话，张国焘被冲昏头脑了。

在这同时，红一方面军到川西后，反客为主，到处派出地方干部，他们以党中央「创造川陕甘边区根据地」的指示为藉口，认为改组原来的地方机构与统一党的领导，是党中央的决定，而当时一般红一方面军干部又有一种优越感，他们（红一方而军）代表党中央，因此，两个方面军在争取地方工作领导方面，多数地区是双线领导的，两个方面军各派各的干部，四方面军认为一方面军夺了他们的权，有的说「一方面军打仗不行，夺自己人的权却有一手。」因而发生了更多的摩擦。

张国焘赴了「鸿门宴」

1935 年 8 月 4 日至 6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派所控制的沙窝举行会议，史称「沙窝会议」。

据张国焘自己回忆：「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驻往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们的卫士，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

张国焘这时发觉自己简直受了侮辱，但沙窝是毛派控制的地区，张进入沙窝等于进了毛泽东的口袋，反抗无力，动弹不得，进入会场时，凯丰交给他一份决议草案，是肯定遵义会议合法性的。

张国焘一看，火了，他站起来说：「肯定遵义会议政治路线正确，军事路线错误，倒果为因……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既有问题，应该重新改选。」张闻天说：「只有党代表大会有权改选。」张国焘又说：「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恩来和我是六大选出的，其它的都不是。」张闻天为之语塞。

邓发手执一件硬物冲向张国焘，朱德见到，连呼，「不可乱来，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朱德转对张国焘说：「这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

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升官晋爵名单，说是政治局通过的，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委、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为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委员。

沙窝会议过程中，毛派先对张国焘使用「下马威」，再用「鸿门宴」，最后给四方面军的高层人物送官，意思是，你张国焘说党中央是不合法的，现在把你的人也让他们当上了官儿，你总不能再说党中央是不合法的吧。

这时的周恩来突然说是病了，他对张国焘说过一些「私心话」，说是打下松潘，换掉老毛，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周是真病还是假病，张全不知道，不过周恩来仍照样参予毛的决策。张等认为北上危险坚持南下，毛周仍坚持北上，南下无出路。沙窝会议的结束，张国焘显然对毛周屈服，否则毛绝不会放张国焘出来的。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陈昌浩回到毛儿盖，徐向前问情况，张国焘说：「我们这次去沙窝，赴了『鸿门宴』了，他们有计划的打击我们四方面军啊。」

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再在毛儿盖开会，毛张两方，为了避免党和红军的公开分裂，毛儿盖会议决定成立左路军与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和朱德的红军总司令部，编入左

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指挥，也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中央直属部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都编入右路军。

左路军，右路军的主力皆为四方面军。

9 月 9 日，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说是截获一则电报，是张国焘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文中说：「望劝毛、周……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刻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误，坚决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我曾当面问过张国焘，他说绝无其事，徐向前晚年答复廖盖隆也说，他绝未见过这份电报。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进击松潘以北，打开了北进的通路。毛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张派控制的最好机会，决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个借口，否则毛派要承担分裂红军的责任，因此叶剑英编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泽东故意去看了陈昌浩，说了些张国焘的好话，叶剑英也对陈昌浩说：「我们同意南下，但在开拔前部队需要收割粮食。」以此为借口，使张派放松警惕。

9 月 10 日黎明三时，毛派以收割粮食为名开始逃跑了，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张派的）闻讯，电告张国焘，张下令阻止。于是，毛张两派的高级干部就在路边吵了起来。毛派骂张派：「张国焘是军阀。」「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决议。」张派骂毛派「什么中央，哈哈。」「你们忘恩负义。」毛派在彭德怀指挥下，9 月 12 日到了一个叫俄界的地方，中央举行会议。毛泽东指示，「我们此次北上，不张扬，目标小，好行动。」周恩来说，「张国焘一心要表示自己是中央，我们将计就计，就让国焘以中央的名义，顶住国民党的军队吧。」毛派决定把自己的部队，改称「陕甘支队」，表面上是一支普通的游击队，这叫以小惑大，既骗了张国焘，也骗了国民党。张闻天对李维汉说，「张国焘对我们耍两面派，我们对他也一样耍两面派。」张国焘说：「毛泽东玩的

是『金蝉脱壳』之计。」「金蝉脱壳」典出自「西游记」，意思是披上老虎皮，自己溜了。张国焘说，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四方面军的主力一直配合一方面军，付出代价很大，现在毛周把四方面军置于危境自己逃了，等于是配合蒋介石消灭我们四方面军。当时张派的口号是「要革命的请跟随四方面军。」

毛派逃走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曾有诗赞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张国焘的新中央

毛周等人逃走后，四方面军群情愤慨，参谋长李特说：「一、四会帅以后，跑在前面与敌作战的全靠我们四方面军，人家对我们当面赞扬，背后拆我们的台，甚至可以说，把屎盆子浇在我们头上。」

张国焘翻开川康省政府主席周纯全的的报告，对大家说：「你们看看这份报告，自从一方面军来到我们川西后，他们无底的向我们需索，他们自称是党中央，我们没有办法，总得供应他们，结果，我们被吃穷了，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了。」

随后川康省委在阿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一条横额，写的是「坚决控诉毛、张、周、秦的滔天罪行」。会议决议说，只有南下，少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当时川西流行着一首顺口溜：「来了党中央，百姓遭了殃；龟孙子走了，中央毛换张。」「龟孙子」是四川骂人的话。

10 月 5 日，张派新的党中央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宣布成立。张国焘致词：「毛、周、张、秦等错误领导，分裂红军，使党中央威信扫地，我们现在应效法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另行成立中央。」台下一片「打倒毛周张秦」声。

接着，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应邀讲话，他们原是一方面军的，在毛儿盖会议的混合编制中被编到张国焘为中心的左路军

的，朱刘二人都坐在主席台上，神情恍惚。

朱德在讲话中说：「我们和一方面军是老夫老妻，夫妻吵架是常事，总有一天破镜重圆……」台下有人大叫：「谁和毛周是夫妻，只有你，朱毛朱毛……」接着又是一片笑声。

刘伯承说：「我的意见曲高和寡，张总政委这么做，我是舍命陪君子。」「万一失败，我们怎样下台？ 」台下又有人高呼：「在总政委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胜利。」

张派组成的党和红军的新中央，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李先念等皆列名其中，会上又通过，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党籍。叶剑英、杨尚昆革职查办。

张派党中央称临时中央，选出中央委员十五人。计：张国焘（兼总书记、西北联邦政府主席、西北军委主席）、朱德（兼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徐向前（兼军委副主席、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兼红军总政委）、刘伯承（兼红军总参谋长）、王树声（兼前总总指挥）、李先念（兼前总政委）、李特（兼前总参谋长）、何畏（兼红军大学校长）、傅钟（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川康省委书记）、何长工（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邵式平（兼川康省委副书记）、李卓然（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兼川康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曾传六（兼中央保卫局局长）。

当时有些原属于一方面军的干部，酝酿串连反对张国焘，事为朱德、刘伯承所知，朱刘劝阻他们说：「要反对张国焘，一定要装出拥护张国焘，争取他的信任。」

1935 年 10 月 20 日，张国焘以中革委主席的名义，准备进攻成都，这时蒋介石把张国焘看成是真正的中共中央，调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拱卫成都。11 月 19 日起，张国焘与蒋介石在成都以北的重镇百夫丈血战七天七夜，四方面军大败，元气大伤，张国焘急令撤兵，总部改设芦山，此地天气恶劣，给养困难，又与藏人冲突。国民党军队

穷追不舍，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兵员、粮草、弹药皆无法补充，屡战屡败，军心开始涣散。

差不多在此同时，1935 年 1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林彪的哥哥）回国，他的任务，一是处理毛张之争，二是传达国际「人民阵线」新路线。张浩回国后，先到延安，其时毛派以「北上抗日」为号召，张浩认为，这正符合国际与苏联的利益。1936 年 1 月 16 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准备约晤。1 月 22 日，毛派中央在陕北开会讨论毛张问题，毛派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张浩代表国际提出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四点：1、毛张二派的中央皆取消，2、毛派中央改为西北局，3、张派的中央改为西南局，4、中央设白区，代表国际直接领导西北局、西南局。张国焘执行了这个方案的第三条，毛派则未加理会，仍称党中央。这时的张国焘经过与蒋介石的百夫丈之战的失败，力量已今非昔比。静观待变。

1936 年 7 月，从湘西突围的，由贺龙、萧克、任弼时领导的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合后，举行联席会议，贺龙是拥毛的，萧克是拥张的，关向应、甘泗淇不太有主见。任弼时是中间偏毛。因为四方面军代表多，任弼时向张国焘提出，在这个两军联席会议中，不可执行党纪中的「少数服从多数」；要求由他（任弼时）作会议总结，张国焘拒绝，会议遂不欢而散。

1936 年 9 月，毛泽东等以中央的名义致电西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两南局正副书记。张国焘等原来打算西进，红四方面军遇黄河对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9 月 13 日，毛派中央电张国焘等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10 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合。周恩来赶到同心城「欢迎」张国焘，随后就挟持张国焘于旺堡，再转保安、毛周又以张国焘的名义调动四方面军，直接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西进」，待九军、三十军相继渡河后，毛又电令其余部队留原地迎敌，因此，已渡河的红军在河西陷于孤军苦战。11 月 10 日，中央军委、将河西

红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新疆，连接苏联，原是张国焘的构想，为毛周所反对。现在这个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却成为毛周用来消灭四方面军的手段。1937 年 3 月，渡河的红军从二万二千人，打到只剩几百人逃到新疆。张国焘留在陕北不断接受批斗，毛周连手打倒张国焘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第九章 中共陕北党争秘史

中共陕北党争的若干内容，有些是当事人对我直接谈的，在中共官方党史中从未发表过的。

1937 年底我初到延安的时候，偶尔见到一些颇为奇特的标语：「拥护毛泽东」，「拥护王明」，「打倒张慕陶」之类。毛泽东和王明我当然知道是中共的领袖，至于张慕陶是谁，他当时为什么如此重要，名字居然和毛泽东王明放在一起，张幕陶犯了什么大罪，中共要提出打倒他呢？

中共在陕西的早期活动

陕西省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播种地区。中共最早的活动分子魏野畴、李子洲都是陕北人。中共初期的武装斗争，陕西省高潮迭起。李子洲曾经给共产国际写过一个报告说，陕北是最理想的游击地区。

1927 年 2 月，史可轩从苏联回国，应冯玉祥之邀，筹办中山军政学校，中共派邓小平，许权中协助史可轩，6 月，冯玉祥反共分共，杀了史可轩。当时许权中率领冯部一旅人宣布起义，其后陕西中共党员唐澍、谢子长、刘志丹等都到许部会合，成为陕西第一支红军队伍。1928 年 1 月，渭华暴动失败，这支红军全军覆没。唐澍战死。

张慕陶是陕西人，又名张金刃，20 年代后期，中共在华北的著名活动分子，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曾在周恩来的推荐下担任顺直省委（等于后日的北方局）组织部长、书记等职。当时陕西省的共产党活动是受顺直省委领导的。因此张慕陶这个人是陕北中共游击活动最早的领导人。

渭华暴动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陕北军委书记，军委受特委杨国栋领导，开会时，刘指杨是「富农成份」，把杨的权夺了，自称特委书记。

1930 年中共立三路线时，中央派杜衡到陕北，成立西北行动委员会，准备大干，以谢子长、刘志丹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则认为，西北工作应先打入反动武装待机夺取军权。被杜称为勾结军阀的右倾主义。其时陕甘一带的中共组织，屡经反复改组，红军番号复杂，兴衰很快。今天这个领导人被打倒了，明天另一个领导人又被打倒了。互相吞并，互相杀戳。

张慕陶曾经领导刘志丹高岗

1931 年 11 月，反对周恩来、王明的，反四中全会的何孟雄、罗章龙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张慕陶为主要成员之一。后来他和罗章龙等同时被开除出党，再后来临时中央委员会解散了，而张慕陶依然有很大的个人活动空间，他的反日反蒋立场，使他在西北军，东北军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又因为他反对过国际路线而被中共开除，更获得北方军阀的信任。他的活动能力有许多是中共当时想做而做不到的。所以中共又派人去找他，恢复他的党籍。

1931 年 9 月开始，在张慕陶领导下的陕北红军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为正副总指挥，高岗为政委。1932 年 3 月，反帝同盟军称红军第二十六军，不久又改称红军西北先锋队，又不久司令员刘善忠被称军阀主义，为参谋长杨作栋所杀。数天后，政委高明镜又杀了杨作栋，自任司令员。

1933 年 1 月，六届四中后代表杜衡回到陕北，企图直接掌握陕北红军，成立军委会，刘志丹挂名主席无实权，高岗下放耀县。不久杜衡亲自指挥的部队溃败，杜衡本人也跑了，而被杜衡打击的高岗却在耀县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打红军第二十六军番号。当时领导刘志丹、高岗打败杜衡的，背后就是张慕陶。

冯玉祥支持张慕陶

1933 年 4 月，张慕陶作为中共代表在冯玉祥身边组织抗日同盟军。他起草了抗日同盟军政治纲领，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当时中

共的权力斗争也发展到抗日同盟军内部。不久，中共河北省委和全国总工会华北负责人饶漱石另派柯庆施为中共驻冯玉祥部的代表，自此，抗日同盟军内有两个中共的领导系统，一个是张慕陶领导的特委，一个是柯庆施领导的前委。两者斗争激烈，最初特委占上风。9 月间，柯庆施在前委宣布开除张慕陶的党籍。10 月间，抗日同盟军溃散。

1934 年 1 月，中共北方局派郭洪涛出任陕北特委书记，郭拟将陕北红军统一指挥。结果接受郭洪涛领导的只有二十七军，刘志丹、高岗领导的二十六军则另组陕、甘特委。北方局的郭洪涛当时被称为王明路线者，而支持刘志丹、高岗的仍旧是张慕陶，张慕陶又受到冯玉祥的支持，冯颇有收编陕北共党游击队作为反日反蒋的资本的打算。

郭洪涛到陕北后，据高岗记述：「郭洪涛同志一回到陕北，就拿富农路线的帽子来打击马明芳同志，（7 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给我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又以『白军取官』,『一贯的动摇怕死』等来打击刘志丹同志。对谢子长同志也是采取了许多方法来打击的。至于对其他许多干部，不说是『右倾』，就说是『富农』，不说是『土匪』，就说是『流氓』，一样采取各种方法来打击，甚至无辜的枪毙同志，造成党内浓厚的无原则的空气，……」（中共原始文件：1942 年 12 月 17、18 日，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高级会议上的讲话）。

陕北左派的垮台与复辟

当年中共在陕北肃反，明反的是张幕陶，暗反的是冯玉祥，但是因为冯玉祥在国民党很有影响力，中共的统战反日反蒋都需要联冯，所以不敢提冯玉祥支持张慕陶的事实。

1935 年 2 月，在张慕陶活动下，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委和西北工作委员会，实行反左，谢子长任西北工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郭洪涛被批为宗派主义，左倾机会主义，会议并通过，撤消郭洪涛领导的陕北特委。而郭洪涛给北方局的报告

说，刘志丹、高岗勾结张幕陶，张慕陶是陕北右派的领袖和党中央对抗。7 月，北方局另派朱理治到陕北肃反，朱理治到陕北后，立即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宣布联席会议对郭洪涛的处分无效。8 月，上海临时中央又派聂洪钧到陕北。聂洪钧回忆说：「在上海临走时，贺常志来和我谈话，说了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很多张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黄子文、蔡子伟……」，「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问题。」

火线肃反，刘志丹等被捕

1935 年 9 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开永坪会议，改组西北军委，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合并，称为十五军团。徐海东、刘志丹为正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另外，成立陕甘晋特委，以朱理治、郭洪涛为正副书记。高岗记述，「这一切组织上的变动说明什么呢？就是把刘志丹同志和我（高岗）从党及军事的主要机关排挤出来了，而郭洪涛、聂洪钧等却被提拔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对陕北进行第三次围剿，据聂洪钧记述：「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令我们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当时郭洪涛是省委的负责人之一，他是北方局派来的，聂洪钧是从上海派来的。他们分别代表高层不同的派系，在整肃刘志丹等的立场是一致的。这说明整个行动是党中央的决策。聂洪钧曾经是周恩来的亲信。朱理治是上海临时中央的。

十五军团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准备将陕北红军领导人一网打尽，当时称为「火线肃反」。据当年在陕北肃反中受过迫害的一位游击队政委李赤然回忆，「参加会议的干部人人自危。」有人一听到自己是反革命，当场就自杀了。被逮抓的习仲勋对陆定一说：「当年朱理治已经挖好了坑，准备将他和高岗活埋。」

其时，一部份在陕北党和红军中极有威望的领导者，临时离开了领导岗位，成了漏网之鱼，当他们听到上述的消息，连络陕北红军和地方武装，聚集到党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要求交还他们（陕北）自己的领导人，形势危急。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宣布将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周恩来也向受难的陕北干部说：「这是张慕陶的新右派事件引起的，每个同志都要接受对党忠诚的考验。」

11 月 3 日，中央宣布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九个委员中有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四人，这说明中央是肯定这次「火线肃反」的。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举行瓦窑堡会议结束。中共中央认为，陕北荒山多，物资缺乏，粮食在平时已不足自给，这时各路红军云集，因为忙于对国军的作战和陕北地方武装的整肃，当然不能从事生产，所以陕北苏区的粮食供应顿呈严重恐慌，中共中央乃决定以抗日为号召派军东征入晋，胜则开辟新苏区，败则席卷山西的物资，再回陕北。

瓦窑堡会议中，一个重要的秘密决策是，东征消灭以刘志丹为首的陕北红军，西征消灭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四方面军。曾任陕北红军司令员的孟伯谦对我说：「1936 年 2 月，毛泽东用『东进抗日』的名义，命令苏区的所有实力，东渡黄河袭击晋西阎锡山的部队，其目的在夺取物资。派刘志丹为红二十八军军长，率徐海东之四百余人，东渡黄河参加这一个战役，刘志丹只身在四百多名有私仇的部队包围之下，过了黄河就宣告阵亡了。

刘志丹死于 1936 年 3 月底 4 月初临危受命反攻三交镇时。关于刘志丹之死，没有确实的日期，刘志丹死时，唯一在他身边的是中央特派员裴周玉，由于刘志丹曾长期受中央惨斗，裴周玉原属中央红军保卫局，在红二十八军的身份又很特殊，所以陕北红军地方干部普遍的说法，刘志丹被中央红军所杀，执行者就是刘身边的中央特派员裴周玉。据另一位陕北干部对我说：「刘志丹死时，子弹是从脑袋后打

进去的。」

陕北大冤狱，特别是刘志丹猝死后，毛泽东为了洗刷自己的责任，特别提升陕北地方干部，高岗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为陕北第一把手的。周恩来也命令陕北各单位，隆重追悼，并亲自致悼词，刘志丹出生的保安县也奉命改为志丹县。

刘志丹死后，高岗却因祸得福，党中央为了要挽回陕北的民心，高岗从此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为什么刘、高有这样不同的命运呢？这就要用周恩来的「每个同志都要接受对党的忠诚的考验」这句话来解释了。

当时每个被捕的陕北党和红军的干部，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我是张慕陶的新右派分子」。保卫局长戴季英奉命抓人，他当然知道所谓「新右派」根本没有这个组织。但在严刑逼供之下，就出现以下三种不同的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受不了皮肉之苦，胡乱承认罪名，党了解这个罪名实际上并不存在，你轻易认罪，将来在敌人面前你不是一样如此吗？党认为这种干部是不可靠的。处死！

第二种表现是，对于这个罪名，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觉得认为自己对党的贡献大，激动得骂起娘来了。党认为，你为这一点委屈就反党，当然是不可靠的，但是考虑到你在群众中的影响，需要一点技术处理（例如先整死，后平反）。

第三种表现是，既不认罪，也不怨党，而且赞扬党用这种办法考验干部是绝对正确的。党认为，这样的干部才是好党员。

我曾经和当年陕北被整肃者的亲人谈及我们上述的分析，刘志丹属于第二种表现，高岗属于第三种表现。

高岗一度是毛泽东可能的接班人

高岗于 1926 年入党，1931 年起担任陕甘游击队司令，红二十六军政委，十五军团副政委。1938 年起，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西北局书记。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党校讲话中说：「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了。」

1942、1943 年，高岗在陕北权势最盛时，也是延安整风差不多同一时期，高岗曾对陕北冤狱作了一个彻底清算。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说：「到 1942 年底至 1943 年初，党中央直接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高岗主持了这个会议，以题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政治报告，作成决议，并经中央通过。

1945 年中共七大，从来不是中央委员的高岗，当选七大第十二名中委。

中共解放战争期间，高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高岗和刘少奇是中共七大后最受毛泽东欣赏的两个人，毛泽东认为，高岗较刘少奇在处理问题上更富于「决断」。

1952 年 8 月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人陆续调北京，高岗任国家计委，权位最为显赫，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与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即后日的国务院）地位平行，时人对高岗有「五马上京，一马当先」之赞。

1953 年初，毛泽东决定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散主义。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周恩来名为政务院总理，实际上只能专管外交，其余政务院十六个部门，全划归高岗

负责的国家计委领导。高岗已成为政务院（国务院）掌握实权的人物。

5 月 19 日，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周恩来、薄一波都先后作了认真的检讨。薄一波是被斗争的主要目标，高岗作了较长的发言，集中攻击簿一波，但是高岗的真正对手是刘少奇，所以高岗故意把刘少奇说过的话，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加在簿一波身上，高岗这种斗争被称为「批薄射刘」。3 月间，高岗代表毛泽东，授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说，中央准备召开八大，彻底改组党中央。高岗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安子文草拟一份中央改组名单。安子文当时认为，高岗的话是绝对可以代表毛主席的，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安子文当然执行。安子文呕心提出两个不同的名单供毛泽东和高岗选择。谁知名单不久就传了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数中央领导都在留心名举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谣言四起，怪话连篇。安子文成了代罪者。高岗甚至扬言，自己将掌握政治局，刘少奇管人大，周恩来如果不行，他将把周撤换。

高岗还说，中共的发展包括两个组织部分，一个是红军与根据地，另一个是地下工作的党，刘少奇仅能代表白区，不能代表党，他的能力也不成熟，七大以来，他被抬得太高了。

高岗俨然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高岗哪里来的胆子？

毛泽东一手导演高饶事件

高岗在党中央地位不断上升，毛泽东功居第一，毛泽东重用高岗，最初是为了化解陕北地方干部对党中央的怨恨，后来觉得高岗骂王明很入骨的确使毛听得进去。再后来发现中央权力平衡中，刘少奇可以制周恩来，高岗又可以制刘少奇，毛暗自得意，高岗这张牌太有用了。

名单继续扩散，安子文作了检讨，围绕着这张名单的中央权力分配争夺战，愈演愈烈。毛泽东挑起高岗对刘少奇的斗争；刘少奇与周恩来本来有矛盾，这时为了维护薄一波，联合对抗高岗；高岗又利用

饶漱石打击安子文，实际上也是打击刘少奇。整个斗争的情况扑朔迷离，毛泽东警惕到，这场斗争继续发展，不但刘少奇、高岗、周恩来三败俱伤，而且也会伤害到自己。毛泽东说话了，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安子文）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根据追查中的了解，散布名单者主要是高岗的司令部，而饶漱石则通过中央组织部的关系将名单层层下达，于是由毛泽东定性为高饶集团。

中共中央决定处理高饶问题，当时高岗私党遍布中央要津，下手不易。因此由周恩来设计诱高岗。12 月 21 日，周恩来对高岗说：「东北鞍钢完成三大重点工程建设，必须中央派人主持典礼，你是中央负责人，又是东北第一把手，这项荣誉，非你莫属。」23 日，高岗得意忘形地去了东北。24 日，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毛泽东宣布自己要去杭州休假，中央由刘少奇主持。

1954 年 1 月，高岗回到北京，立即嗅出北京政治空气有变，又知道中央决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党的团结问题，高岗直觉这些发展都可能与他本人有关，当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面见毛。1 月 22 日，毛致电刘少奇说，高岗目前「不宜来此」，「他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或再加上小平和他商量」。

高岗事件是中共建政初期最复杂的一场谲诈多变的高层的权力斗争，高岗早期和周恩来的关系不错，后来在毛的支持下，从周的手上，夺得大权，再后来发动斗争薄一波，志在推倒刘少奇；薄的以新税制问题又牵到周恩来，周被迫挺薄。演变为毛的中央集权，一人独裁，刘（少奇）周（恩来）联盟自保，高岗孤立，形势至此，毛泽东唯有放弃高岗，保持党中央的团结，此为高饶事件的实际背景。

当时的形势是还有一个微妙的连环套：这边厢毛泽东以刘少奇制周恩来，又以高岗制刘少奇；那边厢，斯大林见到中共的亲俄派渐见式微，要制造中共的新亲俄派，高岗被看上了，斯大林利用高岗，既为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又把高岗和斯大林的关系故意泄漏给毛泽东，试探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忠诚，斯大林骗了高岗，而高岗却

同时被斯大林、毛泽东两个「巨人」骗了。

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通过撤除高饶一切党内外职务，开除出党。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中说：「这里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

第十章 张学良与共产党

我在延安时，认识很多东北朋友。1939 年我离开延安到西安，担任「秦风日报」主笔，又认识了一些东北朋友，通过他们的介绍，到骑兵第二军工作，骑二军是东北军，军长何柱国是广西人。主要干部是东北人，关键职位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特务密布，在这种复杂环境之中，我个人情况更为特别，我是受中共考验的对象，又是自己个人打入骑二军的，没有任何背景与后台。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初到骑二军，就被任命为抗战剧团团长，抗战日报社社长。周围同事偶尔提到张学良，以及后来我在大后方所见所间，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共产党对张学良的评说，党内外完全两极。

当时大后方听到的很多都是反蒋政客称颂张学良的声音。这些政客的目的是，利用张学良作为反蒋的政治资本和讨好中共。呼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当时中共也以「释放张学良」为统战的口号，实际上。他们并非真心诚意想见到国民党释放张学良，因为张的释放，对苏共和中共的控制东北的计划都是不利的。共产党的内部传达仍旧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对中国革命有功，但是，他出身于大土匪大军阀的背景……

骑二军从华北调到河南，假道中共的陕北地区，当时中共军队在沿途堆积沙包，武装实弹全程监视。这就说明了中共对东北军并不友好。

张学良的政治反复

在中共心目中，张学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和政客。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说：他的易帜（即改挂青天白日旗，归顺国民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完全是为了反共。电文中说：共党横肆阴谋，流毒海内，不特人心皆为疾首……先大元帅（即张作霖——引者注）『发讨赤之师，与国府请公反共清共相同』。

1929 年 5 月 27 日，张学良为了讨好蒋介石，表示他的反共是真的，派军警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逮捕俄人三十七人，并下令撤除中东铁路的俄籍局长、副局长，引起一场中苏边境大战。苏联的史料中说：「1929 年中国军阀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阴谋，张学良的军队袭击了中东铁路。」（见中文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十一卷。）

同一个张学良，他以后居然不断讨好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甚至一再要求参加共产党，这真是难以令人理解的。

1930 年 5 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大战中原，双方杀得难解难分，蒋介石派出庞大的游说团做张学良的工作，这些说客中包括吴铁城、陈公博等，他们终日陪张玩乐，诱张出兵援蒋，张问蒋能出多大代价，双方展开谈判，讨价巡价。蒋介石答应，张学良如能臣服，他将成为蒋以下的第一人。当时张学良静观风向，犹豫不决，直到蒋介石宣布任命张学良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并奉上三千万银元。9 月 18 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并将主力部队开入关内，实际上，张学良入关前，蒋已胜利在望。张学良拖到 9 月出兵，就有点投机性质了。

张学良既将主力军开进关内，东北的留守部队当然很薄弱，又群龙无首。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如入无人之境。很多留在东北的张学良旧部，有自动起而反抗的，也有为了自保组织「维持会」的，张学良身为东北军统帅，不知所在。1933 年 2 月，全国舆论沸腾，张学良下野出国。

张学良一向吸毒，而且毒瘾很深，当年蒋介石对他也没有办法。张学良被逼出国了，当然没有在国内自由。他到了意大利，当时是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的贵宾，有一天正要偷偷吸毒时，被一位女士碰上了，对张说：「你在做什么？」张学良抬头一看，这位洋妮儿雍容华贵，可真是位大美人啊！张的左右提醒他，这位女士是墨索里尼的女儿，张学良听了，一昏浪之间，毒瘾全忘了，自此他打起全身勇气，穷追不舍，不断向这位女士奉献爱心，又专心研究法西斯主

义。

张学良回国后，到处宣传法西斯，并鼓动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组织中国的法西斯党，结果蒋介石没有批准。在这同时，张学良写给墨索里尼女儿的情书全被退回，从此他对法西斯也没有兴趣了。

张学良追求法西斯的相思梦破灭以后，他又追求另一个梦。他要找共产党，他的追求纯出于投机心理，又是瞎扑的。张学良开始研究共产党，引导他的竟然是共产党的反对派。

这个中共反对派的来源是：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莫斯科支持王明上台，周恩来实际当家。中共党内实力派群起反对，组织反四中的临时中央。以罗章龙为首的这批人，当时被中共称为「叛徒」或「分裂主义者」，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最早是从这个中共反对派开始的。

中国大陆政治协商会议有一珍藏本的《黎天才自传》，这是研究张学良的第一手的可贵资料。

黎天才原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反对派的北方负责人之一。他从 1929 年起，公开的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张学良担任西北则匪（剿共）总司令时，黎任政训处处长。

据黎天才记述，张学良在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法西斯化失败以后，就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黎天卞说，张学良「曾想组织一个独立政党」，「什么纲领政策，以及政党组织，都由我写成方案。」

张学良自己说，他和蒋介石的分歧是，先「安内」抑先「攘外」的问题。就事而论，当时东北军太苦，思乡心切，可以理解。但是张学良在 1935 年到上海看李杜，当时李杜刚从苏联回国，张学良要李杜为他介绍苏联关系，寻求苏联援助。

张学良援共，要求参加中共被拒

张学良一方面埋怨蒋介石给的给养少，一方面却从他的军费开支中，大量支持共产党。据中共的出版物资料，1936 年春，中共代表李克农到洛川，张学良送给红军大批军火，包括步枪，子弹，医疗用品，无线电器材，钞票印刷机等，为中共解决了许多困难，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的经济封锁，也为红军打开一条生路。

洛川会谈后，张学良为了欺骗蒋介石，致电蒋说：为了加强清剿共匪，决定在洛川成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学良即日前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介石复电嘉勉。这两则电文是国共两党的档案中，应该可以查得出的。

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张学良的第句话是：「国民党己经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是法西斯，一是共产党」周恩来立刻打断张的话说「法西斯在中国绝对行不通」。

在这次会谈中，谈到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开创大西北的新局而。周恩来对张学良说：「如果你能坐轿子，你能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张学良后来说，周恩来这句话听得他心里油滋滋的。周恩来还说，毛泽东的意见，大西北成立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主席和国防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一听，高兴万分，马上送了周恩来两万银元，十五万法币。周恩来笑纳。

延安会谈后，红军的军服都是由东北军的「同和军服庄」供应的。双方并达成协议，以「打假仗」的方式，一方面使张学良向蒋介石「邀功」，一方面不断提供红军援助，具体的做法是，先由东北军占领某个地方，然后丢弃新武器弹药退出，红军进住以旧枪换好枪。当时有一句话：「红军来了就闪避，他们去了不要追」。在这同时，张学良把蒋介石的「围剿共匪作战计划」随时通知红军。以上这些事都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童小鹏的回忆中写的。

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蒋介石通过他的情报网，当然也有

所闻，并有所戒备。据曾任中共驻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刘鼎回忆，1936年7月初，有一天，张学良突然把刘叫去，情绪很紧张的对刘说「我的日子不好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和你们一起干……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必然大有成就。」张学良明白表示，他要参加共产党。刘鼎把张的话电告党中央，中共中央向莫斯科请示，共产国际答复中共，张学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不可靠的同盟者，中共必须要防备他的动摇性和背叛。于是，中共只好答复张学良：「你的想法还不成熟」。可是，张对参加共产党的打算并未死心。他再求新疆的盛世才帮助他参加苏共，盛为东北人，当时是新疆督办，也是苏共的秘密党员。张学良的请求入党，又被苏共严词拒绝。第一次国共分裂，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中国和苏联有过两次严重冲突，俄国人是不信任张学良的。

1936年7月，张学良参加共产党的要求被拒后，中共完全看出了张学良的弱点，张和日本翻了，和苏联翻了，和蒋介石的关系各怀鬼胎，张学良的处境可谓是四面楚歌。共产党认为，张学良的野心，反复，和投机，是不能让他在共产党内发展的。但是可以利用他的野心在共产党的控制下让他放手一搏，无论成败，共产党都有收获。

据《周恩来年谱》记述：「8月9日。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在这同时，中共中央派出叶剑英，潘汉年，朱理治，边章五等，从事改造东北军。

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原计划以改造为手段，达到实际掌握东北军的目的，后来，西安风声很紧，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已经公开身份的中共干部回延安。但是，中共在东北军的基层工作已经相当成功。

张学良与中共骗中有骗

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因为申请加入共产党不成，也对共产党有

了一些想法，所以只有与杨虎城合作，发动「西安事变」。事变之初，延安、莫斯科都感到来得突然，中共领导人意见分歧，后来周恩来和大批中共干部到西安，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急问苏联的态度如何，能不能支持，当周恩来说「否」时，张学良的心立刻冷却了一半。后来时局的发展，国民党大军压缩包围，红军占据了西安附近的据点，中共的顾问已有喧宾夺主之势，莫斯科的宣传又报道说，「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干的，东北军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在这复杂的情况下，张学良不逃怎么办？于是他借口陪蒋介石逃到了南京。

「西安事变」中还有一段内幕，当张学良积极争取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他身边始终秘密藏匿一个神秘人物，此入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中共反对派的黎天才，他一直是张学良的主要幕僚，张的文电多出自黎的手笔。「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瞒着周恩来陪蒋介石到南京，其中唯一知情者就是黎天才。据罗章龙晚年的「回忆片断」记述，罗在组织中共反对派后，张学良曾与他两次密谈。

张学良一生中，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玩女人一样的复杂，他说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如父子，他利用了蒋，又出卖了蒋；他一厢情愿追求共产党，而共产党始终把他视为土匪、军阀；他为了个人利欲熏心，发动「西安事变」，不负责任的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孤注一掷，他是中国历史上罪大恶极的人。张学良最后陪送蒋介石出走，是他自己为了逃命。而历史的讽刺是，最后帮助张学良逃出西安的是一个中共的反对派黎天才。这个黎天才后来被中共处死了。

历史还有更具讽刺的是，许多张学良的老部下在文革时期被斗时，他们的罪名是「拥张某的反党集团」。据称这个集团的领袖是高崇民。高曾是张学良的高级幕僚。他的回忆中说，他的案件，亲友被牵累者数以千计。

张学良晚年不去中国大陆，是他一生中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

张学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恩来说他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明明是一句骗张，骗己也骗人的谎话。

张群说「你是个宝啊，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谁就有用」。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张学良被人利用，他也利用别人。

彭德怀说「张学良这个人很滑头」。当李克农第一次见过张，途经云阳彭的红军总部时，彭这样对李说的。

张学良政治道路的曲折，和他与女人之间的恩怨纠缠是一样的，赵四小姐陪伴他半个世纪，传为撮美丽的英雄与美人的故事。但是，九十一岁的张学良突然说，他爱的另有其人，就这么半句话，把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全搞混了。张学良正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口口声声称颂蒋介石、蒋委员长时，他心里正在想如何争取加入共产党！

张学良这个人，出身于大土匪之家，花花公子，信口开河，狡猾成性，他骗人，人骗他，他一生就是这么混的。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等于是小骗子遇上了大骗子，他谈历史，有些事他难于启齿，有些事他难以自圆其说，有些事他避而不谈，有些事他说「交给上帝了」。试想，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可信吗？我的朋友唐德刚先生是一位历史学者，他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也是很认真的。不幸，他也被骗了。更具讽刺的是，这位历史家用心血记述的原稿，后来又被别人骗了。历史似乎已经作出评价，张学良这个人一生离不开一个「骗」字。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西安事变时，中共有一个张学良的卫队长，亲自带人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当时被反蒋的人传为一时的英雄人物。当时中共的秘密机关和重要人物，也是由孙铭九的部队保护的。孙铭九捉蒋打的是抗日旗帜，说蒋压制抗日，当年他们甚至把张学良身边态度较为温和的王以哲也杀了。

谁会想到，这个孙铭九在抗战期间竟做了日汪伪政权的山东省公安厅长。又谁会想到，在「解放」以后，孙铭九又以西安事变捉蒋和中共地下工作双重英雄身份在北京出现。孙铭九抗日还是亲日？爱国还是汉奸？他的不同身份与面貌，都是共产党给他的任务。

孙铭九的真实身份，可能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周恩来在张学良问题上联张抗日，而拒张入党，可以说是执行了莫斯科路线，孙铭九先做反日英雄再做汉奸，联汪反蒋是毛泽东路线，也是周恩来执行的。这个孙铭九很快不见了，这是所有执行中共党员奉命当汉奸的共同命运。

第十一章 「皖南事变」与中共党内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和戈扬都在重庆，其时国共关系紧张，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或著名左翼人士，都在党的安排下紧急处置，我由重庆转移到浙西作地下工作，戈扬则去新四军，从此又开始我们长达六十年的分离。

「皖南事变」与叶项矛盾

1941 年 1 月，中共新四军九千余人在皖南被国军聚歼，包括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失踪，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十六个字，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冲向国民党，尤其是针对蒋介石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共党史资料局部开放，中共内部也出现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争论，意见分歧有助于我们探讨「皖南事变」的真相。

「皖南事变」包括两个对抗，一个是国共对抗，另一个是毛周对抗，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是与周恩来关系极深的反毛派，军长叶挺是没有实权的。当中共六届六中决定取消长江局，把长江局一分为二，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新四军原来是周恩来江西苏区的老本，刘少奇领导中原局，就带着饶漱石插进新四军核心，成为新四军另一个领导中心了。

1937 年抗战开始，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又称十八集团军）。湘鄂赣闽豫皖粤等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国共在讨论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时，双方僵持。最后，蒋介石提出由叶挺担任军长。叶挺曾是蒋的旧部，过去又是共产党员；1927 年广州暴动失败，叶消极脱党，仍继续与中共保持联系，因此蒋介石一经提出叶挺，中共领导人又邀叶到延安「面试」，随即同意。

1938 年 1 月，蒋介石任命叶挺、项英为新四军正副军长。当时叶挺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的。

项英在中共的历史地位、曾经喧赫一时。项是中共第三届至第六届的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并当选为政治局常委。30 年代初，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项英奉周恩来之命派往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兼）和中央军委主席。曾在江西苏区主持过宁都会议、赣南会议等，展开对毛泽东的斗争。1934 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项英继续领导南方游击战争。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时，同时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六届六中全会后，长江局一分为二，刘少奇领导中原局，周恩来领导东南局，后来再撤东南局设东南分局，都是步步削减周恩来的权力的。

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叶挺应该听项英的；按照军队编制系统，项英应该听叶挺的。在这种情况下，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的了。何况，叶项矛盾以外，还有党内更高层的矛盾。

刘少奇渗沙子，党内矛盾不断升级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均以项英为对象，用当时周恩来的话说，新四军必须坚持由共产党领导，叶挺在新四军是一位「客人」，是统战的对象。通过对叶挺的统战，可以利用蒋介石，可以增强中间人士对中共统战政策的信任。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叶挺作为一个脱党份子，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中共中央一再指示项英「对新四军党的领导」绝对不能放松，同时「对叶挺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尊重」。与叶挺「保持良好关系」。

中共对新四军的领导，用最简单一句话就是，项英管政治，叶挺管向蒋介石要钱。再简单一点说：叶挺做新四军的军长是应付蒋介石的。

在新四军的历史资料中，叶挺每次见蒋介石都是为了要经费，要

补助津贴，要医药用品，要抚恤费等等。附带一说，中共中央和项英对叶挺向蒋介石要钱所得未如理想，一直不满。例如，叶初向蒋要军饷每月十六万五千元，蒋实付六万五千元。后来，项英坚持要叶向蒋力争每月最低要十万元，再后来又把最低额定为十三万元。随着新四军的不断扩充，军需节节增加，叶挺每次和国民党谈判，都是苦费心机的。

叶项之间在最初两个多月（从 1938 年 1 月至 3 月），还算勉强能够相处。4 月 18 日，项英向中共中央告了叶挺一状，说叶挺什么事都听蒋介石的。在叶挺方面，确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地位夹在国共之间，一边要取得中共对他的支持，一边要对蒋介石执礼甚恭，言必称「委座」（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叶挺的任务就是为共产党向国民党要钱，当时他不这样做行吗？

1938 年 6 月，叶挺到武汉，向王明申诉，他担任新四军军长，有职无权，请求辞职。当时王明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主管黄河以南中共党务，权力极大。中共对叶挺表示慰留，同时宣布成立新四军军委会，以项英、叶挺、张云逸、陈毅、周子昆、袁国平等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副之。委员中原来有邓子恢、张鼎丞的，被毛泽东删去了。他们也是当年中央苏区的老反毛派。

1938 年 8 月，叶挺认为，他作为军长和新四军军委会副主席，却不能接触中共有关军事的文件，仍然无法工作，所以再到武汉向王明请辞，并远走广东韶关。此时蒋介石表示，叶已离开，新四军军长须另派人。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无论如何须说服叶挺打消辞意。次年二月，周恩来用半哄半骗的方法，亲自送叶挺回新四军，继而宣布，新四军军委会，叶挺改为主任，项为副主任，安抚叶挺。随后，周恩来又补充说，项英以政委身份负责军委会的实际工作。

1939 年 10 月，叶挺又到重庆，其时王明已去延安，周恩来也去了苏联。叶挺向董必武等再次请辞。叶说：「我不是党员，工作起来困难。」「参谋处机要科也不让我去，我像个什么军长啊？」叶挺这次

离军部时，以军长身份留言先向副军长项英「请假」，随又请辞，项也电告中共中央，建议赞成叶的辞职。叶挺经重庆又去广东、香港，对廖承志表示不干，并用广东话「丢他妈」、「丢他妈」的说了许多粗话。1940 年 6 月，周恩来回重庆，召见叶，告以为了统一战线与革命利益，叶绝不能辞职，并命令新四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陪同叶挺返回新四军。

叶挺三次向中共请辞无结果，遂于 1940 年 11 月 28 日直接向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辞职。当时叶挺的处境内外交困。为新四军北撤问题，中共要叶挺向蒋介石要一笔巨大的开拔费，不得要领。项英又常以命令式口吻说：「叫军长来」，叶挺感到火冒三丈。叶的辞职，顾祝同又表示慰留。

如前所述，毛泽东、周恩来和项英三人之间在二十年代底三十年代初关系微妙，周恩来和项英皆曾领导过，而且清算过毛泽东。遵义会议以后，毛对中共的领导基本形成，但是周恩来对毛并未完全驯服，周恩来抗毛的主要政治资本，一是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王明派对他的支持，二是新四军的武装力量。

1937 年春，刘少奇到平津一带重建北方局，五月回到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会上二百多个代表都收到一份刘少奇检讨中共白区工作的万言书（四封给中央的长信），内容批评过去中共的白区工作，领导错误，需要彻底转变。

与会者过去多数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对刘的万言书反映强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言，对刘的意见加以肯定。毛说：「刘少奇同志指出了白区工作的病症，一针见血。」毛以后还说了「刘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一类的话。

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王明派全力反扑，周恩来公开支持王明路线。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决定之一是，撤销了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逐步代替了过去

的长江局。另一决定是改组原东南分局为东南局，项英、饶漱石任书记、副书记，归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领导。从此刘少奇和饶漱石，便逐步掌握了新四军。

「千古奇冤」是谁制造的？

刘少奇等直接介入，新四军内部的矛盾变得更为复杂。当时，叶挺属于「非党人士」，项英属于党内的「非毛派」，叶项斗争中，刘少奇利用他们的矛盾和通过饶漱石向新四军掺沙子，项英的地位也渐趋孤立。

中原局成立以后，以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为中心展开活动。其时，新四军内部发生高敬亭问题。

高敬亭原是鄂豫皖边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旧部，改编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由于四支队当时人数最多，新四军改编时占全军十分之七，所以高敬亭常常口出狂言，认为新四军这块招牌主要靠他。1939 年 6 月 24 日，张云逸（参谋长）执行叶挺的命令将高枪决。宣布高的罪名是：居功自傲，排斥中央干部，违抗命令等等。项英认为，高敬亭问题主要是他的作风，可以教育，其它罪名不成立。叶挺坚持杀高，主要在于树立他在新四军的领导威信。刘少奇当时的策略是「拉叶打项」，支持叶挺。不仅如此，刘少奇当时还要叶挺直接请示蒋介石，蒋见到高的罪名是「违法乱纪」，当即批示叶挺，所请枪决高敬亭一案「照准」。高敬亭被杀，叶挺和项英的对抗也升高了。

「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新四军北撤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国共双方的说法各有偏颇之处。一部分中共党史资料，说项英阻挠北撤也非事实。

早在 1939 年 1 月，新四军即已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向西防御。其后，1940 年，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又发出通报：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措词虽略有不同，皆强调「北进」。在 1939 年 1 月的新四军一次军事会议中即指出，安徽泾县

云岭（军部所在地），四周孤立，地方很小，目标很大，极难发展等等，说明中共早已在内部动员「北进」。

但是，问题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共的「北进」并不等于国民党所说的「北撤」，「北进」是进攻，「北撤」是退却（后来中共改称为「北移」）。项英认为，北进必须先稳定和巩固南方，这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不冲突。新四军内部争执的焦点，主要是指挥权的斗争。

1939 年 4 月，叶挺、张云逸渡江成立江北指挥部，项英并不反对，但是项英认为，叶挺的权力仅限于「江北指挥部」，而新四军军部必须听项英的。双方告到延安，中共中央指示，皖北部队必须由中原局指挥。对于叶项的军事指挥权实际未置可否。所以，项英婉拒了刘少奇的开会邀请，刘少奇控制下的江北指挥部也拒不执行项英的命令。

1940 年 10 月，苏北的黄桥之战，国军大败，使蒋介石下了决心，处理新四军的北撤问题。10 月 19 日，国府皓电，指责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不遵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守编制，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打友军。其实，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已一再宣称，不放弃自己的组织独立性，扩大发展群众武装力量，中共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中共对皓电要求「北撤」并未拒绝。但是，中共一再拖延，蒋介石的最后限期是 194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四军内部领导层正忙于内部斗争，互相勾心斗角不已。11 月 3 日，叶挺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未通知项英参加，会后，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为统一陇海铁路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成立联合指挥部。中共中央复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代理），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资料来源见 1940 年 11 月，中原局与中共中央往来电）。由此可见，在「皖南事变」以前，刘少奇即已将项英排除在新四军领导之外。12 月 28 日，项英也召开了新四军军委会扩大会议，叶挺被规定为「列席」，没有表决权。此时新四军内部已演变为刘（少奇）项（英）为主的权力斗争，叶挺不过是花瓶，也

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工具。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开始北撤，叶挺、项英各自为战，1 月 8 日，叶挺脱离军部，项英派人追回，1 月 9 日，项英又率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脱离军部。10 日折回，时军部已无人。11 日，刘少奇、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将项英撤职。这时的饶漱石已是中原局的副书记，刘少奇的主要助手，也成了新四军政治上的实际负责人。1 月 18 日，饶漱石命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被扣。

「皖南事变」后的两派斗争

「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关于叶项的公案未了。关于项英的部分，中共先说他失踪。50 年代中共以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为基调，认为新四军在皖南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六十年代，项英被进一步定性为「叛徒」，其中一部分原因出于江青的私怨。杨帆在新四军工作时，听说毛泽东和江青相恋，对项英谈了很多江青的上海私生活的丑事，杨帆在项英的鼓励下写出了，又由项英加油添醋转中共中央。文革前后，项英虽然死了多年仍一再受到鞭尸。刘少奇和江青先后是鞭尸项英的主角。文革前刘少奇借批项反周，文革期间江青把当时刘的助手杨帆斗疯了。这一页历史，共产党员也啼笑皆非吧。

四人帮倒台后，1982 年李一氓著文为项英平反，肯定项英对新四军的贡献。其后，当年项英身边的同志如谢忠良、黄诚、马长炎等都写出他们目睹项英落难经过，证明项英之死既非叛党，也非烈士，基本上与政治无关。经过是：项英躲在山沟，有一天脱光衣服捉虱子，露出大批黄金烟土，被他的副官刘厚总见到，刘杀项英动机纯属谋财害命。

八十年代末期，中共极左派又写出以「皖南事变」为主题的小说，丑化项英。另外，有一批人出版「项英传」，并于 1991 年举行「皖南事变」五十周年纪念，赞扬项英，有关项英的功过，争论再起，迄无

定论。

至于叶挺，目前在中共中央党史档案室存有一份 1941 年 1 月 11 日叶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原电被人挖去了几个字，是这样的，「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 X X X X X X 之缺点，实一因。」这几个「X」字可能是很重要的。

笔者试对「皖南事变」作简短结论如下：

一、当年国军聚歼新四军，周恩来曾说过，主要动机出于国军黄桥之败的复仇。我再补充一点：1940 年 10 月，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聚歼国军以后，国共双方都有密令。国军密令彻底消灭江南共军，共军密令彻底消灭江北国军，可见，「皖南事变」发生的背景应就当时国共斗争形势的全局加以分析。

二、「皖南事变」后，一部分逃出的干部曾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国军特务的罪名拘捕受审，例如第七师参谋长李志高被迫自杀。八十年代末，中共「皖南事变」论战时，双方乱扣帽子，火药味很浓，互指对方的观点有助于国民党。所以，「皖南事变」真相的考证，难度是相当大的。

三、中共批项的文字中说，项英在新四军北移问题上「动摇犹豫」，但对照中共中央文件，这不是项英个人的责任，1940 年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北进或坚持皖南屡有反复。2 月 10 日，中央指示「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5 月 4 日中央指示「皖南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发展」，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个人具名的直接指示。11 月 1 日，中央指示项英，可以拖延一两个月北移，并就北移与留皖南准备两手策略，可进可留。12 月 26 日，毛又电项，责项为何不遵令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以上的事实都说明，出尔反尔，责在中共中央。

四、中共具体处理新四军问题，前期周恩来有较大的发言权，后期刘少奇逐步取得主导权。所以，周恩来所说的「千古奇冤」，我认

为岂止「江南一叶」（叶挺）？叶挺固然是最大的受害者，项英何尝不也是受害者？叶最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政委制ＸＸＸＸ之缺点」，可见叶挺不恨项英个人，而责中共的「政委制」。日后新四军领导中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几乎同出一辙。

五、历史的发展有一定连贯性，国民党打败红四方面军和皖南事变，都为毛泽东消除了党内两个实力派的劲敌，为日后毛泽东的独裁帮助很大；在抗战期间，刘少奇的两员干将，薄一波在山西以新军名义发展，饶漱石以华中局书记直接掌握新四军，都为日后的毛刘联盟奠定基础。

六、「皖南事变」中的大赢家是刘少奇，刘氏最后又惨死于文革。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谁是真正的赢家？在中共历史上这些账怎么算呢？

第十二章 毛周刘的对抗与联盟

前文笔者一再强调，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从六大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是主流。中共没有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就是国际路线，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王明传达，由周恩来具体执行的路线，王明路线也可以解释为周恩来路线。

我的上述观点和中共官方党史的说法完全不同，中共官方党史一向把毛周的矛盾与残酷斗争加以掩盖，而且描述毛泽东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合作无间。这是大谎话。如果不拆穿这个大谎话，我们无法认清这个党的真面目。

权争对象不断变化

我前文说过，中共一大到六大主要斗争的对象是陈独秀，六大以后，不论中共什么人当总书记，都由周恩来掌握实权。而在这同时毛泽东领导游击战争，逐步在农村扎根。在上述情况下，周恩来有了党权要夺军权，他的主要对手是毛泽东，毛泽东有了军权要夺党权，他的主要对手是周恩来，这个发展过程是很自然的。

共产党整人一向不择手段，这是我们所共认的。当年江西以 AB 团罪名杀人，中共部分史料已经透露，点了毛泽东的名，毛以打击 AB 团为名杀人无数，这是事实。但是真相只说出一半，另一半真相是，苏区反 AB 团第一号命令是周恩来下的，当时的目的是打击毛派抗命，接着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不仅认真执行，而且用了周恩来的武器，借口反 AB 团，把一切反毛、非毛的力量加以镇压。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年毛周双方，毛在苏区坚拒周的「调虎离山」之计，周奈何不了毛。周则奔走于上海、莫斯科之间，自持有「毛子」（当年毛派都贬称共产国际代表为「毛子」）支持，毛也奈何不了周。后来周恩来到了江两，周斗毛，毛斗周，你来我往，互有斩获，到遵义会议一役，毛把周摔倒了。

遵义会议，毛胜周败，但是他们的老根据地（即江西苏区，亦称中央苏区）没有了，毛周两个人政治生命，为形势所迫，他们只好团结，投奔张国焘，为了活命，不惜甘拜张国焘主席，其后又弃张而逃。到了陕北，找到立脚点，又演了第二次「火并王伦」。这故事出自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简单的内容是，落难者苦苦求山大王收容，然后把山大王杀了，自立为王。红军「火并王伦」的故事很多。第一次是投奔井冈山，然后杀了山大王袁文才、王佐；这一次是投奔陕北，实行「火线整肃」杀了许多陕北红军主要领导人。

红军从江西逃出以后，毛泽东一路上先开遵义会议斗了周恩来，到了四川又骗了张国焘，再到了陕北，又把陕北土共主要领袖杀了，旧的矛盾刚刚过去，新的矛盾又来了，毛泽东眼里对周恩来总是看不顺眼，但是又离不开他。周恩来在和毛泽东合作对付张国焘，在陕北对付土共时，立功很多，周的立功愈多，毛对他愈看不顺眼，于是，毛泽东到陕北以后，就以检讨「白区工作」为突破点，采取联合刘少奇，抑制周恩来的策略。后来刘少奇的力量坐大了，毛刘之间的矛盾突出，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再度联盟扑杀了刘少奇。文革中，林彪、江青都不过是工具而已。

召开七大的反常现象

中共正式成立于 1921 年 7 月，二大举行于 1922 年 7 月，三大举行于 1923 年 6 月，四大举行于 1925 年 1 月，五大举行于 1927 年 4 月，六大举行于 1928 年 6 月，平均每隔一年多（约 13 个月）举行一次大会。1928 年 6 月的中共六大到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的召开，距离竟达 17 年之久，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据陆定一回忆，中共七大原定 1930 年内召开，并经指定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起草党纲，当时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毛派主张在中国国内举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也不一致，国内的毛派与周派反复较量，都争取掌握控制七大，一再推迟之下，中共七大到 1945 年才得召开，这一推迟改变了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1930 年基本上属于周恩来控制中央的时代，1945 年已经是毛泽东控制中央的时代了。

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期内，党内斗争以毛周为主，红军退出江西苏区后，在遵义会议中，毛泽东击败周恩来，自此即进入一个毛周连手反张国焘的斗争。到延安以后，张国焘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周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联盟逐渐浮现了。

1937 年王明回国，周恩来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重新提出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迫于次年「中共中央三月政治局」通过，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王明为书记，决议并通过中共七大于一年内召开。随后中共出现两个中央（延安中央，武汉的长江局），两个联盟（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联盟，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之间的对抗，拖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王明「留」（扣）在延安，七大的准备工作就流产了。

毛刘联盟的形成

毛刘联盟的形成，直接的原因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决定首先消减陕北土共力量，陕北土共各派历史上与张幕陶的历史背景有关，张幕陶在六大是追随周恩来的，六届四中后他又参加反对派的「临中派」，为中共中央开除，又成为华北反共反蒋军阀的幕僚，后来再成为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骨干，周恩来根据统战冯玉祥的需要，恢复了张幕陶的党籍。张成冯抗日同盟军的中共特委书记。

1935 年底，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奉命赴华北重组北方局，这同时，原北方局的负责人饶漱石也派了柯庆施为抗日同盟军的前委书记，后来随着抗日同盟军的瓦解，柯庆施回到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张幕陶在华北军阀中继续活动，对陕北土共也保持相当的影响力。中共反张幕陶，实际上是借口打击陕北土共的实力派的。

1937 年春，刘少奇回到延安，向中央连续写了四篇万言书，批评过去白区的工作执行过左政策而遭致严重损失，支持周恩来与支持

刘少奇的两派激烈冲突，毛泽东表态支持了刘少奇。

周恩来与刘少奇之间历史上也有长期矛盾。最早出现于顺直省委，顺直省委是中共北方局的前身。早期中共的领导人有蔡和森、彭述之、陈潭秋等。20 年代末期，顺直省委派系林立，纠纷不断。有省委、第二省委等等，省委的代号是「潭少连」，潭即陈潭秋，少即刘少奇，连即韩连会，这三个人是当时顺直省委的负责人。

1928 年 12 月，周恩来到达天津巡视顺直省委工作，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周在会上严厉批评顺直省委组织松散，并提出由张幕陶接刘少奇为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张幕陶，周恩来竭力为张辩护，保他过关，刘少奇被撤职后离开顺直省委。

1930 年，刘少奇担任中国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其后担任中央职工部长，1932 年被上海临时中央批评刘少奇右倾，又被撤职。张闻天说刘少奇的立场动摇。当时的张闻天属于周恩来的国际派。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在历史上早有矛盾。

抗战开始前后，山西阎锡山身边有两个共产党红人，一个是薄一波，他是山西人，从北平国民党监狱中假自首被释出狱，回到山西，阎锡山相信他已经反共，支持他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队，这两个组织成为刘派在山西最早也是最大的武装力量。

阎锡山身边另一个共产党红人是张幕陶，他也打着拥阎的旗帜成立了战地工作委员会和民族革命大学。周恩来为了统战阎，与张也有接触。薄一波「牺牲救国同盟会」向阎控告张幕陶是「托派汉奸」，阎未加理会，后来薄一波就派人到民族革命大学把张幕陶活活打死了。

延安整风开始，毛为刘少奇造势

笔者在「皖南事件真相」一章中，已经写过，在新四军项英与叶挺的对立，陈毅与饶漱石的对立，背后皆为周恩来、刘少奇的分别操

纵，这里不再重复。

历史常出现误区，不是人的意愿所决定的。毛泽东控制中共，蒋介石帮了他两个大忙。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有两个最大的对手，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项英，这两个人都是中共的实力派，张国焘的主力是1935年在成都的百夫长被蒋介石击溃的，项英的主力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被蒋介石歼灭的，在这两个战役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特别是军队方面，完全没有反对力量了。

毛派要整国际派，蓄谋以久。六届六中，当时毛泽东骂王明是「婊子」，王明如果也还骂毛一声毛是「婊子」，会上岂不更活跃，可是王明竟毫无还手之力，颇令大家失望。而周恩来这么个人呢，他一心要把王明推在台前倒毛，自己在幕后筹谋划策，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腿就软了，一听老毛骂「婊子」，立刻感到自己两脚无力到要倒在毛泽东怀里。

1941年2月起，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5月，毛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继之9月11日，陈云说：「刘少奇同志是代表过去十年白区工作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正确，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9月29日，康生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在白区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当时刘少奇本人不在延安，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延安整风开始，高层都看出这次整风毛泽东的意向，以反王明为名，统一全党的思想，确立毛泽东个人领导地位。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要换刘少奇，于是纷纷表态，支持刘少奇，刘也匆匆从敌后赶返延安。

在这同时，经过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周恩来、项英为代表的新四军力量主力覆灭；同年6月，希特勒挥军攻苏，红军西线崩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威信大为削弱。毛泽东乘苏联自顾不暇，无力应付西线战争；威胁苏联，要求苏联停止支持蒋介石抗日，把飞机大炮援助毛泽东，夺取甘肃，继而夺取西南，毛的这个计划，没有获得

苏联的支持。虽然这时苏联已承认毛对中共的领导地位。

1942 年 6 月 2 日，党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毛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总学委以下作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负责党中央直属机关；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高岗成了「延安整风」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手握大权，认为陕北过去被整者报仇的时机来了，12 月，意气风发的高岗主持了西北局高干会，一一指责了他过去的政敌，康生也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宣传延安「特务如麻」，在这同时，刘少奇在布置华中和新四军的工作后，回到延安。1943 年元旦，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刘少奇的大会。

如前所述，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还通过中央会议的召集不定时，由主席决定，中央会议的决议由主席同意才属有效，这次会议中又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处理主席交办的日常事务。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有：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八人，刘少奇为组织委员会书记。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成立反内奸委员会，委员中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等，刘为主任。自此「延安整风」以毛挂帅，刘少奇领导，康生具体执行，高岗配合康生制造了一些边区除内奸的样版故事。后日中共党史把「延安整风」的罪行全部归于康生一个人，是不符史实的。

矛头直指周恩来

1943 年 6 月，周恩来在毛泽东一再电催之下，要他参加筹备七大，他抵达延安后，与朱德、林伯渠等晤谈，了解整风情况，要他作检讨的准备。

当时延安小道消息中有一则是，现在王明卧病在床，动弹不得。王稼祥、秦邦宪、张闻天也没有多大危险了；只有一个老狐狸经验主

义者，毛主席最不放心。这个「经验主义」者显然是指周恩来的。

针对上述的情况，周恩来在 8 月 2 日的晚会上讲话，对毛泽东表态交心，周说：「什么是胜利的保证，胜利就握在毛泽东同志手中。」「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9 月 7 日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毛泽东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其中只有毛泽东、刘少奇是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的。」接着，康生发言，一口气数了王明六十多条罪状，其中都是与六大后周恩来当家以来发生的事。这么一来，会中情绪激动，骂的是王明，真正打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说：「六届四中，王明上台，篡党篡军篡政，用的是流氓手段，六届四中是不合法的。恩来同志要彻底检查。」

毛泽东又说：「抗战期间，王明和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幻想与国民党结成同盟，实际上是国民党、大地主、买办阶级在中共党内的应声虫和代理人。」

毛泽东又说：「长江局配合蒋介石保卫大武汉，新华日报成了国民党的报纸，缺少阶级立场和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长江局是反党的。」

毛泽东又说：「你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用教条八股吓人，其实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按『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学习苏联共产党的整党经验。」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曾受到不公正的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曾说了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周恩来当时在延安，每天要听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等人对他的教育，就中共的历史问题，要周重新认识，说周既犯了左倾又犯了右倾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王稼祥和周恩来作过一次私人谈话。周说：

「我的确要对很多党的错失要负责任，但是，说我周某有过反党行为我是不能接受的。」王稼祥说：「恩来同志，你是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人怀疑你对党的忠诚。一个布尔什维克为党受一点委屈是应该的。恩来，为了党的领导威信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领导威信，你就对所有的指责承担责任吧。虽然有些罪名对你有些委屈，但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的团结，你说一声一切错误全部由你负责，这就是你对党最大的贡献了。」文革期间，一位逃到香港的中共干部对我说过这段史实，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信的。

1943 年 11 月 27 日、28 日，12 月 1、2、3 日，周恩来一共作了五天的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之前，毛泽东先作『一段风趣的讲话，毛说，这次整风，党的整风是脱裤子，让自己赤身露体暴露，然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洗澡，洗清自己身体内外不洁的污物；最后是擦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病的人就感到舒畅了。毛泽东最后说了句：「现在，我们看恩来脱裤子吧。」大家笑了。周恩来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启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了一句：「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这是一场好戏的开场白。

1943 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个人的关注。毛泽东回电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周恩来后来说，经过这次延安整风，他「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但是，毛泽东依然当面污辱周恩来，有一次，毛把周叫到身边，周恭恭敬敬连叫了三次「主席」，毛才应了一个「嗯」字。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也接受了周恩来的一个观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也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共绝对不能与苏联闹翻。」当时毛表示接受。后来证明中共经过辽沈之战到建立全国政权，苏联的支持非常重要。

中共七大，刘周对决

中共的延安整风与筹备七大，是同时进行的。薄一波记述 1943 年 11 月，他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带母亲同去，把母亲安置在一个深沟的窑洞居住。……母亲对他说：「这里不能住，每天夜里闹鬼呀。」薄按方向查看，原来有几个窑洞关着上百青年，都神经失常，大哭大笑，他们都是整风中送来的。

薄一波见到毛泽东，毛对他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七大时，刘少奇负责党章修改的起草。其中有一条是「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出现分歧，刘将其中「任何」二字删掉，周又加上，刘又删掉，反复较量了许多次。最后周说，「我过去在中央工作时，就是因为没有人敢对自己提不同意见所以错误愈犯愈深。我的错误党应该引以为诫，不可再犯。」最后，刘少奇没有理会周恩来。

薄一波记述：「在党的七大上……本来我是作候补中委提名的，陈赓同志（周恩来的亲信——作者注）觉得我是从监狱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少奇同志向毛主席报告。」结果，在毛的支持下，薄当选中央委员。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亲信，陈赓是周恩来的亲信，在中共七大中，代表中有人对周恩来的党龄提出疑问，周恩来 1920 年在欧洲参加德共，他的党籍是 1924 年通过共产国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利用这个借口，降低周恩来在中共党的历史地位。

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周恩来的名次落在林彪、高岗、饶漱石、康生之后。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员中，周恩来占第二十三名。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主管日常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刘少奇正式升为毛泽东以下的第二号人物。8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在毛泽东离开时，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

刘少奇盛气凌人

中共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王稼祥。中共七大时第一个主张把「毛泽东思想」放进党章的是刘少奇。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共七大后，毛泽东横扫群雄，刘少奇盛气凌人。过去反毛者也争先表态对毛效忠。1949 年 3 月，王明在七届二中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刘少奇打断他的话，刘说，王明上述这句话是假的，是掩护，是放毒。5 月，周恩来在中国青年代表大会上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但不是神，不是圣人……。」1956 年由于苏联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共党内高层震动极大。中共八大时，没有再把「毛泽东思想」放进党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股暗流，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刘少奇也跟风而进。

1957 年，毛泽东谈大鸣大放，说鸣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刘少奇后来发挥说，大家都闻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说，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阴谋是阳谋，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翘起尾巴了。刘又加以发挥说：「贱嘛！」刘少奇并说，「他本来是反对大鸣大放的，认为鸣放的后果不可收拾。后来也觉得放屁放得好。」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中，反冒进之声泛滥，毛泽东、刘少奇认为，带头吹反冒进之风的是周恩来。3 月成都会议，毛坚持要周写检讨，刘少奇对邓颖超说：「毛主席脾气你和恩来都应该是熟悉的，毛主席对我说了重话『恩来不写检讨就叫他滚蛋』，你就劝劝恩来吧。」邓与周夫妇吵了一架，邓说：「延安整风时，你自己说过，谁反对毛泽东同志，谁就是反党，恩来你不检讨，这个关过不了，我们的前途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都完了」，邓颖超大哭大闹，周恩来终于写了检讨。11 月，郑州会议中，反冒进之声仍然没完没了，毛刘认为，后台一定仍是周恩来。毛泽东把周恩来毒骂了一顿。然后又在会议上气愤的指责说，「搞不好，党要分裂，一分为二。」刘少奇指着周恩来说：「你要负分裂党的责任。」

1959 年庐山会议斗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康生、林彪等都很积极，这时党内各派都打着拥毛的旗帜，以牺牲彭德怀为手段，巩固与扩大自己的权势为目的，「拥毛」已经不是刘少奇的专利。1960 年，邓颖超在北戴河盛宴高层首长夫人，可能当时周恩来是有所企图的。1961 年，毛泽东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他仍旧清楚地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蒙哥马利再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拒绝表态，他对周恩来还是戒备很深的。

中共领导层的关系不断在变化中，刘少奇本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1961 年初，刘回到湖南。看到乡亲们都在饥饿中，普遍的脚肿病，土地一片荒凉……回到北京，5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说：「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是主要原因。」7 月，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搞下去会跌下台的，再也不能这样搞了。」

1962 年 丨 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刘又指出，现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矛头直指毛泽东。刘又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反对为彭德怀平反，因为把彭打成反党，刘少奇扮演了主要角色。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中说：「中国现在到了该刹车的时候，再不刹车，就要散架了。」王稼祥发言也呼应刘少奇的意见，他说，为了渡过难关，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要缓和，援外要减少。

七千人大会中，毛泽东故意表现出虚怀若谷，没有直接提出不同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意见，不过后来他说，七千人大会「刮了两个风，『翻案风』和『单干风』，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暗藏杀机，蓄势待发。

文革前夕，毛周合作

1964 年四清运动，主要针对农村，毛刘两派在基层展开夺权，白刃搏斗，毛认为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刘少奇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刘少奇认为，四清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包括外交，包产到户等。毛泽东扬言说，他的政权已有三分之一落到敌人（指刘派）手上。刘少奇扬言，四清遇到「四不清」（指毛派）的抵制，「四不清」是反党反革命。

1965 年 1 月，中共开会，毛刘就四清的目标针锋相对，当时多数代表认为刘的观点是对的，毛泽东当场情绪激动地对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我死了你接不上，我现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以后由你挂帅，你骂娘。」在此同时，三届人大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反驳说，毛的「这种提法，在马列著作里从未见过」。毛泽东又提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在毛泽东的鼓动下，文化大批判接踵而来，毛把意识形态与文艺作品中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加以清算，认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挨批挨斗的作品多数是与政治无关的。文化大批判从文艺界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方面，又发展到对「海瑞罢官」的全面挞伐，说这部戏的要害是「罢官」两个字，是准备为彭德怀翻案的，自此，文化大批判上升为政治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开始了。

江青感到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力。转而找周恩来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北京各报才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966 年 3 月底，毛泽东表示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毛特别指出，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云云。5 月 16 日，中央讨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与会者谁都不知道指的是谁，刘少奇也举手了。

文革初起时，周恩来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真正的第二号人物。其余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都是工具。

文革前夕，中共中央将一个关键人物杨尚昆调离了关键的职位。杨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曾经既是国际派，又在全国总工会和北方局与刘少奇同事，对周恩来政治上的反复多变掌握的资料最多。

杨尚昆的回忆中有他与周恩来文革前夕的一次谈话。

1965 年 12 月，当时中央决定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去广东省委工作。杨去周恩来处辞行。他记述说：「我默默地望着他，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记得在这次谈话中，我曾对周总理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它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这段简单的含蓄的话，内容很多。尤其是「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真是可圈可点，以杨尚昆和留俄派的历史关系，以周恩来和王明的历史关系，以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恩恩怨怨，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尽在杨尚昆的一笔账中，杨尚昆当时等于是向周恩来保证说：「我绝不会出卖你的。」也有一点暗示：「你周某不能对我逼人太甚。」

1966 年月文化大革命起，杨尚昆果然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同时被捕，杨尚昆的罪名是「背着党中央私设窃听器，泄漏大量党的秘密。」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周恩来临死有个「叛徒」尾巴

1966 年 4 月，中央会议中，周恩来批判了彭真，「一系列的错误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彭真和薄一波都是刘少奇手下的主将。其后周恩来又下令逮捕薄一波、安子文等，并成立「六十一叛徒集团专案组」，组长为周恩来。

造反派审判王光美，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并成立了「王光美项目组」，组长也是周恩来。当时刘少奇找周恩来，对周说：「我要辞去国家主席，回老家或延安去种田。」周回答刘，这很难啊，只有人大有权决定，其实当时人大已经瘫痪。刘在去找毛，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毛问「为什么？」，刘答「我辞职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停止了。」刘走后，毛对江青说「刘要辞职，是有条件的，要保护走资派。」

周恩来当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否则，让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野心家上台，中国肯定复辟资本主义，千万人头落地。」因此，毛泽东批示：「刘少奇专案组，由总理（周恩来）亲自抓。」周恩来又问刘少奇「1936 年 8 月，在你主持北方局期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为什么？」刘答：「这事当时因为我党的人才尽在国民党监狱中，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这个计划，用假反共争取出狱，北方局把这个意见请示中央，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批示执行，我请恩来同志复查中央档案。」周恩来脸色一沉，对刘少奇说：「你不要叫我恩来同志了。」

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 12 次全会中，通过了以周恩来为组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的报告，并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打倒了，后来四人帮时代，周又被毛以「伍豪（周恩来）脱党启示」纠缠不已，1975 年，周两次电毛说，「我不是叛徒。」并在有关的资料上，用发抖的手签了字，周临死以前，口中念念有词：「我不是叛徒。」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周恩来是不是中共的叛徒呢？这个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30 年代初，上海的报纸刊出伍豪（周恩来）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当时的周恩来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也通过各种渠道辟谣。这事后来又查出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特务科长张冲干的。

在第一国共合作时，张冲是国民党派到苏联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他和周恩来在苏联时就是老朋友，张冲回国后当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周恩来成了中共的特务头子。这两个「老朋友」在抗战前国共合作谈判时，张冲代表国民党，周恩来代表中共，两个老朋友面对面又在一起了。

周恩来与张冲在公开谈判时，两人各为其主，态度严肃，针锋相对，立场坚定，斗争激烈。在私人间交谈时，两人卿卿我我，周拉张的手，张亲周的脸，旁观者都认为他们的亲热是相互为了政治的需要，谁统战谁，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也有好事者怀疑，周恩来与张冲有同性恋关系。

1942 年张冲心脏病发逝世，周恩来的哀痛如丧考妣，哭倒在地。两年前他自己的父亲逝世，他也没有这样伤心过。周恩来为张冲逝世的悲痛之情，一般人的反应都认为属于党的统战表演之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直指周恩来，当年荒唐的「伍豪启事」又被毛泽东从他的弹药库搬出作为清算周恩来「叛党」的武器，如果周恩来死的时间稍迟几个月，中国大陆一场反对「叛徒周恩来」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毛周在文革期间，又一度合作，周对毛虽然一再下拜表示效忠，但毛始终不信他，江青说过周恩来「貌似忠贞实属大奸」，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的。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毛泽东相信鬼神之说

共产党人是信仰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说他们相信鬼神，人们一定不相信，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也是不相信的。

不过，我的确亲自在延安听过一些鬼故事，我在前面已经写过在延安边区医院时，病人聊天，既不敢谈政治，大家就谈鬼。许多年后，我才理解，为什么许多同志相信有鬼呢？因为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经过许多可怖的故事。有些鬼故事都与中共的肃反有关。所以有人对我说：「毛泽东也是怕鬼的。」

抗战期间，我从重庆到浙西，经过赣南、闽西的老苏区，住在小旅馆中，人们都告诫我说：「你晚上不要出门，要遇到鬼的。」白天我跟着当地老百姓在附近农村逛，见到一些大坟墓，人们指着对我说：「这边埋了大约一千人，那边埋了大约一千五百人。」其中有个最大的被称为「万人坑」。我问：「这些人是被枪毙的吗？」他们说：「当时『共匪』哪里有这么多的子弹，是活活埋死的。」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当地的人习惯仍称红军游击队为「共匪」。

大陆「解放」以后，我从中共的报刊上看到，我当年去过的那些老苏区，成了哑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哑子，因为他们的家人当年都以 AB 团罪名被杀，杀他们家人的共产党如今已经得了天下，更不敢讲话了。我在前面说过，这些哑区的人民，直到胡耀邦时代才敢开口说话了。

中共肃反的地区，以人口比例计算最多的是湘西，当时湘西的中共领导人夏曦杀人杀得自己红了眼，精神失常，夜夜叫出鬼声，行军途中跌入一个水塘被淹死了。人们传说是鬼把他拉下水的。

1949 年，章士钊作为李宗仁的和谈代表之一到达北京，章见了毛泽东，第一句话：「润之，总算我把你看对了，你信不信，我善观天象，当年我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你来借钱帮助你们的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我早就看出，你有真命天子帝王之相。」对我讲这段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故事的人叫吴季玉，早年和章士钊都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门下的食客。

我的抗大同学中，有一个叫雷英夫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自称会看相算命，握住女同志的手看手相。起初我笑他占点便宜而已，有人却说他真是准极了。后来抗大不再见到雷英夫了。再后来听说中共很多领导人都接见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奇才。1940 年我在重庆又见到这位仁兄，他吹得更大了。他说许多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是相信星象的。我说：「唯物主义者怎么会相信星象呢？」他说：「星象也是物呀。」雷英夫又说：「他曾对毛泽东说，星象是一门科学，不是迷信。」毛把他派在叶剑英身边当参谋。叶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以后，此人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据说韩战期间他准确判断美军的登陆地点，立了大功，毛和中央军委都表扬了他。

文革前夕，雷英夫给毛泽东一份秘密报告，列出许多理由，判断刘少奇要夺毛泽东的权。据说雷英夫这份报告还保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他到底发生了多大作用则不得而知，不过「四人帮」倒台后，雷英夫到处向人诉苦说，当年他的那份报告是被别人逼出来的。

毛泽东的八三四一部队，传说毛要一个相士给他的警卫部队一个吉祥的代号，相士告诉他「八三四一」最好，结果毛泽东死时活了 83 岁，他从 1935 年遵义会议夺权到 1976 年死时一共当权 41 年，据说叶剑英也认为这个相士灵极了。

江西肃反时，也有一个关于毛泽东的传说，因为毛杀人太多，常常感到死鬼纠缠。毛秘密扶乩（扶乩是推沙盘与鬼交谈的迷信），他的秘书古柏问：「你要和谁说话？」毛答：「我要找马克思。」古柏说：「马克思不懂中国话呀。」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党牺牲的同志中有很多留德的，调他们当翻译。」于是毛泽东问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沙盘上出现了「鬼，鬼，鬼」三个字。所以毛一生都相信他身边有鬼。

对我讲这段故事的是邓文仪。邓文仪是早期留俄学生，回国后成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为激烈反共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5 年他担任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蒋委员长给他一个紧急秘密任务，要他代表蒋要求苏方合作抗日，为了抗日，苏方必须命令中共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暴乱。苏方没有表态，把问题交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把问题交给中共驻国际的代表团，潘汉年和王明接见了他，对他说要国民政府和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谈判。邓文仪说，此后他和中共代表团的私人间也有些接触。其中有一个人对他胡聊上述的传说。

我和邓文仪在抗战时的第三战区见过面，后来在纽约再见时，我请他在华埠永胜西餐厅吃饭，从中午谈到晚上，无所不谈，我印象较深的，一是上述毛泽东的扶乩，二是他说自己相信扶乩，他曾在一次扶乩中请到蒋介石，沙盘上出现八个字：「三年反攻，一定胜利。」这段鬼话，后来成了历史的笑话。

我所见证的中共历史，只能写出自己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不想作出结论。因为中国共产党还在继续走他们的路，新的一代中共党人，也许他们可能对中共的历史要重新认识，重新检讨，历史的罪恶，不直接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中国的未来怎么办，怎么走？他们应该学习历史的教训认真思考，以下，我只能就我个人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心得，用学习当年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精神，提供给新一代的中共党人参考。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全书结尾语 我一生最后的愿望

——学习蔡元培先生

写完这本「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有一点感想，我晚年颇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与启发。为什么，首先，我简要地介绍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字孑民，自幼苦学，什么硕士，博士的文凭都没有，他从6 岁起，一直读私熟或担任塾师。17 岁中秀才，23 岁中举人，26 岁为进士，28 岁入翰林院，清朝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所，翰林皆顶尖的大学士，蔡元培国学根基很深，博览群书，中国古代经典背诵如流，28 岁前，不闻天下事，专读圣贤书，入翰林院后，才开始留心时事，30 岁才旁及自然科学的。蔡元培先生的外文多属自修，32 岁学日文，33 岁学英文，37 岁学德文。1907 年，蔡元培 41 岁了，到德国留学，潜心研究康德美学，他在留学期间，要靠替人补习赚一点钱。他给吴稚晖的信中说，他当时过的是「半佣半丐」的生活。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917 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京大学开创新的学风，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保姆，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初，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相容并包。」我们仅从这 16 个字，就可以理解蔡先生当年主持北大的胸襟和怀抱。

蔡先生主持北大时，北大精神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倡百家争鸣，主张学术在自由竞争中发展。蔡先生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它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思想活跃，人才辈出，主要因为他虚怀若谷，用人不徇私情，破格取材，不问他是不是什么博士硕士，也不管他是左的右的，新的旧的，复古的维新的，按蔡先生自己的说法，不问人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的政治思想，只问他的真实学问。

蔡先生一生的功业，都是从力主学术思想自由出发的。梁漱溟说：「蔡先生成就之伟大，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潮流，冲破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并从而直接培养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柳亚子说：蔡先生「和平敦厚，霭然使人如坐春风」。蔡先生主持北大，求才心切，当年的北大教授，都有一些亲身经历的故事，例如：

陈独秀，蔡先生钦其办「白话报」的毅力，「新青年」杂志对青年的启发与影响，亲自登门拜访，聘为北大教授。

胡适，他在「新青年」杂志鼓吹新文学，1917 年自美回国，即被聘为北大教授，蔡先生说：「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梁漱溟，梁未进过大学，曾投考北大，未被录取。蔡先生读到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应邀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主持北大，当时各家思想交织，古今中外文化杂陈。教授之中，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人物以外，也有非常守旧保守的，其中有拥清复辟拖着长辫子上课的辜鸿铭，曾经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刘师培等，蔡先生说，辜鸿铭长于英国文学，刘师培长于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教员，旨在以教学为主，在校外之行动，悉听自由。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各开一门课，听谁的，由学生自己选择。

胡适在 1935 年「独立评论」发表过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说：「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种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胡先生这篇文章中，又引用了蔡元培一篇演说中的几句话。蔡先生说：「世界上有黑暗与光明……相斗，光明必占胜利。」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林语堂在一篇文章中说，「那时北大是全国思想的大本营，而北大之所以如此，是蔡先生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

由于蔡先生相容并包的态度，他受到新旧派的共同尊敬，也受到不断的政治压力。有人迫蔡先生把胡适、陈独秀解职。蔡答以只问专业权威，不管政治立场。一切由我负责。

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在各种保守势力的压力下，1923 年被迫辞去北大校长。1924 年 11 月再到德国汉堡大学报名入学，这年他已 58 岁了。1935 年，蔡先生著文说：「假如我的年纪回到 20 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

蔡元培先生终生学习不辍，他曾下过大功夫研究美学，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他曾研究「红楼梦」著有「石头记索隐」；他曾提出改造中国文字，甚至用拉丁文字，他最后在德国读的是民族学，可谓兴趣广泛，学识渊博。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筹划者和第一任院长，抗战开始后，由上海准备去大后方，因病在香港住下。1940 年 3 月 5 日逝世，10 日出殡，全港大专学生五千余人执拂。

挽联中有一幅是：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持美育承宗教（注：蔡先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巨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蔡元培先生出身举人，进士，翰林，他是一位不断进步的学者，他逐渐摆脱教条八股，反对读经，提倡科学民主。我们试想，一个从小读私塾的孩子，啃过多少经书，跨过举人、进士、翰林，终于走向反对读经，摆脱教条八股，提倡科学民主，成为一位举世尊敬的学者，这是何等艰辛的道路。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我毕生以蔡元培先生为师，我一生最后的愿望是，中国青年都学习蔡元培先生。

最后，我再强调一句，我劝中国青年学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奋斗、进取与包容的精神，而不是机械的背诵他过去所有说过的话，蔡元培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敢于挑战一切陈腐的教条，迎接一切新思想，不断创造，不断进步！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

《真相》系列(30)

書　　名：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編　　者：司馬璐
發 行 人：何　頻
責任編輯：李小銘
封面設計：一　劃
校　　對：李子安
出　　版：明鏡出版社
全球資訊網：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info@mirrorbooks.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電話：(516)338-6976 傳真：(516)338-6982
國際統一書號：ISBN 1-932138-15-3
定 價：HK$ 125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二版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vur.me/jwnews/jw/